



杭州概览

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

历史名城



灵秀江南

政通人和



物阜民丰



文化渊藪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主 编：蒋文欢
副 主 编：阮关水 金利权
执 行 主 编：冯跃民
执行副主编：马琦敏 黎似玖
责 任 编 辑：俞美娜 倪 晴 张素卿

前 言

杭州，地处浙江省东北部，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也是国务院确定的重点风景旅游城市 and 历史文化名城。从秦朝设钱唐县以来，杭州建置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五代吴越国和南宋王朝都曾在杭州定都。今天，杭州作为浙江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旅游中心。全市总面积16596平方千米，2017年8月临安撤市设区后，杭州下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滨江、萧山、余杭、富阳、临安10个区及桐庐、淳安、建德3个县市，市区面积8000平方千米，全市常住人口918.8万人。民族以汉族为主，另外还有回、蒙、朝鲜、畲等27个少数民族在此居住。

杭州，风景如画，山水旖旎，自古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杭州依水而兴，因水而美，缘水而名。钱塘江浩浩荡荡，以气势雄壮的钱塘江潮闻名天下；西湖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历代文人墨客在此流连忘返；京杭大运河承载千年漕运之利，造就两岸百业兴盛……此外，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是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境内的千岛湖、大奇山、午潮山、富春江等9个国家森林公园，天目山、清凉峰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等名闻遐迩，是中外游客理想的游憩之地和心灵栖息之地。

杭州，人杰地灵，积淀深厚。她以精魂孕育一代又一代的大师，使这座城市永不负“人文荟萃，名家辈出”之美誉，涌现出政治家如孙权、钱镠，思想家龚自珍、章太炎，文学家白居易、范仲淹、苏轼（苏东坡）、郁达夫等，艺术家刘松年、马远、夏圭、李唐、黄公望、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等，科学家毕昇、沈括、钱学森等，民族英雄岳飞、张苍水（张煌言）等一大批杰出人物。杭州物产众多，是中国的“丝绸之府”；又是“鱼米之乡”“茶叶之都”，为著名绿茶龙井茶的产地。王星记扇子、张小泉剪刀、胡庆余堂国药等地方特产名闻海内外。

杭州，经济发达，活力迸发，是创业创新的新高地。钱塘自古繁华。

自隋开运河，杭州居江河之会走上了大都市的发展历程。历史上曾“珍异所聚，商贾并凑”，被誉为“东南第一州”，一度成为国内最繁华的商业都市。改革开放以来，杭州民营经济异军突起，经济强市粗具规模。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一大批高新企业，引领杭州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随着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落户杭州，杭州已经初步建成全国高技术产业基地、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和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成为全世界优秀人才和创业者向往的创业创新新天堂。

杭州，包容开放，精致和谐，是名副其实的宜居之城。早在元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就赞叹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可以说，杭州不仅是中国的，她还是世界的。千百年来，《梁祝》《白蛇传》等传说增添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而“最美妈妈”“最美司机”的故事更为杭州赢得了“幸福之城”的美誉。

杭州，一个将自然优势与现代产业巧妙结合，引领休闲经济潮流的城市；一个生活就像在旅游，懂得将安宁幸福的感受转化为活力和财富的城市；一个以不温不火的态度和风风火火的速度走出了自己节奏的城市，正一步步迈向别样精彩、独特韵味的世界名城。

杭州，就像一本越读越醇、回味无穷的书。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和杭州市方志馆立足于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以《杭州市志》等权威志书为依据，从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角度，全方位、立体式地反映杭州的前世今生，集杭州八千年文明史、五千年建城史之精华，编成这本以“杭州精览”为书名的普及性读本。真诚希望此书能成为各级干部增加杭州历史知识、培养乡土情怀、认清杭州城市精神的好教材，城市管理者研究发展对策、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决策能力的参考书，广大市民和中外游客了解杭州、认识杭州、推介杭州的好名片。因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难免差错，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编者

2017年12月

第一章
历史名城



第一节 文明溯源	二、修筑海塘	16
一、史前文明	三、撩浚西湖	19
二、跨湖之桥		
三、文明曙光	第四节 南宋都城	
	一、定都临安	21
第二节 东南名郡	二、皇城内外	23
一、钱唐设县	三、百万生聚	26
二、隋开运河		
三、柳浦筑城	第五节 江浙首府	
	一、华贵天城	29
第三节 吴越首府	二、明清省会	32
一、善事中国	三、杭州设市	34

第二章
灵秀江南



第一节 东南形胜	(六) 五云盘旋	48
一、三面云山	(七) 名山天目	50
(一) 玉龙金凤	二、五水共导	53
(二) 双峰插云	(一) 三江水美	53
(三) 孤山胜迹	(二) 千里运河	59
(四) 吴山天风	(三) 诗画两湖	64
(五) 宝石流霞	(四) 一曲溪水	69

(五) 沧海桑田	72	(二) 城池演变	77
三、五水共治	73	(三) 巷陌典故	84
第二节 三吴都会		二、名城新颜	95
一、城邑变迁	75	(一) 城市规划	96
(一) 建制沿革	75	(二) 钱塘江时代	98
		(三) 大道通衢	101

第三章 物阜民丰



第一节 富庶东南		第四节 商贾并凑	
一、自古繁华	105	一、舟楫辐辏	127
二、今更胜昔	107	二、西博盛会	128
		三、最佳商城	131
第二节 珍异所聚		第五节 新兴产业	
一、中国茶都	111	一、旅游休闲	134
二、丝绸之府	116	二、动漫文创	136
		三、电子商务	139
第三节 百工兴盛		第六节 产业平台	
一、实业救国	119	一、开发园区	141
二、百废待兴	122	二、特色小镇	143
三、工业兴市	124		



第一节 政治清平

- 一、开国帝王 149
 - (一) 孙权 149
 - (二) 钱镠 152
- 二、治世能臣 155
 - (一) 李泌 156
 - (二) 白居易 158
 - (三) 范仲淹 162
 - (四) 苏轼(苏东坡) 165
 - (五) 杨孟瑛 169
 - (六) 李卫 171
 - (七) 阮元 174
- 三、清官良吏 176
 - (一) 周新 176
 - (二) 商辂 178
 - (三) 毛际可 180
 - (四) 夏同善 181
- 四、家国英雄 183
 - (一) 岳飞 183
 - (二) 于谦 186
 - (三) 张煌言 189
 - (四) 葛云飞 192
- 五、革命志士 193
 - (一) 章太炎 193
 - (二) 秋瑾 196

- (三) 解放前在杭州牺牲
的浙江省委书记 200

第二节 寄望杭州

- 一、毛泽东 203
- 二、邓小平 206
- 三、江泽民 208
- 四、胡锦涛 210
- 五、习近平 213

第三节 重大决策

- 一、改革开放至2016年
的重大决策 217
- 二、G20杭州峰会 227
 - (一) 峰会概况 228
 - (二) G20杭州峰会文艺
演出 229

第四节 品质之城

- 一、誉满神州 231
- 二、文明样本 237
 - (一) 斑马线让行 237
 - (二) 公共自行车 238
 - (三) 红帽子 238
 - (四) 勇士义举 239
- 三、平安杭州 240



第一节 书风蔚然

一、书院学府	244
(一) 南宋太学	244
(二) 万松书院	246
(三) 紫阳书院	247
(四) 诂经精舍	249
(五) 崇文书院	251
(六) 惠兴女学堂	252
(七) 杭州高级中学	254
(八) 杭州第二中学	257
(九) 蚕学馆	259
(十) 笕桥中央航空 学校	262
(十一) 中国美术学院 ..	264
(十二) 浙江大学	267
(十三) 浙江官立两级 师范学堂	269
二、刻书藏书	273
(一) 文澜阁	273
(二) 浙江图书馆	277
(三) 杭州图书馆	279
(四) 杭州刻书印刷业 ..	280

第二节 笔墨生香

一、诗词歌赋	284
二、墨色丹青	287

三、文学大家

(一) 贺知章	291
(二) 朱淑真	293
(三) 陆游	295
(四) 厉鹗	297
(五) 袁枚	299
(六) 龚自珍	301
(七) 郁达夫	303
四、书画巨匠	305
(一) 褚遂良	305
(二) 黄公望	307
(三) 吴昌硕	309
(四) 黄宾虹	311
(五) 潘天寿	313

第三节 曲韵婉转

一、京剧	317
二、越剧	320
三、杭剧	324
四、睦剧	326
五、小热昏	328
六、杭州评话	330

第四节 杏林春暖

一、知名药号	334
(一) 张同泰药号	334



- (二) 胡庆余堂 336
- 二、中医世家 338
- (一) 竹林寺妇科医学

世家 338

- (二) 富阳东梓关张氏
- 中医骨伤科 339
- (三) 陈木扇女科 341

第五节 经世致用

- 一、崇学明道 344
- 二、格物致知 346
- 三、科教英才 348
- (一) 毕昇 348
- (二) 沈括 350

- (三) 林启 352
- (四) 钱学森 355

第六节 东南佛国

- 一、梵宇古刹 359
- (一) 灵隐寺 359
- (二) 径山万寿禅寺 363
- (三) 净慈寺 365
- (四) 天竺三寺 368
- 二、出世僧人 371
- (一) 延寿 371
- (二) 道潜 372
- (三) 李叔同 374
- (四) 苏曼殊 376

第一节 非遗流韵

- 一、西泠篆刻 382
- 二、清水丝绵 386
- 三、浙派古琴 387
- 四、杭罗织造技艺 389
- 五、王星记扇制作
- 技艺 391
- 六、张小泉剪刀
- 锻制技艺 393

- 七、杭州雕版印刷
- 技艺 395
- 八、中式服装制作
- 技艺 397
- 九、西湖龙井茶采摘
- 制作技艺 398
- 十、西湖绸伞 399
- 十一、杭州织锦
- 技艺 402

第二节 方言谚语

- 一、方言 404
- 二、歇后语 406
- 三、谚语 407
- 四、日常口语 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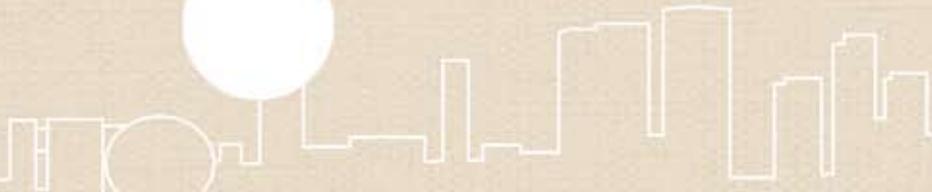
第三节 社会风俗

- 一、生活习俗 414
 - (一) 送春牛图 414
 - (二) 蚕猫辟鼠 415
 - (三) 采茶 415
 - (四) 青龙吉利 415
 - (五) 喜接财神 416
- 二、礼仪习俗 416
 - (一) 婚礼发奁 416
 - (二) 婚礼敬茶 417

- (三) 三朝回门 417
- (四) 催生礼 417
- (五) 生日庆寿 418
- 三、节日习俗 418
 - (一) 春节 418
 - (二) 元宵节 420
 - (三) 寒食节 421
 - (四) 端午节 421
 - (五) 七夕 422
 - (六) 中元节 422
 - (七) 中秋节 422
 - (八) 观潮 423
 - (九) 重阳节 423
 - (十) 腊八日 424
 - (十一) 除夕 425

第二章

历史名城



杭州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是浙江省省会，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中心，长江三角洲南翼重要的中心城市，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点风景旅游城市，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等美誉。

建德乌龟洞考古发现表明，在10万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在8000年至7000年前，绚丽多彩的跨湖桥文化已经显现。5300年至4300年前的良渚文化是中国史前文化的辉煌代表。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争霸，杭州先属越，后属吴，越灭吴后，复属越。战国时，楚灭越国，杭州又归入楚。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设置钱唐县、余杭县。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升钱唐县为临江郡（不久即废）。陈后主祯明元年（587），置钱唐郡。

隋开皇九年（589），废钱唐郡，置杭州。不久，州治移至濒临钱塘江的柳浦西（今凤凰山南麓一带），肇建新城。自此，山中小县变为“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适宜于都市发展的杭州”。隋炀帝时凿通江南运河，使舟船从杭州可西达长安（今西安）、北至涿郡（今北京），由此作为运河南端的杭州，地位日益重要。唐代，杭州趋于繁荣。唐贞观年间（627—649），杭州人口增至15.3万人。五代后梁时，吴越国定都杭州。吴越国实行“保境安民”政策，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

北宋期间，杭州既是东南经济发达的地区，又是有湖山胜景的风景城市。以苏轼（苏东坡）为代表的杭州主政者，疏浚西湖、兴修水利，进一步促进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宋室南渡后，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南宋王朝定都临安（今杭州）。“东南第一州”遂一跃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元明清时期，政治中心北移。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商贸繁荣，自然风光独特，吸引着四方宾客，杭州依然保持“东南大州”地位。

中华民国元年（1912），废杭州府，合并钱塘、仁和两县为杭县，仍为省会所在地。民国16年（1927）析出杭县城区设杭州市，直属浙江省，从此，杭州确立“市”的建制。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揭开了杭州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一、史前文明

杭州建德李家镇新桥村后的山坡上，有一个面积20多平方米、进深7米的天然岩洞，当地人叫它“乌龟洞”。1974年冬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浙江省博物馆的专家，在这个山洞里发掘出一枚古人类的牙齿化石和许多第四纪哺乳动物的化石，其中有许多是现在已经绝迹的动物，如剑齿象、纳玛象、巨貘等。正是这枚原始人牙齿化石使这个貌不惊人的乌龟洞一下子出名了。

乌龟洞属石灰岩溶洞，发育于上石炭纪时代的石灰岩（船山灰岩）中，高出当地河水面约15米，为20世纪60年代初发现，洞顶大部坍塌，现呈岩厦状。发掘于上部地层的“建德人”化石标本为一枚右上犬齿，除其齿冠远端外侧稍缺一小块之外，其他部分均基本保存完好。齿冠唇面有条状浅槽痕迹，疑被啮齿类动物咬掉了一部分；齿根的尖部缺失，而略呈一斜面。这件标本的齿冠内侧缘已磨失，齿冠高11.66毫米，远中近中径为8.2毫米，唇舌径9.5毫米。此牙齿化石粗壮程度大于1958年在广西柳江县通天岩旁洞穴中发现的“柳江人”牙齿化石，据此分析，此牙齿化石应归



“建德人”遗址标本——建德人牙（建德市志办 供稿）

属男性个体；而从其齿尖的磨损程度比“柳江人”稍弱来看，说明他可能是30岁左右。人们通俗地将这次发现的古人类称为“建德人”。

“建德人”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更新世的早一阶段，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古人类，即处在母系社会初期阶段。由此推知，距今至少10万年前，就有“建德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栖息劳作，从而揭开了杭州地区史前文明的篇章。这是“10万年”的级别，而北京著名的“山顶洞人”距今是“万年”级别。

“建德人”的发现有着很高的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它填补了杭州乃至浙江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的空白，增加了智人化石在我国分布的新知，揭开了在浙江发现古人类化石的序幕；同时也为研究建德境内以至新安江流域的远古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浙江史前文化端倪，进一步证明了长江流域（江南一带统属长江流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1982年，乌龟洞“建德人”遗址被列为建德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被列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跨湖之桥

跨湖桥文化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城区西南约4千米的城厢街道湘湖村。遗址西南约3千米为“三江”（钱塘江、富春江与浦阳江）的交汇处。遗址南北均为低矮的山丘，往北越过山岭可见钱塘江，南面为东西向连绵不断的会稽山余脉。在古湘湖的上湘湖和下湘湖之间曾有一座跨湖桥，当年的桥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在如今的湘湖之畔新建了一座跨湖桥遗址博物馆（2009年9月28日，新馆建成开馆），主要展示跨湖桥遗址出土文物。

跨湖桥文化遗址埋藏于海相沉积之下，底层略低于现在的海平面，遗存长年保存于水线以下。文化层分为9层，堆积最厚处仅1.24米，上部覆盖的青灰色海相淤积层厚达4.6米，遗址面积数万平方米。经过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000平方米左右，遗址文化内涵丰富、面貌独特，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有机质文物保存良好。釜、豆、盆、钵、甑、罐为常见的陶器群，形制别致；彩陶较多，分内彩和外彩两种。发现千余粒人工栽培稻谷。于2002年11月18日出土的约7600年前的独木舟，堪称“中华第一舟”。



独木舟出土现场（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供稿）

该地区考古工作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已经陆续在湘湖沼泽地发现了一些文物。之后在70年代初，杭州市文物部门曾在跨湖桥遗址东南约2千米处采集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1990年5月30日，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分校学生郑苗在湘湖边捡到石斧、石凿、动物骨器等文物。经初步鉴定，认定为史前文物。6月1日，经实地调查，在当地砖瓦厂取土工地现场发现大量陶片、兽骨、鹿角、木器残件等文物。遗址大部分已遭破坏，但在剖面留有厚约2米、宽约30米的文化堆积层。同月14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接到报告后，派专业人员会同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人员再次进行仔细考察，认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并于当年进行首次抢救性考古发掘。

1990年10月10日至12月11日，跨湖桥遗址第一次发掘。实际发掘面积330平方米，出土陶器、石器、木器和骨角器等113件编号文物，以及大量黑陶、彩陶碎片和骨角器残件，还发现灰坑、房址、墓葬、柱洞及特殊的建筑遗迹。经碳14年代测定，跨湖桥遗址距今8000年至7000年，是当时发现的浙江省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2001年5月初至7月下旬，进行第二次发掘。实际发掘

面积约300平方米，出土大量陶器、石器、木器、骨角器等文物以及稻谷颗粒，尤其是取得一批可复原的陶器。此次考古发现一件稍有残缺的绳纹小陶釜，外底有烟火熏焦痕，器内盛有一捆植物茎枝，纹理结节清晰，出土时头尾整齐地曲缩在釜底。经检测，定为茎枝类。这一珍贵资料对研究我国中草药的起源尤其是煎药起源具有重要价值。经碳14年代测定，再一次证实跨湖桥遗址年代为距今8000年至7000年。2002年10月至12月，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发掘范围在2001年基础上扩大，实际发掘面积约350平方米，发现人工培植的稻谷颗粒及大量陶器、古器、木器、骨角器等文物，还发现独木舟及相关遗迹。

跨湖桥文化遗址要早于河姆渡遗址1000年，是当时发现的浙江省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非常独特，是一种独立的文化类型。这一发现，把浙江的文明史提前到了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是浙江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重要证据，也再次有力地证实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2004年，“跨湖桥文化”正式命名。2006年，跨湖桥文化遗址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文明曙光

“太湖文明五千年，崧泽良渚踵相连。”钱塘江北岸，有一个曾经辉煌灿烂却湮没于历史的古文明中心——良渚。民国25年（1936），西湖博物馆的年轻学者施昕更在他的家乡余杭良渚一带开启了这片土地上考古探索的先河。80多年前的考古研究，让这段史前文明重见天日。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源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以良渚遗址命名的良渚文化及其所代表的良渚文明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良渚文化包括浙江余杭反山、瑶山，江苏吴县、张陵山、草鞋山，武进寺墩，常熟罗墩和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安徽阜宁等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这一时期的文化。

良渚文化时期，人们“凿井而饮”“构木而居”，过着以农业为主，采集、狩猎和饲养家畜为辅的定居生活。良渚人的食物以水稻为主，当时人们普遍栽

培水稻，拥有先进的稻作农业技术，广泛使用磨制木石工具，有石犁、木锄、石刀、石镰等。犁耕农业是稻作文化的主要标志，普遍出土的石犁表明当时石犁的使用已经进入大力推广和改进阶段。

原始农业的发达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已经出现制玉、制陶、纺织、酿酒等多种技艺高超的手工业。其中制玉技术最为盛行，在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玉器，品种丰富，主要有琮、钺、璧、环、珠、管、璜、镯等，用途大体可分为礼仪、祭祀用器和装饰品三大类。尤其玉琮最具代表性。1986年余杭反山墓地出土的一件玉琮，重6.5千克，高8.9厘米，上射径达17.6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良渚文化的玉器不仅品类众多，而且琢磨精致，纹饰华丽，为后代玉器的造型奠定了基础。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的丝麻织物，其中的绸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它的发现，将浙江“丝绸之府”的历史



余杭反山出土的玉琮王（来源于《美丽洲：良渚文化与良渚学引论》）

上溯到四五千年之前。

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如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其中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这些都表明当时已经出现较为完整的社会组织形态，形成了一批聚落群。2007年，良渚古城城址发现，这座远古时期的王城城址具有三重结构，包含了宫殿区、内城、外郭城，当时号称“中华第一城”。2015年，良渚古城水利系统被确认，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建有世界最早的水坝，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良渚文化在当时已经开始展现出文明的曙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资料链接

1987年1月在余杭镇南湖出土的一只黑陶罐上，有8个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已具有文字的初级形态，表达了一定的语言内涵，李学勤解读其中四字为“封石虎网”。^[1]



黑陶刻符罐（良渚博物院 供稿）

[1] 《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

一、钱唐设县

杭州在周朝以前属“扬州之域”。公元前21世纪，大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今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并舍其杭（“杭”是方舟）于此，故名“余杭”。^[1]春秋战国时期，杭州钱塘江两岸均是当时吴越争霸的重要战场，至今杭州吴山上还有纪念伍子胥的伍公庙，1979年还在萧山湘湖畔发现了越王城遗址。周赧王九年（前306），楚灭越国，杭州归入楚。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将王翦灭楚降越后，在今杭州之地设置了钱唐县、余杭县，属会稽郡，是中国建县最早的一批县份。这是杭州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行政建置，迄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钱唐县治大致在今岳庙至灵隐一带，据《水经注》记载：“浙江又东径灵隐山，山在四山之中。……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径其南。”当时西湖区域尚是一片海湾，吴山与宝石山为海湾南北的岬角，今西湖以东的杭州城区当时尚在海中。后来由于钱塘江水流带下和海潮涌上的泥沙不断堆积，海湾逐渐与大海相隔，湾内形成后来称为“西湖”的潟湖，今杭州城区也逐渐成为陆地，但依然时常遭受海水侵袭。

秦朝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开通了苏州至杭州地区水陆交通路线，在春秋时期吴古江南河和百尺渚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开浚。《越绝书》载：“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今嘉兴）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致钱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发会稽谪戍卒治

[1] 关于杭州之得名古有两说：一说夏禹南巡至此，因名“禹杭”。杭者，方舟也。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思之，且传其制。后讹“禹”为“余”。二说禹由此渡会稽，舍其杭（舟）于此，故名。现代著名学者谭其骧在其《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一文中断定：“杭州之名……得名于州治余杭。”他考证，“余同于，越民族的发语词，犹言于越、於潜、余姚”，“余杭并非禹杭之讹称”。但无论如何，“杭州”得名于“余杭”，“余杭”得名于“航”，而航和大禹渊源深厚；因此，“杭州”之名的背后，是跨越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通陵，高以南陵，道县相属。”同时为了加强对越人的监管，推行徙民政策，将越人迁离原居地大越（今绍兴），安置到余杭等地。秦始皇的一系列措施对杭州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播起了积极作用，也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南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钱唐”即钱唐县，“浙江”即钱塘江，“狭中”大约在今富阳境内江面较狭的地方。传说现在宝石山南麓有秦始皇缆船石的遗址，就是秦始皇东流泛舫舟之处。

资料链接

秦皇缆船石^[1]

明 张舆

葛仙岭西大石头，祖龙东来曾系舟；
不闻登仙入蓬岛，徒见作佛如嘉州。

[1]（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八。



相传此处为秦始皇缆船石所在（黎似玖 摄）

地涌半身云水绕，山开一面金碧浮；
几回劫火烧不尽，空对湖山飞白鸥。



二、隋开运河

隋唐时期杭州交通道路的发展以江南运河的开发最为重要。江南运河的开凿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时，已经基本形成了由今江苏省镇江经丹阳、苏州和浙江省嘉兴，直到杭州的水上通道。但是，作为全国性大运河的组成部分，则是隋炀帝主持完成的。

隋炀帝即位后，开始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网。隋大业六年（610）十二月，开始拓展江南运河，江南运河的开凿是在原有运河的基础上疏治和拓阔而成，从京口（今镇江）绕太湖以东直达余杭郡（今杭州）。《资治通鉴》载：“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1] 隋江南运河全长800余千米，宽大致为30米，深度要求是“使可通龙舟”，夹岸遍栽柳树。隋炀帝的御龙舟，据记载：“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2] 如此龙舟，吃水必然不浅，江南运河既然要求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

[2]（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〇《王礼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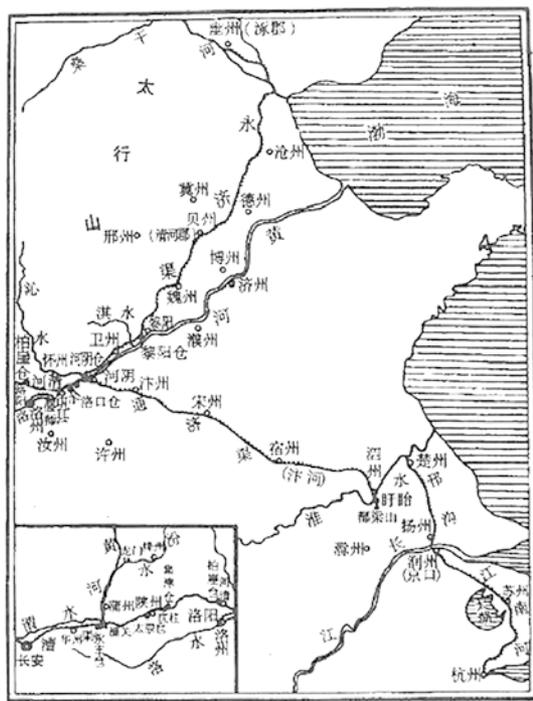
能够通行如此规制的“龙舟”，其深度自然也就相当可观了。隋江南运河北起镇江东南，经丹阳、苏州、吴江、嘉兴，折向西南经石门、崇福、长安、临平，然后经上塘河至杭州西南的大通桥附近入钱塘江，略同于今大运河江南段，唯崇德以南一段在今运河之南。

江南运河杭州段是隋大运河最南一段，其杭城北段沿用上塘河水道。在上塘河水道南端疏凿了一条新的水道，这条水道穿越西湖以东一带的沙洲平原，放弃了原来绕西环岸的水道，改走从宝石山东麓径直至吴山东的路线。这是今杭州主城区内的第一条人工水道，水道继续向南延伸，从柳浦口直通钱塘江。

江南运河经过的地方是江南极其富庶的地区，白居易《想东游五十韵》称颂说：“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所以运河开凿以后，很少变化，而且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开凿江南运河，征用了大量的民工，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隋祚短促，杭州未见其盛。但是隋以后的历史表明，江南运河对于杭州城的迅速崛起，



三堡船闸（来源于杭州图库）



隋大运河示意图（来源于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对于促进浙江乃至整个太湖流域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提高该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始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唐以后，武则天天授二年（691），“敕钱塘、於潜、余杭、临安四县租税皆取道于苕溪，公私便之”^[1]。安史之乱后，关中经济凋敝，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所以东南贡赋由运河上调京师就成为定制。杭州逐步成为“东南名郡”，白居易《答微之夸越州州宅》诗云：“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隋书·地理志》也记载：“杭州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2]

三、柳浦筑城

“柳浦歌船集，烟村酒筛斜。”^[3]柳浦在杭州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柳浦”本意为种植柳树的水滨。据《读史方輿纪要》记载：“柳浦，在府城东南五里，候潮门外。江干有浙江亭，亭北有跨浦桥。六朝时，谓之柳浦埭。”^[4]柳浦因埭而得名。

柳浦在今杭州凤凰山东麓，隋之前，在柳浦以西的滨江山前冲积坡地带，有相当面积的可耕地、充沛的山泉及就近可取的山林柴草，该地区逐步成为钱唐县的中心聚落地。此外，江南运河已粗具规模，其南终端即为柳浦，与西陵（今滨江区西兴街道）成为一组连接钱塘江两岸水路交通的要津，也是中原与会稽交通的主要渡口之一。东晋咸和三年（328）时，钱唐县治已经由宝石山东麓移址于柳浦。

以“杭州”为名的建置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太平寰宇记》记载：“隋平陈，废郡，改为钱唐县……合四县置杭州在余杭县，盖因其县以立名。十年，移州居钱唐县。十一年，复设州于柳浦西，依山筑城，即今郡是也。”^[5]杭州移州于钱唐，再复设州于柳浦，具体的原因因为文献的缺失已不可考，但柳浦的地理位置必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柳浦背山面海（江），与后世的樟亭

[1]（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八九。

[2]（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三一《地理志》。

[3]（明）田汝成：《田叔禾集》卷一二《湖上春行》。

[4]（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九〇。

[5]（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三《江南东道五》。

臨安志卷第五

城府

自古圖謀所載郡國必繫之於山蓋陵谷之遷變不常而城邑之更易亦異山則終古表立而考論輿地者恃以爲識焉錢唐舊治武林山猶云逼江則今之湖固與江通也華信作塘乃徙平地則已漸爲陸矣若沙河漾沙坑與所謂瀾頭之類皆古水所及也隋代始州於柳浦西依山築城嘗慨然求所謂柳浦者已不可考而依山所築則今之鳳凰山也前治武林山後治鳳凰山兩山之間昔水今陸豈非天所以啟

音右臨安志卷五

一

驿、浙江闸、南星桥轮渡码头，为一脉相承的钱塘江北岸渡口。隋时江干已经成陆地，柳浦—西陵一线可联通浙东运河，西溯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及兰江，可将浙江东西两路连成一片，甚至可以控扼闽、赣、皖等地，北面居高临下，可以俯视太湖平原，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自不待言。由柳浦扩展而来的杭州此时的政治地位或已超越曾为越国之都的绍兴，并成为江南最大的城市之一，作为州治的地位自此稳定。其后随着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而一再升格，府治乃至省会亦一直设于此地，甚至两度短暂地成为一国之都，盖因其形势之便。

（淳祐）《临安志》中关于柳浦的记载

隋大业六年(610)，隋炀帝“敕穿江南河”，水上航运对于维护大一统帝国在政治、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愈发关键。虽然隋炀帝由于过度役使人民而国运短祚，但后世利用他所开发的运河系统转漕粮米布帛，这对维持国家的统一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全汉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中记叙：“斯坦因发掘新疆吐鲁番哈刺和卓附近阿斯塔纳的坟墓所得的出土物品中，有两段浙江婺州的税布，其年代略较开元为早。”^[1] 要将处于浙江内陆的财富运输至遥远的吐鲁番并规避海上风波之险，通过杭州、柳浦的运河航道再转运北上，就是必然的选择。

[1] 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年编印。

一、善事中国

唐代，中国经济重心开始由北转南。杭州城市日趋繁荣，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出现“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1]的繁荣景象。中唐以后，杭州已有“东南名郡”之称。至吴越国统治两浙之时，吴越国开创者钱镠将国都定于杭州，当时称为“西府”或“西都”，这是杭州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国之都。

当时中原地区历经唐末、五代、宋初的更迭，钱氏三世五王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始终坚持“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以藩镇自居，尊奉中原王朝。当时吴越国地处东南沿海，西北为吴国，南方是闽国，处于三面受敌、一面靠海的艰难处境。“保境安民”既是钱镠有自知之明之处，也是他比同时代其他割据军阀更为高明之处。例如他反对董昌称帝，曾写信劝他“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岂若开门作

[1]（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〇《五月十五日夜月》。



钱王射潮雕塑（黎似玫 摄）

节度使，使终身富贵”^[1]。当时的军阀纷纷割据一方，建国称帝。不仅如此，他们还劝钱镠做天子，可是钱镠一概拒绝了，还批评他们说：“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中，又据吾于上耶！”^[2]

到钱镠统治后期，吴越国通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实力雄厚了，但他也没有发动战争，仍甘愿屈居人之下。这说明“保境安民”是其一贯的国策，不但钱镠自己一生始终奉行不渝，直至他临终之前，还告诫其子孙要“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3]。《钱氏家乘》也记载钱镠“嘱曰：‘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勿废臣礼’”。意思是说，不管中原地区如何改朝换代，都要视为正朔，称臣纳贡。

之后的吴越国王也继续奉行“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直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俶遵照“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的遗训，审时度势，纳土归宋，使吴越国赢得了五代十国时期最为安定繁荣之地的美誉。而钱氏之功为历代名家称颂。苏轼说：“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4] 欧阳修也说：“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5]

总之，钱氏吴越“善事中国”“勿废臣礼”的“保境安民”国策，既是战略上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同时也使吴越国免遭战祸，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安定局面。杭州城市由此“从第三等超升到第一等”^[6]，一跃成为与苏州、越州并称的东南地区中心城市。

二、修筑海塘

“天下大计，仰于东南。”^[7] 杭嘉湖地区历来是粮食主产区和财赋重地。钱塘江海塘作为古代伟大水利工程之一，其安危关系到钱塘江流域的农业收成和

[1]（宋）范炯、林禹：《吴越备史》卷一。

[2]（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七八《吴越二》。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七七《后唐纪六》。

[4]（宋）苏轼：《苏东坡集》卷三三《表忠观碑》。

[5]（宋）欧阳修：《有美堂记》。

[6] 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转引自《杭州地名志》第八编《文选》。

[7]（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一六五《列传九十·权德舆》。

百姓的安居乐业，因此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

钱塘江海塘始筑于秦汉。唐代及以前的钱塘江海塘，大多为土塘，土塘质地松软，御潮能力极差。唐末至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混战，海塘年久失修，潮患严重，“江挟海潮，为杭人患，



钱氏海塘外侧结构（来源于《大众考古》）

其来已久”^[1]。吴越国时期，“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目击平原沃野，尽成江水汪洋”^[2]。“人坠垫溺……庶俾水反归壑，谷迁为陵，土不蹇崩，人无荡析。”^[3] 钱塘江潮的灾害严重影响了两岸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钱塘潮灾害，将直接危及钱镠的吴越国政权。当时吴越国在钱镠治理下，局势渐趋安定，他在钱塘江滨“江海故地”上扩大了杭州城，防治潮患为当务之急。钱镠在给梁太祖朱温的《筑塘疏》中写道：“江之水源，自衢、婺、睦州各道，汇入富春，奔腾而入；潮汐由杭州之盐官（今海宁）、秀州（今嘉兴）之海盐各路，汇入鳖子门而入。每昼夜两次冲激，岸渐成江。近年以来，江大地窄。溯自唐贞观以前，居民修筑，不费官帑，塘堤不固，易于崩坍。迨后兵革顿兴，民亦屡迁，遂废修塘之工。海飓大作，怒涛掀簸，堤岸冲啮殆尽。……虽值干戈扰攘之后，即兴筑塘修堤之举。”^[4] 陈述了筑塘防江潮的重要性。

梁开平四年（910）八月，钱镠“大庀工徒，凿石填江，又平江中罗刹石”^[5]，开始筑捍海石塘。钱镠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筑捍海塘。“大竹破之为器，长数十丈，中实巨石。取罗山大木，长数丈，植之横为塘，依匠人为防

[1]（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三一《山川十·捍海塘》。

[2]（唐）钱镠：《筑塘疏》。

[3]（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三一《山川十·捍海塘》。

[4]（民国）《钱氏家乘·遗文·武肃王筑塘疏》。

[5]（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三三。

之制。内又以土填之，外用木立于水际，去岸二丈九尺，立九木，作六重，象《易》既济、未济二卦，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渐积”^[1]，规模异常浩大。用竹笼装载巨石，再用巨大的木材使其就地定位。由于坝体中间有缝隙，汹涌的海潮可以穿过坝体，减轻了海潮对坝的冲力。在堤的后背，沿着江岸留下了12丈9尺宽的空地作为缓冲，以容纳过量的海水，避免涨潮时的巨量海水直接冲刷被保护的农田。从开平四年八月动工到当年十月竣工，这就是著名的“钱氏捍海塘”或称“钱氏石塘”。“筑塘以石，自吴越王始。”^[2]这种竹笼填石与梃柱相结合的筑塘固塘方法是海塘技术史上的一次飞跃，海塘的修筑也奠定了杭州在五代乃至南宋临江城时期的城市格局。

除了修筑海塘外，钱镠还“建候潮、通江等城门；又置龙山、浙江两闸，以遏江潮入河”^[3]。捍海塘的成功修筑，使得“边江石岸无冲垫之失，缘堤居民无惊溺之虞”^[4]，极大地改善了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生产状况，奠定了吴越国繁荣昌盛的根基，“是以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5]，“富庶胜于东南”^[6]。在钱氏统治的数十年时间里，杭州及其周边地区基本上免除了潮患，逐步成为江南富庶之地。

资料链接

一、钱王射潮的传说

钱王（钱镠）治理杭州的时候，各种事情都感到还容易办，就是这道钱塘江的大堤修不好。因为潮水一天一夜要来两次，简直没有法子能把海堤修筑起来。后来有人告诉钱王，海塘难修，是因为钱塘江潮神作怪的缘故。于是，生性勇猛的钱王，命令军士采“山阳之竹”制成“丹羽之矢”，在农历八月十八潮神生日这一天，精选了1万名弓箭手到江边聚集。由于途中需要经过一座宝石

[1]（清）丁丙：《松梦寮诗稿》卷三注引《捍海塘志》。

[2]（清）查祥：《两浙海塘通志》卷二〇。

[3]（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七八《吴越二》。

[4]（宋）曹勋：《六和塔记》。

[5]（清）翟均廉：《海塘录》卷八。

[6]（清）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九。

山，而这个地方山路狭窄，只能容纳一人通过，钱王使用脚把这座山蹬成了两半，使山中间出现了一条宽宽的道路。从此，这儿就被叫作“蹬开岭”，钱王那双硕大无比的脚印，至今还深陷在石壁上，清晰可见呢。

当弓箭手在江边聚齐后，钱王又奋笔写了两句话：“为报潮神并水府，钱塘且借与钱城。”随后把这两句话扔进了江中。但潮神却仍然不理不睬，还是像往常一样，凶猛地扑了过来。钱王见此，大吼一声：“放箭！”抢先射出了第一箭。顿时，万箭齐发，直射潮头。围观的百姓们都跺脚拍掌，大声呐喊助威。一会儿工夫，便连续射出了3万支箭，竟逼得潮头不敢向岸边冲击过来。钱王又下令：“追射！”那潮头只好弯弯曲曲地向西南逸去，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钱王射潮的壮举虽然是传说故事，但却向人们传达了一个人定胜天、誓治海潮的淳朴道理，对鼓舞吴越国士气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五代吴越捍海塘遗址

2014年6月5日至11月15日，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杭州市上城区危旧房改善项目，对位于上城区江城路以东的原江城文化宫所在位置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吴越王钱镠兴建的五代吴越捍海塘。五代吴越国捍海塘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并保存最早的海塘实物。

三、撩浚西湖

自唐代李泌凿六井，白居易疏浚西湖筑捍湖堤后，西湖对杭州城市发展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就日益显示出来，并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州傍青山县枕湖”^[1]，西湖风景也日渐闻名。但此后，由于西湖年久失修，朝着沼泽化的方向发展，自白居易浚湖到吴越建国初，前后不到百年，西湖已是“湖葑蔓合”，面积缩小，蓄水量大减。吴越建国初年，钱镠正准备在凤凰山以唐时州治筑子城扩建宫室时，有方士向他献媚建议：“王如广牙城改旧为新，有国止及百年；

[1]（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〇《余杭形胜》。

若填筑西湖以为公府，当十倍于此。”^[1] 钱镠回答说，杭城百姓靠湖水生存已经很久了，无湖等于无民。哪里有千年国运而不换君主的？我有国百年就足够了。因此，有“广治不填湖，留以待真主”的佳话。说明钱镠已看清西湖对杭州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他不仅不填塞西湖，而且为整治西湖做出两大决策：

一是设立“撩湖兵制”。在后唐天成二年（927），置撩湖兵士千人，专职日夜疏浚西湖，清除葑草，加深湖床，使西湖秀色再现，并以充沛的淡水供应全城居民的需要。后唐应顺三年（936），继位的钱元瓘再次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据《西湖志纂》记载：“五代时，西湖岁久不修，湖葑蔓蔽。吴越王钱氏置军千人治湖。又疏涌金池以入运河。……涌金池在丰豫门内，引西湖水为池。”^[2] 由于有撩湖兵士“专一开浚”，所以直到宋建隆四年（963）七月，钱俶还“大阅楼舫于西湖”。

二是致力于西湖周边的寺院、庭园建设。吴越国崇尚释氏，厚礼僧人，在西湖周边大兴寺院、佛塔，在西湖群山的崖壁和洞穴中雕凿石窟佛像。当时吴山上的秣华园、涌金门外的西园、嘉会门外的瑞萼园、月轮山下的南果园等，还有保俶塔、雷峰塔、六和塔、白塔等著名的钱塘四塔。尤其是钱塘四塔，1000多年来向为西湖的标志。古寺、宝塔、石窟佛像等佛教艺术和绮丽的湖光山色相结合，使西湖更富有魅力，平添了无限风光，是杭州悠久文化的历史见证，也是我们祖国的宝贵艺术财富和文化遗产。

[1]（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二《吴越六》。

[2]（清）梁诗正、沈德潜：《西湖志纂》卷二。

西湖船影（里尔 摄）



一、定都临安

杭州是江南地区人口最多的州郡，也是北宋政府财赋收入的重点地区，有“东南第一州”之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在《望海潮》中是这样描写杭州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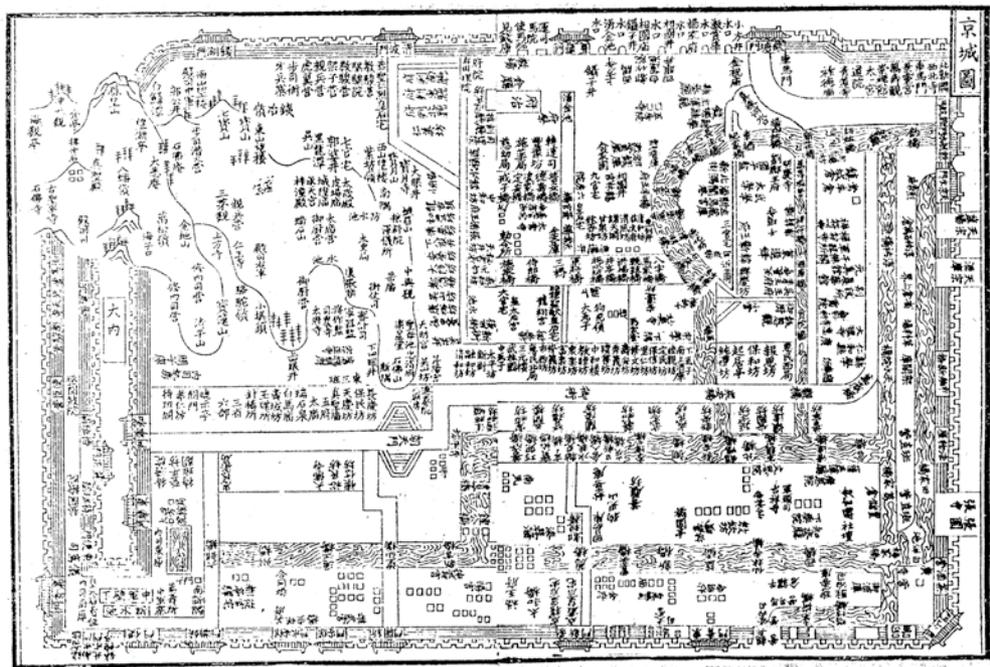
北宋靖康二年（1127），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宋徽宗、宋钦宗成为金人的俘虏，北宋灭亡。领兵在外的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成为南宋开国皇帝，史称“宋高宗”。因南宋政权刚刚建立，外加军事上持续溃退，南京也不能久留。定都何处成为朝廷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有三种方案：“李纲请营南阳，宗泽请幸汴京城，汪（伯彦）、黄（潜善）请幸东南。”^[1]三种不同观点，其实争论的焦点是坚守中原还是避难东南。当宋高宗举棋未定之时，军事上已经迅速溃败，金军铁骑已经快到应天府了。宋高宗只能匆匆下旨：“巡幸东南，为避敌之计。”此时“东南”的建康（今江苏南京）成为首选。当时衢州司刑曹事张邵上书：“有东南之形势，今纵未能逐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不应退自削弱。”^[2]高宗一路南逃至扬州，扬州地处长江北岸。

南宋建炎二年（1128）秋，金兵再次南侵，目标直指扬州。建炎三年（1129）正月，金兵先后攻下徐州、淮阳、泗州，并派遣拔离速率兵奔袭扬州。听到金兵奔袭扬州的急报，宋高宗惊恐万分。卫肤敏上书：“……臣倾尝三为陛下言，扬州非驻蹕之地，乞早幸江宁。今越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须事定亟还江陵。”^[3]二月初三，宋高宗带领御营

[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

[2]（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七三《列传一三二》。

[3]（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七八《列传一三七》。



南宋京城图 [来源于(咸淳)《临安志》]

都统制王渊和亲信宦官康履，慌乱逃出扬州，仓皇逃至镇江。在南北军民备战抗金、恢复中原的强烈要求下，宋高宗下令改江宁府为建康府，并北上进驻。其实，此时的宋高宗觉得镇江、建康离前线太近，都不是安全之地，决定“径趋杭州”。

南宋建炎三年（1129）二月十三日，宋高宗及大臣百官到达杭州。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不久，金将兀术率军从安吉直扑杭州，宋高宗渡过钱塘江，一路向东南逃遁，经过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最后从定海（今宁波镇海）下海逃往温州。直至金兵北撤，宋高宗才从温州北返至越州，于绍兴二年（1132）搬回临安，将其作为南宋朝廷临时所在地。此后，宋高宗在抗金形势有所好转时也曾想进踔建康，但南宋朝廷最后还是于绍兴八年（1138）决定正式定都临安。为了表示不忘北方故土，名义上这里只称“行在所”。自此之后，直到南宋灭亡，国都终未他迁。

定都临安，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有：一是临安

在防守上占据地理优势。长江及杭嘉湖平原密布水网是抵御金兵铁骑的天然屏障。正如赵构所述：“朕以为金人所恃者，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能骋也。”^[1]同时，临安处东南海边，东南丘陵的地区，危峰幽谷，最宜设险，而丘陵与海岸，多成山海交错之处，沿海设险不患无术。即使守不住，从临安过钱塘江或入海南避，也比从建康逃走要更安全、更快捷。因此，朱熹曾说：“建康形势雄壮，然淮破则止隔一水（长江）……欲进取则都建康，欲自守则都临安。”^[2]二是富庶的物质条件。临安地处京杭大运河南端，东接浙东运河，自隋唐以来，已经成为两浙的中心，被视为百事繁庶的“地上天宫”。临安在金兵数次南侵时并没有像建康一样遭到严重损毁，又有吴越国时期奠定的完善的城市体制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三是从当时南宋政权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的实际出发。正如尚书考功员外郎楼炤对宋高宗所述：“今日之计，当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计。力可以保淮南，则以淮南为屏蔽，权都建康，渐图恢复。力未可以保淮南，则因长江为险阻，权都吴（今苏州）、会（今绍兴），以养国力。”^[3]

二、皇城内外

“有风月九衢，凤凰双阙，万年芳树，千雉宫墙。”南宋词人杨泽民笔下《风流子·咏钱塘》展现出临江城庄严的皇家气象和都城建设的繁华富丽。当时的临江城，在中外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是杭州城市地位最高的时期，这与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及对临安城的营建密切相关。

杭州城垣最早修筑于隋开皇十一年（591），经过吴越国和北宋不断扩建改造，规模不断扩大。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临安（今杭州）。因金兵的洗劫及南宋初年杭城火灾影响，宋高宗刚到杭州时，“城之内外所向墟落，不复井邑”^[4]。于是，开始在北宋杭州州治基础上营建皇城和都城。绍兴十一年，“始作崇政、垂拱二殿”。至绍兴二十八年才粗具规模。到宋孝宗以后，因国内形

[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七。

[2]（民国）李榕：《杭州府志》卷四。

[3]（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八〇《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4]（宋）曹勋：《松隐集》卷三一《仙林寺记》。



南宋晚期一号殿址之砖座遗迹细部及南宋龙纹瓦当（来源于《南宋御街》）

势渐趋安定，财力已趋雄厚，皇城宫殿才有规模地兴建起来。此后，再经过诸帝的扩建和改建，有了金碧辉煌、巍峨壮丽的宫殿。“一时制画规模，悉与东京相埒。”当时的皇城称为“大内”，四周各开一门。宫殿和城门的规模和格局和北宋汴京相同，巍峨的丽正门前建有二三里方圆的宫廷广场，就仿照了东京的宫殿格局。门为三重，大门之上还有城楼，门外广场四周设有权子，戒备森严，禁止随意通行。进入丽正门，就是遍布大内的宫殿、园林和亭阁，均依傍于凤凰山东麓，围绕着馒头山，利用自然山水和地形而建。

在修建皇城的同时，还对“外城大有更易”，尤其是对东南城垣做了扩展，向外伸展了13丈，使城市范围进一步扩大。经过多次扩建，南宋都城共有旱城门13座。此外还有水门5座。南宋都城旱门和水门采取不同形制，水门都是平屋；旱门中的东青门与艮山门，门外建设有半月形瓮城，用以增强城门防御能力；其他城门建设有城楼。连接各城门的城墙已经由原来的土墙逐步改建为砖墙，加固后的城墙高3丈、厚约丈余，严禁闲杂人等攀爬。城墙外还有10多丈宽的护城河，河两岸种植柳树，禁止行人往来。扩建后的都城为“南北展，东西缩”的格局，城区南北长约7千米、东西宽约2.5千米，其面积约为15平方千米。总体上，皇城是承袭《周礼》“前朝后寝”的传统格式，而整个都城则是按“前朝后市”的布局规划，朝廷在前，百官衙署和市区在后，趋朝者皆须由后而入，杭人称为“倒骑龙”。

城市交通系统基本上按经纬线进行规划。在都城中心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天街”，是城市的主轴线，这就是御街，老百姓呼其为“十里禁街”。御街是南宋临安城建设的代表之作，它起自皇城北门和宁门，是为皇帝去景灵宫参拜祭典而修建的。御街是当时杭州最宽的道路，据史料记载，御街长达13500余尺，约4200米，宽度没有记载。但杭州御街的设计与修建仿效汴京御街，汴京御街宽200多步，杭州御街当然也有相当的宽度。御街分御道、河道、走廊3部分。御道中央专供皇帝通行，旁有官员进出宫中的道路。御道两侧为砖石砌岸的河道，河中植莲花，岸上栽桃李，绿树成荫、百花争艳，“望之如绣”。河道外的走廊才允许百姓行走，走廊外面允许居民设铺经商。除了御街外，南北走向的还有两条繁华的大路。一条是御街之西的后市街，另一条是西大街。东西向道路主要有3条，分别为从钱塘门至东青门、从丰豫门至崇新门、从清波门至新门。城中各厢坊之间则多为不规整的南北纵横街衢小巷，各街巷道路大多用石板铺设，形式大多是两侧直铺，中间横铺，形如梯子，宽约5丈。此外，还有密布的河道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城市水网，当时都城内桥梁有117座，加上城外南北厢，全部



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演出剧照（吴昊华 提供）

桥梁达347座。当时著名的河道有城内的盐桥河、茆山河、小河和清湖河，城内的四条河与城外的大运河、龙山河、下塘河、新开运河、城河等10余条河相通连，组成一个整体，保证了都城内外的航运畅通与物资供应，显示出江南水乡城市风貌。

南宋时期的杭州，彻底打破了坊、市分开的旧制，形成了新的坊巷聚居和管理体制。杭州城内外分为13厢（厢是城区的一种行政区划），每厢设厢官，厢下设坊。城内有9厢85坊巷，城外还有4厢。南宋杭城坊名，保留到现在的还不少，如清河坊、太平坊、保佑坊、寿安坊、积善坊、里仁坊等。

三、百万生聚

南宋临江城经济的繁荣，不仅超越前代，而且直到元代马可·波罗来杭时，仍称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南宋是杭州继唐代以后第二次人口高速增长时期。南宋临安府户口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是宋室南渡后，北方人口的大批南迁，“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1]；另一方面是杭州地处东南沿海，物产丰富，气候温和，自然条件优越，进一步促进了人口自然增长。

南宋朝廷对大批南迁的人口采取的是积极招徕和安抚的政策。南宋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率内侍及亲军渡过长江，百官、百姓随之渡江者约数万人。为了保证北方难民顺利过江，南宋朝廷“令有司具舟常、润，迎济衣冠、军民家属”，从而形成了“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2]的南迁高潮。驻蹕临安后，又多次下诏要求地方官多方抚恤流寓的“西北士人”。

朝廷在安置措施和办法上也逐渐形成体制和定例。在一些江河码头或交通要冲之地设立接待处，这些接待处多以佛寺改成，故当时人称为“接待寺”。在杭城内外共设立了20余个接待寺。其中最大的接待寺是城北郊夹城巷的妙行寺，因地处运河码头，流民四集，据（成化）《杭州府志》载，20余年中，该寺累计接待了各界人士300万人次。

[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

[2]（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八《食货志·赈恤》。



宋嫂鱼羹^[1]

政府对不同的移民阶层采取了不同的安置办法和手段。对于王公贵族、官僚地主，高宗格外体恤照顾，加官进秩，赐给房屋土地。面对潮水般涌来的西北、中原流民百姓，朝廷亦多方存恤。以地区而言，汴京流民为最多，他们得到南宋诸皇帝宣诏赐钱的优惠待遇。如“宋五嫂者，汴京酒家妇，善作鱼羹，至是侨居苏堤”。宋高宗赵构听到宋五嫂话语中汴京口音，勾起他的思乡情，亲尝了她制作的鱼羹，念其年老，特赐她钱千文、银钱百文、绢10匹。

由于采取了存恤政策，流寓杭州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到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西北人以驻蹕之地，辐辏骈集，数倍于土著”^[2]。大批北方人口流寓杭州，使杭州人口急剧增加，空荒之地逐渐变为繁华街巷。沿钱塘江的城南郊厢（区）和运河两岸的城北郊厢，形成了15个市镇，人口密集。咸淳年间（1265—1274），临安府的人口已达到124万之多，这个数字包括临安府所属九县人口；其中府治所在地钱塘、仁和两县的人口达43万余，已占全府人口三分之一左右，可见杭州市区及其附近，人口众多而且又比较集中。^[3]

[1] 本书图片未标明来源者，均源于网络、翻拍等，下文不作注释。

[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

[3] 关于南宋临安城市人口数量，学术界说法不一。例如：加藤繁认为户数在30万左右，人口在150万左右；桑原鹭藏与池田静夫提出500万人左右；林正秋认为咸淳（1265—1274）末年，临安城区人口当在43万左右；赵冈认为城厢合计近250万人；沈冬梅同意加藤繁关于150万人的估计；吴松弟则以为到南宋后期，临安城内外人口在120万上下。

人口的增加给南宋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再加上统治者出台的一些积极措施，南宋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外贸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例，当时杭州的手工业经济蓬勃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据《梦粱录》等古籍记载，当时杭城内经营的工商业有414行。特别是丝织业、印刷业、制瓷业等行业，都有专门的制造作坊。商业的经营则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坊市制度，“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大街小巷商铺的商品琳琅满目。因此，商人与工匠在临安的居民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人数约占城区居民总数的三成，达到了中国都城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平，远非唐代长安、北宋东京所能望其项背。

北方人口的大批迁入，对临安城的语言、饮食、服饰、习俗等也产生巨大影响。大量的移民多数来自今天的河南省，其中绝大多数又来自开封。因此，南宋临安文化受开封移民的影响最大，在语言、生活习俗等方面都极像开封。据《梦粱录》记载：“南渡以来几两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临安之所以形成这种南北饮食混淆的局面，不仅是北方食物进入，也是与南方食物相互融合发展的结果。临安有一种专门满足下层平民需求的饭店称“衢州饭店”，出售虾鱼、粉羹、鱼面之类。从名称来看，这种饭店应是两浙的衢州人所开，从菜单来看应以南方传统食物为主，但“鱼面”之“面”在南宋初却主要是北方移民的食物，可见已被改造成北方移民后裔和南方人普遍接受的“鱼面”了。

一、华贵天城

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来到元朝统治时期的中国，并在这里游历了17年。在根据他的口述于1294年整理完成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他对中国城市杭州给予了最高的评价，盛赞它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

元代的杭州尽管不是一国之都，但它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仍相当重要，是中国南方一大都会。它不仅规模宏伟、人口众多、交通发达、经济繁荣，而且还是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是当时世界东方的一大国际性都市。“邑屋繁华，货殖填委”是当时杭州城的生动写照。城内有大市场10所，每星期有3日为市集，有四五万人来此贸易。市场上各色物品应有尽有，丝绸、瓷器等为集市贸易的重要商品。当时杭州最热闹繁华的中心地段是寿安坊（又名“花市”，即今官巷口），“人马杂沓，声器若雷，气湓如雾”^[1]。

元初的杭州城是“城宽、地阔、人烟稠集”的大都市。然而，元政府为维护蒙古贵族的高压统治，明令全国拆毁旧城，禁止修筑新城，以示天下统一，杭州的内外城墙逐渐为居民平毁。元至正十七年（1357），张士诚占领杭州。至正十九年，张士诚主持修筑杭州城垣。张士诚修建的杭州城较之南宋临安城，东界外扩、南界北缩，仍然保持南北长、东西短的狭长形布局。

元代杭州的手工业有了新的发展。“杭民藉手业以供衣食”^[2]者很多。当时西湖的一些边缘地区也开始栽桑养蚕，丝织业很兴盛，作坊很多，技艺高超。大都（今北京）的皇公贵族常常到杭州来催办上等丝织衣物。官办杭州织染局从“织帛之家”拣送工匠织造的“纳石失”（织

[1]（明）徐一夔：《始丰稿》卷五。

[2]（民国）李榕：《杭州府志》卷一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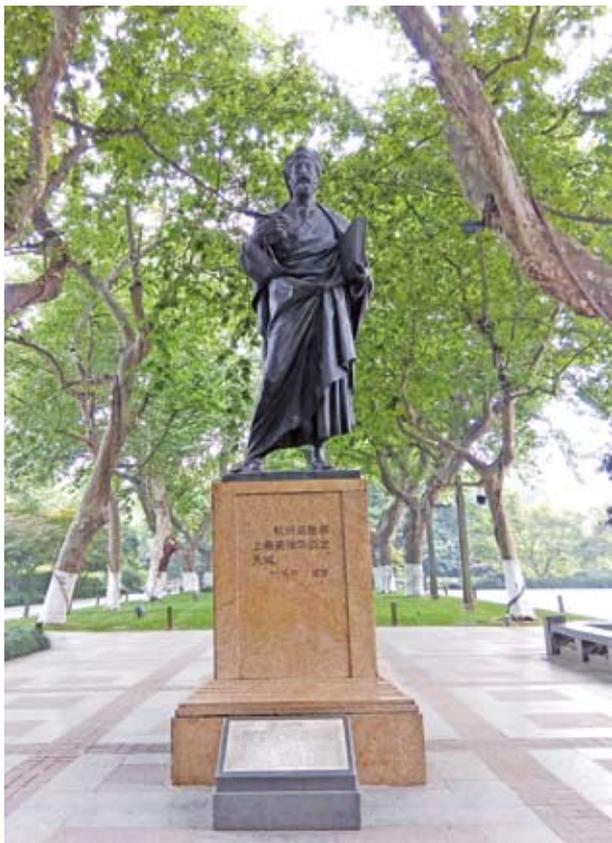
金帛)、“怯绵里”(剪绒织物)极其精致。由于丝织品的大量生产,杭人“多衣丝绸”。元代杭州仍然是全国刻书印书中心,皇家帝师所用佛典,多刻于杭州。元政府统治下的商业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人的地位大幅提高,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观念上认为商人处于四民之末的思维定式。蒙古、色目的贵族往往参与商业活动,西域的商人阿合马、桑哥和汉人卢世荣以理财得宠于元世祖而身居高官。元末江南的文坛领袖杨维禛说出当时人的心态,“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1],人们情愿舍官而做一获利丰厚的盐商。作为人口逾百万的大都市,杭州是重要的消费市场和商品生产基地。就消费而言,以胡椒为例,每日杭州消费量为44担,达四五千斤。可想而知,粮食、酒、肉、香料等的需求数量是何等之大。杭州作为传统的丝绸产地,除本地产出的生丝原料外,还要大量地从外地输入,以满足丝绸生产的需求。此外,杭州的谷麦加工业、制糖业、酿酒业、制瓷业等十分兴盛。

在东征西战中建立起来的元帝国,其海陆交通网络空前发达。元代的水路交通干线,是大都(今北京)到杭州的大运河。元初,为了把江南的财赋运到大都,大规模修治运河,先后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从而使大运河南北贯通,不仅沟通了南北水路航线,而且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的航线连接起来了。据记载,当时从大都到杭州的运河航程,约为两个月。沿途设有水站,配备站户、船只,负责供给官差使客食宿,并用船只运送。元政府为了养护河道等,还多次下令在运河沿岸、大道旁边等地种植榆、槐、柳等树木。许多过往的外国使客、商人、旅行家,通过大运河北上南下。大运河成了南北之间的一条安全便捷的交通干线。在陆路驿道方面,元政府为了达到“通达边情,布宣号令”的目的,以大都为中心修建驿站,在全国形成稠密的交通网络。杭州是浙西地区的一个中转站,杭州的陆路驿道主要是通往浙西地区,从在城站经庙山站(今富阳庙山坞)到新城站(今富阳新登镇),然后西往临川站(今临安境内),与其他相邻路、州的驿道相连。通过驿道,杭州还与钦察汗国的塔纳(今俄罗斯罗斯托夫南)有商路相通。元代的海上交通,较之前代更加发达。当时的杭州,是东南航线上的一大港口。印度、埃及等地

[1] (清)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五五。

来杭的舶商，往来不绝，有的还定居于杭城。而元朝政府遣往南洋乃至东非国家的使臣，也常常从大都循陆路或水路驿站南下，经杭州、泉州等地出航。

经济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昌盛，吸引各国各地的商人、旅行家纷至沓来。元代杭州不仅有原居当地的南人（原南宋统治的居民），有来自北方的汉人以及边疆地区的蒙古、女真、党项等族人，还有大批西域各族移民。明杭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云：“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多，号色目种。隆准深眸，不啖豕肉，



位于西湖湖滨的马可·波罗塑像（黎似玖 摄）

婚姻丧葬，不与中国相通。”^[1] 杭州色目人主要也是回回人。元末文人陶宗仪说：“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2] 这说明当时杭州已形成了回回人聚居街坊。在民间文化交流上，当时杭州人所穿之靴，仿高丽式样，并成为一时所尚的流行款式；从东南亚进口的胡椒，成了居民日常惯用的调味品；西域所产的西瓜等佳果美食，开始成了杭州社会上层人士相互馈赠的上等礼品；回回人阿里海牙之孙贯云石隐居钱塘，卖药市中；“白纷乌纱碧眼深”的西域相者王月屋携带布囊诗卷，在杭城设摊看相，聊以度日。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元代杭州虽然失去了昔日王朝首都的尊荣，但继续保持“五

[1]（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八。

[2]（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八“嘲回回”条。

方之民所聚，货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征输之所入，实他郡所不及”^[1]的发展势头。

二、明清省会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李文忠攻下杭州后，即改杭州路为杭州府。同年，又于杭州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简称“浙江省”），“浙江”作为省名由此开始。明洪武九年（1376），废行中书省，在地方设三司，改浙江行中书省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布政司署仍设在清河坊西，即元代江浙行省署旧址。明代省、府之间还设分守、分巡诸道，杭州府属杭严道，仍辖钱塘、仁和等9县（洪武二年降海宁州为县）。洪武四年（1371），知府刘文以县附府为便，乃自招贤坊迁仁和县于府左，自纪家桥迁钱塘县于府右。

明初杭州的城市地位已不及宋元时代，不仅失去了全国第一等城市的地位，连“东南第一州”之名也不复保持。与南京、扬州等城市相比，经济发展已相形见绌了。之后，由于明朝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积极措施，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尽管杭州在明中期还不时受到东南沿海倭寇侵扰，但杭州城市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后，又逐渐发展起来。至明代中叶，商品经济开始繁荣，甚至作为商品集散地的市镇集贸市场也大量涌现，商品充斥于各级市场。当时仁和县有药市在炭桥，花市在官巷，鲜鱼行在候潮门外，青果圃在候潮门泥路，书市在橘圆亭。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曾经一度衰落的杭州手工业又逐渐兴盛起来，杭州再次成为全国商业、手工业的一大都市。万历《歙志》卷十《货殖》已把杭州与两京、广州并列为全国大都会。“城中阘阘之盛，自金陵而下，无其比已。”^[2]杭州的商品来自省内外各地，“五方辐辏，无窳不售，盖物盛所聚，何必自其地产哉”^[3]。来自省内的有湖州的丝，嘉兴的绢，绍兴的茶、酒，宁波的海味水产，严州的漆，衢州的橘，温州的漆器，金华的酒，处州的瓷等。明人王士性说：

[1]（民国）李榕：《杭州府志》卷十九。

[2]（明）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十。

[3]（明）聂心汤：（万历）《钱塘县志·纪疆》。

“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1]加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书院兴盛、人才辈出，呈现出“江浙人文薮”的盛况，当时的杭州地区被称为“人物之都会，财赋之奥区”^[2]。

明代杭州地方官府重视西湖的建设和保护工作。正德三年（1508），知府杨孟瑛力排群议，主持了西湖历史上阻力最大、工程最巨的一次浚湖，终于挽救了废弃不治达230余年的西湖，得以“始复唐、宋之旧”。

清承明制，康熙初复改布政使司为行省。有清一代杭州均称“杭州府”，是浙江省省会及杭嘉湖道治所。辖钱塘、仁和、富阳、余杭、临安、於潜、新城、昌化8县及海宁州〔乾隆三十八年（1773）升海宁县为州〕。

清代前期，康熙和乾隆两皇帝因仰慕西湖胜景和杭州繁华，曾多次来到杭州。康熙帝先后游杭5次，为此“浚治西湖，辟孤山以建行宫，并疏涌金门城河以达御舟”^[3]。康熙帝还亲题“西湖十景”碑，建亭勒石。乾隆帝也曾6次巡游杭州，在各风景区和“西湖十景”碑后，舞文弄墨，勒石题诗，兴复古迹。他还下令在孤山行宫后建文澜阁，珍藏《四库全书》，为西湖增添风光。

清代杭州城垣仍沿袭明代格局，少有变化，仅康熙五年（1666）永昌门毁坏，重建后改为“望江门”。但在城内又筑城中之城。顺治五年（1648），巡抚萧起元为在杭城驻八旗精兵以弹压浙江人民的反抗，于城内中西部修筑满城，使杭州成为清代最先派驻八旗驻防的3个城市之一。杭州满城东起结缚桥至比胜庙（今岳王路、惠兴路、青年路），南自比胜庙至涌金水门（今开元路），西从涌金水门至钱塘门（即原杭州西城墙，今湖滨路），北自钱塘门经小车桥至结缚桥（今庆春路西段）。城高19尺，门阔6尺，周10里，占地约1430亩。新建城门五，即东平海门（今平海路与岳王路交叉口）、迎紫门（今解放路与青年路、惠兴路交叉处），南延龄门（今延安路与开元路交叉处，又名“来薰门”），东北为拱宸门（在今浣纱路与庆春路交叉口西），西北为承乾门（在小车桥附近），加上原来的钱塘门，共6门。另外还有水门3座，以通浣纱诸河。满城内驻八旗精兵及其眷属，故称“旗下营”。今杭州老年人仍习惯地称这一带为“旗下”。

[1]（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条。

[2]（明）杨孟瑛：《请开西湖奏议》，载于梁诗正《西湖志纂》卷十一《艺文》。

[3]（清）李卫：《西湖志》卷二《水利二》。



清旗营旧址·教场路（黎似玖 摄）

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杭州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被日本开为商埠。第二年又于拱宸桥强设日租界，其界址“东以陆家湾河为界，西至运河塘路为界，南至拱宸桥，北至瓦窑头”，周共11里余，占地2809亩。^[1]从此，杭州被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同时，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受到了严重冲击，近代工业、市政设施的建立及近代教育的兴起又开启了杭州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三、杭州设市

清宣统三年（1911）10月，武昌首义成功，紧接着，上海光复的消息便传到了杭州，浙江革命党人决定乘势起义。11月4日晚，驻杭州的新军八十一标、八十二标、会党及从上海赶来的敢死队，从笕桥、南星桥出发进攻省城；城内警察营、工兵营接应。起义部队遂分三路攻城内各战略要地，摧毁了清朝在浙

[1] 陈善颐：《杭州拱宸桥日本租界划界交涉经过》，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江的最高统治机构——抚署，巡抚增韞被俘。5日，杭州全城宣告光复。杭州光复后，全省各地闻风响应，纷纷宣布独立或反正，不到一个月，全省光复。杭州光复后，革命军政府没收了旗营土地，驱逐了所有旗兵及其家眷，掌握了大片土地。民国元年（1912）1月22日，浙江军政府决定，废杭州府，合并钱塘、仁和两县为杭县，仍为省会所在地。民国3年，北京政府决定省以下设道，以清代杭嘉湖道范围置钱塘道，道尹行政公署驻杭县，辖杭县、海宁、富阳、余杭、临安、於潜、新登、昌化等20个县。民国16年，划杭县所属城区和部分郊区设立杭州市。此后，杭州一直为浙江省的直辖市和省会。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杭州市为浙江省直辖市、浙江省省会。1958年底，原属宁波专区的萧山县、建德专区的富阳县划归杭州市管辖。1960年5月，桐庐县从金华专区改属杭州市，并撤销富阳县并入桐庐县；临安县从嘉兴专区改属杭州市，同时撤销昌化县（含於潜）并入临安县。1963年5月，建德、淳安县由金华专区划属杭州市。至此，杭州市辖上



中山公园光华复旦牌坊（黎似玖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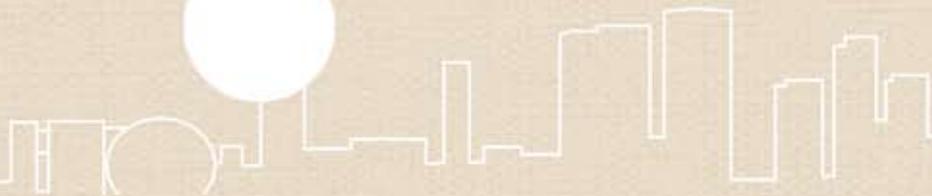
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5个区和余杭、萧山、富阳、桐庐、临安、建德、淳安7个县。

1985年底，杭州市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半山6区和余杭、萧山、富阳、桐庐、临安、建德、淳安7县。1987年11月至1994年4月，萧山、建德、余杭、富阳先后撤县设市。1990年1月17日，撤销拱墅区、半山区，建立新的拱墅区。1995年12月1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驻地由人民路28号迁至环城北路318号。1996年10月，临安撤县设市。12月12日，设立滨江区。2001年2月2日，撤销萧山市、余杭市，设立萧山区、余杭区。2014年12月13日，撤销富阳市，设立富阳区。2016年10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和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杭州市人民政府驻地由拱墅区环城北路318号迁至江干区解放东路18号。2017年7月18日，临安撤市设区。

2017年末，杭州市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滨江、萧山、余杭、富阳、临安10个市辖区和桐庐、淳安2个县，建德1个县级市。共84个街道、86个镇、23个乡；1090个社区、2036个行政村。

第二章

灵秀江南



杭州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杭州湾，南与绍兴、金华、衢州三市相接，北与湖州、嘉兴两市毗邻，西与安徽省交界，是中国东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地理坐标：北纬29°11′~30°34′，东经118°20′~120°37′。至2017年，全市土地面积16596平方千米，其中市区土地面积8000平方千米。

杭州系“东南形胜”，山水相依，湖城合璧。全市土地面积构成中，山地丘陵占65.6%，集中分布在西部、中部和南部；平原占26.4%，主要分布在东北部；江、河、湖、水库等占8%，故常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运河和以涌潮闻名的钱塘江穿城而过。境内有“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和世界上岛屿最多的湖泊——千岛湖，均为国家级风景名胜景区，与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构成“三江两湖”全国重点风景旅游线。享有“副西湖”美誉的西溪湿地建有中国第一个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此外，境内还有天目山、清凉峰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岛湖、午潮山、大奇山、富春江、青山湖、径山、桐庐瑶琳、半山、西山9个国家级森林公园。

杭州乃“三吴都会”，东南名郡，自古繁华。隋开皇九年（589）废钱唐郡，置杭州，杭州之名首次出现在历史上。开皇十一年，移州治于柳浦西，依山筑城，“周围三十六里九十步”，并设城门12座。这是杭州第一次建造州城。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前后3次扩建杭州城，在凤凰山下兴建子城，外再包以罗城，得“腰鼓城”之称。此后，宋、元、明、清各代基本沿袭吴越城建格局。南宋时期，改设旱城门13座、水城门5座，并形成了城中有坊、坊中有巷的全新格局。当时杭城御街两侧设置66条坊巷，这些坊巷大都是今日街巷的前身。元至正十九年（1359），张士诚改筑杭州城垣，设旱城门10座、水城门6座。清顺治五年（1648），杭州城内始建满洲驻防旗营城垣，俗称“旗下营”。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拆除城墙。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从此揭开了杭州发展的历史新篇章。改革开放后，杭州城区向郊区扩展，形成以西湖为中心的城市格局；21世纪开始，杭州城市中心逐渐向钱塘江转移，城市发展由“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



一、三面云山

杭州山脉的走势，如东晋郭璞在《钱唐天目山》诗中生动形象般描述，“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唐”。西湖以西诸群山，自临安天目山逶迤而来，从南、西、北三面环绕西湖，状如马蹄；西湖以东平原，坐落着千余年历史的杭州城。群山环抱西湖，古城依傍西湖，山、水、城融为一体，正是“三面云山一面城”“乱峰围绕水平铺”的真实写照。全市最高点是海拔1787米的清凉峰，西湖风景区内最高峰是海拔412米的天竺山。

自秦汉至清代，2000余年间，伴随西湖东边的城市发展，西湖周边的群山逐渐得到开发，成为文人名士的游赏地及佛、儒、道等文化与宗教活动的开展地。西湖群山具有的丰富文化底蕴，成为西湖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玉龙金凤

玉皇山横亘于西湖与钱塘江之间，与凤凰山冈峦相连，如龙飞凤舞。因其山势之形，远望如巨龙横卧，古称“龙山”。“玉皇飞云”被列

西湖全景（刘浩源 摄）



为“新西湖十景”之一。

玉皇山海拔237米，是西湖主要道教活动场所之一。唐时供奉三清教主；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迎取阿育王像供奉于此，又称“育王山”；明时在山顶修筑福星观，供奉玉皇大帝，因而更名为“玉皇山”。

在玉皇山巅，可西望群山，北瞰西湖，南眺钱塘，湖山空阔，风光无限，农历八月更可远观气势澎湃的钱塘潮奇观，可谓“亭倚玉龙迎风起，座看湖月听潮声”。山腰紫来洞前，可俯瞰山下南宋皇帝“躬耕”以示“劝农”的“八卦田”全景。八卦田九宫八格，所种的8类农作物四季呈现出8种不同的色彩，赏心悦目。这也是玉皇山景观的亮点之一。

凤凰山主峰海拔174米，位于西湖风景区东南隅，在万松岭与慈云岭之间，



西湖群山登山路线图

玉皇山上俯瞰八卦田（来源于杭州图库）





凤凰山上古圣果寺遗址（吴昌琨 摄）



凤凰山上宋高宗“忠实”题刻（吴昌琨 摄）

形如飞凤，故名。

据《西湖游览志》卷七记载：“自唐以来，肇造州治，盖凤凰之右翅也。钱氏因之，递加拓饰，逮于南宋建都，而兹山东麓，环入禁苑。”南宋迁都杭州，或出于地势考虑，选址凤凰山东麓建“皇城大内”^[1]，亭、台、楼、阁、斋、堂、轩、观等无所不有。而今，青山依旧在，故宫早无影。

凤凰山上的圣果寺遗址是存留古物最集中的地方，尚存吴越雕造“西方三圣”残迹、北宋十八罗汉造像、宋高宗楷书“忠实”二字，还有凤凰池、归云洞、月岩等名胜。

资料链接

相传，古时候，天上的银河边住着一只金龙和一只金凤。他们同心协力，一起把一块璞玉琢成了一颗璀璨的明珠。珠光照到哪里，哪里树木就常青，百花就盛开。王母娘娘得知后，就派天兵天将把宝珠抢走了。玉龙、金凤赶去索珠，王母不肯。一时间你抢我夺，明珠不慎掉落人间，变成了波光粼粼的西湖。玉龙和金凤也随着明珠降落，变成了两座秀丽的山峰，永远守护在西湖之滨。这就是玉龙山（即玉皇山）和与它毗连的凤凰山。

[1] 从南宋开始，正式把皇官称为“大内”。《宋史·舆服志》云：“南渡后，皇帝之居曰殿，总曰‘大内’。”

（二）双峰插云

天目山往东的一支余脉，遇西湖而分成南山、北山，形成环抱状的名胜景区，两山之巔即南高峰和北高峰。古时山巔均建佛塔，遥相对峙，迥然高出群峰之上。春秋佳日，岚翠雾白，塔尖入云，时隐时现，自西湖上远望，景观颇为宏远壮阔。南宋祝穆《方輿胜览》、吴自牧《梦粱录》及宋、明人画作，该景皆作“两峰插云”。入清，南北两峰古塔皆毁圮。康熙三十八年（1699），清康熙帝到西湖品题十景，改“两峰”为“双峰”，其后构筑御碑亭于行（洪）春桥侧。

北高峰地处灵隐寺北，海拔314米。灵隐寺后的韬光道，是从山脚通往北高峰顶的蹬道，石级数百，曲折三十六弯。山腰有韬光寺，始建于中唐。创建僧人法号韬光，与杭州刺史白居易为好友。现附近有吕纯阳炼丹台遗址、观海亭、维摩洞等胜迹。山顶有号称“天下



北高峰韬光寺内景（马琦敏 摄）

第一财神庙”的灵顺寺（俗称“华光庙”），宋徽宗大观年间赐额“灵顺”，清康熙帝留“华光庙”墨宝，乾隆帝赐“财神真君”并赋诗一首，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现存大殿为明末清初所建，规模宏伟。寺内现还存有御道踏石、连升三级石刻等文物。

历代名人苏轼、乾隆、毛泽东、朱德等都先后登临北高峰，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1999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06周年之际，“毛泽东诗碑亭”在北高峰顶落成，碑上镌刻着毛泽东诗手迹，供游人观赏。

南高峰与北高峰遥遥相对，海拔257米。由于山体主要由石灰岩构成，加上两侧山麓的断层，岩溶地貌突出。其南麓著名的烟霞洞、水乐洞、石屋洞以及洞内绚丽多姿的钟乳石，都与这种地质现象有关。

山中有一处“千人洞”，是西湖群山已知山洞中最大的洞穴，因被认为洞中可容千人，故名。清朝李卫《西湖志》卷五有记载：“山窾仅六尺许，渐进渐广，

可容千人。相传昔有寇难，里人多避于此，今瓶灶陶器尚存。”现因洞内岩块大量崩坍，危险较大，禁止游人入内。

南高峰顶，宋时有五大祀龙处之一的白龙王祠，后改建荣国寺塔院，建有铁塔一座，明万历年间(1573—1620)遭雷击，现只剩下塔址。20世纪60

年代初，朱德登上山顶，感而赋诗：“登上南高峰，钱塘在眼中。回首西湖望，江山锦绣同。”



双峰插云御碑亭（20世纪20年代）（来源于《近代杭州图集》）

南高峰顶荣国寺塔院遗址考古现场（马琦敏 摄）



（三）孤山胜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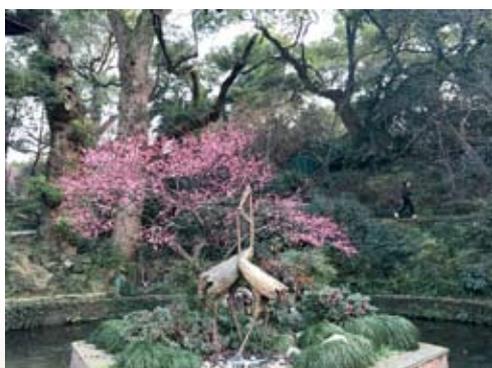
孤山海拔35米，是西湖群山中最
低的山，却是湖中最大的岛屿，也是
湖中唯一的天然岛屿。孤山在西湖的
西北边，北里湖与外湖之间，东接白
堤，西连西泠桥，四面环水，孤峙湖
中，故名。^[1]（咸淳）《临安志》卷
二十三载：“一屿耸立，旁无联附，为
湖山胜绝处。”

旧时山北多梅，故有“梅花屿”
之称。宋代林逋隐居于此，“以梅为
妻，以鹤为子”，创作了众多咏梅诗
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
黄昏”更被誉为绝唱。现于孤山北麓
建放鹤亭以纪念林逋，四周广栽梅
树，为杭城赏梅胜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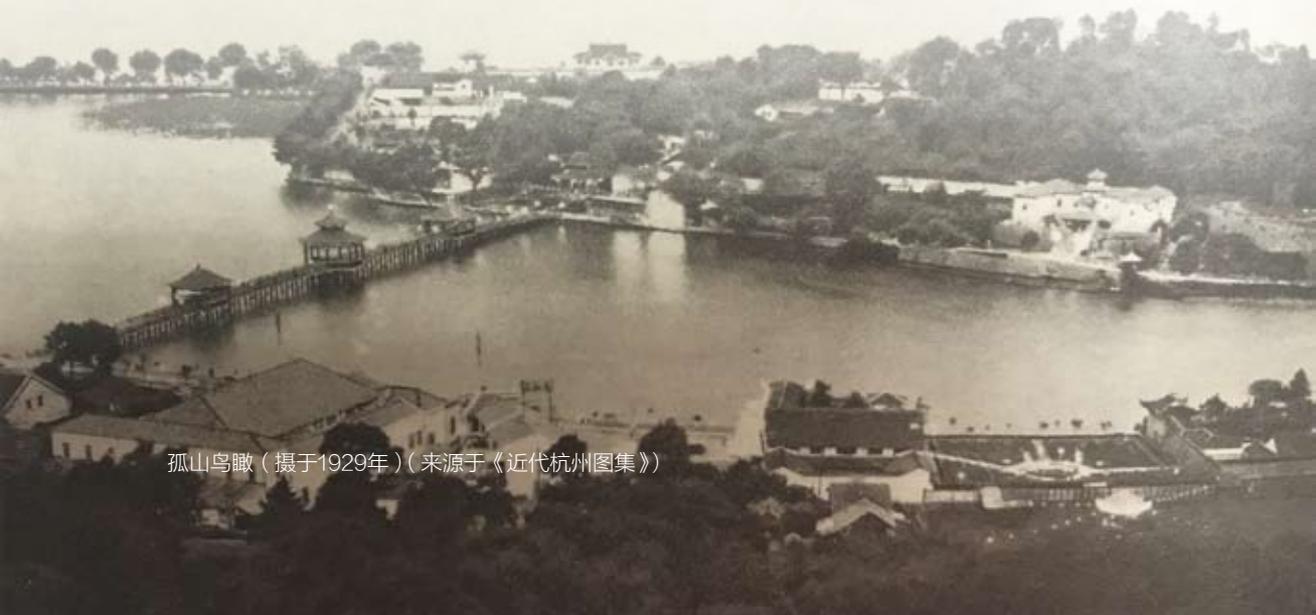
[1] 邵玉贞：《西湖孤山》，杭州出版社2013年出
版，第1页。



孤山放鹤亭（马琦敏 摄）



孤山“梅妻鹤子”景点（马琦敏 摄）



孤山鸟瞰（摄于1929年）（来源于《近代杭州图集》）

孤山景色秀丽，文物胜迹荟萃，清代王复礼《御览孤山志》称：“钱塘之胜在西湖，西湖之奇在孤山。”孤山之美早在唐宋已闻名遐迩，唐诗人白居易有“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的佳句。孤山与白堤相连之处是“西湖十景”之“平湖秋月”。山南麓有清代庋藏7部《四库全书》之一的文澜阁，有陈列浙江文物精品的浙江省博物馆，有清代著名学者俞樾的故居“俞楼”，有由清代行宫部分御花园改建成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中山公园。山顶西边有清末至近现代被誉为“天下第一社”的西泠印社，西麓有秋瑾之墓，东北坡有放鹤亭等。

（四）吴山天风

吴山地处西湖东南，是西湖群山中唯一嵌入市区的山。因春秋时期曾为吴、越之界，故名；杭城百姓因山上建有城隍庙，俗称其为“城隍山”。吴山由紫阳山、城隍山、伍公山、云居山、粮道山等十几个山头组成，海拔均约百米，山势平缓，但由于其深入市区，三面临城，上山可揽江、山、湖、城之胜，有凌空超越之感，故得“新西湖十景”之“吴山天风”之名。

吴山自古多奇岩怪石，其东南方向紫阳山上，山石嵯峨，是吴山一大景观；山腰有瑞石古洞，属喀斯特地貌，怪石嶙峋，是吴山石景最奇特之处。

吴山也多摩崖石刻，这些石刻大多为题记、诗句、题字等，如“钱塘县令钱华记”“我来海国三千里，君在蓬莱第一峰”“第一山”^[1]“吴山第一峰”“忠孝节义”等，吴山遂有“第一峰”之别称。宝成寺内岩壁上的麻曷葛刺造像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有明确纪年的元代藏传佛教大黑天摩崖石刻造像，已



吴山宝成寺麻曷葛刺造像（马琦敏 摄）

[1]（清）梁诗正：《西湖志纂》卷一：“吴山最高处名紫阳山，亦名瑞石山，上有宋米芾书‘第一山’石刻存焉。”

于2011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曾经闻名的《有美堂记》碑文早已无影。当年梅挚出守杭州，宋仁宗赐诗，有“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之句，梅挚到杭后，建堂于吴山上，名“有美”。欧阳修为记，蔡襄书碑。有美堂虽早已无存，但所幸有《有美堂记》脍炙人口，流芳百世。今在原遗址前立碑一座，碑上刻有《有美堂记》一文。

吴山旧时还多祠庙寺观，曾是杭城香火最盛之处，三教共存，人神同享，有祭祀春秋吴国大臣伍子胥的伍公庙，有重新修缮一新的东岳庙，还有药王庙、小普陀、三官庙等。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城隍庙，旧时杭城俗谚“城里城隍庙，城外土地庙”，可见它的影响。现在其遗址上建城隍阁与周新祠，城隍阁为七层仿宋元建筑，属吴山最高处，是眺望湖山美景的绝佳之地，也是现今杭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周新祠即昔日的“城隍庙”，明朝永乐年间开始祭祀周新。周新曾任浙江按察使，刚正不阿、明察秋毫，深受人民爱戴，人称“冷面寒铁”。

资料链接

相传北宋词人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咏尽西湖美景，后传入北方，金主完颜亮垂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起意投鞭南下，并命画工潜入临安摹绘西湖图景，制成屏风，亲笔题诗其上：“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吴山天风（来源于杭州图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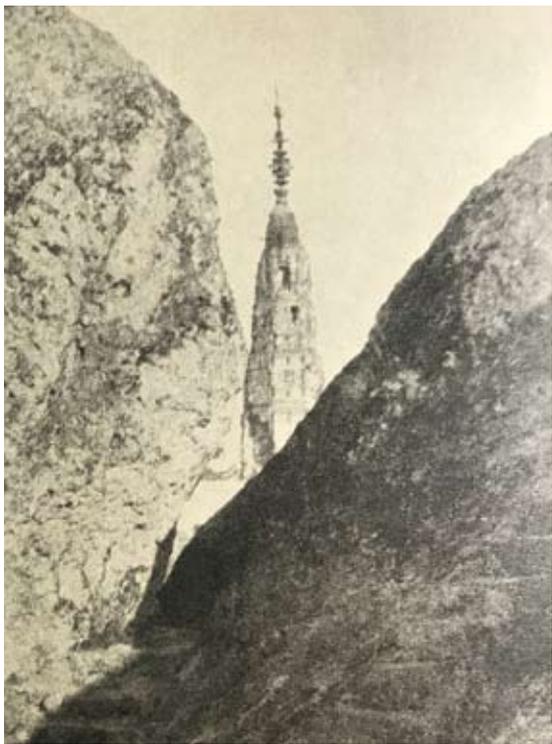
宝石流霞（来源于杭州图库）

（五）宝石流霞

宝石山海拔97米，为西湖北岸屏障。1.5亿年前，杭州断桥与里西湖一带曾发生过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形成了宝石山与葛岭。而宝石山则是西湖附近唯一含有大量“宝石”^[1]的火山岩。因山岩赭红，岩内多玛瑙状晶体，朝霞初现或夕阳西下之时，这些红色的“宝石”发出熠熠霞光，故在“新西湖十景”中取名“宝石流霞”。

宝石山东巅，保俶塔巍然伫立其上。塔高45.3米，现共7级。原名“应天塔”，吴越国宰相吴延爽为保其君钱弘俶朝宋平安归来而改名为“保俶”。现塔身为民国22年（1933）仿清代原样重建，塔刹铁构件均为明代旧物，塔身秀挺，宛如窈窕美女，故有“保俶如美人”一说。今虽不能登高眺远，却因其所处的位置而成为杭州和西湖的标志之一。塔旁有来凤亭，即清代“钱塘十八景”之“宝石风亭”。亭旁有块卵形巨石，如天外坠落般搁置山巅，俗称“落星石”。来

[1] 地质学上称为“碧玉”，是火山喷发的岩浆碎屑，其成分为二氧化硅，内含氧化铁，故呈暗红色。



宝石山保俶塔，摄于1919—1924年间（来源于《近代杭州图集》）

凤亭往西有“蹬开岭”，石级狭窄，两壁峭削，仅容一人通过，身临其境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感。再往西，到蛤蟆峰，因不同角度观望有不同的形态，此峰又称“巾幘峰”、“狮子峰”。此山岩为宝石山最高点，是俯瞰西湖的绝佳之地。

宝石山之西有葛岭，岭巅海拔125米。相传东晋葛洪曾炼丹于此，故而得名。岭巅有初阳台，宜远眺。初阳台南下有抱朴道院，因葛洪道号“抱朴子”得名。其黄色院墙随山势起伏，颇有特色。现属全国24处重点道教活动场所之一，也是杭州市道教协会的主要活动场所。

（六）五云盘旋

五云山海拔340米，位于西湖风景区西南部，北接琅玕岭，南濒钱塘江，东瞰九溪山谷，西邻云栖坞，为江干名山，也是西湖群山中著名高山。据《云栖纪事》引《云栖兰若志》记载：“山之得名，以五色瑞云盘旋山顶，已而飞集西坞，经时不散。”

五云山景致怡人，自古即是登高览胜的好去处。元代诗人方回曾有诗赞曰：“不浓不淡烟中树，如有如无雨外山。尺素展看空想象，何由身著画图间。”毛泽东主席1955年在登临此山后留有诗句：“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衣。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五云山山顶有一株傲立千年的银杏，树龄1400余年，是杭州现存最古老的银杏树。每当深秋，那一树的金黄与满地的灿烂，堪称五云山最美之景。树后为吴

越国古刹真际寺遗址，“民国时寺中奉财神，春秋二季烧香者颇众”^[1]。现真际寺遗址被辟为茶室，遗址内有口古井，是杭州西湖风景区海拔最高的天然水井，被称为“天井”。

资料链接

琅玕岭，又名郎当岭，平均海拔在200米以上，是西湖群山中最长、最高的山岭。据明代释广宾纂《杭州上天竺讲寺志》卷十记载：“郎当岭又名扞薜岭，在幽淙岭之上，下为活沙坞。左迫削嶂，右临深溪，缘木攀萝，方可举趾，非芒屨莫登，虽矫捷亦怯，故称郎当。上为天门（指天竺山），东通龙井，南通五云。”其原指天竺山东、龙井村西、梅家坞村东北的山岭，因长度刚好在5千米左右，故有“十里琅玕”之名。

如今，十里琅玕已远不止10里，它南起五云山，北至上天竺一带山冈。上琅玕岭的山路很多，可从五云山北上，从龙井村西行，从天竺山南走等，其中从梅家坞东走，穿越龙井茶产区，抵达五云山顶后向西从云栖竹径下山，是十里琅玕最经典的线路。途中可看梅坞龙井，望五岭起伏，听天竺梵音，江天湖山尽收眼底。2016年10月，十里琅玕入选“杭州十大最美森林古道”。古道起自云栖竹径，止于灵隐天竺。



五云山千年银杏（来源于杭州图库）

[1] 钟毓龙：《说杭州》（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出版，第91页。

（七）名山天目

天目山位于杭州西郊临安区境内，逶迤浙、皖两省，是浙江西北部最大山脉，浙西诸山之祖。主体东西山脉，惯称“东天目山”与“西天目山”，因“峰顶各有一池，左右相对，名曰‘天目’”^[1]，两池若双目，仰望苍穹，古称“天眼山”“天池山”“浮玉山”，自五代后晋天福元年(936)起，改称“天目山”，沿用至今。



天目山图 [来源于(乾隆)《杭州府志》]

西天目山主峰仙人顶，海拔1507米，被视为洞天福地的神灵之山，奇丽秀绝，甲于浙西。战国《山海经》、北魏《水经·浙江水注》、唐五代《吴越王钱镠记》、宋《天目真镜录》等典籍中均有记述其地理之奇特，自然之荣生。山上古树参天，多奇树异木，以“大树华盖闻九州”“十里不同天”的参天树景为人称道，有“大树王国”之誉，如2015年6月入选“浙江十大古树”的“五世同堂”野银杏，宋代称“千秋树”、清代乾隆皇帝封“大树王”的千年柳杉，有“地球独生子”之称的天目铁木和2015年6月入选“浙江十大树王”之一的金钱松，等

[1]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五。

等。山中亦是天然的动物园，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动物有云豹、金钱豹、黑麂、梅花鹿、华南虎、白颈长尾雉6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动物有猕猴、穿山甲、雀鹰、中华虎凤蝶等36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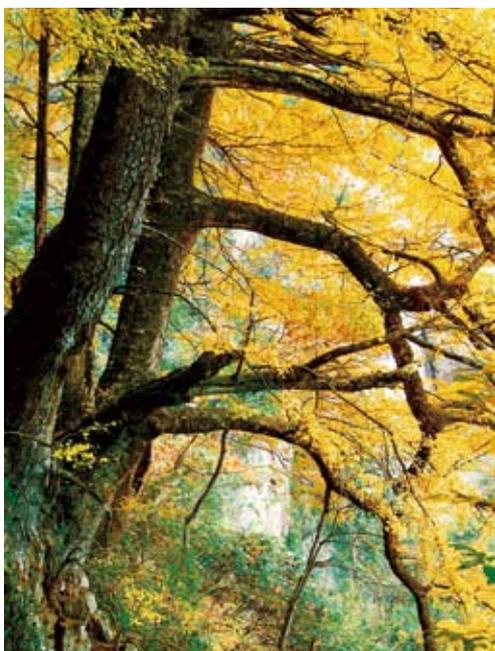
西天目山半山狮子岩左侧有狮子正宗禅寺（又名“开山老殿”），元代所建，为临济宗中兴祖庭。宋末起，日本、印度、高丽（今朝鲜半岛）等国高僧前来参禅问法，称高峰、中峰两位禅师“江南古佛”，有“不上西天（指西天目山），不参两峰（即高峰、中峰），不成正宗”之说。老殿后毁于兵燹，仅存山门，今已全面修葺一新，香火重兴。

山麓有依山而筑的禅源寺，清康熙四年（1665）建，当时占地40余亩，禅堂寮舍500余间，盛时僧侣1000余名，一度成为江南佛教中心。清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御书“禅源寺”额悬于天王殿；清光绪十五年（1889），以韦驮菩萨祈雨灵应，德宗帝御赐“福佑潜城”额悬于寺中。民国30年（1941）被日军飞机炸毁，仅存山门、天王殿和官客堂。今已全面复建。

东天目山主峰大仙峰，海拔1479米，景区内峰、洞、崖、瀑、寺



西天目山大树王（王文彬 摄）



西天目山“五世同堂”野银杏（刘柏良 摄）

等自然、人文景观十分丰富。自晋以后，东天目山佛教隆盛，昭明禅寺为韦驮菩萨道场，历代高僧辈出。梁昭明太子萧统曾在此山分《金刚经》，编《文选》。山上野银杏、柳杉、红豆杉、金钱松、天目杜鹃等古树名木遍布，更有连绵数千亩的黄山松林，史称“万松林”。

资料链接

抗日战争期间，浙西行署迁至西天目山，天目山一度成为浙西抗日中心。爱国文化精英云集天目，相继创办浙西一中、民族文化馆、民族日报社、民族剧团、天目书院，西天目山成为影响全国的浙西抗日民族文化中心，在反侵略战争史上留下璀璨一页。

民国28年（1939）3月23日，周恩来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烽火千里行，来到西天目山。次日上午，省立浙西临时中学在禅源寺百子堂补行开学典礼，周恩来做长篇演讲，肯定了浙江的抗日形势，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阴谋，提出了向敌人发起进攻的具体办法。1989年3月，值周恩来来到西天目山之行50周年之际，临安市政府在禅源寺“百子堂”遗址建周恩来演讲纪念亭。



天目山浙西行署办事机构旧址——留椿屋（葛华平 摄）



二、五水共导

杭州依水而兴，因水而美，缘水而名。这一城秀水，是杭州自古传承的珍贵遗产，是杭州几千年来繁荣昌盛的基础。杭州水系发达，河流众多，江（钱塘江）、河（运河）、湖（西湖）、海（东海）、溪（西溪）“五水共导”。市域内主要河流有钱塘江、东苕溪、京杭大运河、萧绍运河和上塘河等，分属钱塘江、太湖两大水系。钱塘江水系包括新安江、富春江和钱塘江。杭州盛名，缘河而生；杭州城池，依河而建；江南名郡，凭河而扬；两朝都城，据河而定。2011年6月24日，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杭州成为“双世遗”城市。

21世纪初，杭州立足于江、河、湖、海、溪“五水共导”的城市资源禀赋，实施西湖综合保护、西溪湿地综合保护、运河综合保护、河道有机更新、钱塘江水系生态保护五大系统工程。通过城市治水实践，杭州有效提升了城市生活品质，营造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亲水型“宜居城市”，彰显了独特的城市魅力。

（一）三江水美

钱塘江以清澈碧绿的钱塘江水和排山倒海的钱塘江潮闻名天下。自古以来，其名众多，有浙江、渐水、渐江、罗刹江、之江、曲江等。三国时始见“钱唐江”，而当时仅指流经古钱唐县（今杭州）的河段，唐代改称“钱塘江”。近代

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之亮灯工程
(市园文局 供稿)



以“钱塘江”统称整条河流。钱塘江以北源新安江起算，河长668千米，南源为兰江，主要流经浙、皖两省，注入东海。钱塘江干流各段随地而异名，在杭州市境内，建德市梅城以上泛称“新安江”，自梅城以下至桐庐县和富阳区段称“富春江”，到萧山区闻家堰后称“钱塘江”（又称“之江”）。



钱塘江图 [来源于(乾隆)《杭州府志》]

新安江在杭州流经淳安县、建德市，这里山高水长、河道曲折，两岸山色秀丽，江水澄净，唐代孟浩然有诗赞曰：“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素有“锦峰秀岭，山水之乡”的美誉。因上游干流穿行于皖南、浙西山区的丘陵、低山和盆地间，河床坡度大，水流急，多峡谷险滩，清代黄仲则有诗曰：“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所以水力资源丰富。1957年4月，在建德市新安江镇以西6千米的铜官峡谷中始建新安江水电站，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主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1959年9月，新安江截流，水库大坝因拦蓄上游之水，形成一个面积573平方千米的人工湖。因水高山低，使无

数山峦半掩于湖水之中，形成1078个岛屿，故新安江水库又有“千岛湖”之美誉。



新安江一段（来源于杭州图库）

富春江在杭州流经建德市、桐庐县、富阳区，以山水俱佳闻名。在古代中，讴歌富春江的诗文俯拾皆是。如南朝梁代吴均在其《与朱元思书》中极

言富春之美：“自富阳至

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唐代吴融《富春》一诗云：“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寰。”元代李桓《富春舟中》赞曰：“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沿途胜迹有三国东吴大帝孙权故里的龙门古镇、中药鼻祖桐君结庐炼丹的桐君山及严子陵钓台等。

富春江自建德梅城至桐庐间的河段，为高山峡谷地带，称“七里泷”，又称“桐江”，分为“一关三峡”，即乌石关、乌龙峡、子胥峡、葫芦峡，为富春风光

富阳“城市绿心”新沙岛（市农办 供稿）



最锦绣处。沿途有葫芦飞瀑、子胥渡口、子陵垂钓、七里扬帆等著名景点。此地虽无长江三峡两岸险峻，但秀丽妩媚实远过之，故有“小三峡”之称^[1]。自古以来，这片风光以“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魅力令无数文人墨客倾倒，元代画家黄公望所



浦阳江流经萧山区浦阳镇段的弯弯河道（来源于杭州图库）

作的“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富春山居图》便是对这一带山光水色的真实写照。富春江水电站建成后，高峡出平湖，富春江风光仍旧不减当年。

钱塘江在萧山区闻家堰小砾山右纳浦阳江后，因河道折向西北，至西湖区九溪又折向东北流，形若反“之”，故又名“之江”。

因独特的喇叭形河口及受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等影响，钱塘江形成独特雄伟、闻名于世的自然景观——钱塘江大潮。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钱塘江涌潮最大，潮头可高达数米。受两岸海塘影响，涌潮潮景变化万千，形成白练横江“一线潮”、双龙相扑“碰头潮”，还有“交叉潮”“回头潮”等多种潮姿，集自然涌潮景观之大成。唐代李白《横江词六首》其四云：“浪大天门石

[1] 马时雍：《杭州的水》，杭州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0页。

钱江潮（贺勋毅 摄）



壁开，海神来过恶风回。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宋代苏轼《望海楼晚景》中开头即有“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十二回”的描述，在其《观浙江涛》中则称：“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海宁七里庙观潮后写有一首气势磅礴的《七绝·观潮》：“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古时杭城观潮，以凤凰山、江干一带为最佳处。因地理位置的变迁，自明代起，以海宁盐官为观潮第一胜地，亦称“海宁观潮”。观潮之俗始于汉魏，盛于唐宋，历经2000余年不衰。尤其自中唐后，钱塘秋潮被视为杭越一绝，故有“闲话钱塘郡，半年听海潮”^[1]之说。

虽然“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但其桀骜不驯，千百年来给沿江百姓造成不少灾祸，史书上记载着许多“坍江、决堤”的悲惨史事。为抵御涌潮之患，保百姓长治久安，自唐起，历经8个朝代的更迭，终于修筑起规模宏大、驰名中外的钱塘江海塘。杭州的吴越国海塘、明清海塘和海宁的鱼鳞石塘成为中国海塘建筑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海塘实物遗存。此外，两地还留有与此文化相关的古迹，如始建于北宋开宝三年（970）、既体现镇潮信仰又具有导航功能的镇潮塔



钱塘江六和塔处（摄于1910—1919年）（来源于《近代杭州图集》）

[1]（唐）李频：《陕府上姚中丞》。

“六和塔”等。杭州市于1997年从下沙海塘开始实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钱塘江标准海塘建设。如今，下游两岸已巍然屹立起崭新坚固的大堤，犹如“水上长城”。

资料链接

钱塘江大桥，也是钱塘江上的第一座大桥，始建于1934年8月，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是中国自行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由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设计。1937年12月23日为阻止日本侵略军渡江，刚建好不久的钱塘江大桥被迫炸毁，茅以升亲自参与指挥。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桥于1946年修复通车。70年来，任凭风吹浪打，岿然不动，一度被网民热捧为“桥坚强”。2016年9月，钱塘江大桥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自钱塘江大桥建成至今，钱塘江杭州段上又先后建起9座大桥，大大缓解了钱塘江两岸的交通压力，实现杭州从“西湖时代”到“钱塘江时代”的跨越。杭城百姓俗称这些桥为“一桥”“二桥”“三桥”等。



钱塘江上的大桥



（二）千里运河

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版图上，杭州作为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之地，因一水穿城过，而两岸百业兴。当年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1]，使僻处一隅的杭州一举成为运河名城，钱塘繁华，自此开启。京杭大运河（杭州段）北起余杭塘栖，一路流经杭州市余杭、拱墅、下城、江干四城区，最后经三堡船闸汇入钱塘江，蜿蜒50多千米。如今，除了延续传统的交通和水利功能，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更成了以历史街区、文化园区、博物馆群、寺庙庵堂、遗产遗迹为重要节点的文化休闲体验长廊和水上旅游黄金线。

古代的京杭大运河，首要任务便是运输粮食，这种粮食称“漕粮”，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之用，而漕粮的运输便称“漕运”。史载，北宋时每年经运河北运的粮食近800万担；清代在通州，仅运粮的漕船每年就有2万余艘，而押运漕船的官兵有12万人次之多。杭州作为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位置优越，官办粮仓应运而生。特别是城北湖墅，当年粮仓云集。清光绪六年（1880），浙江巡抚谭钟麟因杭城粮食告急，遂令杭州士绅购粮10万石，分储于原有的两个粮仓，原仓库不敷储存，便在霞湾巷购地10亩，历时4年，于光绪十年（1884）建成共有4排仓库、可储存谷物四五万石的粮仓，取“以仁致富，

[1] 京杭古运河南段，自长江至钱塘江一段又称“江南运河”，过江苏平望入浙江境后即为浙江段，过桐乡大麻进入杭州市境后称“杭州段”。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沿岸景色（来源于《杭州年鉴（2015）》）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申遗点段分布图（来源于《杭州年鉴（2015）》）



浙杭通益公机器纺织厂（杭一棉前身）“麒麟”牌商标广告（1889-1914）（来源于《京杭大运河图说》）

和则义达”之意而名“富义仓”。作为杭州现存唯一的古粮仓，富义仓曾是清朝一大粮仓，与北京的南新仓并称为清代的“天下粮仓”。如今，“富义仓遗址”处早已无粮仓之迹，倒成了文化创意园区。

大运河的开凿，也促进了杭州商贸业的发展。到明清时期，杭州武林门至湖墅一带沿岸成为南北货运中心，商客云集，夜市热闹，有“橈帆卸泊，百货登市”“篝火烛照，如同白日”之景。到了近代，则由于交通便利及沿岸丝、绸、绵、麻等原料丰富而促使了杭州轻纺业的大力发展，如浙江解放后首个大型国有企业“航母”——浙江麻纺厂，还有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杭州第

一棉纺厂均位于此。除轻纺业类工厂外，还有造纸厂、汽车发动机厂、台钻厂等知名工业大厂。如今，这些老厂房，有的被改造成了创意园，有的其址上建起了高档的楼盘……

运河沿岸，风情独特。这里的居民枕水而居，木楼瓦屋“上宅下店”，别有江南韵味；这里的水乡食俗、运河菜系，带动了沿岸酒楼茶肆的兴旺；这里曾经热闹非凡的庙会，让各种



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摄于1978年）（来源于《京杭大运河图说》）

杂艺南北交汇。而酒楼茶肆和庙会的兴盛又促进了杭剧、评话、弹词、小热昏等地方戏曲的发展。沿岸还多私宅、别墅，至今有迹可循的有高家花园等。

湖墅北路往北，过大关桥，便是小河直街了。街道不长，约1千米，但市井味十足。由于运河的带动，这里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三百六十行各显神通，促成了小河直街的空前兴旺。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熙熙攘攘，热热闹闹，有“小河贯万家，街衢竞物华”一说。如今，街区保留了一半以上的原住民，有效延续了运河民居传统的民风民俗和生活方式，被称为杭州“最后的运河人家”。



运河沿岸的人家（马琦敏 摄）

资料链接

运河上桥梁颇多。在杭州，有广济桥、大关桥、德胜桥、江涨桥、拱宸桥、卖鱼桥等。

广济桥：位于塘栖古镇上，又名“通济桥”“碧天桥”，俗称“长桥”，桥长83米，高13米，为大运河上现存唯一的七孔石拱桥。据清代王同《塘栖志》载：



拱宸桥 (Dave Yin 摄)

“跨溪有桥，额名通济，肇自前代，漫不可考，久益倾圮……”通济桥系明代弘治二年至十一年（1489—1498）僧人陈鄞募捐修建，为七孔桥。后经多次修葺，至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重建，改名为“广济桥”。桥身古朴，雕饰精美，是浙江境内颇为雄伟的古桥。

拱宸桥：位于湖墅大关桥之北，作为京杭大运河到杭终点的一个标志，桥长98米，高16米，始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是杭州城内古桥中最高、最长的三孔石拱桥，见证了京杭大运河的荣耀，有“运河第一桥”之誉。在古代，“宸”指帝王居所，“拱”即拱手，两手相合表恭敬，“拱宸桥”之名由此而来。如今，在桥的东岸建有运河文化广场和国内第一座以运河文化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桥的西岸则是桥西历史街区，保存有最完整的清末民国初沿河居民建筑及大量近现代工业遗存。这些工业遗产现已变身运河边的刀剪剑、扇、伞三大国家级博物馆，集中展示中国伞文化、杭州张小泉剪刀以及以杭州王星记扇子为主的中国扇发展史等近代民族工业发展进程。



三潭印月（来源于杭州图库）

（三）诗画两湖

1. 西湖旖旎在十景

西湖最早称“武林水”。据《汉书·地理志》载：“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见诸文献记载的名称主要有二，一是因杭州古名“钱塘（唐）”，湖称“钱塘（唐）湖”；二是因湖在杭城之西，故名“西湖”。北宋以后，名家诗文大都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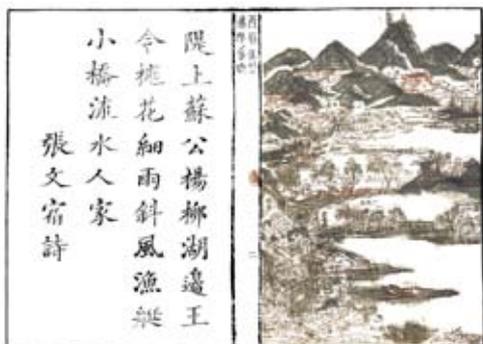
西湖湖面面积为6.5平方千米，南、西、北三面云山，东接杭州城区，南邻钱塘江，湖城相依，江湖并美。沧海桑田间，西湖经历了一个从海水侵蚀的潟湖到可灌溉饮用之湖直至成为极具人文荟萃之湖的漫长过程。西湖美景，天造人设，是千百年来人们治理疏浚、依势造景的山水之湖，是千百年来人们感怀世事、寄托情怀的精神之湖。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一山、二塔、三岛、三堤、五湖”，组成西湖之秀美格局——孤山、白堤、苏堤、杨公堤分割西湖为外西湖、西里湖、北里湖、小南湖及岳湖等五片，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三个小岛鼎立于外西湖湖心，雷峰塔与保俶塔隔湖相映。这一片湖光山色，分则各领风骚，合则相得益彰。

西湖山水是历史的熔铸，到处有人文的渗透，折射出杭州不同时期的嬗变与传承进程。西湖山水间，留存下来的一系列历史文化遗存，包含了摩崖造像、古刹道观、祠墓遗址、藏书楼阁和西湖龙井茶等多种景观类型，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唐宋佛教禅宗文化、社会传统忠孝文化、文人士大夫的隐逸文化、中国江南传统的藏书文化以及唐宋时期茶禅文化等。而“西湖十景”是这诸多文化景观中的精华所在，诗情画意，意境优美。自中唐起，西湖山水便备受青睐与赞美。南宋定都杭州时，南宋画师们围绕两堤三岛，以四季景物和晨昏变化作为观赏特征，创作诸多西湖山水画，“西湖十景”之名由此而出。当年的文人士大夫们以天人合一的理念从审美角度出发，画以景名，景以画传，做到了诗、画、景的完美统一，使“西湖十景”成了中国题名景观的杰出范例。南宋祝穆《方輿胜览》卷一中有记载：“西湖，在州西，周回三十里，其涧出诸涧泉，山川秀发，四时画舫遨游，歌鼓之声不绝。好事者尝命十题，有曰：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峰落照、南屏晚钟、曲院风荷、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两峰插云。”这十景“考凡四字景目，例起画家，景皆先画而后命意”^[1]。南宋吴自



平湖秋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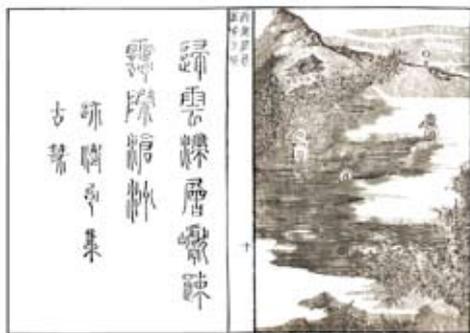


苏堤春晓

[1] (清)翟灏：《湖山便览》卷一《纪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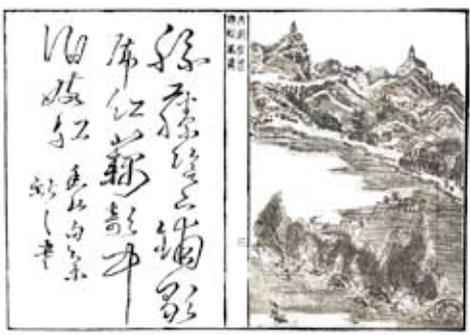
断桥残雪



雷峰夕照



南屏晚钟



曲院风荷



花港观鱼



柳浪闻莺



三潭印月

两峰插云

西湖十景图（来源于清代《西湖佳话古今遗迹》）

牧《梦梁录》中记载“西湖十景”时，“雷峰落照”成“雷峰夕照”。此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御书“西湖十景”景名，改“两峰插云”为“双峰插云”，并由地方官勒石立碑于十处景点。后乾隆南巡杭州，就十景各赋诗一首，并镌刻于碑上，使“西湖十景”更广为人知，被公认为西湖山水的代表。

1984年，杭州日报社等五家单位发起了“新西湖十景”评选活动，最后确定云栖竹径、满陇桂雨、虎跑梦泉、龙井问茶、九溪烟树、吴山天风、阮墩环碧、黄龙吐翠、玉皇飞云、宝石流霞为新十景。2007年，杭州市政府进行“三评西湖十景”和名称征集（“西湖十景”“新西湖十景”不再列入评选范围），最后确定灵隐禅踪、六和听涛、岳墓栖霞、湖滨晴雨、钱祠表忠、万松书缘、杨堤景行、三台云水、梅坞春早、北街梦寻为三评“西湖十景”。

2. 千岛碧水画中游

1959年，新安江截流，因水库大坝蓄上游之水，形成了一个面积为573平方千米的人工湖——新安江水库。淳安境内本多山，山高水低的结果，使无数山峦半淹湖水之中，形成星罗棋布、姿态各异、风姿绰约的1078个岛屿，因此新安江水库又得“千岛湖”之美誉。湖中水色澄碧透明，能见度可达7米，为国家一级水体，被誉为“天下第一秀水”。当代郭沫若先生游览后曾发出绝佳咏赞：“西子三千个，群山已失高。峰峦成岛屿，平地卷波涛。”

千岛湖分中心湖区、东南湖区、西南湖区、西北湖区和东北湖区五大区块。现已开发成熟可供游览的有中心湖区、东南湖区和周边乡村游景点。中心湖区



千岛湖（吴宗其 摄）

是目前千岛湖最美的区域，主要有梅峰览胜、龙山岛、月光岛、渔乐岛四个景区；东南湖区则是千岛湖开发最早的景区，主要有黄山尖、天池岛、桂华岛、蜜山岛四个景区。周边乡村游景点主要有下姜村、龙川湾、文渊狮城、森林氧吧等。这些景区中有体现奇特自然风光的梅峰览胜、赋溪石林，有反映淳安悠久历史、人文古迹的海瑞祠、蜜山禅寺，有体味人与自然、人与动物情趣的猴岛，还有参与水上运动、刺激惊险的温馨岛等多处游览景点。湖的四周群山叠翠，绵延起伏，森林覆盖率达93%，动植物资源丰富，盛产茶叶、蚕桑、木材、毛竹等。湖内淡水鱼种类多达80余种。

千岛湖碧水下，还沉睡着“贺城”和“狮城”两座千年古城，因当年建造新安江水电站而被沉入湖底。贺城即淳安古城。史载为东汉建安时期东吴大将贺齐所建，故名。旧时贺城为浙西



文渊狮城（吴昌琨 摄）

重镇，经济富强，文化鼎盛，古往今来，许多文人硕儒如南朝沈约，唐朝李白，北宋范仲淹，南宋朱熹、陆游等均曾到过此地，名篇佳作群集，文人古迹遍地。狮城即遂安古城。据载为唐武德四年（621）迁至此，因背依五狮山，故名“狮城”。该城水陆交通便利，为徽杭商贸往来的重镇，有“浙西小天府”之称，城内多名胜古迹，有明清时期古塔、牌坊及岳庙、城隍庙、忠烈桥、五狮书院等古建筑，还有历代古墓葬等。2011年2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刊发了一组水下狮城的精美照片。之后，将水下狮城复制上岸成了千岛湖文化旅游的新中心。2016年6月，在离狮城原址最近的姜家镇上，“文渊狮城”正式开园。它再现了水下狮城千年的原生景象。

（四）一曲溪水

西溪，一名多义。初为水名、山名，后为镇市名、乡村名，再后为路名、区片名。古今含义有所不同，区域范围又有大小区别。明洪瞻祖《西溪志》载：“溪薄余杭界，自分金岭，挟上埠诸溪之间细流，划原田，穿市镇，而又逆受余杭、南湖之侵，横山环之，凡三十六里，过朱桥、会于江，注古荡与湖合。”清《西湖志》卷四称，西溪“曲水弯环，群山四绕，名园古刹，前后踵接，又多芦汀沙渚”。

西溪地理位置一般指西溪河流经的杭城西部留下至古荡段两岸的宽阔地带，

西溪湿地全景（江灵光 摄）



总面积约60平方千米。沧海桑田，西溪历经海侵、海退、湖泊、沼泽，形成原生态湿地，后又历经渔耕经济的改造，成为次生湿地。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西溪湿地大量被占用，面积锐减，现实施保护的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约为11.5平方千米，分为东部湿地生态保护培育区、中部湿地生态旅游休闲区和西部湿地生态景观封育区。

西溪湿地历经东汉形成、唐宋发展、明清全盛、民国衰落的演变过程。东汉熹平二年（173），余杭县令陈浑在东苕溪筑堤蓄水，建成南湖水库，是为西溪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唐代始有“西溪”之名，南宋开辟西溪“辇道”（又称“南宋辇道”，东起历秦亭、方井、法华至西溪镇、十八里，皆在梅海竹林中）。“西溪一洼水耳，复古未闻。自宋辇经途，斥为皋壤，沟塍鳞次，耕渔栉比，兼绕梅、竹、茶、笋，而香雪十八里，遂成佳话矣。”^[1]明时，“福胜梅花”和“河渚芦花”成为西溪两绝；西溪与灵峰、孤山并列为杭州三大赏梅胜地。至清代，西溪又重修庵堂、拱桥，新建书楼、别业，并与西湖、南山、北山并列为杭州四大风景区。元明清时期，文人墨客、丹青高手慕名而来，或游览，或居住，给西溪留下较多诗词书画和匾额碑刻，使西溪进入全盛时期。民国时期，列强入侵，军阀混战，民生凋敝，西溪风光不再，渐趋衰落、荒芜。

[1]（明）吴本泰：《西溪梵隐志》卷一《纪胜》。

西溪湿地雪景（来源于杭州图库）





“西溪十景”之秋芦飞雪（来源于杭州图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化工业化扩张，占用大片湿地，西溪生态功能退化。保护西溪，刻不容缓。2002年，杭州市委、市政府着手制订规划，开始实施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2005年5月1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建成并对外开放，至2010年，工程全部竣工。濒临消失的西溪湿地终于得到有效的保护，西溪湿地从此转入新的全盛时期。



秋雪庵（20世纪20年代）（来源于《近代杭州图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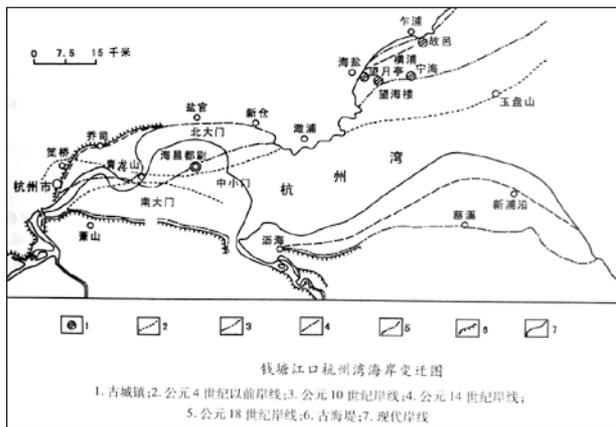
西溪多古迹、胜景。有历代名人学士的结庐隐居地，如洪园和洪钟别业、章次白的梅竹山庄、冯梦祯的西溪草堂等；有遍布深谷翠坞的寺庙庵堂，如秋雪庵、曲水庵、蒋相公祠、东岳庙、法华寺、永兴寺等；有以秋雪庵四周“秋芦作花，远近联白”形成的“秋雪八景”，有因明代《曲水八咏》而成的“曲水八景”，还有“西溪三堤”“西溪十景”等。西溪也多各种节庆活动，根据四季分明的特点举办初春探梅节、初夏龙舟文化节、秋季火柿节、初冬听芦节和杭州花朝节及“非诚勿扰”爱情主题游等活动。

（五）沧海桑田

“江、河、湖、海、溪”五水中，“海”与杭州这座城市的渊源，可说最为久远。古时，今杭州市城区大部分地区是海湾水域，汉代以后才逐渐成陆。之后，随着水陆变迁和城市拓展，这片与浩瀚大海相连的浅海湾才逐渐为人所用，为人所居。北宋苏轼在其《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提到：“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南宋周密在其《癸辛杂识》中论及吴山青衣泉的石壁间有水波细纹的遗迹时，也曾说：“今之城中，皆当深入水底数十丈。”因而，杭州城市形成与扩展的历史，可说是钱塘江渐渐后退，江海成为陆地的历史。

杭州因海而成，却也因海潮怒湃而曾经使居民不堪其苦。历朝历代在与水患作斗争中，修建了不少海塘江堤。西汉末至东汉初，华信在杭州筑防海大塘，为国内有史可稽的第一条海塘。据北宋《太平御览》所引南朝宋刘道真《钱唐记》称：“防海大塘在县东，去邑一里许。昔县境逼近江流，县治灵隐山下，今余址犹存。郡议曹华信家富，乃议立此塘以防海水。”这条海塘的筑成，把湖水与海水分开，结束了古代西湖与大海相通的历史，从而促使塘外海涂泥沙的淤涨，加快杭州滨海陆地的形成和扩大。

沧海桑田，如今的杭州已远离水患，依着钱塘江流入杭州湾而与东海一脉相通。这个典型的喇叭口形海湾，以钱塘江大潮闻名，是中国沿海潮差最大的海湾。在这片海陆交互的地带，利用北岸冲蚀、南岸淤涨的自然趋势，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百姓在杭州湾围垦造田、修筑堤坝。从1953年至1978年，下沙人民先后参加了大规模的钱塘江滩涂围垦造田活动，形成并稳定目前的地域。而自1965年以来，萧山区人民为了锁住大潮，筑起了长堤，至2000年底，共围垦造地面积52.62万亩，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誉为“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



杭州湾海岸变迁图（来源于《杭州市志》）

三、五水共治

20世纪90年代，京杭大运河完成“双流奇汇”工程，与钱塘江沟通，使江河再一次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2003年9月，钱塘江西湖引水工程完成，使西湖引水不再受到钱塘江水质变化的影响。这两项工程是“五水共治”的前奏。

2013年11月29日，山河秀美的水乡浙江，吹响了全省治水的号角，浙江省委做出了“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的“五水共治”重大决策。杭州作为省会城市积极响应“五水共治”的号召，投入治水大潮当中。



钱塘江水面保洁系列行动启动（来源于杭州图库）

12月12日，杭州市召开“五水共治”工作动员大会，出台了《“五水共治”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和《杭州市“河长制”实施方案》，吹响了三年攻坚战的号角。



河长制公示牌（马琦敏 摄）

这三年的杭州，大力开展“清三河”、“污水零直排”、河湖库塘清污（淤）、深化“河长制”等，全市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自“五水共治”开展以后，社区、街道、

区县，机关、学校、企业……全市范围内，形成了参与治水的热潮，真正成了一场全民行动。这三年的治水，杭州成绩显著。一是全面消除垃圾河、黑臭河。至2016年底，杭州市已累计完成71条460千米垃圾河和277条802千米黑臭河整治，全面消灭“黑河、臭河、垃圾河”。二是提升截污方式，建成零直排区。2015年开始，杭州市全面推广污水“零直排区”建设，通过应截尽截、以拆代截、就地处理等方式，不断升级“零直排”整治方案，优化提升截污方式。至2016年10月，杭州市1520个行政村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16座污水处理厂完成

提标改造，789个养殖场通过治理验收，并关停6847家治污设施不合格的养殖场。三是咬住河湖清淤，全面减少内源污染。杭州市探索出了五大清淤和淤泥利用模式，比如余杭区的“淤泥藕塘就地利用”模式，造就千亩荷塘和千亩花海，推动产业转型；下城区的“留置管道”模式，萧山区的“淤泥干化造地”模式，富阳的“协同焚烧”模式，淳安、临安、建德、桐庐等地的淤泥“回归山林”模式。四是河长、河道警长全覆盖，投诉满意率近100%。杭州市1845条乡镇级以上河道，实现河长、河道警长全覆盖，河长牵头制订河道年度治理计划。开展“河长制”工作问卷调查，回收问卷741份，对河长制工作满意率96.3%。发动党员、共青团、志愿者等参与治水，累计发动2659名河长、685名警长、582名民间河长、5000名巡河志愿者、5800名河道保洁员共同参与治水。五是排涝水。“暴雨看海”一直是杭城内涝一大顽疾，杭州市民的一大心病。2014年6月，杭州市出台《杭州市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将原有20年一遇的规划排涝标准，提升到“中心城区50年一遇，其他区域不低于30年一遇”的标准。通过三年努力，杭州告别了“突下暴雨、交通中断、家中进水”的苦恼，城区也少出现较大范围积水的内涝了。



下城区东新街道四通拱桥见证“五水共治”（来源于杭州图库）

一、城邑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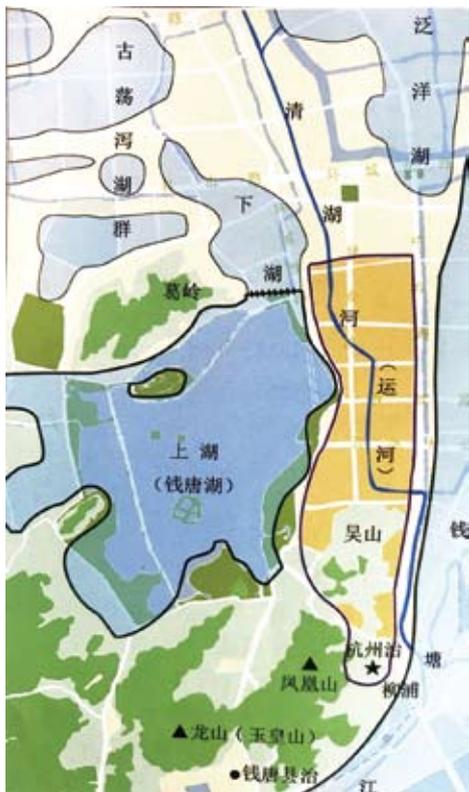
(一) 建制沿革

杭州在周朝以前属“扬州之域”。春秋时，杭州先属越，后属吴。越灭吴后，复属越。战国时，越败于楚，杭州归入楚国版图。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灭楚降越后，于今杭州之地置钱唐县、余杭县，同属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是为“钱唐”之名最早见于正史。

三国时，钱唐属吴国，为吴郡都尉治，属扬州。陈后主祯明元年（587），置钱唐郡，辖钱唐、富阳、新城、於潜4县，属吴州。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废钱唐郡，置杭州，辖钱唐、盐官、余杭、富阳、於潜、武康6县，“杭州”之名始此。隋开皇十一年（591），移州治于柳浦之西的凤凰山东麓，并开始营建杭州城垣。至江南运河开通，杭州由原来的山中小县逐步成为水居江河



隋杭州城和江南运河杭州城区段位置示意图^[1]

[1] 杭州市档案局（馆）：《杭州历史文化图说》，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60页。

之会、陆介两浙之间的要地，走上大都市发展历程。隋大业三年（607），改杭州为余杭郡。唐武德四年（621），改余杭郡为杭州。后为避国号，改钱唐县为钱塘县。

五代时，钱鏐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时称“西府”或“西都”，下辖钱塘、钱江、余杭、富春、盐官、桐庐、於潜、安国、新登、金昌、武康11县。杭州成为吴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王钱弘俶纳土归宋，杭州复降为州。南宋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南渡至杭，升杭州为临安府，为行在所。绍兴八年（1138），宋朝廷正式定都临安，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富阳、於潜、新城、盐官、昌化9县。杭州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

元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占临安府。设两浙都督府，不久改为安抚司。至元十四年，改临安府为杭州。至元十五年，又改为杭州路，置总管府。至元二十一年，自扬州迁江淮行省治于杭州，次年改称“江浙行省”，杭州为省治始此。杭州在政治上的地位虽有下降，但仍不失为东南重镇。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攻占杭州，改杭州路为杭州府，为浙江等处行中书省治所，辖钱塘、仁和、余杭、富阳、临安、於潜、新城、昌化、海宁9县。清代，仍称“杭州府”，政区设置沿袭明朝的。

民国元年（1912），废杭州府，以钱塘、仁和二县旧地设杭县。民国16年（1927），划杭县所属城区等地设杭州市，杭州置市始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杭州市辖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江干、艮山、笕桥、拱墅等8区及杭县。此后，其行政区划经多次调整。2017年，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滨江、萧山、余杭、富阳、临安10区，桐庐、淳安2县，建德1市。



2017年杭州行政区划图

（二）城池演变

在杭城的西北部余杭区良渚，有一座形成于新石器时代的古城，是迄今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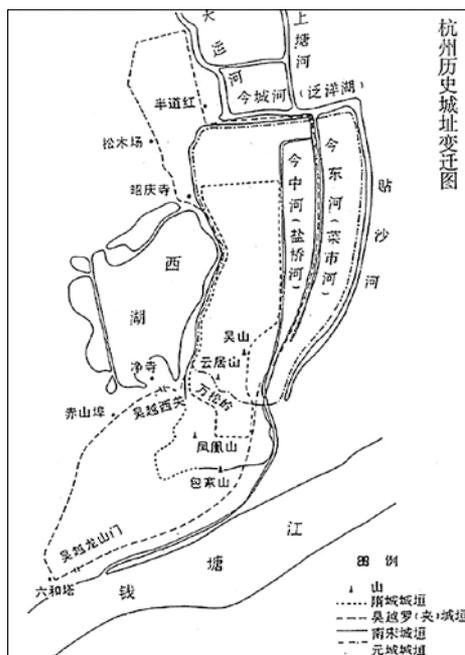
春秋战国，今天的杭州曾分属越国、吴国和楚国之地。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置钱唐县。县治设于“逼近江流”的“灵隐山下”，“灵隐山”为古代武林山别称，泛指西湖群山。

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大臣杨素主持修筑杭州城，州治设于城南凤凰山麓，城北为居民和市场，奠定了杭州

城市的基本格局。（乾道）《临安志》卷二有记载：“杨素筑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有城门十二。”据考证，当时杭州城“西南部起自凤凰山麓的柳浦，依山筑城，向北沿湖滨路稍东，北界不越过钱塘门昭庆寺后的霍山，东部接近盐桥河（今中河），但盐桥河并不包括在城中”^[1]。隋代建杭城的南垣，东划胥山（今吴山）于城外，西则包络金地山（今云居山）、万松岭于城内。其十二城门，见于前人记载的仅有4座：一是钱唐门，至清犹存；一是盐桥门，一是炭桥新门，都在盐桥河以西，至五代吴越时犹存；城之南门是凤凰门，其所在地无考。

唐代长庆年间（821—824），刺史白居易疏浚西湖，修筑钱塘湖堤，杭州城从江干扩展至今武林门一带，有“骈橈二十里，开肆三万室”^[2]之说。

到了五代十国，钱镠前后三次扩建杭州城，在凤凰山下兴建子城，外再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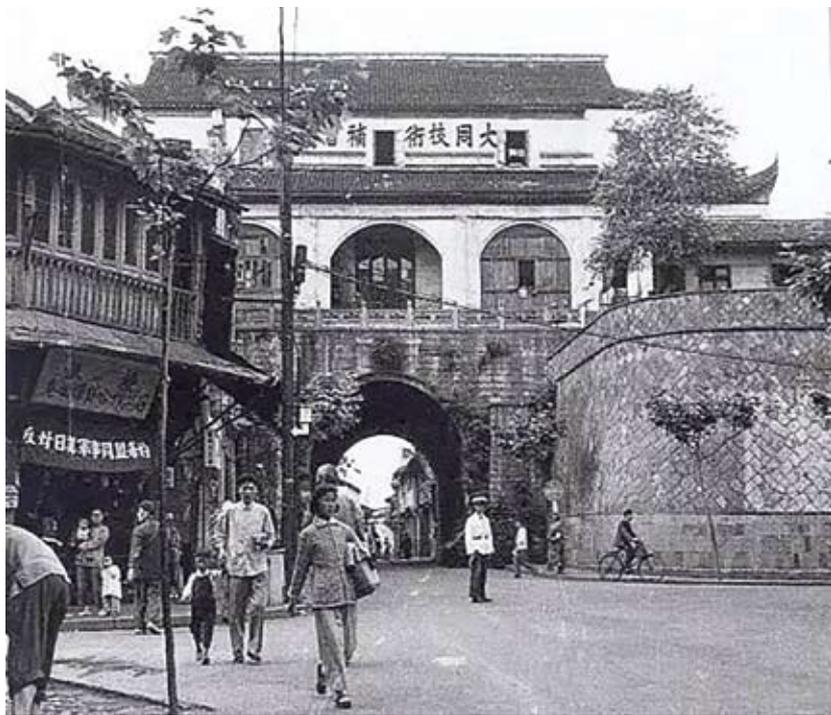


杭州历史城址变迁图（来源于《杭州市志》）

[1] 王士伦：《隋代杭州的建置及城垣范围》，《隋唐名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2]（唐）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

以罗城，后作为吴越国的王城。第一次在唐大顺元年（890），“筑新夹城，环包氏山泊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1]，置龙山门、西关门；第二次在唐景福二年（893），“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泊钱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2]，设朝天门（今鼓楼）、南土门、北土门、保德门（又称“宝德门”）、北关门；第三次在后梁开平四年（910），“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3]，建竹车门。杭州城经三次重大扩建，南至秦望山麓与六和塔一带，北抵现在的武林门外，西濒西湖，东以菜市河（今东河）为界，而所筑外城（即吴越罗城）形成南北修长、东西狭窄的不规则矩形。据北宋钱俨撰《吴越备史》载，唐乾宁二年（895），淮帅杨行密欲率军攻杭州，派僧人偷窥杭城，僧回告行密：“此腰鼓城也，击之终不可得。”于是杨行密罢兵而返。所以杭州城又称为“腰鼓城”。此后，宋、元、明、清各代基本沿袭吴越城建规划安排。



鼓楼旧照

[1]（宋）钱俨：《吴越备史》卷一《武肃王上》。

[2]（宋）钱俨：《吴越备史》卷一《武肃王上》。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七。

到了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增筑内城及东南的外城，杭城范围除城南与城北略有收缩，城东西两侧基本承袭吴越旧制。内城即皇城，当时又称“大内”，宋高宗于凤凰山东麓创筑，周围9里，北起凤山门，西至万松岭，东至候潮门，南至江干。内城有4座城门，南边称“丽正门”，为大内正门；北门称“和宁门”，建筑与丽正门相同；东有东华门，西有西华门。城内殿宇亭阁，星罗



凤山水门旧照（曹晓波 摄）

棋布，有殿三十、堂三十三、斋四、楼七、阁二十、轩一、观一、亭九十等^[1]，规模与汴京（今河南开封）大内相仿。外城又称“罗城”，经扩大，共有旱门13座，水门5座。南面是嘉会门（旧名“利涉门”），为外城各门之冠；北面是余杭门（俗



南宋京城示意图^[2]

呼“北关门”，今武林门），与苏州、湖州、常州、嘉兴以及江淮诸道，水陆相通，为北面交通要道；东面有7门，为便门、候潮门、保安门（俗呼“小堰门”）、新门（也称“新开门”，俗呼“草桥门”）、崇新门（俗呼“荐桥门”）、东青门（俗呼“菜市门”）、艮山门（俗呼“坝子门”）；西面有4门，是钱湖门、清波门（俗呼“暗门”）、丰豫门、钱塘门。此外，还有5座水门，即北水门、南水门、保安水门、天宗水门和余杭水门。

元代禁修城墙以示统一，南宋临安城墙逐渐为居民所平。元至正十九年（1359），张士诚改筑杭州城垣，将原有的临江城东城垣从菜市河（今东河）向东拓展1.5千米

[1]（明）聂心汤：《万历》《钱塘县志·纪都》。

[2] 杭州市档案局（馆）：《杭州历史文化图说》，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49页。



古庆春门旧址（马琦敏 摄）

到贴沙河，南部自候潮门以西则缩入1千米，将杭州城垣南界从凤凰山南向北缩到新建的凤山门、万松岭、云居山一线，北城墙和西城墙则继承了南宋临安城城垣的走向。^[1]而城门也有所增减，北余杭门，增设天宗、北新2门；废东面的保安门、便门及南面的嘉会门，以和宁门为南门。水门有6座：南曰“凤山水门”，今犹存；西曰“涌金水门”，即今之涌金闸处；北有武林水门、坝子桥水门；东有横河水门、车驾桥水门。其轮廓范围，奠定了明清杭州城市的格局。

明代杭州城垣仍依元末之旧，城门有所变动：废天宗、北新、钱湖3门，共设10城门。城南改和宁门为“凤山门”（又名“正阳门”），城北改余杭门为“武林门”。西边



元末张士诚筑杭州城示意图^[2]

[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〇：“东自艮山门至候潮门，视旧城拓开三里，而络市河于内；南自候潮门迤西则缩入二里，而截凤凰山于外城……城周三十五里一百丈。此今城之大略也。”

[2] 杭州市档案局（馆）：《杭州历史文化图说》，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92页。

改丰豫门为“涌金门”，另有清波、钱塘2门，东为艮山门（又呼“坝子门”）、庆春门（又呼“太平门”）、清泰门（又呼“螺蛳门”）、永昌门（俗称“草桥门”）、候潮门。南宋宫城在宋末被焚毁，政治中心移至涌金门与清波门之间的杭州府治。

清代杭州城市格局最大的变化是内筑满洲驻防旗营城垣（俗称“满城”），即城中筑城。清顺治五年（1648）开始圈筑驻防兵营，顺治七年（1650）竣工。《大清一统志·杭州府》记载：“增筑满洲驻防营于城内西北隅，周十里，凡五门。因内驻八旗军及其家眷，故俗称‘旗下营’。”清康熙五年（1666），永昌门毁，



清杭州旗营位置图^[1]

后重建，改名“望江门”。杭城10门，百姓以城门地名编成顺口溜：“北关、坝子、正阳门，螺蛳沿过草桥门，候潮闻得清波响，涌金、钱塘共太平。”水门仍承元、明之旧。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沪杭甬铁路设车站（今城站）于清泰门内，铁路自城外贯城而入，拆去清泰门城墙数十丈。

民国2年（1913）起，杭州开始拆除城墙，修建道路。继拆除杭城西北隅的满城之后，接着拆除清波、涌金、钱塘3门间的城墙，以原城墙砖石建湖滨路、南山路，辟湖滨公园，从此西湖和城区连成一片。随后又拆除凤山、武林、望江、艮山、候潮5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剩的庆春门以及残余的东北城墙和西城墙的北段，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拓建环城东路、环城北路和延伸环城西路时拆除，现仅留下凤山水门1座。2001年，萧山、余杭撤市设区；2014年，富阳撤市设区；2017年，临安撤市设区，杭州市区面积扩大到8000平方千米。全市辖13个区（县、市），总面积16596平方千米。大杭州格局形成。

[1] 杭州市档案局(馆):《杭州历史文化图说》，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18页。

资料链接

杭城十座旧城门坐落的位置与今址对应如下：

钱塘门：今湖滨路与环城西路相接处；

涌金门：今南山路与涌金路交叉处；

清波门：今南山路与清波路、河坊街、孝子坊、勾山里相交一带；

武林门：今武林路与体育场路交叉西北侧；

艮山门：今环城北路与建国北路交叉处；

庆春门：今环城东路与庆春路交叉处；

清泰门：今环城东路与清泰路交叉东侧；

望江门：今望江路与江城路交叉东侧；

候潮门：今候潮路与江城路相交处；

凤山门：今中山南路、凤山路相接处。

资料链接

杭州城内，昔日起重要作用的城门多数已拆毁，取而代之的是古城门遗址石碑，以及坐落于古庆春门旧址上的杭州古城墙陈列馆。杭城百姓曾把十大城门及各门的物产编成朗朗上口的杭曲小调：

清波门外柴担儿

清波门一带古迹多，历史上曾是诗人墨客及书画家寓居之地。又因门通南山，市民需用薪柴多从此门运入，故有“清波门外柴担儿”之民谣。

涌金门外划船儿

涌金门外游船码头的旧址，老杭州人称“第一码头”，从城里出来坐游船，这是唯一的码头。那时候划船的船民以居住地为帮，有茅家埠帮、丁家山帮、岳坟帮等，各有地盘，其中涌金门属于郭家湖头帮。故有“涌金门外划船儿”之民谣。



涌金门(19世纪90年代)(来源于《近代杭州图集》)



古涌金门旧址石碑(倪晴 摄)

钱塘门外香袋儿

钱塘门外的香市，是闻名江南的。光一个观世音，就有三期香会。香会的日子里，城里的人从陆路进出，要走钱塘门。松木场下船的香客进城，也要走钱塘门。于是城门下整日人如川流，热闹非凡。故有“钱塘门外香袋儿”之民谣。

武林门外鱼担儿

曾经的武林门外，一是米店多，二是鱼行多。每到后半夜，来自塘栖、德清水乡的渔船，便早早地到了卖鱼桥卸船过秤。故有“武林门外鱼担儿”之民谣。

艮山门外丝篮儿

艮山门一带，宋元以来个体丝织与机纺作坊遍布，机杼之声，比户相闻，为驰名中外的“杭纺”主要产地。故有“坝子门外丝篮儿”之谣。

庆春门外粪担儿

庆春门在南宋时为皇城后花园，以后就一直以民居和菜地为主，成了旧时杭州主要的蔬菜供应点。菜农们早晨挑菜进城，沿街叫卖，等到中午卖完菜后，到住户家里讨点粪便带回去，用作种菜的肥料用，每当路过这里时，都是一股粪便的臭味。故有“庆春门外粪担儿”之民谣。

螺蛳门外盐担儿

螺蛳门其实就是清泰门。清泰门外沿江一带直至江水入海处，相传就是古代煮海盐的地方。一直到了近代，江水改道，海塘变迁，煮盐场面就没再出现了，但清泰门外沿钱塘江东行数十里，还留下“老盐仓”“盐官”等地名。故有“螺蛳门外盐担儿”之民谣。

草桥门外菜担儿

望江门俗称“草桥门”，以前这一带是郊区，到了明代，望江门外还是江涂田野。杭州郊区的农民就在此垦荒，以种菜为业，然后挑到城里卖。故有“草桥门外菜担儿”之民谣。

候潮门外酒坛儿

候潮门因为城门濒临钱塘江，每日两次可以候潮而得名。曾经从绍兴等地运来的老酒到杭州，都必须经过候潮门旁的水门，然后下船，改用马车运输。候潮门的道路算是最差的那种，崎岖不平，酒坛经不住车马的颠簸，老是溢出来，阵阵酒香扑鼻，于是有了“候潮门外酒坛儿”一说。

凤山门外跑马儿

凤山门在南宋时，是朝廷三省六部诸官署所在地，都是达官贵人所住之地。凤山门外的万松岭一带，是连接江干一带和游览西湖的交通要道，风景非常优美，这些达官贵人们每到天气好的时候，都会骑马前去踏青。故有“凤山门外跑马儿”之民谣。

（三）巷陌典故

杭州从来就诗意满满，且不说那“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山水风光，仅仅是黑瓦白墙中的一条条街巷里弄，也充满了人文情怀。学士路、后市街、十五奎巷、耶稣堂弄、三元坊……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故事。它们记录着杭

州的前世今生，慢慢地刻画着杭州的城市框架，于陌巷深处尽显人生百态。

1. 铭记他们，万世流芳

杭州那些以人名流芳的地名，以人物之名命名以示纪念。如唐代白居易在杭当刺史时，疏浚西湖、兴修水利，晚年官至太子少傅，人们取“白傅路”纪念他；北宋苏轼两度在杭为官，也疏浚西湖、筑苏堤，我们以“东坡路”怀念他；南宋岳飞保家卫国，百姓取“岳王路”之名瞻仰他。另外，南宋柳翠姑娘色艺出众又喜施舍穷人，凿井之地于是成了“柳翠井巷”；五代钱王促国家统一，留下了“钱王路”；明代于谦对国忠义，后人改其故宅为“怜忠祠”而有了“祠堂巷”；清末惠兴女士创办女校，校建成后即名“惠兴”，路也以“惠兴”而名……

有的则因其与名人有关联而为人熟知，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取“元宝”吉利之意而构建宅第的“元宝街”；戴望舒笔下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大塔儿巷”；诞生伟大思想家龚自珍的“马坡巷”、影业巨子夏衍的“严家弄”和一代才女林徽因的“蔡官巷”，等等。

不论是杭州人还是外乡人，只要因国家、因民族、因杭州而与这座城市有着牵引，杭州人就必定记在心中。如此纳川归海的胸怀，才创造出杭州的独特韵味、别样精彩。



白傅路（马琦敏 摄）



东坡路（马琦敏 摄）



元宝街（马琦敏 摄）

蕲王路：与白傅路平行，南起学士路，北至长生路，靠近西湖五公园，为杭城繁华地带。因抗金名将韩世忠曾居住于此，所以取其封号“蕲王”而得“蕲王路”之名。韩世忠曾在抗西夏、抗金作战中屡建战功。他与岳飞等抗金将领一样，多次上书揭露女真南侵的阴谋与反对秦桧的投降主和政策。岳飞死后，他为岳飞申冤。宋金和议签署后，他就开始闭门谢客，口不言兵。绍兴二十一年（1151）病逝，宋孝宗封他为蕲王，谥“忠武”。



大塔儿巷（马琦敏 摄）

潮王路：东起绍兴路，西至莫干山路，因曾有潮王庙而得名。潮王庙原址在上塘河东，朝晖新村北。据明代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卷二十三记载：“石姥庙，在德胜坝，其神石瑰。当唐长庆



蕲王路（马琦敏 摄）

间，江涛为患，神竭家贫，筑堤捍之，竟死于事。屡见灵异，守臣上之，咸通中封潮王，故俗称潮王庙。”清代《湖墅小志》中也有记载：“潮王庙，在芳林乡（今朝晖新村），唐石瑰筑堤捍潮，死于海。”

虽然现在钱塘江水患已远去，潮声也早已远离城区，但有些地名仍在述说着当年的情景，如曾能听闻潮声的潮鸣寺巷等。

资料链接

南宋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在金军的威胁下，节节败退，迁至杭州时，匆忙留宿于庆春门外归德院。当晚夜深时，忽然听闻轰鸣如雷，以为金兵追至，

十分惊骇，于是忙派太监到外面查探，才知是潮水来临时的潮涌声。宋高宗虚惊一场。第二天，归德院住持请求高宗为寺院赐额题词留念。宋高宗想起昨夜之事，便题“潮鸣”两字作为匾额。

孩儿巷：东起中山北路，西至武林路。南宋时为保和坊砖街巷，巷内多泥孩儿铺，故名“泥孩儿巷”，后简称“孩儿巷”至今。这条南宋临安城内普普通通的小巷，青砖铺路，却因为诗人陆游的到来，有了诗情，有了故事。《夜归砖街巷书事》可为其寓居此巷的确证。而《临安春雨初霁》中“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一句却使孩儿巷从此与这位大诗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除了陆游，明朝率军援朝抗日的一代名将宋应昌也曾居住于孩儿巷。现如今，孩儿巷98号内有“陆游纪念馆”与特辟专室陈列宋应昌生平事迹的“下城区文史资料陈列室”。



孩儿巷98号（马琦敏 摄）

2. 见证战事，不忘历史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常体现在街巷地名上，于街巷地名中可窥见曾经的兴亡与盛衰。如建国路、凯旋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而命名；解放路为纪念杭州解放，由中正街改名；光复路原为小河，日军侵杭期间河道淤塞，民国34

年（1945）杭州光复后填河筑路，遂以“光复”名路……

见证政变的六部桥直街，东起江城路，西至中河南路，路以桥名。六部桥横跨中河，位于六部桥直街与六部桥弄之间，因南宋的六部二十四司官署大多设在六部桥西一带，六部要员须通过此桥去中央枢密直至大内，所以称为“六部桥”。六部桥是皇



六部桥（俞美娜 摄）

城北门——和宁门外的第一座桥，交通位置相当重要。桥的南面是皇城，西面是三省六部机构所在地，东面则有都亭驿。此桥于南宋时见证过一次重大政变，史称“六部桥之变”。据明代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余》卷二记载：“开禧三年十一月三日，侂胄方早朝，弥远密遣中军统制夏震伏兵六部桥侧，率健卒拥侂胄至玉津园，槌杀之。”此后，史弥远独家专政，滥用权力更甚于韩侂胄，一时间正直君子贬斥殆尽。此次事变也促使南宋加快走向衰亡。

于抗日战争中涅槃的复兴路，东北至秋涛路与江城路相接，西南起虎跑路接之江路。清时称“江干大街”，民国时由南到北依次为白塔岭、新开路、化仙桥塘上、红庙街、花牌楼、海月桥塘上、洋洋桥外街、美政桥外街、诸桥外街、龙舌嘴大街。抗日战争胜利后以中华复兴之意，统称“复兴街”。1999年10月，命名为“复兴路”。复兴路古时为杭城观潮胜地之一，清末民国初商贾云集，买卖兴旺，是木材、柴炭、山货的集散地，故有“金江干”之美称。民国26年（1937）12月25日，日本侵略军纵火3天，大肆焚烧从南星桥到闸口一带的所有店铺、仓库、市场和民宅。昔日繁华的街面、市井化为灰烬。抗日战争胜利后，杭州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江干大街，更名为“复兴街”。20世纪90年代拓建后，景观全新，近20条巷、弄消失。

3. 街巷连心，宣扬美德



吉祥巷 (马琦敏 摄)

街巷连着百姓的心，街巷地名中往往寄寓着他们的喜与乐，记刻着他们心中的善与恶，烙印着他们崇尚的孝与忠。如惠民路，或传因明代普及惠民药局，或传因陈慎吾惠及乡民得名；五福里，曾为南宋宪圣慈烈吴太后的“吴府”所在地，后谐音成“五福”；青云街，地近贡院，寓意“青云直上”；吉祥巷，因巷处于南宋东城墙与德寿宫墙之间，故名“夹墙巷”，清朝巷旁有慈善机构，改今称。

积善坊巷：东起中山中路中段，西至青年路中段。(咸淳)《临安志》卷十九有记载：“积善坊，银瓮中酒库北，俗呼上百戏巷。”因百戏伎艺之人聚居于此得名。清代，巷内曾住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杭州著名戏剧家洪昇的外祖父黄机。其父去世早，黄机年幼时即以孝道出名。祖母蔡氏高寿104岁，在顺治二年（1645）曾被钦赐旌表建坊，以表蔡氏“教子孙慈惠有方”。黄机在官40余年，洁身自爱，敝衣疏食，两袖清风，人称“太平良相”。

十五奎巷：东起中山南路，北端与鼓楼相接。宋名“竹竿巷”，因经营竹竿为集市而名，属长庆坊。(万历)《钱塘县志》卷十六有记载：“忠节坊长庆坊，俗呼石乌龟巷。”因巷内有一只石雕乌龟得名。(康熙)《钱塘县志》卷四有记载：“长庆坊，嘉靖年间，巷多习骑射者，一举得十人，故



十五奎巷 (马琦敏 摄)

张其名曰十武魁巷。”“十武奎巷”后又谐音成“十五奎巷”。此事使古巷增添了好声誉，培育了好风气。

资料链接

羊千弄：南起莫衙营，北至头营巷，西连建国北路。南宋时为富景园皇家牧羊处，蓄养羊数千只，牧羊者栖息于此。相传牧羊者中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靠向军营官兵卖熟羊肉度日。儿子生性强悍粗蛮，好逸恶劳。一次，儿子喝酒寻衅，被人打断腿骨，扔进水塘，亏得老母赶到，救上岸。某日，儿子见一羊羔双蹄跪地昂首吮吸乳汁，便问母原委，老母泣不成声。邻居一妇人气愤不过，骂道：“连小羊都懂孝道，你对母亲无情无义，连畜生都不如！”挥鞭欲打不孝子，老母忙以身相护，但鞭子已击中儿子，撕心裂肺的疼痛终使逆子幡然悔悟，从此孝敬老母，辛勤劳作，牧羊上千，一时在街坊传为佳话。羊千弄因此得名，市井也称作“至孝弄”。

4. 朝代兴衰，物是人非

杭州自隋起始为州治，吴越、南宋又为都城，元后则为省会，与皇城、朝廷、后宫、官署、军营等相关的历史印迹在今之街巷地名中犹可窥一二。如御街，曾是南宋皇帝于“四孟”（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到景灵宫（今武林路西侧，供奉皇室祖先塑像的场所）朝拜祖宗时的专用道路；后市街，因南宋几代拥有权势的皇后都曾居住于此而扬名，是南宋皇亲国戚的重要活动基地；三衙前，因是南宋南、北、东三通判衙门故址而名；直大方伯，因明代布政使应朝玉在巷内建大宅，因布政使又名“方伯”，故有“大方伯”



后市街（马琦敏 摄）

之名；还有因是宋禁军银枪班驻地所在的银枪班巷，以及见证清朝旗营将军署历史的将军路等。

察院前巷：东起中山南路中段，西至太庙巷，中折北连城隍牌楼巷。南宋在此设有左右丞相府、参知政事府、枢密府，元为江南行御史南台即南察院所在，明改为都察院、巡按院，巷名由此而来。清康熙末年（1722），又改造为万岁龙亭，为节日时文武百官朝贺及拜表迎诏之所。民国改“察院前”为“察院前巷”。



察院前巷路口（马琦敏 摄）

1995年5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太庙巷北、察院前巷南紫阳住宅小区开发地块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保存完整的南宋太庙东围墙、东大门、大殿夯筑台基等重要建筑遗迹。此为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梅花碑：东起成头巷，西至佑圣观路。因有块刻着梅花和石的碑而得名，碑虽几经更易，地名却依然留存。此地曾为南宋德寿宫的一部分。明代设有管理木税的南关工部分司。当时庭院有梅树和芙蓉石等景物，厅上配以“梅石双清”题额；厅南立石碑，碑上刻有明代画家蓝瑛等人画的梅花，故称“梅花碑”。清乾隆下江南时甚喜此碑，移其至北京圆明园内，另摹一石安置于原址。民国时，省政府曾设于梅花碑大院附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先后有几个行政机构在此一带办公，院中的碑被砌入墙内。后房屋几经改建，清仿制的梅花碑下落不明。如今，为纪念古迹，在梅花碑原址旁建造了一座梅石园，并重立一块梅花碑。



梅花碑（马琦敏 摄）

5. 钱塘商业，有名为证

“钱塘自古繁华”。杭州自隋唐以来，“商贾并凑”，“骈衢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工商业渐趋繁荣。南宋绍兴八年（1138）定都杭州，促使杭州商业快速发展。据当时的《都城纪胜》所载，杭城工商业有414行，可见当时杭州工商业之盛、从业户数之众。如今虽已物是人非，但这些带有行业集市色彩或故事的地名却仍留存巷陌深处，朗朗上口，品读其名，犹如穿越时空，置身往昔。消逝的无法再现，幸存的弥足珍贵。如以手工作坊命名的皮市巷、打铜巷、打铁弄、刀茅巷、扇子巷^[1]等；因市场所在命名的马市巷、皮市巷、米市巷、卖鱼桥、竹竿巷等；还有因南宋时地处繁华闹市而有名的羊血弄，因“朱养心”“张小泉”“胡庆余堂”等远近驰名的“老字号”迭出而扬名的大井巷，因弄里人气最旺的湖州会馆^[2]而出名的酱园弄，以及见证行业更替的高银巷，等等。

东园巷：西起建国北路，东至刀茅巷中段。南宋时，巷为富景园一隅，极一时之盛。清厉鹗所著《东城杂记》“富景园”条下有记载：“武林城东曰东园者，宋御园也。至淮张^[3]展城后，迤东十里许，民居甚鲜，多为池塘畦棱，因概以东园名。乡先辈或云宋东苑，似未得其详。”



东园巷（马琦敏 摄）

后来居民增多，聚成坊巷，便有了“东园巷”之称。清时，东园巷内“居民勤织作，繰车纬篋，接响连檐”^[4]，逐渐形成杭城丝绸业集中区，巷内有“最受绸业中人重视的机神庙（今为东园

[1] 据《杭州市地名志》载，“扇子巷”南起河坊街东段，北至清泰街。因巷内多扇店，是南宋以来扇子生产的集中区，故名。今已不存。

[2] 湖州会馆遗址（酱园弄12号）今为南宋钱币博物馆，属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指张士诚。

[4] 《东城杂记》“杭世骏序”。

小学)”^[1]，后成杭州民营丝织业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直至解放前后，丝绸厂仍多集中于此，见证着杭城“丝绸之府”的时兴时衰。

灯芯巷：东起延安路，西折北至狮虎桥路。南宋《咸淳临安志》卷十九记载：“同德坊，祥符寺西，俗呼灯芯巷。”巷以产灯芯得名。上元（亦名“元宵节”）夜，杭州俚俗，各界人士男女持各色彩灯上街临节，名“闹元宵”。苏轼、曾巩在上元节饮酒观灯后，曾各留《祥符九曲观灯》诗一首，两诗当时为人颂咏。清人丁丙所著《武林坊巷志》卷七“灯心巷”条中有记载：“眉山苏公、南丰曾公，上元所题‘纱笼银叶’‘锦帐红云’之句，其规概之宏丽，尚可想见。”

金钗袋巷：南起抚宁巷，北至望江路。宋称“保安巷”，清时称“金钗袋巷”。1966年改称“爱武巷”，1981年复名“金钗袋巷”。南宋时，主管专卖业务的榷货务都茶场、杂买务杂卖场都集中设置在此巷附近，热闹非凡，门庭若市。其中，杂买务集中采购供应宫廷的食品和用品。宫廷多女眷，需锦



金钗袋巷（马琦敏 摄）

缎绸罗、胭脂粉黛和金银首饰之类的商品，而进宫物件包装讲究，有的需用金钗袋盛装，“金钗袋巷”之名便流传开来。

6. 寺庙道观，影响深远

杭州素有“东南佛国”之称，佛、道诸教兴盛不绝，寺观祠庵遍布，给杭城地名以深刻的影响。有的以寺庙命名，如潮鸣寺巷、白马庙巷、太庙巷、香积寺路等。有的以道观命名，如宝极观巷^[2]，因有建于元延祐五年（1318），后供奉全真教祖师张三丰的宝极观而得名；佑圣观巷，因宋淳熙三年（1176）改宅第为道院，以供奉北极真武佑圣君的佑圣观而得名；紫金观巷，因元时道士吴全节等人在巷内建紫琼观，后又改“紫金观”而得名。还

[1] 《杭州丝绸志》第十四篇第二节。

[2] 1958年毁观建厂，后凤起路拓建时拆除，成为凤起路一段。



耶稣堂弄 (马琦敏 摄)

有以祠堂、庵、耶稣堂命名的如祠堂巷、钱王祠路、白云庵、耶稣堂弄等。

王马巷：东起东清巷，西至新华路。宋时，此巷离东面城墙较近，城外是护城河（今东河），因而该巷位置重要。并且枢密院亲兵营驻扎此地，故名“枢密巷”。此后，明代佥事（按察使属官）王琦居此，里人马教授舍宅为凝真院，一王一马均受百姓尊敬和爱戴，巷开始被称为“王马巷”。《武林坊巷志》卷五“平安坊二”下有“王马巷”条，先引《约略说》曰：“枢密巷，今为王马巷，内有仁和粮厅署，今旷。”后又写道：“考《西湖游览志》，王佥事琦居与褚河南同里。《成化志》，凝真庵为里人马教授舍宅。今巷正对凝真观，扬青祠即奉王公琦之处。巷名‘王马’，殆地以人传欤？”巷内有清时杭州最大的寺庙之一白衣寺，1991年因火灾被毁大半，虽已恢复旧貌，辉煌却荡然无存。

佑圣观路：南起河坊街中段，北至解放路中段。清始名“佑圣观巷”。据（万历）《钱塘县志》和民国《杭州府志》所记，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未登基前，其宅邸在此巷，其子宋光宗、孙宋宁宗都出生于此。淳熙三年（1176），改诏为宫。元大德七年（1303）毁于兵火，是年重建，改为观。《武林坊巷



佑圣观路 (马琦敏 摄)

志》卷四“芝松坊二”下“佑圣观”条中引《西湖游览志》曰：“绍定间，赐额曰‘佑圣宫’，命学士院书之，纂书佑字，傍无人字，道流喟然曰：‘宫无人，何

以自立?’事闻，上特许加人字。孝宗尝题杜甫诗于壁，云：‘富贵必从勤劳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白马庙巷（马琦敏 摄）

二、名城新颜

隋开皇九年(589)，废钱唐郡，置杭州。开皇十一年(591)，移州治柳浦西，依山筑城，此为杭州城市建设之始。唐时，杭州水利工程大兴，西湖风景渐成。五代吴越国以杭城为都，三次修城，拓宽城郭，又修水利、筑江堤、开运河、疏西湖、凿池井，铸就杭州城市发展基础。宋室南渡，定都杭州，建皇城，兴园林，修道路，城市建设一时鼎盛。元时，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到杭，誉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元明清三代，杭州城市格局基本保持宋时情形。清鸦片战争以后，杭州拆城垣、拓城郭，扩街为路、改桥填河，拆旗营、建新市场、辟公园，城区道路逐步拓展。但是，民国时期，战事频繁，政局不稳，城市建设起伏较大。随着沪杭甬铁路、浙赣铁路开通，钱塘江大桥修建，内外交通得到改善与发展。公交、自来水、电力、邮政、电信等公用市政设施的建立和兴起，以轻纺为主的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开启杭州城市建设近代

化进程。

（一）城市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市政府在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把有限的城市建设资金重点用于疏浚西湖，整修灵隐、六和塔、西泠印社等名胜古迹上，并逐步实施一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陆续拓宽、延伸、新建道路，新建、改造部分沿街建筑和居民住宅，使城市面貌明显改善。改革开放以后，杭州先后编制完成三轮城市总体规划（见附表），分别为《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81—2000年）》《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年）》《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年）》。2014年开始，又对现行总体规划进行了修编。2016年1月11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年）》（2016年修订）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

杭州就像一位赛跑选手，按城市总体规划定的路线奋勇往前奔跑，一日未曾停歇。接下来，杭州将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以率先发展为第一要务，以改革创新为第一动力，以城市国际化为主抓手，以筹办重大赛事活动为牵引，不断厚植创新活力之城、历史文化名城、生态文明之都和东方品质之城特色，



《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修订版）中的城市布局

率先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好全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排头兵，为加快城市国际化，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而不懈奋斗。

附：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81—2000年）

规划期限：远期2000年，近期1985年。

城市性质：浙江省省会所在地，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

城市布局：按照保护西湖风景，开辟钱江新区，逐步改造旧城，配套生活设施，调整工业结构，发展卫星城镇的原则进行空间布局。



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年）

规划期限：远期2010年，近期2000年。

城市性质：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三角洲重要中心城市，浙江省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

城市布局：从以旧城为核心的团块状布局，转变为以钱塘江为轴心，跨江、沿江多核组团式布局，组团之间保留必要的绿色空间，形成“一个主城、两个副城（下沙、滨江）、六个旅游区（西湖、灵山、之江、西溪、龙坞、江南）”的布局形态。



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年）

规划期限：远期2020年，近期2010年。

城市性质：浙江省省会和经济、文化、科教中心，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

城市布局：从以旧城为核心的团块状布局，转变为以钱塘江为轴线的跨江、沿江，网络化组团式布局。采用点轴结合的拓展方式，组团之间保留必要的绿

色生态开敞空间，形成“一主三副（江南、临平、下沙）、双心双轴（湖滨、武林中心，钱江新城、钱江世纪城中心；钱塘江城市生态轴、主城—江南城城市发展轴）、六大组团（塘栖、余杭、良渚、义蓬、瓜沥、临浦）、六条生态带”的开放式空间结构。



2016年修订版的总体规划中，城市布局依旧坚持“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空间策略，但对主城、副城、组团的范围和内涵进行了优化调整，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主要形成四个层级：城市主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次中心—居住区级中心。“双心双轴”不变，增加大江东、城西科创、城北3个城市副中心。撤销塘栖组团，归入临平副中心，增加瓶窑组团。



（二）钱塘江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杭州正一步一步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自2001年萧山、余杭划入杭州城区开始，15年弹指一挥间，杭州更换了四任市委书记、六任市长，但迈入“钱塘江时代”的脚步一日不曾停歇。昔日的农田与滩涂，如今高楼林立，呈现出一派生机。这不仅体现出杭州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风貌，也尊重了“西湖时代”三面云山一面城





2016年10月2日，数以万计的市民游客涌向钱江新城的市民广场及城市阳台，观赏灯光秀和音乐喷泉（来源于《杭州日记（2016）》）

钱江新城主题灯光秀之《江南水乡》（来源于《杭州年鉴（2016）》）



的历史格局。西湖的婉约秀美与钱塘江的壮阔大气相互辉映，古都杭州焕发新颜，更展现出独特韵味、别样精彩。

钱江新城作为一个从零开始的新城，其身后，是城市中心的东移，是杭州向“钱塘江时代”迈进的庞大城市发展。钱江新城也由此成为杭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新中心，集行政办公、金融、贸易、信息、商业、旅游、居住等诸多功能于一体，成为杭州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商务区（CBD）。

2001年7月1日，杭州大剧院在钱塘江畔开工，钱江新城建设正式启动。2008年9月30日，钱江新城核心区开放典礼暨“城市日”启动仪式在市民中心广场举行，包括城市阳台、市民中心、市民广场、国际会议中心、杭州图书馆、杭州市城市规划展览馆、青少年发展中心在内的钱江新城核心区对外开放。之后，一系列的楼宇在钱江新城上拔地而起。秉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天圆地方、广宇六合”之意而建的市民中心，展现了杭州这座具有浓厚东方文化特色的国际都市的胸襟与气度。金球模样的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与形似弯月的杭州大剧院遥相对望，在波涛汹涌的钱塘江畔勾勒出“日月同辉”的雄浑景象，成为杭州独一无二的城市符号和崭新地标。站在城市阳台远眺，对岸的G20杭州峰会主会场——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与杭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白莲花”为标志的钱江世纪城粗具规模。

而随着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钱江新城“城·水·光·影”的主题灯光秀也成为杭州一张新的文化名片。站在夜幕下，背靠钱塘江，从城市阳台望去，市民中心、国际会议中心、杭州大剧院和脚下的城市阳台一起组成了一幅恢宏巨幕。

日月同辉，莲花绽放。经过15年的发展，钱江新城在政府的高投入、多政策的支持中，以G20杭州峰会为契机，终于走入了全世界的目光中，迎来了属于它的繁荣与收获。

（三）大道通衢

2017年1月10日，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等多家权威机构正式发布了《2016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16年，杭州成为治堵典范之城，拥堵城市排名下降4位，拥堵趋势下降4.94%，成为全国拥堵缓解城市之首。治堵绝非一日之功，这样的良好表现，来自于杭州城市拥堵开出的一张张“药方”——从公交场站的建设、快速路网的拓宽，以及停车场库的建设，每一张“药方”都看出了杭州治堵的决心。

在杭州治堵的众多举措中，地铁搭配“小红车”的出行模式越来越成为杭州的独特亮点。

2007年3月28日，杭州地铁1号线开工建设，于2012年11月24日通车试运营。这是杭州市和浙江省的首条地铁线路。之后，随着2015年11月24日下沙延伸段的建成通车，杭州地铁1号线基本成形，并成为全球第一条覆盖有4G网络的地铁线路。2016年12月23日，根据《杭州地铁建设三期规划》，杭州地铁1号线将延伸至杭州萧山机场。除了地铁1号线，截至2016年底，已通车运营的还有地铁2号线东南段、地铁4号线首段。杭州地铁总运营里程达82千米。即将开通的几段地铁，也将为杭州的出行打开新的方向。



杭州地铁吉祥物——“杭杭”（来源于《杭州年鉴（2015）》）

同时，杭州的公共自行车也跟上步伐，成为杭州地铁站出口的“标配”。这些红色的公共自行车（俗称“小红车”），按公共服务定位进行布局，在国内尚无先例，与国外的公共自行车系统也有所不同。自2008年5月1日运营以来，用共享理念打造自行车慢行系统，在杭州已经走过了9个年头，8万多辆“小红车”在杭州随处可见。公共自行车的“杭州模式”还在全国200多个城市成功复制。

对于杭州来说，公共自行车系统是缓解交通“两难”、打造低碳城市、培养市民健康生活方式的“秘密武器”，它通过与地铁、水上巴士、公交汽电车、出租车等系统的连接，解决了市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实现了零换乘。



地铁4号线首通段开通试运营（来源于杭州图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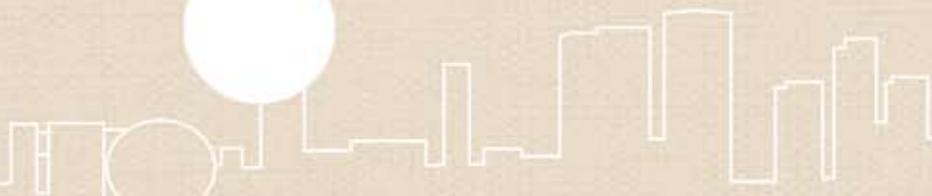
2011年9月9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旅游频道选出了全球8个提供最棒公共自行车服务的城市，杭州凭借“世界最大公共自行车”项目的起源地，与巴黎、华盛顿、孟买、伦敦、墨西哥城、墨尔本和都柏林一起，成为全球8座公共自行车服务最棒的城市。让杭州公共自行车刷屏的，还有2016年G20杭州峰会期间，阿根廷总统骑着“小红车”亲身体会杭州的绿色出行，游览西湖的画面。

公共自行车24小时多功能服务亭（市城投集团 供稿）



第三章

物阜民丰



杭州经济开发历史悠久。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表明，早在8000年前，杭州先民就在这里筑屋定居，种植、打鱼、狩猎，开启了“鱼米之乡”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杭州的手工业开始发展。秦汉时期，杭州地区农业生产技术迅速提高。隋代开凿江南运河，为杭州发展和繁荣奠定良好的基础。唐以后，杭州成为全国的主要粮仓，海外贸易发达。吴越国时，杭州因战争较少，社会安定，经济上奖励农业、手工业生产，成为东南乃至全国的大都会和工商业中心之一。

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中心，不仅是全国第一大都会，而且是当时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元代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会，在经济上仍然是全国的一个大都会。明代，杭州的经济继续发展。清代，杭州开始出现近代工业。

民国时期，杭州有一批近代民族工业悄然兴起，主要是丝绸、棉纺、针织、机器铁工、造纸、印刷、火柴等近代轻工业。杭州的手工业仍然相当发达，商业兴盛，银行业发达，成为全省金融中心。日军侵占杭州期间，杭州市工商各业遭受极度摧残，损失惨重。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外国货大量倾销，杭州的民族工业遭受致命打击；商业结构日益向服务性、居间行业发展；金融业处于瘫痪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形成门类齐备的工业体系。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杭州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出现新的变化，轻工业迅速发展，机械电子、纺织丝绸、化学医药、轻工食品成为杭州市的四大支柱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从“丝绸之府”到“女装之都”，从“中国茶都”到“动漫之都”，这座聚集中国民营企业最多的城市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2000年以后，杭州市加快传统产业升级。“十二五”以来，杭州市深入实施“一号工程”，形成以信息经济为引领，高端服务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都市现代农业为基础的产业新体系。随着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创建，杭州已经初步建成全国高技术产业基地、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和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成为全世界优秀人才和创业者向往的创新创业新天堂。

一、自古繁华

杭州经济开发历史悠久。距今4300—53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杭州地区的经济发展已进入与黄河流域同等的发展阶段，杭州先民创造了辉煌的原始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杭州地区的经济受越国经济的影响最大。这个时期的最大变化是青铜器和铁器取代了原始的、落后的石制器具，生产工具发生划时代的质变，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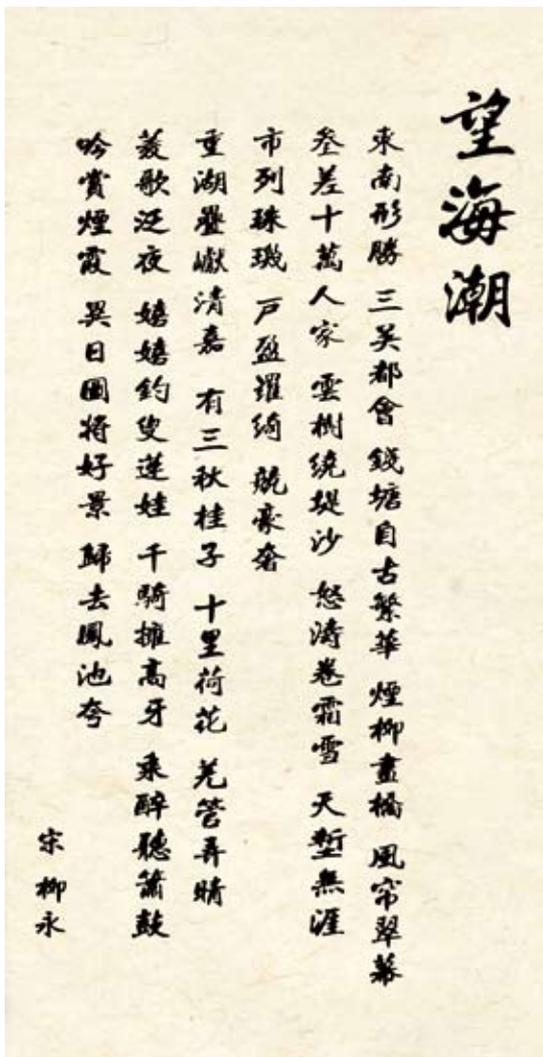
秦时在杭州地区置钱唐县和余杭县。钱唐县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钱塘江南北商贩活动的中枢，扩大了地区间的物资交流，促进了经济发展。由于朝廷重视农业，特别是汉朝文、景二帝提倡“农，天下之大本也”的重农政策，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提高。东汉中期以后，钱唐县已发展成“有户万五千，口逾六万”的规模。

隋大业六年（610）开凿江南运河，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的交流，为杭州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隋书·地理志》称当时以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为“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唐以后，杭嘉湖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速度更快，成为全国的主要粮仓。天宝年间（742—756），杭州地区年产粮食约840万石，除自给外，可剩余几百万石。唐时杭州所产的丝织品品种花式丰富多彩，有绯绫、白编绫、纹绫、柿蒂绫等，是海外贸易的重要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远销中亚诸国。杭州“骈衢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是全国知名的商业城市和重要贸易港口。日本、高丽、大食、波斯等国商人，到杭经商的四时不绝。由于经济的发展，杭州的户口增至10万人，税钱达50万缗（1000文为一缗），占当时全国一年财政收入1200万缗的二十四分之一。唐末五代，杭州地区在吴越国王钱氏的统治下，政治上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战争较少，社会安定；经济上又奖励农工业生产，兼以东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因此，经济得以继续发展，成为五代十国中经济繁荣、文

化昌盛之区。杭州成了东南亦且是全国的大都会。当时杭州在经济上已成为中国的工商业中心之一，支撑这个中心的经济主要是农业、丝织业和商业。

南宋绍兴八年（1138）开始，杭州作为都城，历时140余年，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中心。当时的杭州，不仅是全国第一大都会，而且是世界上繁华的大都市之一。据《都城纪胜》记载，杭州工商业有414行，可见当时杭州工商业之盛、从业户数之众。南宋杭州城内从熟食小店到衣服或家庭杂物用具，都有专门的手工业作坊。杭州开始成为丝绸都会，丝绸市场和内外贸易相当发达。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当时杭州共有28个行市，其中与丝绸直接相关的行市即有丝锦市、生帛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绢市、银朱彩色行6个。经销丝绸以及与丝绸有关的

店铺就更多。杭州的丝绸产品除供应本地需要外，还常常由商人运到外地销售。南宋时，为了满足宫廷饮食、祭祀和陈设等方面用瓷的需要，在杭州建设官窑，专门生产宫廷用瓷，通称“南宋官窑”。它所生产的青瓷，制作精美，釉质肥润，有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另外，南宋时早期的金融业已萌生。官府大量发行关子、会子和钞引，实行钱钞并用，货币种类增多，进行货币买卖的金融业应运而生。其时在杭城内已形成一个特殊行业——质库和钱钞交易铺。



《望海潮》（柳永）

元代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会，经济上仍然是全国的一个大都会，又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它在南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明代时，随着杭州的城市地位下降，经济发展也相形见绌。但是明代杭州经济发展中出现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明中叶以后，商业勃兴，商业活动参与金融业，质库逐渐演变成典当，从事钱钞兑换的钱铺在杭州又重新出现。

进入清代后，杭州的经济得到继续发展，城内、城郊商品市场扩大，从商人员增多。杭州金融业在清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康熙、乾隆年间，典当、钱铺发展到鼎盛时期，典当多时有50多家，钱铺也发展较快。后来典当业渐趋衰落，钱铺则逐步发展成全面存放汇兑业务的钱庄，成为杭州金融业的主要力量。钱庄多时有59家，还有现兑庄和兑换店百余家。杭州巨商胡光墉（雪岩）开设的阜康钱庄，在全国颇具名声。到清末，杭州银行业开始兴起。光绪三十三年（1907），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成立，并在上海、汉口设立分行，享誉全国。宣统元年（1909），浙江官银号改组为浙江银行，是我国最早创立的省银行，并在上海、宁波等地设分行。清末我国最早创办的10家银行中，有4家系浙江人创办，还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商股股权也有很大部分掌握在浙江人手中，故有“江浙财阀”之称。清代中叶以后，杭州的近代工业逐渐兴起。光绪十五年（1889），筹建通益公纱厂，为近代工业的开端。光绪二十二年（1896），根据《马关条约》，杭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设海关于拱宸桥堍。自此，对外进出口贸易更趋活跃。

二、今更胜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后经历“大跃进”、经济调整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等阶段的发展，杭州经济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围绕建设现代化总目标，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谋全局，积极组织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断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改革从计划经济的薄弱环节入手，在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起，杭州市农村进行农产品流通体

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试点开始，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1985年以后，杭州市经济发展经过一轮“上升—调整—再上升—再调整—快速增长”的发展过程，全市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结构日益改善，产业发展逐渐形成符合杭州自身实际的崭新格局。

1986年至1987年，全市经济总量增长较快。两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1.5%和12.8%，工业生产总产值增长20%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4.02%和22.8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6.70%和17.90%，全市财政总收入分别增长10.45%和9.86%。

1988年至1990年，杭州市经济发展速度有较大回落，进入调整时期。这三年全市生产总值分别增长7.4%、下降3.1%和增长5.8%，工业总产值1989年、1990年现价增幅降至11.4%和8.4%。商品零售物价上涨较多，涨幅累计达到52.28%，平均每年上升15.05%。扣除物价因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

璀璨新城（钱江新城管委会 供稿）



呈负增长。全市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降至3.73%。由于政府财力不足，固定资产投资基本维持在1987年的规模。

1991年至1995年，杭州市经济发展再次加速，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鼓舞下，迎来一个经济发展的高增长期。杭州市计划、投资体制改革进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阶段，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这五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8.1%、22.9%、30.1%、26.3%和19.9%；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累计增长2.49倍，平均每年增长28.40%；五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632.80亿元，是“七五”时期（1986—1990）的3.68倍，年均增长44.70%。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市场商品供应日见丰富，城乡居民购买力提高。199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1990年增长2.05倍，平均每年增长24.98%。全市财政总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6.90%。

1996年至1999年，由于前期经济过热，特别是投资规模增长过多、过快，



客观上要求经济有所调整，全国经济实现“软着陆”。这一时期杭州市生产总值增幅基本稳定在10%~13%；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幅平均回落至14%；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适度增长，平均每年增长17.01%；零售物价指数逐渐平稳，涨幅由1995年的13.3%下降为负1.8%，零售市场供大于求格局基本形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1.19%。

进入21世纪，杭州市经济发展进入健康、平稳、快速发展的轨道。2015年，杭州实现生产总值10053.58亿元，成为全国第十个迈入“万亿”级的城市。2016年，杭州实现生产总值11050.4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5%，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2.8个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04.84亿元，增长1.9%；第二产业增加值3977.39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6768.26亿元，增长13.0%；三次产业结构由2015年的2.9:38.9:58.2升级为2.8:36:61.2。经济发展呈现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双轮驱动、互相促进的格局，初步形成与现代化大都市相适应的产业体系。



改革开放后杭州GDP增长曲线图（来源于杭州市方志馆）

一、中国茶都

唐代，陆羽的《茶经》问世。《茶经》与杭州存在密切关系，陆羽在杭州余杭双溪陆羽泉著《茶经》。据（民国）《杭州府志》记载：“唐陆鸿渐，隐居苕霅，著《茶经》其地。”^[1]陆羽于乾元三年（760）到达余杭双溪苕溪之滨，在那里隐居著《茶经》。最早记述杭州产茶的正是陆羽的《茶经》，据记载，“临安、於潜二县生天目山……钱塘生天竺、灵隐二寺；睦州生桐庐县山谷”^[2]。说明在唐代杭州的天竺、灵隐和临安一带有茶树栽培。此外始建于唐朝天宝元年（742）的余杭径山禅寺，也由开寺僧法钦“尝手植茶树数株，采以供佛，逾年蔓延山谷，其味鲜芳，特异它产”，并成为中国茶资源和茶文化向海外流传的主要窗口。

从唐代茶区分布来看，唐时属浙西道的杭州、睦州均产茶。据《茶经》和《新唐书》载：除“天竺、灵隐茶”外，其时杭州余杭郡有钱塘（今杭州）、盐官、余杭、富阳、於潜、临安、新城（今富阳新登）、唐山（今临安昌化）8县，睦州（后改为新定郡）有建德、青溪（今淳安）、寿昌、桐庐、分水、遂安6县均有茶叶生产。在这些茶叶产区，已形成区域规模，所产茶叶列入地方土产名录，也被列为贡品。此时出产的各地名茶有睦州鸠坑、建德细茶、天目山茶（临安）、钱塘天竺茶和大方茶、余杭径山茶等。

杭州余杭径山寺与径山茶，始于唐代，盛名于宋。天宝元年（742），法钦禅师到径山结庵种茶，用以奉供佛祖、接待宾客；南宋时，径山茶被列为贡品，寺院还行“茶宴”接待八方客人。“茶宴”有专门的道具，程序包括烹点、献茶、举盏、闻香、观（汤）色、品

[1]（民国）李榕：《杭州府志》卷二六。

[2]（唐）陆羽：《茶经》卷下《八之出》。

味、叙事、叙景、迎送等程序。由于径山寺是东南名寺，同时“茶宴”出名，吸引了众多日本禅师先后到径山寺留学研修佛学。他们回国时把有关的茶文化和茶科技传播到日本，与其本国的文化结合，加以改进，演化为今天的日本“茶道”。

龙井茶最初属于佛门寺僧炒制的山茶、散茶，炒制工艺最初源自寺僧，后流传民间，在长期的实践和发展中积累形成。宋代，西湖茶区已形成，天竺、灵隐二寺依然是西湖的主要产茶区。因南宋杭州升为临安府，继又定都临安，天竺、灵隐二寺所产茶升为贡茶。据记载：“茶岁贡。见旧志载，钱塘宝云庵产者名‘宝云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产者名‘白云茶’。”^[1] 这些茶被列为“岁贡”，足见南宋时期杭州西湖产茶已堪称茶中佳品。“宝云白云又垂云，无味之味乃至味”，说的就是宋朝西湖茶区产的“贡茶”。

宋元时期，与西湖和龙井茶渊源最深的是著名学者、诗人虞集。虞集的《次邓文原游龙井》在西湖龙井茶的发展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宋代龙井茶有著名高僧辩才马主锡，当时的杭州官员和著名文人都爱到寺院与他品茶论禅。因他的到来，使得曾经清寂的山寺一时香火剧增，龙井寺也因此变得蓬荜生辉、名声大噪。秦观、赵抃等人均与禅师有较好的友情，常来寺拜访品茗，写下《重

[1]（清）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一。

龙坞茶村（之江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供稿）



游龙井》《游龙井记》等诗文。苏轼更是与辩才友情深厚，留下“虎溪送客”等美谈。辩才与这些名士的交游唱和，使得老龙井从养在深山无人识的沉寂，成为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名胜。

明代，随着龙井茶崭露头角，名声远播，也逐渐开始走出寺院，为平常百姓所饮用，成为一种名茶。明嘉靖《浙江通志》、万历《杭州府志》《钱塘县志》均对龙井茶的生产有记载。此时的龙井茶与虎丘茶、天池茶、阳羨茶、六安茶、天目茶被列为中国六大名茶，明黄一正收录的《名茶录》及江南才子徐文长辑录的全国名茶中，均有龙井茶。万历十八年（1590），屠隆《考槃余事》及成化《杭州府志》还记载“龙井”和“天目”皆选为贡茶的史实。且明代开始，茶不再是贵族们专享的奢侈品，杭州茶也逐渐走进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茶”也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项。

发展至清朝，西湖龙井声名鹊起。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四度驾临西湖茶区，观看茶农采茶，乘兴六咏龙井茶。一曰：“龙井新茶龙井泉，一家风味称烹煎。寸芽出自烂石上，时节焙成谷雨前。何必龙团夸御茗，聊因雀舌润心莲。呼之欲出辩才在，笑我依然文字禅。”又曰：“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试一观其道。树男接踵下层椒，倾筐雀舌还鹰爪。地炉文火徐徐添，乾釜柔风旋旋炒。漫炒细焙有次芽，辛苦功夫殊不少。”这两首诗描述了用于龙井茶生产的原料是非常幼嫩的“雀舌”（一芽一叶初展），而且炒制工艺已经相当精细、复杂。乾隆帝除了多次观茶吟咏之外，甚至还亲自在胡公庙前的茶园采茶，这些茶树被后人称为“十八棵御茶”，并成为杭州的一处名胜。由于名人效应，加之龙井茶“吸之淡然，似乎无味。饮过后，觉有一种太和之气，弥沦乎此颊之间。此无味之味，乃至味也。为益于人不浅，故能疗疾。其贵如珍，不可多得”，其名声已在茶界独占鳌头。据郝彭行（1757—1825）考证：“茶之名者，有浙之龙井，江南之芥片，闽之武夷云。”晚清大学问家俞樾认为“今杭州之龙井茶，苏州洞庭山之碧螺春茶，皆名闻天下”。清朝时，茶树栽培逐渐由龙井向翁家山、满觉陇、九溪、云栖、梅家坞等传播，而且明前、雨前等上等龙井茶产量已达“千余斤”。

民国以后，随着交往增加，龙井茶已“名遍全国，远逮欧美”，并且形成了“狮”“龙”“云”“虎”等不同产地的西湖龙井茶风格，其中“产狮子峰者尤佳，



梅坞春早（来源于杭州图库）

色绿而作豆茶香，有雨前、明前之二大别”。由于龙井茶“真者颇难得，其值以两计，贵至银币数角，贱至铜币数枚”，生产龙井茶有利可图，官僚资本逐渐进入并开始控制龙井茶的产销，也促使龙井茶栽培面积大幅度扩大。据西湖区农技站资料，民国19年（1930），茶园面积已达95.3公顷，产量为33吨；民国25年（1936），茶园面积在153.3公顷，产量为44吨；至1949年，茶园面积已达到234.3公顷，产量约84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杭州茶产业更是得到了国家和政府以及热心人士的关心和支持，西湖龙井茶获得快速发展。2005年4月，杭州被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等机构联合授予“中国茶都”称号。后杭州举办多次国际性茶文化活动，不断提升“中国茶都”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天赐杭州一方风水宝地，地育西湖一片龙井香茶。”

2006年4月20日，举行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题字“茶为国饮，杭为茶都”的石碑揭牌仪式。在揭牌仪式上，杭州8家“国字号”茶叶机构践行2005年《杭州宣言》中所提及的设立“全民饮茶日”建议，中国工程院院

士陈宗懋宣读《关于设立“全民饮茶日”倡议书》。此举是茶都杭州积极宣传和推广“茶为国饮”的举措，也向世人彰显杭州作为“中国茶都”更有责任和义务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茶知识、推广茶文化、扩大茶影响，在全民族中营造“知茶、爱茶、饮茶”的氛围，助推中国茶产业发展，将中国传统茶文化传承并发扬光大。

至2015年，列入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的茶园面积为1116公顷，其中一级保护区370.3公顷、二级保护区745.7公顷，有茶农9253户，茶叶企业67家。西湖风景名胜茶产量124.1吨，产值1亿余元。启动国家美丽茶园综合标准化示范区（西湖）项目，实施省茶产业升级转化工程“现代茶园绿色防控技术应用与示范”项目，同时成立西湖风景名胜区茶叶商会，会员单位60个，其中茶叶企业44家、茶叶专业合作社6个、茶村经济合作社10个。

资料链接

日本《类聚名物考》记载：“茶道之起，正元中筑（1259）由崇福寺开山祖师南浦绍明从宋传入。”《东福寺志》载：“圣一国师圆尔辨圆带回《禅苑清规》一卷，依此为蓝本，制定了《东福寺清规》，布置讲究的僧堂举行‘茶宴’，室内张贴径山寺无准师范、虚堂智愚的书法墨迹，摆设中国花瓶和天目茶碗。”王家斌经考证后认为，杭州余杭径山“茶宴”是日本“茶道”之源，径山寺是日本“茶道”的故乡，说明宋代时径山寺的茶文化已向日本等国传播。

资料链接

杭州有8个“国字号”茶叶机构：茶叶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茶文化社团组织——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叶学会，茶叶研究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茶叶检测中心——国家茶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农业部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全国茶学教育重点学科——浙江大学茶学系。

二、丝绸之府

杭州丝绸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良渚文化考古出土了中国最早、最为完整的织机构件和众多的纺专（原始纺织工具，即纺轮），表明杭州的先民已经能进行纺织物的织造生产。至春秋战国时期，杭州地区的蚕桑丝织业较之前有了发展。两汉时期，会稽地区为东南繁盛的都会，丝织业继续向前推进，并为三国时期吴国的定鼎江南积聚物质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纷扰，北方大量人口流徙南方，为南方的开发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织机及使用方法（来源于《美丽洲：良渚文化与良渚学引论》）

隋唐时期，随着京杭运河的开通，丝绸生产日趋繁盛。唐代杭州的菜市桥、忠清巷等地，已成为丝织品作坊相当集中的街巷。杭州生产的部分丝织品被选定为向皇家缴纳的贡品。《唐六典》记载：唐玄宗开元时，越州入贡吴绫、白编、交梭3种高级丝织品。白居易在《杭州春望》诗中写道：“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这里说的“柿蒂”就是指丝织物上的图案，是当时杭州丝绸中一个很有特色的品种。唐晚期，扬州人褚载来到杭州宝善桥一带传授纺织云锦的技术，加快了杭州丝织业发展。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王钱鏐据有杭州，保聚一方，“闭关而修蚕织”，发展蚕桑丝绸业，为杭州成为“丝绸之府”开辟道路。

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丝织品的生产主要转移到长江流域，杭州作为首都，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且技术趋于成熟，出现版本众多的《蚕织图》。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时，杭州生产的丝织品主要有绫、罗、锦、缎、缙丝、杜缙、鹿胎、纴丝、纱、绢、绵、绌等10多个大类品种，说明杭州的丝绸制造业十分发达。

元明时期，杭州的丝织业沿袭宋代以来的趋势，继续发展。至元末，杭州城内有众多的织工，且他们往往受雇于人。元末明初的徐一夔就有《织工对》

一篇短文，对元末杭州城内的织工生活状态有生动的描述：“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明代，朝廷施行系列举措，鼓励农工商业的发展。丝绸生产更向杭嘉湖地区集中，杭州的丝绸生产随之进入繁盛期。

清代，一改明代在全国各地设置织染局的格局，仅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地设置织造局，通称“江南三织造”。康熙皇帝在《桑赋序》中写道：“朕巡浙西，桑树被野，天下丝绸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唯此一区。”杭州地区的官营织造生产规模庞大，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杭州形成一批优秀的传统丝绸名品，民间的丝绸生产也趋细化。光绪二十三年（1897），林启在西子湖畔创办蚕学馆，揭开了我国近代纺织丝绸教育的帷幕。

至民国，近代丝绸业在杭州得到全面发展。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大力兴办丝绸学堂，培养技术人才，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发展民族资本的丝绸业，各种新式绸厂“纷纷设立，有如雨后春笋”，著名的有振新、纬成、天章、虎林、鸿章等。丝绸业的发达，也催生各类同业公会。民国前期是杭州丝行最为兴盛的时期，民国10年至民国15年（1921—1926）有120余家。最盛时，“自宝善桥至艮山门丝行林立，计50余家，每届新丝上市时，各丝行门前高搭帐篷，摊贩林立，形似举行盛大之赛会。由各银行钱庄运往下城之现银，每日达数十万元”。民国15年（1926）秋，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上，都锦生的丝织唐伯虎名画《宫妃夜游图》荣获金质奖章。一时杭州丝织品享誉中外，被誉为“东方艺术之花”，远销南洋和欧美等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丝绸产业大幅度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杭州丝绸产业已发展成为一个集栽桑养蚕、缫丝、绢纺、丝织、印染、服装及制成品生产销售、丝绸机械制造以及辅助性服务等多个环节为一体的纵向



杭州丝绸（来源于杭州图库）

一体化非常明显的产业集群。2001年，杭州市提出打造“女装之都”的战略决策。2005年11月4日，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弘扬“丝绸之府”，打造“女装之都”的若干意见》，为杭州丝绸女装产业的发展竖起一座新的里程碑。2007年，中国商业联合会授予杭州“中国女装中心”称号，中国丝绸协会评定杭州市为“中国丝绸日”举办地。同时，杭州丝绸产业经发展和积累，还形成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产业基地和特色街区，如余杭区“中国丝绸织造基地”、淳安“全国品牌茧示范基地”、萧山区女装产业区、桐庐丝针织女装产业基地及杭州中国丝绸城、杭州武林路时尚女装街、杭州四季青服装特色街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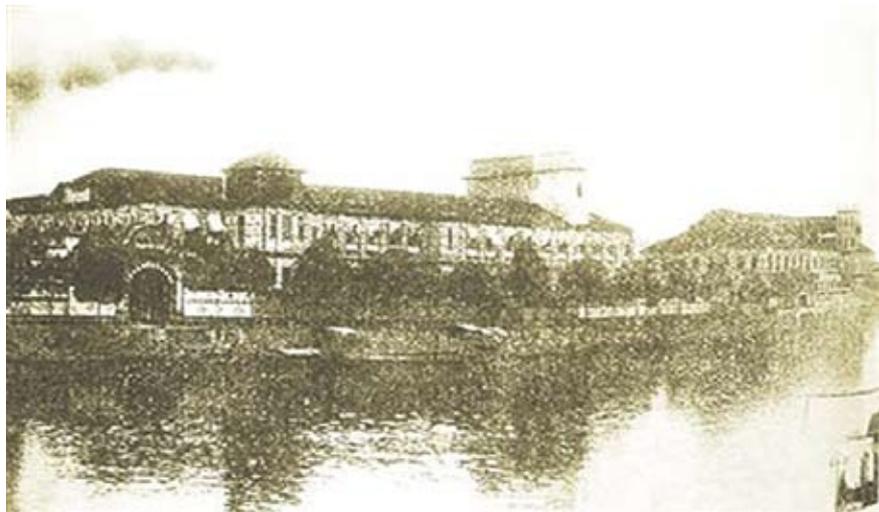


2015年10月22日至25日，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女装展览会在杭州举行
(市经信委 供稿)

一、实业救国

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时期，国内掀起了实业救国的潮流。早期在杭州试办洋务实业的是军事工业。清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曾觅能匠仿造过小轮船，并在西湖试航；光绪九年（1883），刘秉璋着手在杭州城东薄场巷保国寺旧址举办浙江机器局，于光绪十一年（1885）9月建成，是为杭州近代工厂之始。受洋务运动影响，杭州开始出现了私人资本经营的近代新式企业，即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

中华民国建立后，杭州和全国一样，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民国元年（1912）6月，省城工商界率先组织成立新的杭州总商会。接着，劝业会、农事试验场、织业试验场、商品陈列所等实业团体和场所纷纷设立。实业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各种工业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职业学校及习艺所纷纷举办。孙中山于民国元年（1912）11月、12月和民国5年（1916）8月三次来浙江考察，就浙江兴办实业、修筑



运河边的通益公纱厂（杭一棉前身）（1910年至1919年）



江墅铁路遗址公园（黎似玖 摄）

道路、建设港口、整顿市政、发展金融、繁荣商业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对杭州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卷入战争，经济实力受到削弱。帝国主义向杭州的商品输出逐步减少。民国2年（1913），杭州口岸的洋货进口达55.8万海关两，至民国7年（1918）减少到19.5万两。这为民族工业产品腾出了一定的市场。杭州的民族工业利用市场空隙，获得发展机会。不仅以丝织、棉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而且五金机械、电力、交通运输、银行等各部门各行业都得到较迅速的发展。

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和反帝运动也是支持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民国4年（1915），袁世凯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并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浙江的杭州和宁波率先起来响应，两地学生积极进行抵制日货的宣传。民国8年（1919），“五四”爱国运动爆发，5月9日，杭州之江大学首先组织劝用国货会。接着，杭州各中学也都建立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组织。抵制日货的行动，虽然是一种消极的斗争方式，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货和其他洋货在中国市场上的发展势头，

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在一段时间内，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杭州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是困难重重、坎坷不平，但仍在继续缓慢发展，直到民国16年（1927）以后才开始逐步衰落。

1907年至1926年杭州部分企业名录

名称	成立年份	企业性质	资本额（万元）	备注
浙江兴业银行	1907	商业	—	1915年，总行由杭州移至上海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	1915	—	—	1923，改组，官商分开
虎林丝织厂	1914	合资	—	提花机10多台
纬成公司缫丝工场	1916	合资	—	购日本缫丝机100台，聘日本技师
虎林公司丝厂	1917	合资	—	缫丝车288台
天章丝织厂	1915	合资	—	1915年使用电力织机，1920年有1700多名工人
蒋广昌丝织厂	1915	独资	—	大绸庄建厂自产，1918年扩大到4个工场
悦昌文记丝织厂	1917	—	3	大绸庄建厂自产，有电织机、手织机150台
都锦生丝织厂	1922	独资	1	织造风景织锦、椅垫、桌单等
怡章鸿丝织厂	1922	独资	0.5	电力机、络丝机36台
普益丝织厂	1926	合资	6	1929年迁徙上海
鼎新纺织公司	1914	合资	—	由杭州通益公纱厂易主改组而成
广生棉织三厂	1923	合资	1	有铁机、木机、电力马达
惠民布厂	1926	合资	0.6	有铁机、木机、电力马达

续表

名称	成立年份	企业性质	资本额（万元）	备注
六一织造厂	1924	合资	2	1927年由上海迁来杭州
协隆火柴梗片厂	1924	合资	4	置蒸汽引擎1台
武林造纸厂	1921	独资	40	
民生制造厂（玻璃）	1926	合资	7	工人90名，年产值9万元
民生药厂	1926	合资	0.6	
宝华汽车行	1922	合资	—	后与永华汽车行合并成永华汽车公司
武林铁工厂	1914	合资	2	1916年聘日本技师，仿制提花机
新明电气公司	1919	商办	3	
钱江商轮公司	1912	—	—	杭州到桐庐等
王清记轮船局	1915	—	—	杭州至苏州，初有轮船4艘

二、百废待兴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在华势力得到空前的发展。美国货物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对中国民族工业构成极大威胁。如美国的奶粉充斥市场，杭州本地牛乳业竟杀掉四分之一的奶牛，其余的亦大部分转到农村去耕地。抗日战争前日产鲜乳3000磅的西湖炼乳公司等牛乳厂被迫改制锭子油，最终仍是倒闭。

同时，国民党各级地方政府加强对各行业的盘剥，增加税额，对各类工商业的打击最大。如在民国36年（1947）的所得税征收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不问有无盈利，也不论经营多少时候，税局只根据上峰下来的预算”，最初额定68亿元，接着又加34亿元，共计102亿元，而实际征收了120亿元。仅在杭州一地征收的税额就达41亿元，而当时杭州各商店正式向市政府财政科登记的资本总额也仅有百亿元，以百亿元的资本负担41亿元的所得税，可见税负之重。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主要采取了通货膨胀的政策，从而导致了物价飞速

上涨，各种工业原料价格昂贵、成本过高，超过了一般工商业的承受能力。民国37年（1948）金圆券出台后，物价更加飞涨，各行业的处境就更加困难。

杭州的丝织业开工的厂家不过十分之一二，产量不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十分之一；茶厂开工的，不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四分之一；具有较大规模的武林烟厂，因资金亏耗殆尽而宣告闭歇；张小泉剪刀厂到民国37年（1948）底亏损剪刀5万多把，不得不宣告停业；都锦生丝织厂也只能东拼西借，每日忙于“调头寸”。民国36年（1947）的《中国经济年鉴》详细记载了当时杭州各业凋敝的情形：“由勉强维持以致不能维持，由不能维持以致倒闭溃灭的商号行庄，着实有一个很可观的数字。这个倒闭之风波及于每一行业，其中尤以茶行业为最。”

物价的上涨和币值的下跌也直接影响了浙江银行和钱庄的资金运营能力。当时除了中央银行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的资金力量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杭州的中国银行到民国37年（1948）底时，全省的业务收入总共只有金圆券1100万元，按当时职工的生活指数计算，只值抗战前的10万法币，其业务的开展自然是非常困难。

1949年5月，杭州解放。经历了三年的恢复与发展，从1953年开始，杭州市进入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到1956年，全市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杭州建立。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57年胜利完成，杭州的经济社会呈现出经济稳步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生活初步改善的蓬勃朝气。通过此后十多年的努力探索和艰苦创业，增强了农业发展的基础，形成了工业化的基本格局，积



1958年，杭州半山刚建成钢铁基地的场景（杭钢厂史陈列馆 供稿）

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杭州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初步的拨乱反正，国民经济及各种社会事业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揭开了历史新篇章。

三、工业兴市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杭州市全面整顿工业企业。至1985年底，全市工业有37个大类、128个行业、211个门类。主要有轻工、丝绸、棉纺织、机械、化工、食品、电子、仪器仪表、电力、冶金、建材、造纸、家用电器、工艺美术、服装等。其中机械电子、纺织丝绸、化工医药、轻工食品为杭州工业的四大支柱。全市工业总产值（含村及村以下企业）146.35亿元。全市乡及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4.26亿元。

1986年，市委、市政府为振兴杭州市丝绸、纺织工业，制定免征企业调节税、提高企业留利率、全行业实行岗位工资制等优惠政策。1987年，杭州市全面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深化企业改革。至1988年底，工业企业全面实行党政分开工作基本完成。

1989年，工业生产遇到资金、能源、原材料严重短缺等困难，企业开工不足，市场疲软，产品库存急剧上升。1990年3月，工业生产止跌回升，但经济效益仍未好转，亏损企业面和亏损额继续增加。1991年，全市工业系统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扩大“放开经营”改革试点，实行劳动人事、工资分配、劳动保险（简称“三项制度”）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投入

产出总承包试点等，工业生产全面回升。至1992年底，全市预算内工业企业亏损户从1991年的70家减少到30家，亏损额从1.36亿元减少到3077万元，完成扭亏增盈责任指标。全市工业总产值达607.45亿元。

1994年，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试点起步，杭州汽轮动力（集团）公司被列为国家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之一。1995年，全市28家企业列入国家和省、市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全市私营企业发展到9439家，其中17家跻身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行列。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281.37亿元，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企业经济效益继续下滑，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润总额23.14亿元，其中亏损金额11.55亿元。

1996年，杭州市被国务院列为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杭州市确定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等20家企业为试点企业。1997年，杭州市加快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体系建设；组建一批产品有一定关联度的企业集团；开展以实施名牌战略、振兴经济为目标，引导企业走“名牌—质量—效益型”道路的活动。至年底，杭州市有53种浙江名牌产品，42种杭州名牌产品。私营企业1.73万家，雇工20.87万人。

1998年，杭州市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国内市场需求的约束，企业生产经营更为困难。随着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一批新的产业在市场需求带动和政府扶持下加速成长，形成4个年销售额超100亿元的支柱产业，即食品行业、家电行业、电子行业、纺织行业。

1999年，杭州市制定企业改组、改制减免收费办法。杭州市在87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中，确定22家作为扭亏责任重点企业，通过股权转让、企业转制、破产拍卖等实现扭亏。至年底，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减少到16家，亏损面降为18%，亏损额1.6亿元。

2000年，杭州市推动企业改制步伐。市委、市政府确定杭州金松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等13家国有大企业、



大集团为全市改制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至年末，13家重点改制企业全面完成改制目标任务。杭州市形成与城市定位相适应、在国内外市场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机械、电子、食品、纺织4个支柱产业。2001年6月6日，市委、市政府组建杭州市工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至年底，市属国企改革基本完成，国企改革219家，改制面达到97.8%。

2002年2月，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正式确立“工业兴市”战略为全市必须着力推进的“五大战略”之一。大会确立“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新一轮发展目标时，提出“既要青山绿水，又要金山银山”，在实施“环境立市”战略的同时，大力推进“工业兴市”战略。找准比较优势，打造产业优势，大力发展与城市



加工超大型汽轮机转子（来源于杭州图库）

性质相吻合的生态工业和绿色工业，在建设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同时，建设绿色生态工业城市，使工业兴市与环境立市实现良性互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与构筑现代化大都市相得益彰。这对于杭州工业的发展具有跨时代的重大意义。同年7月18日，杭州召开了第一次工业兴市大会，集中出台了6项支持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拉开了实施“工业兴市”战略的帷幕。

工业兴市战略提出以后，市委、市政府又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总体要求，以及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战略部署，制定了《杭州市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纲要》《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以“两港三区”为重点的“一号工程”的若干意见》《关于杭州市适度发展新型重化工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推进我市高新技术产业由“点”到“面”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为杭州市工业的今后发展指明方向。

一、舟楫辐辏

杭州地处长江以南，位于钱塘江入海口，土地肥沃，气候湿润，自古以来江海之上水运发达，商业兴旺，经济繁荣。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表明，杭州地区早在8000年前就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水上航运工具。

水上交通，端赖舟楫。春秋战国吴越争霸时，水上军事力量发挥重要作用，“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1]。杭州的海外交通与贸易，则可追溯到三国时代。杭州地区当时属扬州的吴郡及会稽郡。吴帝孙权黄龙二年（230）曾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带领甲士万人，飘海到夷洲（今台湾）、亶洲（今日本一岛屿），带回了夷洲人数千人。嘉禾二年（233）将军贺达等又带兵万人载金宝珍货等远航到辽东半岛，以及高句丽、南海诸国。《南史·海南诸国·中天竺国》有东吴派会稽商人刘成送大秦（罗马帝国，今地中海中部）商人秦论回国的记载。当时的杭州地区作为海外交通贸易的港



运河帆影（20世纪30年代）（来源于《美术生活》）

[1]（东汉）袁康：《越绝书》卷八。

口，与邻国交流还是以民间往来为主。

隋朝开凿江南运河后，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杭州成为当时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当时杭州的州治已迁到凤凰山下的柳浦，它是钱塘江北岸今杭州江干一带的重要渡口。在钱塘江南岸，宁绍平原的商货由浙东运河驳运至对岸柳浦渡口，直接运至江都（今扬州）及京都（今洛阳）。

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派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翌年八月，又令越州等造海船及双舫千余艘。这些海船的建造，对杭州的海外交通运输是个有力的支持。唐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曾赞说：“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此时大唐国威远振，海外交通，盛极一时。唐诗人杜甫在《解闷十二首》曾咏江南繁盛说：“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西陵即今之滨江区西兴。当时杭州因江南运河的开凿，而权居江、河、海三水的枢纽，凡往来南北的商旅，由杭州转乘海船，即可飘海至海外各国；海外船舶，则可从杭州湾驶入钱塘江的杭州海口，驳运至江南运河，北去江都和京都，南北交通，均甚便捷，正所谓“水居江河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南北交通，畅通无阻”。

吴越国时期，钱镠整治钱塘江，凿平礁石险滩，使钱塘江航道有所改善，从而促进吴越国和沿海各地的来往，甚至连日本、朝鲜等国也与吴越国建立了贸易关系，不仅促进了杭州城市的繁荣，并且使这个城市走向国际化。

从北宋到元朝，杭州一直是东南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不仅设有专门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而且还是外来舶货、朝贡品的集中转运港。尤其是南宋时期，杭州人口倍增，货物云集，商业空前繁荣。每日所需万余石的食米来自苏、湖、常、秀（今嘉兴）四州及淮南、江西、湖南、两广等地，由运河或海路输入。钱塘江畔与运河两岸船只云集，客旅往来不绝。

二、西博盛会

民国18年（1929），第一届西湖博览会（以下简称“首届西博会”）在杭州举办。首届西博会是中国会展史上一次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展销会。同时，它也是浙江经济走向世界的尝试。连年的军阀混战，致使国内的工商业处于奄

奄一息的状态。当时，浙江的财政可谓“捉襟见肘”。当时的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出身于浙江省湖州市的丝绸大户，他上任后，立即宣布举办西博会。杭州因西湖风光秀美闻名天下，以西湖为会址举办博览会则显得创意独到。

首届西博会由当时浙江省政府建设厅牵头筹备，会址左起断桥，经孤山至西泠桥，右以宝石山、葛岭为屏障，并延伸至岳王庙、金沙港，面积约5平方千米，环行一周约4千米。绿水青山、园林古迹诸多，是西湖的精华之处。为丰富展品，组织者在安徽、湖北、上海及浙江省内共75个市、县设立筹备分会，在苏州、无锡、常州以及越南南圻、印度尼西亚万隆等地设立了展品征集处，筹备工作历时9个月，共征得展品147604件。



西湖博览会大门内面（摄于1929年）（来源于《近代杭州图集》）

民国18年（1929）6月6日，首届西博会正式开幕。政府官员、工商巨头、文化名人、社会贤达，还有普通民众共10万余人齐聚一起，参加这一盛会。首届西博会设有8馆2所3个陈列处，即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特种陈列所、参考陈列所，铁路陈列处、交通部电信陈列处、航空陈列处。博览会的多数展馆设在孤山，展馆大多借用会址一带的公共场所、祠堂、庙宇、私人庄舍，另有添建的部分新建筑。其中，借助里西湖上专门搭建的博览会桥，参观者可便捷地跨越里西湖，到对岸的北山路及其延伸段参观其他馆所——丝绸馆内，参展的绫罗绸缎、丝织品精美、

华丽，“丝绸之府”的美誉名不虚传；工业馆的机械工程材料、模型、五金、纺织、玻璃等物品，引起了参观者的极大兴趣；参考陈列所则将外国机器、原料与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做了比较。

为了增加学术气氛，首届西博会期间还邀请政界要人、专家名人做了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外交等64场专题演讲。

为营造盛会的热烈气氛，首届西博会在秀丽的西子湖畔建起了各种造型别致的建筑，有大门、各馆门楼、音乐亭、纪念碑等。各方人士纷至沓来，竞相参观游览，并饶有兴致地参与各项游艺活动，听音乐、看京剧、跳舞、下棋、打乒乓球、登高、骑自行车等。多子塔院室内影院、孤山放映场放映的电影，吸引了人们新奇的目光；当夜幕低垂时，满湖灯船欢歌四起，烟花腾空，绚烂似火树银花，瞬息万变，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使首届西博会的展期不得不延长，直至10月20日才落下帷幕。展会期间，参观者多达2000余万人次，参观、洽谈商务的海内外代表团1000多个；参展的中外展品有14万余件，陈列品奖项共2917个，其中特等奖237个、优秀奖806个、一等奖1066个、二等奖808个。在237个特等奖中，浙江展品占91个。

首届西博会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文化振兴的盛会，与同期举办的美国芝加哥博览会、费城博览会、法国巴黎博览会并称为“四大博览会”。首届西博会的举办，意味着中国民族工业清醒地审视和自觉地激励自己，提高了中国商品，特别是浙、杭产品以及杭州西湖的知名度，给相对萧条的工商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城市面貌也因此得到很大改观。

2000年开始，杭州市恢复举办西湖博览会，每年举办一次。西博会利用杭州的自然、历史和人文资源，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它既是1929年首届西博会的历史延伸，又是时代呼唤的现实产物。新西博会的成功举办，有效促进了杭州市会展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大力推动了商贸、餐饮、交通、通信、娱乐、宾馆、广告、印刷、物流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新西博会展项目众多，活动各具特色，思想论坛专家云集，结合会展业、商务游、观光游、休闲游，演绎了西湖文化。西湖狂欢节、西湖情玫瑰婚典、西湖歌舞文艺演出、浙江省暨杭州市国际马拉松赛、西湖花会、西湖艺术博览会、西湖电子音像博览

会、西湖国际雕塑邀请展等项目，散发着杭州地域文化的色彩，成为演绎西湖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

三、最佳商城

钱塘自古繁华。自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杭州就有“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之盛况。到唐代，杭州“骈衢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成为中国东南部的一大商埠。五代时，吴越国定都杭州，钱塘江边“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北宋时，杭州成为中国四大商港之一。南宋定都杭州后，御街两侧商铺林立，酒肆茶楼、艺场教坊、驿站旅舍比比皆是。至元代，杭州仍为东南重镇，工商业持续繁荣，海外贸易又有发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元末，杭城连遭大火和战乱，商业萧条。明中后期，杭州商业逐渐复苏。清康熙年间（1662—1722）开放海禁，杭州从商人数增多，史称“杭民半多商贾”。

进入20世纪，随着沪杭甬铁路和浙赣铁路先后建成通车，杭州成为浙西、皖南、赣东、闽北等地大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和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工业品交易市场。民国18年（1929），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对提高杭州商品的知名度、拓展杭州商品市场起到积极作用。民国26年（1937），日本侵略军侵占杭州，许多商家关闭歇业，杭州商业陷入萧条。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商业体系逐步形成。1953年起，杭州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1月，市区有131个行业、2533家私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1957年，市区零售商业网点共有12731个，从业人员26479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1961万元，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之后20余年，杭州商业经济在曲折中艰难发展。

20世纪80年代，杭州市商业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大中型商业企业普遍实行承包责任制、经理负责制，多数小型企业实行“改、转、租”。全市逐步形成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共同发展的商业结构。全市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从1979年的10018个增加到1985年的59258个，其中个体经营网点由680个增加到45188个。1988年，杭州市清理整顿包括党政机关办企业在内的公司、中心，保留批发企业1903家，撤销1016家。是年3月，国务院批准杭州市区、萧山、余

杭、富阳、临安、桐庐为中国沿海经济开放区，对外经济贸易快速发展。同年，杭州市进出口总额8400万美元，协议总投资6781万美元，协议利用外资2734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696万美元。

20世纪90年代，杭州市商贸业进一步发展，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外来商家纷纷抢滩杭州。杭州先后建起杭州大厦、杭州百货大楼、银泰百货等一批商贸购物中心，超市连锁业成为零售商业新的经济增长点。1992年，杭州市全面放开市场经营，从而掀起又一股经商高潮，民营商业得到大发展。1993年2月，杭州市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单轨制”。1994年，杭州市粮食流通体制重回“双轨制”。1998年，杭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基本形成国有集体、个体和私营股份制等其他经济“三分天下”的格局。

进入21世纪后，杭州市商品流通更加活跃，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2001年，杭州市的粮食销售市场和销售价格彻底放开。2005年，杭州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78.43亿元，其中批零贸易业零售额872.01亿元、餐饮业零售额100.86亿元。年末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720个，营业网点10万余个，其中年成交额超1亿元的大型市场109个；全年市场成交总额1467亿元。2004—2008年，杭州连续



武林商圈（来源于杭州图库）

5年获得《福布斯》评选的“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首的称号。

2010年，市委、市政府确定该年为“消费提升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46.08亿元，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074.24亿元，乡村消费品零售额71.84亿元。“十一五”时期，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7%。2015年，杭州市生产总值10053.58亿元，成为全国第十个迈入“万亿”级的城市。

2016年，全市生产总值11050.49亿元。全市完成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860.74亿元，住宿餐饮业增加值177.47亿元。全市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76.20亿元。其中商品零售额4637.58亿元，餐饮收入538.62亿元。城镇消费品零售额4904.61亿元；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71.59亿元。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中，文化办公用品类、五金电料类商品分别增长40.1%和29.9%，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分别增长16.7%和14.8%，汽车类、通信器材类商品分别增长10.7%和7.4%；金银珠宝类、石油及制品类商品分别下降12.6%和5.4%。全市网络零售额3445.65亿元，增长28.6%；居民网络消费额1499.98亿元，增长34.0%。

经过20余年的改革与发展，杭州经济迅猛发展，带动了社会各项事业的长足进步，城市综合实力在国内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杭州成为全国最佳和最具竞争力的商业城市之一。

一、旅游休闲

杭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七大古都之一，也是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杭州旅游资源丰富，有2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9个国家级森林公园，还有遍布全市的人文资源等，堪称“人间天堂、东南明珠”“东方休闲之都”“生活品质之城”和“东方养生胜地”等。

杭州的旅游活动与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早在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杭州地区就有先民们“剡木为舟、剡木为楫”，往来于水乡地带。隋唐五代，杭州作为京杭运河的终端，商业有了很大发展，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商埠。唐代，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修筑长堤，治理西湖，并以不朽的诗作扩大杭州的知名度，不少唐代诗人游览西湖后，还逆水而上，游历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写下无数赞美杭州山水的诗篇，开辟浙西“唐诗之路”。五代时期，吴越王修寺庙，建塔碑，丰富杭州的旅游文化资源。北宋时期，杭州被冠以“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美誉。苏轼两次任职杭州，浚西湖，筑湖堤，并以神来之笔讴歌杭州西湖之美，留下千古绝唱，成为杭州西湖旅游文化中的宝贵财富，提升了杭州的文化品位。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旅游随之兴旺。“西湖十景”初步形成。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宗教园林点缀在湖山之间。佛教寺庙发展到480处，杭州成为“东南佛国”。明清时期，杭州与海外交往频繁，旅游业仍有发展。康熙、乾隆二帝多次南巡到杭州，在西湖孤山建造行宫，康熙皇帝题书“西湖十景”碑名，乾隆皇帝也为“西湖十景”题诗。“西湖十景”成为杭州旅游精华而经久不衰。民国时期，公路、铁路开通，西湖环湖马路开辟，旅游交通更为便利。民国18年（1929），西湖博览会召开，中国旅行社总社及杭州分社设点服务，接待游客。民国21年（1932），



信义坊夜景（来源于杭州图库）

杭州市游客局成立，标志着近代杭州旅游业的兴起。

1950年，市政府公布《西湖风景区管理条例》，并着手疏浚西湖，整修游道，改建苏堤六桥，整修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六和塔、灵隐寺等一批旅游景点。同时，建设军队、工人休疗养基地，使杭州成为人民游览、休疗养的乐园。旅游管理及经营机构相继建立。“文化大革命”时期，旅游景点遭到严重损坏，文物古迹遭到毁灭性的破坏。1971年，由于国际交往需要，杭州旅游业才有新的转机。为接待西哈努克、尼克松、蓬皮杜等国家元首，改建三潭印月曲桥，重建花港公园牡丹亭，整修六和塔、灵隐寺等一批旅游景点，改建杭州机场，改修主要道路，整修主要宾馆饭店，整治西湖。1978年后，杭州市旅游业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1983年5月，国务院批准杭州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1998年，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努力把旅游业建设成为杭州市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同年，杭州市成为全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共计接待中外游客2171.7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63.43亿元。

进入21世纪，市委、市政府实施“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和“旅游西进”

的旅游国际化战略，开始重点挖掘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等地域文化，并力争把杭州建成全国吴越文化的中心，南宋文化的唯一城市，佛教文化的重心城市，西湖文化、运河文化及其衍生的爱情文化、名人文化的优势城市。2000年起，杭州恢复举办西湖博览会，定名为“中国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每年一届，至2016年为第十八届。2002年、2003年，杭州先后拆除环湖围墙，陆续对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景点实行免费开放，使西湖景区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不收门票的AAAAA级风景区。还湖于民，开放西湖，在全国引起轰动。2005年，西溪湿地公园一期工程竣工，京杭运河（杭州段）“一馆二场二带三园六埠十五桥”的景观建设基本完成。2006年，持续184天的“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盛大开幕，26个国家和地区的88个城市建馆，3422万名中外来宾参加。2007年，杭州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12年，重磅推出的“三江两岸”黄金旅游线成为杭州又一张旅游新名片。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开启了杭州迈入“国际重要旅游休闲中心”的新时代。是年，杭州共计接待中外游客1405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572亿元。

二、动漫文创

2003年，以浙江中南集团卡通影视有限公司等企业的成立为标志，杭州开始在动漫文创领域进行产业化探索。

2004年12月，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动画产业园成为国家广电总局命名的全国首批国家动画产业基地之一，也是唯一以科技园区命名的动画产业基地。同年，中国美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和浙江大学相继被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成立国家动漫产业教学基地。

2005年，杭州在与国内诸多城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中国国际动漫节的主办权。动漫节以“专业化、国际化、产业化、品牌化”为目标，汇聚中外最新动漫原创作品、动漫衍生产品，展示国内外动漫产业最新成果，推介中外最新动漫理念，推广各种动漫相关的专业服务和娱乐活动。同年，杭州的动漫企业从50家发展到60余家；全市共立项动画片29部3131集，生产14部共752集计8100多分钟，一跃成为排在广州之后的全国第二，占全国总数的20%。

2007年，为抢抓创意经济时代机遇，杭州市委、市政府做出了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战略部署。同年10月，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应运而生。2008年，杭州成立了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设立了市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资金，明确了重点发展的八大行业和十大园区，有效解决了“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房办事、有章理事”等体制机制问题，为文创产业的快速发展扎好了根基。

2009年，杭州着力打造企业集聚平台、产业融资平台、项目引导平台、人才开发平台和展示交易平台五大平台，助推全市文创产业发展。这一年，杭州获国家推荐的优秀动画片共计8部，占全国总数的16%，列全国各大城市第一位；动画片《郑和下西洋》、舞台剧《宋城千古情》等4部作品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杭州市还被评为“2009年度支持中国动漫游戏产业发展模范政府”。

2010年6月7日，国务院批准通过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将杭州定位为“全国文化创意中心”，标志着杭州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的战略升格。这一年，中国网吧服务软件第一股——顺网科技、中国电视剧第一股——华策影视、中国旅游演艺第一股——宋城演艺先后上市；盛世龙图公司制作的动画电影《梦回金沙城》代表中国成功入围第83届奥斯卡，中国国际动漫节被国家广电总局和中国动画学会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动漫节展”，杭州高新区动画基地获得全国唯一的“最佳动画产业基地奖”。

2003年至2017年，杭州紧紧围绕建设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的目标，不断突破、创新、拓展、融合，着力打造了西溪创意产业园、之江文化创意园、白马湖生态创意城等24个市级园区，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工艺和民间艺术之都”、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等一系列称号。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作为全市文创产业的重要展示与交易平台，紧紧围绕“国际化、专业化、产业化、品牌化”的办展理念，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好的发展历程，成为全国四大文创产业综合会展之一。2013年，全市文创产业实现增加值1359.51亿元，占全市GDP的16.3%。至2016年，全市文创产业实现增加值2541.68亿元，高于全市GDP增速11.7个百分点，占全市GDP的23.0%。

文创产业中，杭州动漫游戏产业更是异军突起，以“动漫+”的形式融入相



2015年4月28日，中南之夜·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典礼暨中国动画电影新片首映在杭州大剧院举行（来源于杭州图库）

关产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至2016年，杭州市连续12年成功举办的中国国际动漫节成为中国规模最大、人气最旺、影响最广的动漫专业盛会，先后被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列为重点扶持文化会展项目及“中华文化走出去工程”重点扶持的文化交易平台。2016年，中国国际动漫节成为G20杭州峰会前唯一举办的大型文化活动，展会规模和节展效益再次刷新历史记录。同年，杭州电魂网络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国内A股主板独立IPO游戏第一股。杭州动漫游戏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2.1亿元，利润总额达25.2亿元，上缴税金5.89亿元。全年有7部动画作品被列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荐的优秀国产动画片，6部动画作品获总局少儿精品奖，连续3年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

杭州动漫游戏产业通过产业聚集，逐步形成了产业体系相对完整、结构布局日趋合理、整体技术水平先进、市场导向作用明显的格局。杭州将在打造“动漫之都”的进程中书写新的时代繁华！

三、电子商务

2008年5月29日，杭州被授予“中国电子商务之都”称号。2011年，杭州市被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授予“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称号。2015年，杭州成为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依托政策红利、创新创业生态优化完善和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杭州的电子商务产业实力不断壮大，不仅保持着高速增长，在各领域的应用也进一步普及和深化，配套体系持续优化，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日益凸显。杭州的电子商务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仅在全国领先，部分领域也走在世界前列。

到2016年末，全市规模以上第三方电子商务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74.33亿元，实现利润总额767.70亿元，成为杭州GDP增长的主要动力。电子商务企业资产总计2841.77亿元，远高于传统产业的企业资产平均增速。

截至2016年，杭州电子商务网站的数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其中，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已经与杭州共同走过了长达16年的奋斗历程。



阿里巴巴集团位于杭州的企业园区（阿里巴巴集团 供稿）

阿里巴巴作为电子商务领域的标志性企业，带动并聚集了大批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吸引了网易、京东等更多优质电商企业入驻。而淘宝网商园、腾讯创业基地、福地创业园、梦想小镇、云栖小镇、浙大科技园等创业新区，也成为创业者们共同奋斗、并肩作战的阵地和



2009年至2016年“双十一”阿里平台总交易规模

摇篮。2016年，天猫、淘宝、网易、阿里巴巴、京东惠景、物产电子等全市前六大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367.79亿元，占规模以上电子商务企业的86.9%，增长贡献率达88.7%。

2015年，杭州成为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简称“杭州综试区”）。此后，在相关政策引领下，在杭州综试区、市、区县多举措助推下，跨境电商产业集聚度进一步提升，集聚效应逐渐显现。

截至2016年，杭州已建成下沙跨境电商产业园、下城跨境电商产业园、萧山空港跨境电商产业等三大国家级跨境电商试验园区，并不断探索创新发展模式，取得显著成效。除了有阿里巴巴和网易考拉等本土跨境平台巨头“坐镇”之外，亚马逊、谷歌、大龙网、敦煌网、环球市场等国内外知名电商平台及互联网企业纷纷布局杭州综试区，将杭州作为重要的战略据点。到2016年末，全市实现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81.12亿美元，其中出口60.60亿美元、进口20.52亿美元。

一、开发园区

开发园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在扩大对外开放、深化改革中有效地发挥了窗口、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成为杭州市主要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实施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平台和打造“一主三副六中心”的重要支撑点，也是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基地和核心集聚区。

杭州市的开发园区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市委、市政府做出开发下沙轻、化工工业区的决策，将下沙开发工作列入杭州市经济发展的初步规划。1990年7月18日，杭州钱江外商台商投资区江北管理委员会成立；同年8月15日，杭州钱江外商台商投资区建立。1992年5月23日，杭州钱江外商台商投资区下沙首期工程奠基开工典礼举行，下沙区块5平方千米启动区正式开工建设。1993年4月4日，国务院批准设立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2004年2月4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成立江东开发建设指挥部，40平方千米的江东工业园区市本级区块筹建工作全面开展。

1988年10月，市政府向省政府报告，要求建立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0年3月21日，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同年8月3日，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成立。1991年3月6日，国务院批准设立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02年6月11日，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滨江区管理体制调整，两区合二为一，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体制。2015年8月，国务院批复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6年，杭州高新区GDP达到901.4亿元，比上年增长14%，近5年年均增长12.1%；财政总收入235.37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25.37亿元。

1992年8月，杭州西湖之江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成立。10月4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11月6日，杭州西湖之江

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更名为“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2002年9月19日，市委、市政府对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与西湖区的管理体制进行调整，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管理委员会和西湖区党委、政府实行“职能分开、干部兼职”的办法，履行度假区开发建设和行政区域管理的双重职能。

1993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准设立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2005年底，辖区范围包括市北区、桥南区、江东工业区及钱江农场和红垦农场，辖区面积35.15平方千米。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前身是杭州钱江外商台商投资区江南管理委员会管辖的市北区块。1990年6月，经浙江省同意，杭州市决定建立杭州钱江外商台商投资区江南管委会。1993年5月，国务院批准市北区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一个省级开发区——萧山高新园区，拥有一个国家级产业基地——杭州软件产业基地萧山扩展区块。

2003年3月，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开始组建。2015年2月上旬，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萧山临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定名为“萧山临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现行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政策。这是杭州市继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后的又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杭州余杭经济开发区创建于1993年11月，是经浙江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隅（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供稿）



开发区之一。2012年9月30日，杭州余杭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当时浙江省唯一的“生物医药产业示范基地”。园区当年拥有亿元以上规模企业49家。

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92年，是浙江省首批省级开发区之一。2008年被评为长三角最具投资价值开发区。2012年10月，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2015年在浙江省21个国家级开发区中综合排名第5位，被评为全省优秀国家级开发区。

经过30多年的开发和建设，杭州市有7个国家级开发区和众多的省级开发区、经济园区、产业园区、科技园区等，聚集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服务业，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管理，都已日臻完善，成为杭州市和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点、增长极和辐射源，成为杭州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以及发展现代工业、外向型经济和高教科研的重要基地。2016年，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江国家高新区7个国家级开发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6719.15亿元，利润总额609.65亿元，分别增长9.6%和18.5%；规模以上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2251.06亿元，利润总额309.58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14.7%和17.8%。

二、特色小镇

梦想，源于对未来的憧憬；小镇，是故乡凝结的意象。为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5年6月4日，浙江省公布了第一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全省10个设区市的37个小镇列入首批创建名单，其中杭州占9席，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这9个小镇涉及信息经济、金融、时尚、健康、历史经典等产业领域。分别是上城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江干丁兰智慧小镇、西湖云栖小镇、西湖龙坞茶镇、余杭梦想小镇、余杭艺尚小镇、富阳硅谷小镇、桐庐健康小镇以及临安云制造小镇。

特色小镇是相对独立于市区，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功能、社区特征融合叠加的发展空间载体。它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和浙江特色，不是行政区划单元的“镇”，也不是传统工业园区或旅游功能区的“区”，更不

是政府大包大揽的行政平台，而是同业企业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企业社区，是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空间边界明确的创新创业空间。以余杭梦想小镇为例，其核心区块总面积约3平方千米，以章太炎故居、“四无粮仓”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自由徜徉”的自然生态系统为载体，以科技城开放、包容、创新、服务的政务生态系统为支撑，以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地和金融资源集聚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为驱动，通过建设“众创空间”、O2O服务体系，“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孵化链条，打造更富激情的创业生态系统，帮助“有梦想、有激情、有知识、有创意”，但“无资本、无经验、无市场、无支撑”的大学生“无中生有”，使他们创业的“梦想变成财富”。

2015年7月，杭州正式启动首批市级特色小镇的申报工作，从提交的74个创建方案中，经过实地调研，筛选出55个特色小镇进入评审环节。按照产业支撑、三生融合（即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市场主导、政策保障等多个指标对小镇进行评分后，结合杭州重点产业空间布局，最终形成了首批32个市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按照要求，杭州市级特色小镇3年内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亿元以上。同时，在3年内，杭州市要力争达到省、市、区（县、市）三级特色小镇总数100个左右，并明确税收支持、土地要素保障、重点项目支持、科技创新支

位于余杭区未来科技城的梦想小镇（来源于杭州图库）



持四大扶持政策。

这些特色小镇表现出了很好的发展态势，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2015年末，41个第一批省级和市级特色小镇创建对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38亿元，形成信息经济、金融、健康等产业集群，实现经济总收入1300多亿元，税收180亿元；打造众创空间25个，入驻创业项目1374个，引进创业人才9800人，落户天使基金、财富管理等金融机构近500个，管理基金规模超过2000亿元。举办各类创业大赛、论坛等活动600多场次。随着小镇建设体系的成熟，这些数字还在不断壮大。

2016年1月28日，浙江省第二批42个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51个培育名单公布。杭州市范围内有10个小镇被列入创建名单，15个被列入培育名单。截至2016年9月底，杭州市共有各级特色小镇44个。

杭州市各级特色小镇一览表（截至2016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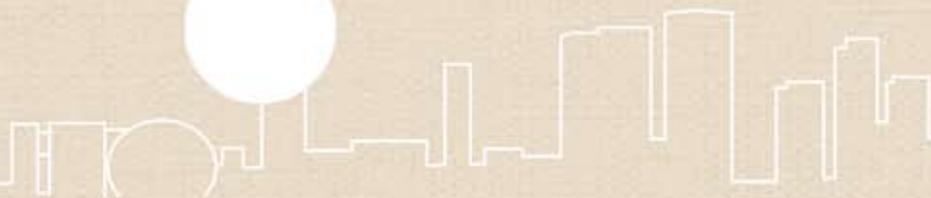
所属区域	小镇名称	产业类型	等级与批次
上城区	山南基金小镇	金融	省级第一批创建名单
	吴山宋韵小镇	历史经典	省级第二批培育名单、市级第一批
下城区	跨贸小镇	信息经济	省级第二批创建名单、市级第一批
江干区	丁兰智慧小镇	信息经济	省级第一批创建名单
	钱塘智造小镇	高端装备制造	省级第二批培育名单、市级第一批
	东方电商小镇	信息经济	省级第二批培育名单
拱墅区	运河财富小镇	金融	省级第二批创建名单、市级第一批
	上塘电商小镇	信息经济	省级第二批培育名单、市级第一批
西湖区	云栖小镇	信息经济	省级第一批创建名单
	龙坞茶镇	历史经典	省级第一批创建名单
	艺创小镇	时尚、文创	省级第二批创建名单、市级第一批
	云谷小镇	信息经济	省级第二批培育名单、市级第一批
	西溪谷互联网金融小镇	信息经济、金融	省级第二批培育名单、市级第一批
	紫金众创小镇	信息经济、金融	省级第二批培育名单、市级第一批
滨江区	物联网小镇	信息经济	省级第二批创建名单、市级第一批
	创意小镇	时尚、文创	省级第二批培育名单、市级第一批

续表

所属区域	小镇名称	产业类型	等级与批次
萧山区	信息港小镇	信息经济	省级第二批创建名单、市级第一批
	机器人小镇	高端装备制造	省级第二批培育名单、市级第一批
	湘湖金融小镇	金融	市级第一批
	空港小镇	信息经济	市级第一批
余杭区	梦想小镇	信息经济、金融	省级第一批创建名单
	艺尚小镇	时尚	省级第一批创建名单
	梦栖小镇	时尚、文创	省级第二批创建名单、市级第一批
	创龄健康小镇	健康	省级第二批培育名单
	好竹意小镇	历史经典	市级第一批
	新能源汽车小镇	环保、高端装备制造	市级第一批
	传感小镇	高端装备制造	市级第一批
富阳区	智能能源小镇	环保	市级第一批
	硅谷小镇	信息经济	省级第一批创建名单
桐庐县	药谷小镇	健康	省级第二批创建名单、市级第一批
	健康小镇	健康	省级第一批创建名单
	智慧安防小镇	高端装备制造	省级第二批创建名单、市级第一批
	妙笔小镇	历史经典	市级第一批
	富春江慢生活小镇	健康、旅游	市级第一批
淳安县	千岛湖乐水小镇	旅游	省级第二批培育名单、市级第一批
建德市	航空小镇	高端装备制造	省级第二批创建名单、市级第一批
临安市	云制造小镇	信息经济	省级第一批创建名单
	龙岗坚果电商小镇	信息经济	省级第二批培育名单、市级第一批
	颐养小镇	健康	省级第二批培育名单
	红叶小镇	旅游	市级第一批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	汽车小镇	高端装备制造	省级第二批培育名单、市级第一批
	巧客小镇	时尚、文创	省级第二批培育名单、市级第一批
下沙经济开发区	东部医药港小镇	健康	市级第一批
市城投集团	天子岭静脉小镇	环保	省级第二批创建名单、市级第一批

第四章

政通人和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秦统一全国，杭州开始了大一统封建体制下的发展历程。在漫长而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既有孙权、钱镠这样的开明帝王，也涌现了李泌、白居易、周新、商辂等一批清正廉洁的贤官。孙权建业江南，钱镠保境安民，在他们执政期间，社会安定、经济富庶、文化繁荣。与此同时，李泌、白居易、范仲淹、苏轼（苏东坡）、杨孟瑛、李卫、阮元等先后治理杭州。李泌开凿六井、解决了杭城百姓的饮水问题，白居易疏浚西湖、保证了农业灌溉和居民饮水之需，范仲淹荒政三策、救平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苏轼更是为杭州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西湖治理及扬名天下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还有周新、商辂、毛际可、夏同善等清正廉洁、疾恶如仇。这些帝王先贤善政爱民的事迹，家喻户晓，盛传千载，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注杭州的建设和发展。多年来，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杭州人民艰苦奋斗、勇于拼搏、敢于创新，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国民经济稳步提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富民强市、社会和谐为主旨，着力稳增长、调结构、强统筹、治环境、惠民生、促和谐，使杭州的经济实力、科技竞争力、社会凝聚力、文化软实力、城市影响力都上了一个新台阶。2016年，杭州以如诗如画的美丽、人性关爱的温暖、创新创业的激情再次惊艳世界，一个具有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正在华夏大地崛起。



一、开国帝王

在杭州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帝王是东吴大帝孙权和吴越王钱镠。他们睿智开明、审时度势，具有非凡的雄才大略和宏大的历史远见。在执政期间，他们对外开展军事、外交活动，保境安民；对内发展农业、兴建水利，富国强兵，为以后杭州的安定、富庶、繁荣奠定了基础。

（一）孙权

孙权（182—252），字仲谋，祖籍在吴郡富春（今杭州市富阳区），出生于下邳（今江苏邳州），是春秋名将孙武的后代，三国时期东吴的建立者。

《三国志·吴书》引用《江表传》记载，孙权出生时，目有精光，方颐大口，形貌奇伟，异于常人，人们认为他有贵相。孙权9岁时，他的父亲孙坚因奉命讨伐荆州刺史刘表，不幸战死，他由母亲吴夫人抚养长大。13岁，孙权就跟随兄长孙策平定江东，并参与军内计谋商议，他的不凡见解常常令兄长也感到很惊奇。建安元年（196），孙策任命15岁的孙权为阳羨（今江苏宜兴）县长，因此，后人评价孙权：“少年大志，十五而立。”

孙权性格旷达开朗、温和多决断，又崇尚侠义，蓄养门客，与父兄齐名。建安五年（200），兄



《龙门孙氏宗谱》

长孙策早逝，18岁的孙权继位为江东之主。他广罗人才，“纳鲁肃于凡品”，“拔吕蒙于行阵”，身边武将辈出，谋士如云，同时依靠张昭、周瑜、程普等南北士族地主势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东吴政权。建安十三年（208），孙权与刘备联盟，并作为联合抗曹的主力，率领3万大军，在赤壁大败曹操，天下三分局面初步形成。此后孙权与刘备划湘水为界，智取荆州，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

黄武元年（222），孙权自称“吴王”。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于武昌（今湖北鄂州），正式建立吴国，国号“吴”，史称“东吴大帝”。

在执政吴国的半个多世纪里，孙权对外开展军事、外交活动，对内注重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农业方面，他设置了专职农官，实行屯田，屯田的规模可观，且多用牛耕，耕作技术也较为先进，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根据《三国志·吴书》记载：黄武五年（226）春天，孙权因百姓遭受连年战争之苦，下令各州郡对百姓采取宽容安息政策，并亲自驾牛扶犁，下田耕作，鼓励官民参加农垦。在水利建设方面，孙权亲自规划开凿运河，用以交通和灌溉，促进了江南地区航运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此外，他还鼓励发展手工业、商业和货运贸易，促进了纺织、煮盐、造船、酿酒、瓷器制作等手工业的发展，使江南社会的经济、生活水平与中原的差距逐渐缩小。

杭州龙门古镇民俗风情节（贝加 摄）



当时的钱唐县属于吴国的吴郡。在孙权的经营下，整个江浙地区的面貌都大有改观，经济有了长足发展。

资料链接

龙门古镇



富阳区龙门镇（市农办 供稿）

孙权故里龙门古镇地处富春江南岸，既是“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旅游线路上的国家一级景点，也是“富春十景”之一。全村7000余人口中，90%以上姓孙，是中国最大的孙权后裔聚居地，也是民间孙氏文化保留最全之地。

东汉名士严子陵畅游龙门山，曾留下“此地山清水秀，胜似吕梁龙门”的赞誉，龙门古镇也缘此而名。在龙门古镇，可以感受江南特有的民俗风情，领略孙权家族千年来所形成的浓厚的孙氏文化，饱览秀美的龙门山自然风光和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且极为罕见的明清古建筑群，伴随着古樟、小桥、溪流与古街，欣赏古镇独特的风景。

（二）钱缪

钱缪（852—932），字具美（一作巨美），杭州临安人，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建者。

唐大中六年（852），钱缪生于今杭州市临安区大官山功臣山下的石镜乡临水里。因少时家境贫寒，16岁便开始贩盐挑米。他奔走于两浙一带，目睹乱世，在维持生计之余，开始练弩戟，读兵法。唐乾符二年（875），临安石镜镇镇将董昌招募乡兵，钱缪应募，后因作战勇敢步步升迁，从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升为镇海军节度使。乾宁元年（894），又加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乾宁三年（896），因讨伐妄图称帝的董昌有功，升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中书令。乾宁四年（897），赐铁券，恕九死。钱缪在唐昭宗朝，位至太师。元祐元年（904），钱缪被封为吴王。



钱王铁券（来源于国家博物馆官网）

钱王铁券用铁铸成，上嵌金字350个：“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钱缪铁券在朱元璋的明朝起了作用，使钱氏后人保住田产家财。后经五位帝王御览，也曾遗落民间，今保存于浙江省博物馆。

唐天祐四年（907），梁太祖即位，中国历史进入了以乱世著称的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建立的吴越国，便是其中之一。吴越国地处东南沿海，位于长江三角洲的精华之地，东濒大海，大部分边界同西北的吴国（后卫南唐国）相接，南连闽国的章泉。在鼎盛时期领有十三州一军，包含杭州、越州（今绍兴）、湖州、温州、台州、明州（今宁波）、处州（丽水）、衢州、婺州（今金华）、睦州（今建德、桐庐、淳安等地）、秀州（今嘉兴），还有江苏的苏州、福建的福州，以及钱氏家乡临安（安国衣锦军），约为今浙江全省、江苏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一带。



吴越国国境图（来源于《中国历史地图集》）

由于当时天下大乱，而吴越国在地理位置上三面受敌，一面临海，为求国家安定，钱镠深谋远虑、审时度势，在政治上实行“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政策。他一方面“朝奉中原为臣”，即所谓“事大”；另一方面“连横诸藩”，与周边相对弱小的藩镇保持和平关系，保证边境的安宁；而与“强邻淮南”，则围绕领土问题，时战时和。

与此同时，钱镠依靠吴越国发达的海上交通，派船队与日本、暹罗（今泰国）建立起通商关系。

对内，钱镠非常重视内政建设，兴建海塘、扩建杭城、疏浚湖河、发展农桑、扩大贸易、任用贤才，促进了杭州及两浙的发展，保障民众安居乐业。

经过吴越国几十年的苦心经营，钱塘富庶，由是盛于东南，到北宋时一跃成为“东南第一州”。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曾称赞说：“吴越之地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

后唐长兴三年（932），钱鏐去世，享年80岁。他在位41年，临终前依然嘱咐继位人钱元瓘“子孙善事中国（北方小朝廷），勿以异姓废事大之礼”。因此，对于五代的5朝14君，不论谁做皇帝，吴越国钱氏都一直称臣纳贡，保境安民。北宋建立后，吴越国“纳土归宋”，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使老百姓免受战乱之苦。杭州人为纪念钱王，在西子湖畔建起了钱王祠。900多年来，钱王祠历经沧桑，几经毁建，现在仍是西湖边集游览、观赏、文化展示、历史研究为一体的园林新景点。

资料链接

婆留井传说

传说钱鏐出生时“红光满室，后庭一片兵甲声”，他的父亲钱宽认为不吉祥，要将他抛弃在屋后的井中，全仗阿婆（祖母）留养。所以钱鏐的小名就叫“婆留”（意为阿婆留其命），那口井后来也被称为“婆留井”。



钱祠表忠（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供稿）

吴越国王表

杭州作为吴越国的首府，历经钱氏三代五王的统治，长达72年（钱镠24年、钱元瓘9年、钱弘佐7年、钱弘俶半年、钱俶32年）。如果从893年钱镠受封为镇海军节度使开始，实际上钱氏以军政首领的身份统治杭州长达86年。

任次	庙号	谥号	姓名	父母	在位起讫年月	葬地	附注
一	太祖	武肃	钱镠	父：钱宽 母：水丘氏	唐天祐四年（907）二月至 宝正七年（932）三月	临安太庙山南坡	
二	世宗	文穆	钱传瓘 (钱元瓘)	钱镠第七子 母：陈氏	后梁长兴三年（932）四月至 后唐天福六年（941）八月	杭州玉皇山南原	
三	成宗	忠献	钱弘佐	钱传瓘第六子 母：许氏	后唐天福六年（941）九月至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六月	杭州玉皇山西原	丞相曹仲达摄政
四		忠逊 (让王)	钱弘俶	钱传瓘第七子 母：鹿氏	后唐天汉十二年（947）六月至 十二月	会稽（今绍兴）秦望山	因内衙统军使胡进发动政变而让位，后徙居越州（今绍兴）
五		忠懿	钱弘俶	钱传瓘第九子 母：吴氏	后汉乾祐元年（948）一月至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	河南洛阳贤相里陶公原	978年纳土归宋，不得回杭

注：本表摘自《杭州历史文化图说》。

二、治世能臣

根据历代志书记载，从东汉的钱唐县令到民国的杭州市市长，杭州共有过1189位首官。他们如星光闪耀，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用自己的智慧与才情铸就了杭州的灵魂，谱写了一代代善政爱民的事迹，千古传颂，其中以李泌、白居易、范仲淹、苏轼、杨孟瑛、李卫、阮元等最为人称道。

（一）李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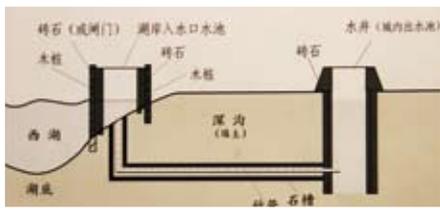
李泌(722—789)，字长源，原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后来迁居京兆(今陕西西安)。

李泌幼年聪敏，有“神童”的称誉。成年后更是博览经史，精通黄老之学；文笔也极好，尤其擅长写诗。在唐玄宗时，李泌任太子供奉，并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被封为邺侯，官至中书令。

李泌一生崇尚出世无为的老庄之道，在肃宗、代宗两朝数度辞去宰相之位，远离朝堂，隐居衡山。他虽然从政时间短，可在任期间却做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其中之一便是开凿六井，为杭城百姓解决了饮水问题。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至兴元元年(784)，李泌调任杭州刺史。杭州原本是钱塘江和东海故地，经过江水和海潮的双重冲刷后，沙土堆积，逐渐演变成陆地。但杭州城的地下水依旧带着海水的咸苦，无法饮用，老百姓就地打井不管用，便只能到很远的西湖去汲水，非常不方便，“饮水难”成了当时杭州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严重限制了城市的发展。

怎么才能让大家喝上淡水呢？李泌想了个好办法，即引西湖水进杭城，开六井以泽百姓。



西湖水入城设施示意图
(来源于杭州博物馆)



李泌引水纪念景观(张素卿 摄)

他派民工从涌金门到钱塘门一带开挖6个人水口，设置水闸，然后铺设暗管（甃瓦石），把西湖水引入杭城，又在城市西北人口稠密之地开挖6口大井（6个大池子）作为出水口。这样，只要开启水闸，清淡可口的西湖淡水就溢满水井，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此，“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带此而后食”（苏轼《乞开杭州西湖状》）。这六井分别是：相国井（今解放路和浣纱路交界）、西井（今延安路南口）、金牛井（在西井西北）、方井（俗称“四眼井”，在金牛井西北）、白龟井（在今龙翔桥之西）、小方井（俗称“六眼井”，今小车桥附近）。

李泌是历史上第一个把西湖水引入古老杭城的人，这个给水系统解决了百姓的饮水问题，也为杭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白居易、钱镠、苏轼等贤明首官在任期间不断修缮六井，使其作用得以持续发挥。后来，随着杭州地下水水质变好，人们就地掘井涌出的井水也能饮用，原有六井的功能才逐渐减退，六井也渐渐湮没。为纪念这位德泽百世的唐代刺史，1980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在原址修建相国井；2003年，在原引水设施入水口处修建了“李泌引水纪念景观”，让后人记住李泌的功绩。



相国井（张素卿 摄）

位于解放路与浣纱路交叉口，地处闹市，虽早已失去实用价值，但它是杭州城市演变的重要见证之一，也是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相国井井圈和石栏杆及相国井碑记等，均为1980年整修时新建。

（二）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自称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后来迁居至下邳（今陕西省渭南北）。

白居易出身于官宦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与熏陶，很早就显露出文学才华。唐贞元十四年（798），白居易中进士，贞元十九年（803）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此后，历任翰林学士、左拾遗（谏官）、太子左赞善大夫（太子陪读）、太子少傅、刑部尚书等职。

少年，白居易便以“兼济天下”作为志向。他频繁上疏言事，写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唐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屡次上疏却不被皇帝（穆宗）采纳，同时又常遭受权臣猜忌，看到朝中党争激烈，他请求到外地任职。同年七月，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十月到任。在任期间，他心系百姓，“罄戟心所念，简牍手自操”，为杭州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是疏浚六井。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时，距李泌修建六井有40多年，因年久失修，六井逐渐湮塞，饮水不畅。他主持重新疏通，恢复了六井的饮用功能。

其次是治理西湖。当时杭州的气候特点是“春多雨，夏秋多旱”，由于西湖淤塞，每逢雨季，西湖水就满溢，周围农田受涝；每逢旱天，西湖又变得很浅，无法用以灌溉；旱涝交互成灾，使农民困苦不堪。白居易经过实地考察发现，解决旱涝问题的关键在于浚治西湖。于是，他力排众议，亲自主持修建拦湖大堤，即将当时西湖上、下湖^[1]之间的一条堤坝加高数尺。此堤起自石函桥（今少

[1] 上湖即今西湖，地势较高；下湖当时叫泛洋湖，今已湮废，地势较低。



年宫一带)，迤北至余杭门（今武林门），当时人们称为“白公堤”。这条上下湖间的分隔堤，有效地蓄水泄洪，保证了农业灌溉和居民饮水的需要。从此，杭州附近的千余顷农田，得免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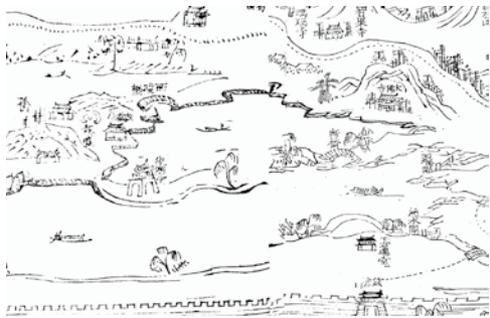
为了保护此堤，白居易还写了一篇《钱塘湖石记》（当时西湖又叫“钱塘湖”），说明筑堤的作用、灌溉方法以及可能遇到的各种阻碍，告诫后任刺史在使用这条堤时应注意的事项，并刻石立于湖边（现刻于杭州西湖北角圣塘闸照壁）。

白居易也十分注重保护西湖水面不受侵占，他颁布了一条特别法令：谁破坏湖的环境，就要受到惩罚。穷人如果犯西湖管理之法，就罚他在湖边种几棵树；富家如果触犯此法，就罚他在路上辟除葑草。这些措施都有效地保护了西湖水面不受破坏。

此外，白居易还对役政和赋税进行了改革，又提倡文教事业，他自己更是撩开西湖美丽风景面纱的第一人。在他的诗词中，西湖从一湾湖水变成了一位美人。他一生作诗3600多首，写西湖山水的就有200多首，是历代诗人中写西湖最多的人。后来，文人墨客们也钟情于西湖，造就了西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白沙堤 [来源于(明)《西湖游览志》]



白沙堤(20世纪20年代)(来源于《杭州古旧地图集》)

唐长庆四年（824），白居易离任杭州。他为官清廉，在杭期间，将自己俸禄的大部分留存在官库，作为疏浚西湖的固定基金，用去多少，再由继任者补足原数。后人沿袭成一种制度，持续了50年之久。而他自己仅仅带走两片天竺石和一只鹤作为纪念，即使这样，白居易也觉得取之有愧。他说：“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蘘；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在他看来，这两片石头价值千金，恐会玷污自己的清白操守。

别州民

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
甘棠一无树，那得泪潸然。
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
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今天，白居易留下的白公堤已经堙没不可见，但杭州百姓为了纪念白居易，把杭州城西通往孤山的白沙堤改名为“白公堤”，即现在的“白堤”，并在孤山之麓建了白公祠，以永远纪念这位为民造福的贤刺史。同样，白居易也难忘杭州的一切美好，多年后他又写下诗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惜别白公景观雕像（张素卿 摄）



少年白居易

16岁时，白居易到京城拜会当时的名士顾况，希望能得到指点。他毕恭毕敬呈上自己的新作。顾况打开诗卷，见上面工整地写着“白居易”三个字，将了捋胡须，笑着说：“长安米贵，白居不易啊！”

面对这个小玩笑，白居易并不辩解。等顾老先生翻开诗卷，不觉眼前一亮，他轻声吟诵起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字字真情、句句余味，“好诗！好诗！”顾况连连叫好，他走过去拉住白居易的手说：“你小小年纪，有这样的志向，这等的才华，在长安定能大有作为！”

《钱塘湖石记》

钱塘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一人立于田次，一人立于湖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自钱塘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须放湖入河，从河入田。准盐铁使旧法，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脱或水不足，即更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又有余矣。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钱塘县官。县官多假他词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所托。或云：菱芡失其利。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芡与稻粱之利孰多？断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内六井无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数十眼，湖耗则泉涌，虽尽竭湖水，而泉用有余；况前后放湖，终不致竭，而云井无水，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于人，与湖相通，中有阴窦，往往堙塞；亦宜数察而通理之。则虽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无税田约数十顷，湖浅则田出，湖深则田没。田户多与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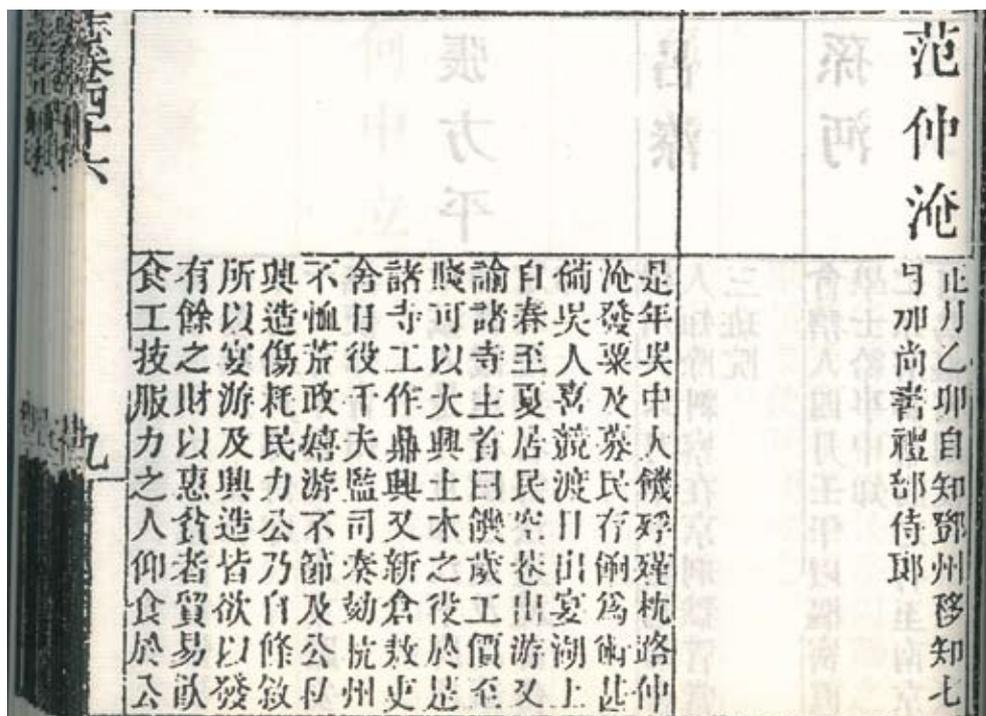
圣塘闸亭与钱塘湖石记（张素卿 摄）

由计会，盗泄湖水，以得私田。其石函、南笕并诸小笕閘，非灌田时，并须封闭筑塞，数令巡检，小有漏泄，罪责所由，即无盗泄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决。须所由巡守预为之防。其笕之南，旧有缺岸。若水暴涨，即于缺岸泄之；以不减，兼于石函、南笕泄之，防堤溃也。予在郡三年，仍岁逢旱，湖之利害，终究其由。恐来者要知，故书于石；欲读者易晓，故不文其言。长庆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记。

（三）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历任秘阁校理、右司谏、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陕西经略副使、参知政事等职。

少年时，范仲淹虽然家贫，但好学，常以天下为己任。他怀着一腔利泽生民的志愿，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40多年的政治生涯里，他三次入朝执政，三次被贬官外放。身边的人都劝他少管闲事、明哲保身，但



（南宋）咸淳《临安志》卷四六有关范仲淹的记载

范仲淹强调“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宋皇祐元年（1049）正月，年已61岁的范仲淹从河南邓州调任杭州知府。次年，两浙路^[1]遭受大饥荒，路有饿殍，饥民流徙，受灾十分严重。范仲淹除了用发粟救济等常规措施救灾外，又创造性地实施了被后世誉称为“荒政三策”的救灾方略。

所谓“三策”，一是招募工人兴建佛寺、官家谷仓及吏卒官舍，每天募集工人多达1000人，为出卖劳力的百姓提供就业机会，不致饿死荒野；二是鼓励当地民俗赛舟，即发展杭城旅游业，增加社会就业；三是提高谷物价格，让各地商贾竞相运米来杭，从而确保了杭州的粮食供应。“荒政三策”一改以往的被动救荒为主动兴利，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从而保证了杭州府社会安定，人民

[1]北宋时期的浙江行政区，范围基本继承了唐末的两浙道，大致包括今天的浙江省全境，江苏省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四市和上海市。

安居乐业。在《梦溪笔谈》中有记载：“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

范仲淹任杭州知府的一年多时间里，还非常重视教育，振兴学校，功在士林。在此期间，这位文学大家也写下了他对西湖深深的眷恋。

忆杭州西湖

长忆西湖胜鉴湖，春波千顷绿如铺。
吾皇不让明皇美，可赐疏狂贺老无。

范仲淹逝世后，杭州人民在孤山建了范公祠，在梅东高桥建了范府君庙来纪念他。时至今日，这些历史遗存已被岁月淹没，但在地方志书和前人留下的碑刻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范公对杭州的贡献，以及百姓对他的敬仰。

《杭州使院范文正公祠记》中记载：“范文正公之名德，世之所共仰也……杭州旧有范府君庙，在梅东高桥，明时以祀文正公。郡志云，里人奉为土谷神，盖皇祐初公守杭州时发粟救饥，为术甚备，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当时既德之，延及后世，报功之祀不衰。而习俗相及，于提学署中亦祀文正为土地之神……”

《康熙仁和县志》中也有记载：“范明王庙，在梅东高桥东相沿（按：“东相”应为“东厢”之误，意即桥的东面），系文正公范仲淹为此地土谷神。康熙十一年，巡抚范承谟以其苗裔，至庙致祭。”

资料链接

范仲淹“三光经历”

《宋人轶事汇编》中记载，范仲淹的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光”（光耀）一次。第一次是天圣七年（1029），他因谏言太后还政被贬，称为“极光”；第二次因废郭皇后一事再次被贬，称为“愈光”；第三次是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因上《百官图》第三次被贬，称为“尤光”。

（四）苏轼（苏东坡）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聪慧异常，“一读书便能会悟，一落笔便自惊人”，被誉为蜀中奇才。

宋嘉祐二年（1057），20岁的苏轼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登进士第。熙宁四年（1071），他因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方案，被贬到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诗得祸，被押御史台狱将近半年，史称“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他被召还朝，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后因朝内新旧党之争，又再次被贬到杭州、惠州、儋州等地。一直到64岁，才获大赦北还，途中病逝于江苏常州。

苏轼先后两次来杭州，历时近5年。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至熙宁七年（1074）七月，苏轼第一次来到杭州，做了3年通判（地方行政副职兼监察官）。其间，他悉心研究西湖水利，协助太守陈襄有效地修浚六井和沈公井。

宋元祐四年（1089）七月至元祐六年（1091）六月，苏轼第二次来杭，以龙图阁学士出任知州。在任期间，他尽心尽力，把杭州治理得井井有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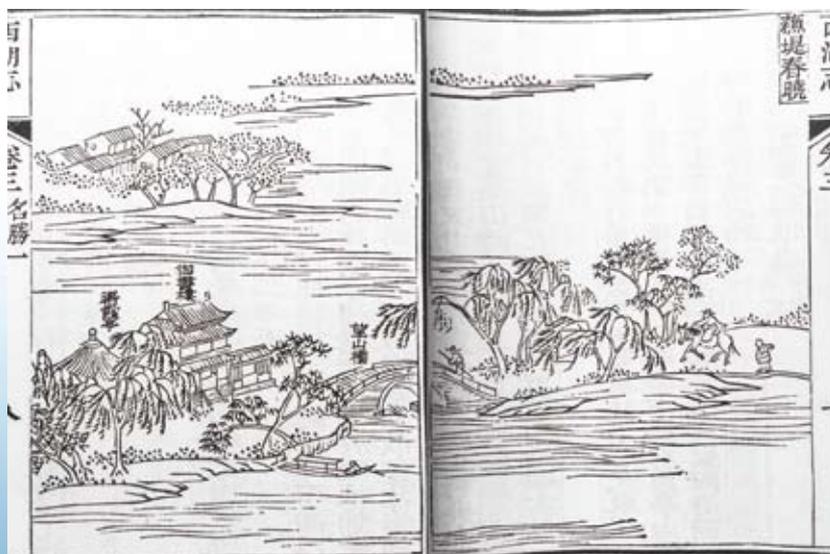


杭州市方志馆内的“把酒问青天”雕塑（张素卿 摄）

苏轼第二次到任杭州时，恰逢大旱，“饥疫并作”。他一面奏请朝廷免去三分之一的供米并给予赈济；一面在地方推行平仓制度，低价出售官米，有效缓解了灾情。此时，由于灾情引发的瘟疫流行也让百姓苦不堪言。苏轼捐献私帑，与官家合办了杭州历史上最早的民间救济医院“安乐坊”，收治贫苦病人。

为了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赈灾工作告一段落后，苏轼着手开展了一项围绕西湖、六井和内河的全方面水利工程。他带领地方官员仔细实地考察、反复讨论研究，于元祐五年（1090）农历四月二十九，向朝廷呈报《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从多角度、全方位地说明：西湖既是杭城百姓赖以生存的水源地，也是城市繁荣发展的基础。如果西湖湮废，百姓必然耗散，城市会渐渐衰败，只有保住西湖才能保住杭城。仅隔了5天，他又呈报《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提出了全面修浚、开发西湖的具体方案。

得到朝廷批准后，苏轼带领20余万名工人，用将近4个月的时间，开掘葑田25万余丈，将挖出的葑泥在西湖中筑起一道长堤，堤上造六桥、遍植桃柳，杭州百姓称为“苏公堤”。苏堤的出现不仅让南来北往的车马行人不再环湖而行，



苏堤春晓 [来源于（清）《西湖志》]

也为宽阔的西湖水面平添了一道贯通两岸的六桥风光 [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一说“束浦桥”）和跨虹桥，也叫“六吊桥”]。

为避免西湖再次湮塞，苏轼将湖面分派给百姓种菱，再在湖上建三座石塔，严禁在石塔以内水域种植菱藕，这些措施使得西湖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着清澈。后来，这三座石塔逐渐演变为西湖的代表性景观“三潭印月”。

此外，苏轼还主持修复六井，用瓦筒代替易腐的竹管，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在城内新建水井，使“西湖甘水，殆遍一城”。他又主持疏浚了盐桥河、茅山河，并设置水闸，既便利了城中水运，也减少了海潮对河道的影响。

从此，杭州城内建成了一个粗具规模的水利网络，西湖也变得更加明媚动人，如同仙境。苏轼常常到西湖巡游，观之不足、爱之有余，写下了大量描绘西湖美景的诗句。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一）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二）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为杭州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西湖治理及扬名天下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把杭州看作自己的故乡一般，曾说“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在杭期间，他为官清正廉洁，离任时以白居易为榜样，只带走了几块西湖的石头。元祐六年（1091），杭城老百姓含泪送别了这位好“市长”。为了纪念他，杭城家家都挂起苏轼的画像，饮食必祝，又在西湖边修建祠堂。1988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在苏堤南隅修建苏东坡纪念馆。

资料链接

苏轼与美食

苏轼爱美食，他发明的“东坡系列菜”可以组成一本菜谱：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酥、东坡豆腐、东坡酒……其中，东坡肉是最受大家欢迎的杭州名菜。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带领民工疏浚西湖，使杭州城变得更加明媚动人。老百姓们为了感谢这位好太守，过年时，抬着他最喜欢吃的猪肉和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极懂饮食艺术，他安排家人将肉块和酒放在一起烹煮，炖得红酥酥的，又再回赠给疏浚西湖的百姓。大家吃后赞不绝口，亲切地称这美味为“东坡肉”。从此，“东坡肉”的做法在民间流传开来。

“三评西湖十景”之“杨堤景行”（市园文局 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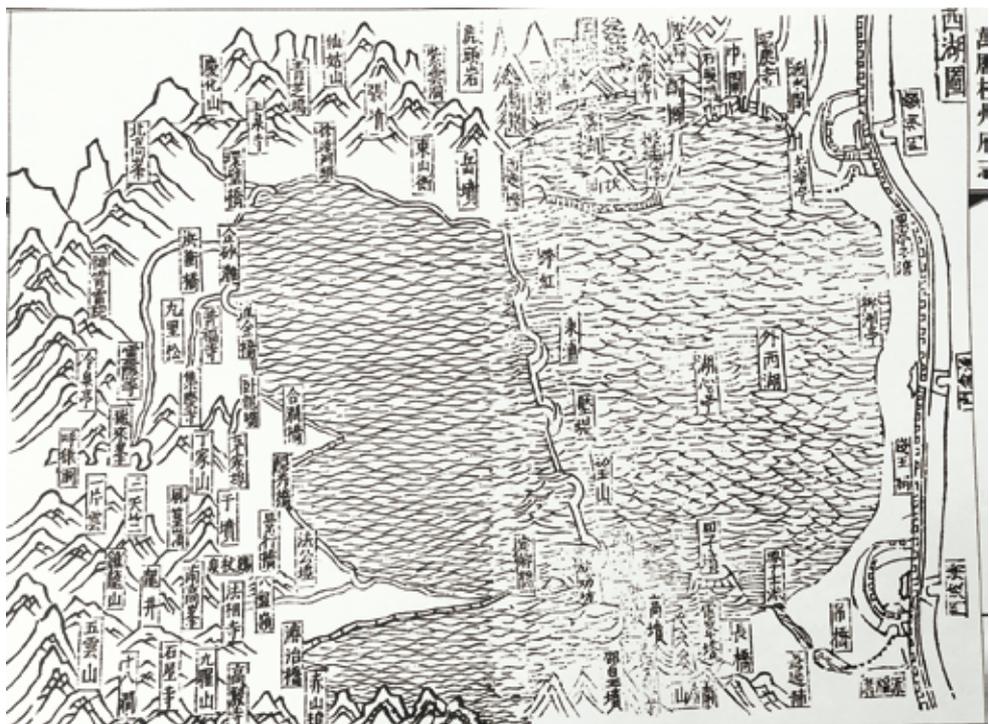
（五）杨孟瑛

杨孟瑛（生卒年不详），字温甫，四川酆都（今四川丰都县）人。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弘治十五年（1502）任杭州知府。（万历）《杭州府志》称他“当事敢任，多便民美政”。田汝成也在《西湖游览志余》里赞曰：“西湖开浚之绩，古今尤著者，白乐天、苏子瞻、杨温甫三公而已。”

元灭南宋后，蒙古贵族视西湖为“销金锅”，将南宋王朝的灭亡归罪于西湖，因此，对西湖“废而不治，兼政无纲纪，任民规窃，尽为桑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00多年。特别是元末开始，一些地方富豪编起竹篱，强占湖址，或种植菱藕，或占湖为田，或填湖筑屋，把“碧波万顷”的西湖分割得支离破碎。当时杭州流传着民谣：“十里湖光十里篱，编篱都是富豪家；待他享尽功名后，只见湖光不见篱。”明初，朝廷又将这些湖田登记造册，额定税额，收起田赋来，间接承认了强占的非法行为。因此，西湖湖面急剧缩小，周围的河流也几近干涸。后来有一些有识之士和地方官员曾做过疏浚的努力，但由于“浮议蜂起，有力者百计阻之”而收效甚微。直到杨孟瑛任杭州知府，西湖面貌才大有改观。

杨孟瑛到任杭州时，西湖已被侵占十之八九，严重淤塞湮废，湖西一带更是葑草蔓合，状如荒野，但他立意要排除万难，使西湖恢复唐宋旧观。他冲破





《西湖图》[来源于(万历)《杭州府志》]

势豪的重重阻挠，力排众议，通过御史车梁、佾事高江，上疏请求疏浚西湖。在奏疏中，他力陈疏浚的5条理由：西湖淤塞，一是有损杭州形胜；二是不利抵御奸寇；三是水脉不通，影响居民用水；四是运河枯涩，影响南北贸易；五是不利农田灌溉，影响百姓生计。最后，他表明自己不怕富豪们的反对，因为疏浚好西湖“所利于民者甚大”。同时，杨孟瑛也考虑得很周全，对占有湖田的一般农家，开湖后无田耕种，可以用其他肥沃之田如数补偿。但尽管如此，阻力依然重重，杨孟瑛的奏疏在5年后，才得到朝廷应允。

明正德三年（1508）农历二月，浚湖的旨意终于到了，由杨孟瑛主持的西湖疏浚工程正式动工。疏浚工程前后历时152天，用工670万工，清除田荡3480余亩，费银23600余两。他指挥民夫用西里湖挖掘的淤泥葑草加高苏堤至2丈，拓宽至5.3丈，两旁遍植杨柳，使苏堤恢复六桥烟柳旧观。又用挖出的葑泥，在西里湖修筑一条南北走向的长堤，后人称“杨公堤”。杨公堤上也筑六桥，分别命名为“环碧”“流金”“卧龙”“隐秀”“景行”“浚源”，人称“里六桥”。里六

桥与苏堤六桥相互辉映，时人合称“西湖十二桥”。

由于“清理包占田荡，为豪右所忌”，杨孟瑛在开湖之初便遭到诬告，说他“开浚无功，靡费官帑”。浚湖工程结束后，他被反对派弹劾，降为顺天府丞，离开了杭州，这也极大影响了他名声的流传。但历史铭记了这位好“市长”，清代《西湖志》中评说：“虽谤怨者多，而有明开浚之功以孟瑛为最。”田汝成也在《西湖游览志余》里感慨：“温甫兴久废无穷之利，而卒陨其名，嗣今谁复有任事之人哉？”在杭州百姓心中，他也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为“白苏以后贤太守”。

（六）李卫

李卫（1686—1738），字又玠，江苏铜山人。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捐资为员外郎，授兵部，任户部郎中。雍正三年（1725），升任巡抚浙江都察院右副都御使，雍四年加授总督，雍十年，再授刑部尚书、直隶总督。次年，返浙回任。

清朝前期，西湖淤塞严重。康熙、乾隆皇帝先后11次来到杭州，多次题咏西湖，并下旨浚治。雍正四年（1726），李卫升任浙江总督后，根据朝廷旨意，主持大规模疏浚西湖。前后历时2年，用银4.27万两，共开挖淤潜葑摊3122亩，治理面积占西湖总面积的36%。这次疏浚是清朝最大规模的西湖治理工程，对保护西湖的秀美风光、历史文化底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雍正九年（1731），李卫再次主持疏浚西湖的金沙港，并用挖出的泥沙筑成一道自苏堤东浦桥至金沙港的长堤，宽3丈余，长63丈，名为“金沙堤”。当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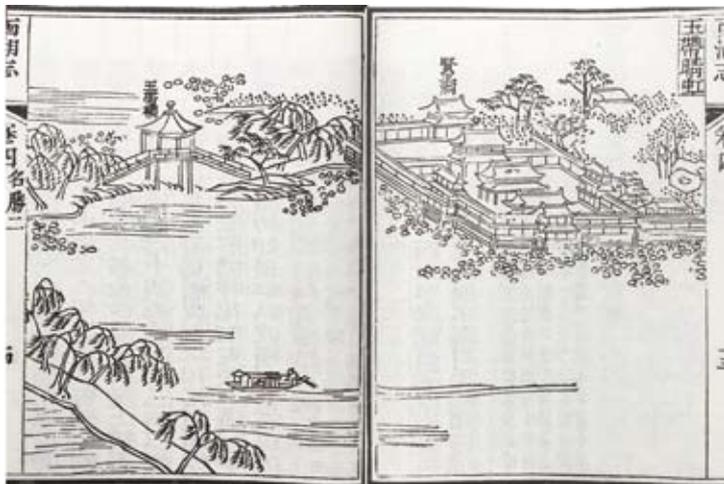
玉带桥（韩盛 摄）



金沙港溪流湍急，李卫又在堤上开挖3个桥洞用于疏导湖水，同时贯通了岳湖和西里湖。由于这座桥远望形如带环，故名为“玉带桥”。桥上建有重檐斜依的四角方亭，天气晴朗时，桥和亭倒映在碧波湖水里，俨然长虹亘空，形成了一道“玉带晴虹”的美景。

玉带晴虹

金沙水翠风荷苑，双峰雾矮睡眠松；
三环联结飘玉带，晴空无雨落彩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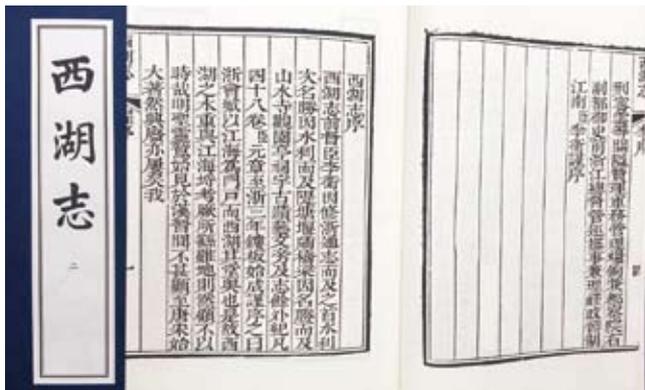
玉带晴虹 [来源于(清)《西湖志》]

在疏浚西湖的同时，李卫也注重名胜景点的建设，将西湖美景增加至“西湖十八景”^[1]。他在三潭印月筑曲桥朱栏，亘于池上，三折而入画轩，并建长廊、水轩、画楼，临水周围栽以芙蓉。在岳王庙前立“碧血丹心”坊，钱王祠前立功德坊，还在万松岭补种松树万株。又先后在玉泉筑洗心亭，在孤山筑西爽亭，在宝石山筑来凤亭。在丁家山辟石级，除榛莽，建八角亭，蕉石配景。后在金沙港跨虹桥旁建湖山神社，以祀湖山之神及十二花神；在其旁辟竹素园，建流觞亭、水月亭、聚景楼、观瀑轩、泉香宝等。

[1]西湖十八景，产生于清代。分别是湖山春社、功德崇坊、玉带晴虹、海霞西爽、梅林归鹤、鱼沼秋蓉、蓬池松舍、宝石凤亭、亭湾骑射、蕉石鸣琴、玉泉鱼跃、凤岭松涛、湖心平眺、吴山大观、天竺香市、云栖梵径、韬光观海、西溪探梅。其实有些景点已远离西湖，所以也有人称之为“杭州十八景”。

李卫也很重视水利建设，开浚上塘河并修筑苕溪险塘、运河堤塘和钱江堤塘等。

杭州西湖在宋、元以前并无专志，至明嘉靖年间（1522—1566），开始有了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及《西湖游览志余》。清雍正九年（1731），李卫主持编修《西湖志》，内容丰富、记述周详，无论是文学价值还是史料价值，都可以称为西湖文学之大典。当时参加编修《西湖志》的多是文学名士，像杭世骏、沈德潜、傅王露等人，他们谈到李卫时说：“卫公不甚识字，然遇文人甚敬。”李卫还主持修撰了《浙江通史》等。《清史稿》评价：“卫在浙江五年，莅政开敏，令行禁止”。



《西湖志》影印本（杭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

资料链接

李卫请求恢复江浙士人会试

清雍正四年（1726）秋，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江西正考官查嗣庭，因诗文获“大不敬”罪。除株连亲属、大加杀戮之外，朝廷还因此停止了整个浙江士人参加乡试、会试，并特别设了“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

当时李卫任浙江巡抚，他一面“文告严督”，一面上书称“浙江士子感恩悔过，士风丕变，乃命昭旧乡会试”。在他的努力下，雍正六年（1728）八月，朝

廷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次年，朝廷恢复了浙江的乡试取士。雍正八年（1730）殿试状元周澍、探花梁诗正皆是钱塘人，榜眼沈昌宇是秀水人，史称“三鼎甲皆取浙人，实旷恩也”。

（七）阮元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后历任少詹事、山东学政、浙江学政、浙江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以体仁阁大学士致仕，加太子太保，进太傅，卒谥文达。阮元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工隶书，于金石、考据、经学等造诣极深，人称“才通六艺”“一代经师”。

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任浙江学政，嘉庆五年（1800）升任浙江巡抚，在杭长达12年。他一生勤奋治学，著述和编纂颇多，其中以《经籍纂诂》和《十三经注疏》最为人称颂。他还主持重修《浙江通志》，编辑《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集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阮元之所以成为通儒，除了天赋，更得益于他后天的博闻强记。他不但搜集金石碑刻，留心名物考订，对天文算学也甚为关注，主持编



《西湖全图》局部（1910—1919年）（来源于《杭州古旧地图集》）

撰了历代天算家传记《畴人传》，在自著《擘经室集》中也有《匕图考》《考工记车制图解》等关于科技考古方面的代表作。

在学术和教育上，阮元倡导“实学”，以振兴文教、选拔人才为己任，并将教育理念一一付诸实践。嘉庆二年（1797），他在孤山南麓建了50所房子，组织文人学子编写古汉语训诂资料汇编——《经籍纂诂》。嘉庆六年，他将此处辟为书院，选拔两浙学子中好古嗜学者在此读书，取名“诂经精舍”。“精舍者，汉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勘新知也。”诂经精舍里讲学的大都是博学鸿儒，既有与朱筠并称“南王北朱”的王昶，也有被称为“天下奇才”的孙星衍。在创办的百余年间，诂经精舍可查考的学生有1000多人，清末藏书家丁丙、民主革命家章太炎都曾在此就读。

阮元一手兴文、一手施政。他第一次出任浙江巡抚时，距李卫大规模疏浚西湖已过去将近80年。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浚治，西湖里葑草满布、堤岸坍塌、水道淤塞，每遇雨天，杭城泛滥成灾。嘉庆九年（1804），阮元带头捐俸治理西湖，历时10个月完成。嘉庆十四年（1809），在他第二次任浙江巡抚期间，再次疏浚西湖，并用湖底淤泥堆积成小岛，既解决了淤泥的出路，又为游客停泊观光提供了好去处。他在《〈西泠怀古集〉序》中写道：“因北山至南山相距十里，湖面空旷，三潭以南遇风作，无停泊处，适浚湖，因仿坡公（苏轼）筑堤之法，积封为墩，为游人舣舟之所。郡人植芙蓉其上，呼为‘阮公墩’。”

阮公祠（张素卿 摄）



同时，他还组织重修岳飞庙、修缮孔庙、在西湖旁先后修建苏祠和白文公祠，保护和提升了西湖景观的文化内涵；又创办浙江最早的公立图书馆“灵隐书藏”，让贫困学子有书可读；设立普济堂、育婴堂，帮助无依无靠的老病贫民和弃婴；同时大力整顿地方吏治、平定海盗，为民众消除了多年积患。杭州百姓为了纪念阮公，于清光绪五年（1879）在吴山南麓建“阮公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市政府将阮公祠整修并对外开放，向世人展示阮公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资料链接

陈团扇

清乾隆六十年（1795）农历八月二十四，阮元奉旨调任浙江学政。嘉庆元年（1796），陈文述应杭州乡试，阮元以《仿宋画院制团扇》命题。陈文述诗最佳，末句云：“歌得合欢词一曲，想教留赠合欢人。”阮元大赞，批其旁云：“不知谁是合欢人”，并以团扇赠文述，人称其为“陈团扇”。

陈文述后来当了诂经精舍的老师。当时，杭州几乎没有人用团扇，因为带着不太方便。此事之后，团扇就开始流行了。

三、清官良吏

“执政以廉为本，为官以勤为先，做人以洁为要。”不论是外地来杭为官的，还是杭州籍到外地做官的，杭州的清官良吏代不乏人。他们信奉“心正则廉洁，身正则刚直，行正则威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人民公仆的道德楷模。

（一）周新

周新（？—1413），原名志新，字日新，广东南海人。因明成祖常称呼他为“新”，故以此为名。

明洪武年间，周新由太学生推荐，进入太学任教，后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他以为官清廉、善于断案而被人称道。明成祖即位后，周新调任监察御史。他敢于直言正谏，不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当朝权贵，只要行为有所不端，他即上书弹劾。权贵们心生惧怕，称周新为“冷面寒铁”。



杭州城隍周新像（张素卿 摄）

明永乐三年（1405），周新调任浙江按察使。任命消息传到浙江，老百姓高呼“我得生矣”。果然，周新一上任即为民办事，清除了衙门中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官差，又通过微服私访洞察民情，为民申冤理枉。一次，他微服私访时触怒了一位县官，被抓进监狱。他便借此机会向犯人们了解县中疾苦，还发现了一些冤假错案的蛛丝马迹。出狱后，周新亲自查问口供，逐案落实，平反了冤案、错案。他的雷厉风行和刚正不阿令贪官污吏们闻风丧胆，“周廉使”的美名也传遍天下。

永乐十年（1412），浙江遭水灾，损失惨重。一些地方官员因个人私利，隐报灾情。周新知道后，不畏豪门阻挠，据实将灾情上奏朝廷，并提出了减免租税方案。朝廷派人核实后，按照周新的方案赈济灾民，有效缓解了灾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周新不仅心系百姓，而且公正廉洁，疾恶如仇。当时的锦衣卫指挥纪纲备受明成祖宠信，倚势凌人、巧取豪夺。一次，纪纲派一名千户任浙江缉事，该千户在浙期间大肆收受贿赂、作威作福，被周新抓捕入狱。纪纲因嫉恨，利用职权之便在皇帝面前设计陷害周新，并在押送周新赴京城途中将他折磨得遍体鳞伤。尽管受尽屈辱，周新大节不夺，向明成祖据理力争：“陛下任命按察司执行公务，和都察院一样都是擒治奸恶，我奉命捉拿奸恶之人，为何判罪于我？”或许是皇帝过于亲信纪纲，或许是周新的说法触怒了他，周新最终被下令处死。临刑前，他高声道：“生当直臣，死当直鬼。”



吴山城隍庙 [来源于(清)《浙江通志》《西湖图》]

后来，明成祖似有悔意，他问侍臣：“周新是哪里人？”答：“南海人。”明成祖感触道：“岭外竟有这样的人，是我错杀了他。”明成祖下令追封周新为浙江城隍之神，护国庇民，为一方百姓记下善恶功过，并立庙于吴山，受世代敬仰。

（二）商辂

商辂（1414—1486），字弘载，杭州淳安芝山（今里商乡里商村）人。他在明英宗、代宗、宪宗三朝为官，历任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太子少保、谨身殿大学士等，时人称“我朝贤佐，商公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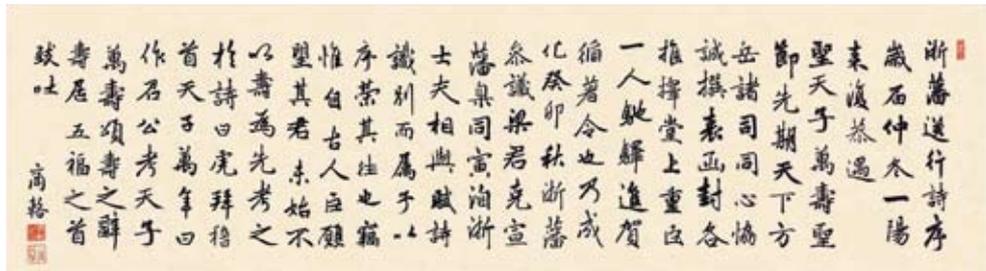
明宣德十年（1435），商辂参加乡试，中解元。次年再参加会试，却意外落榜。与大多数学子不同，他选择到国子监继续发奋、精进学业，潜心苦读近10年。正统十年（1445），商辂再次参加会试，中会元；后参加殿试，再中状元，成为明朝近300年科举史上第二个“三元及第”之人。由于明朝第一位三元及第者黄观后来被皇帝除名，因此商辂也是明朝唯一被承认的“三元郎”。

随后，商辂入朝任翰林院修撰，于成化年间主持修纂《宋元通鉴纲目》，兼任东阁、文渊阁大学士，参与国家机要事务。他为官18年，刚正不阿，敢于直言善谏，认真辅佐君主，被人誉为“贤佐”，民间也尊他为“三元宰相”。在成化年间，仁寿太后的庄户曾与百姓发生田地之争，明宪宗极为孝顺母亲，想把这些百姓迁往塞外。商辂劝谏：“天下都是皇上的，何必还要建皇庄与百姓争田呢？”一语惊醒，宪宗马上明白过来，打消了此念头。



科甲第一家（商通 供稿）

成化十三年（1477），为了监控朝堂内外、稳固统治，宪宗设立了西厂，由贴身小太监汪直负责，并直接向皇帝本人汇报。汪直等人却滥用职权谋私利，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商辂与大臣们联名上疏揭露西厂十一大罪，并痛陈其危害：“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宪宗不以为然，生气地说：“用一个太监而已，怎么就危及天下了？”他甚至传旨严厉责备联名上疏的主使者。朝阁大臣们仍据理力争、犯颜直谏。看到大家一心为国，商辂深受感动：“诸公如此尽忠为国，我还有什



《浙藩送行诗序》手迹（商通 供稿）

么担忧的？”终于，在朝臣们的努力下，宪宗不得不罢免了汪直在西厂的职务。

可是私下里，宪宗依然对汪直信任有加。御史戴晋深知皇帝离不开西厂，便上疏鼓吹汪直有功，同时汪直又诬陷商辂曾收受贿赂，宪宗于当年六月恢复汪直职务。商辂知道难以改变皇帝心意，极度失望之下竭力请辞。

他在家安居期间，同僚刘吉曾前往看望，见他儿孙满堂，尽享天伦，感慨道：“我与你共事多年，从未见你妄杀一人，如今子孙兴旺，便是上天给的福报。”商辂答：“我只是不敢让朝廷妄杀一人而已。”

（三）毛际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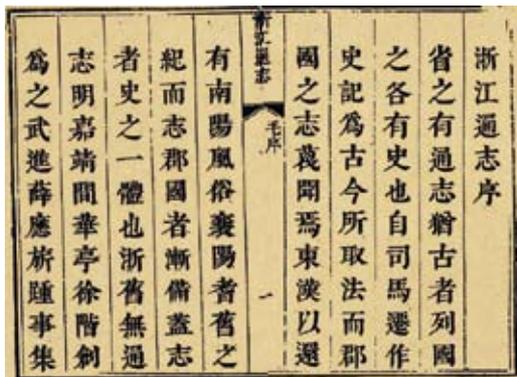
毛际可（1633—1708），字会侯，号鹤舫，遂安十一都（今杭州淳安百亩畈乡）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后被派往河南彰德府（今河南省安阳市）担任推官，再调任陕西城固、河南祥符任知县。康熙二十六年（1687），毛际可在《重建遂安县大成殿碑记》中阐明自己的读书志向：“窃唯学者，所以学为人子，学为人臣。”即读书出仕，做一个忠君爱民的良臣，是他的理想，也是他一直在身体力行努力实践的。

毛际可任河南彰德府推官初，负责刑名狱讼相关事宜。有一名防将倚仗家族权势横行乡里，不仅掠夺财物，还强抢民女，而官府因惧怕豪门势力，都不敢处治他。毛际可到任后，通过调查取证掌握了他犯法的事实。哪知这位骄横的防将丝毫不把毛际可放在眼里，大言不惭：“尔书生敢奈何我？”但毛际可并不是惧怕豪门权势之人，他当庭传唤人证物证，将防将驳斥得无词狡辩，并列出行罪10多条，判处防将死刑弃市。毛际可雷厉风行的作风一时震慑住了社会上的邪气，一些已判决的冤案经毛际可复审，也得到平反。



但在清朝初年，朝廷对《安序堂文钞》(部分)

汉族官员的任用还有所保留，毛际可从政20多年，只是七品知县。45岁那年，他辞官回乡，闭门著书，作品颇丰，最具代表性的有《春秋三传考异》12卷、《松皋文集》10卷、《安序堂文钞》30卷等。此外，他还在家乡修建了问字亭，以启后学。远近慕名而来的求学者络绎不绝。



《浙江通志序》(部分)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毛际可应浙江巡抚王国安邀请，任《两浙通志》总裁，并撰写序言。此书稿于当年底完成，虽未立即刊印行世，但它作为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浙江通志》的底本，凝结了毛际可等一代名儒的心血。后来雍正年间出版的《浙江通志》将毛际可写的《浙江通志序》收录其中，赖以流传。次年，毛际可再次应严州(今杭州市桐庐县、淳安县和建德市等地)知府任凤厚的邀请，担任《严州府志》总编，也因兵乱，直到乾隆年间才补充刻印成书。

毛际可不仅为官公正廉洁、文学卓异闻名，对地方志的编撰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当之无愧的东南大文豪，也是《浙江通志》没有署名的编撰人之一。他还擅古诗词、工书画，与同时的毛奇龄、毛先舒一起被称为“浙中三毛，文中三豪”。

(四) 夏同善

夏同善(1831—1880)，字舜乐，杭州人。清咸丰六年(1856)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编修、右庶子(负责记注、撰文等)、日讲起居注官等职。

夏同善酷爱读书，少时就遍读外祖父家中所藏典籍。时人赞誉他文章超群，“在曾(曾国藩)左(左宗棠)之上”，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他现存于世的遗著有与长子夏庚复合刊的《俟斋诗草》和《夏子松先生函牍》(手稿存于浙江图书馆)等。他的才华也受到慈禧太后的欣赏，清光绪元年(1875)，夏同善与翁同龢等被任命为“毓庆宫行走”，为光绪帝授读，因而他也有“光绪帝师”之称。

夏同善深知帝师的责任之重，为官刚正不阿，闻过即谏。光绪帝即位初，畿辅一带发生旱灾，夏同善奏请凿井溉田以缓解灾情；之后山西、河南饥荒严重，他再次奏请移拨海防关税经费赈济灾民。光绪四年（1878），夏同善外放江苏学政，临行前向皇上谏言“捐输妨政”，力陈捐官对国家的危害，不仅败坏吏治，还产生了一大批腐朽昏庸的官吏和贪污腐败现象，更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光绪帝采纳了他的忠告，一时天下欣欣望治。次年，黄河下游水患，夏同善提出了“浚海口、直河湾、通支河”三大有效治理措施；之后在苏州，他严厉查禁鸦片；在江阴，他捐俸修治江阴城河；在君山，他劝导百姓植树造林，植松5万余棵，直到今天，当地百姓仍将君山称为“夏公山”。

夏同善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会同28名官员联名上书，要求刑部重审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葛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获慈禧太后批准。两年后，杨葛冤案真相大白，天下皆知。由于夏同善是翻案的关键人物，官职较高且影响较大，一时名震江南。

为官20多年里，夏同善洁身自好，清正廉洁。他常常将自己俸禄捐献给灾民，自家既无豪宅，也无藏珍。清光绪六年（1880），夏同善去世，光绪帝“闻之遽泣”，赐谥号文敬，以表彰他一生的功绩。



夏同善纪念馆（来源于杭州廉政网）

四、家国英雄

(一) 岳飞

岳飞（1103—1142）是南宋著名的抗金英雄。宋崇宁二年（1103），岳飞出身于河南汤阴县岳家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境清贫。据史料记载，岳飞出生时，有大禽若鹄，自东南来，飞鸣于寝室之上，故他的父母给他取名飞，字鹏举。^[1]岳飞自幼体格强健，喜欢读《左氏春秋》和孙吴兵法，以“武圣”关羽为榜样。由于家里贫穷，无法供岳飞上学，在他11岁时，外祖父姚大翁请来了闻名全县的刀枪手陈广，教岳飞练习武艺。岳飞经过刻苦磨炼，只用了两年的时间便精通刀枪，成了“一县无敌”的枪手。后来，岳飞又拜周同^[2]为师。周同是射箭高手，他也是将来对岳飞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位老师。



岳飞画像

北宋宣和四年（1122），河北真定府招募“敢战士”以御辽，未满20岁的岳飞应募，经过选拔，被任命为“敢战士”中的一名分队长，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也就是在这一年，岳飞的父亲病故，他离开了军队，赶回汤阴为父亲守孝。宣和六年（1124），河北等路发生水灾，岳家生计艰难，岳飞为了谋生，参加了河东路平定军，充当骑兵，以后晋升为偏校。靖康元年（1126），两路金军在攻破太原后会合，两次南下围困大宋首都开封。从平定军突围回到家乡的岳飞目睹了金人入侵后，人民惨遭杀戮，心中愤慨，又想投军，刚好那时武翼大夫刘浩在相州城里招募义士，收编溃兵。但岳飞又担忧家中年迈的母亲和力弱的妻儿在兵乱中难保安全。岳飞的母亲姚氏是位深明大义的妇女，积极勉励岳飞再次从戎报国。岳飞牢记母亲教诲，别过亲人后，

[1]（宋）岳珂《金佖粹编》卷四《鄂王行实编年》：“（崇宁二年）二月十五日，先臣（岳飞）生，名飞，字鹏举。……及生先臣之夕，有大禽若鹄，自东南来，飞鸣于寝室之上。先臣（岳）和异之，因名焉。”

[2]周同又作周侗（1040—1119），字光祖，华州潼关人，人称“陕西大侠铁臂膀周侗”。北宋末年之武术大师，以善于箭术闻名。南宋名将岳飞之师。

参加了抗金部队。

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军从已被洗劫一空的汴京撤出，满载着金帛、珍宝北上，并且俘虏了徽宗、钦宗二帝。北宋就此灭亡，这也是史称的“靖康之耻”。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南宋王朝建立。赵构采取了黄潜善等人避战南迁的政策，岳飞不顾自己官卑职低，向宋高宗赵构上疏千言^[1]，希望高宗率军北上，收复中原。然而他的耿耿丹心只换得“小臣越职，非所宜言”八字批语，并被革去军职，逐出了军营。不久，他随当时的抗金名将宗泽留守开封。岳飞在汜水关一带击败金军，凯旋后被宗泽任命为统领，不久又提升为统制。建炎三年（1129），金兀术占领长江和县，打算渡江南进，岳飞率军抵抗，苦战无援，建康府失守。之后与金人作战，岳飞每战皆胜，并于建炎四年（1130）在清水亭、牛头山等地大败金兀术，收复了建康府。岳飞率领的岳家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全军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抢掠。”打仗时，全军士气高涨，所向披靡。所以当时在金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就在岳家军频频传出捷报的时候，宋高宗赵构却实行投降政策。他进一步重用秦桧，并令其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岳王庙中的这副对联，为这段历史留下了公正的注解（倪晴 摄）

[1] 《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又《金佖粹编》卷一〇《南京上皇帝书略》载：“陛下已登大宝，黎元有归，社稷有主，已足以伐虜人之谋；而勤王御营之师日集，兵势渐盛。彼方谓吾素弱，未必能敌，正宜乘其怠而击之。而李纲、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复故疆，迎还二圣，奉车驾日益南，又令长安、维扬、襄阳准备巡幸。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恐不足以系中原之望，虽使将帅之臣戮力于外，终亡成功。为今之计，莫若请车驾还京，罢三州巡幸之诏，乘二圣蒙尘未久，虜穴未固之际，亲帅六军，迤邐北渡。则天威所临，将帅一心，士卒作气，中原之地指期可复。”



岳家军将士图

与金接通关系，遭到了岳飞坚决反对。他在临安（今杭州）朝见高宗时说：“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1]但宋高宗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廿七日，秦桧以宰相身份代表宋高宗跪在金使脚下，答应取消宋国号，做金的藩属，并每年纳贡。绍兴十年（1140），金军兵临顺昌（今安徽阜阳）城下，高宗怕顺昌有失，派岳飞发兵救援。岳飞率领已整训三年的岳家军一步步挺进中原，逼得金兀术放弃开封府，准备渡河北遁。正当岳飞在抗金作战中取得主动，要与部下“直捣黄龙，与诸君通饮尔”^[2]时，高宗在秦桧等人的谗言下，一日之中降12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诏旨措辞严厉：命大军即刻班师，岳飞本人去临安朝见。岳飞接到如此荒唐的命令，痛心疾首：“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岳飞回到杭州后，即被免去了兵权。

虽然被免去了兵权，可岳飞仍坚持抗金，反对议和，成为赵构与金议和的障碍。金兀术在给秦桧的书信中说“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3]于是秦桧让諫议大夫万俟卨弹劾岳飞。许多文官武将冒死为岳飞辩解。大将韩世忠向秦桧要证据，秦桧回答说：“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质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廿九日（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下达命令赐死岳

[1] 《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2] 《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3] （宋）岳珂《金佗粹编》卷二〇《吁天辨诬通叙》：查籥尝谓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兀术遗桧书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桧于是杀先臣以为信。

飞，岳飞在大理寺狱中被杀害，时年39岁。岳飞被害前，他在供状上写下了八个字的绝笔：“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岳飞被害以后，狱卒隗顺冒着生命危险，将岳飞的遗体背出杭州城，埋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旁。为了日后辨识，隗顺又把岳飞身上佩带过的玉环系在其遗体腰下，还在坟前栽了两棵橘树。隗顺死前，又将埋葬岳飞的地点告诉其儿子。岳飞沉冤21年后，宋孝宗赵昚即位，为顺应民意，特降旨为岳飞平反昭雪，并张贴文告，悬赏寻求岳飞遗体。隗顺的儿子就把埋葬岳飞的地点告诉了朝廷。朝廷以隆重的礼仪把岳飞的遗骸迁葬到杭州栖霞岭下，并将西湖显明寺改为祭祀岳飞的祠宇。以后历代修缮，成为现在的岳坟和岳王庙。1961年，岳飞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于谦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开国皇帝朱元璋驾崩，也就是在这一年，救明朝于水火之中的民族英雄于谦诞生在杭州府钱塘县太平坊南新街的于氏祖居。于谦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6岁时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有一天，他与叔叔一起去祖坟祭扫，路过凤凰台，他的叔叔随口说：“今日同上凤凰台。”于谦马上应声道：“他年独占麒麟阁。”在他7岁的时候，有个僧人惊奇于他的相貌，说：“他日救时宰相也。”少年时期的于谦曾就读惠安寺^[1]，15岁时考取了钱塘县儒学生员，来到吴山三茅观潜心求学。

明永乐十二年（1414），17岁的于谦参加了第一次乡试，以落榜告终。6年后，于谦再次在浙江贡院参加了乡试，顺利通过。永乐十九年（1421），大明王朝迁都北京，于谦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向往已久的



于谦故居内的于氏古井（倪晴 摄）

[1] 惠安寺：今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十三湾巷。

京城，走进了会试^[1]的考场。于谦会试中试，没有辜负他10多年的寒窗苦读。农历三月初一，于谦参加殿试，名列三甲第九十二名。

永乐二十一年（1423），于谦奉命出使湖广，从此步入了仕途生涯。于谦此次出使的任务是安抚少数民族，兼犒劳军官。他赏罚分明，申明朝廷大义，众心诚服。宣德二年（1427），于谦奉敕以监察御史^[2]之职巡按江西两年有余，他的足迹踏遍了江西的每一寸土地，清理了大量积案。他澄清吏治，革除扰民之举，被江西老百姓称为“于青天”。

宣德五年（1430）是明朝的灾荒之年，水灾、旱灾、蝗灾频发，饿殍遍地，朝廷税粮收入锐减，国库空虚。明宣宗朱瞻基将于谦升为正三品的兵部右侍郎，委以巡抚^[3]河南、山西之重任。于谦一走就是18年，在这18年时间里，他屡屡上书为民请命。当时内阁三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佐政，政清治正，凡是于谦所奏，都一一允准。后宦官王振把持朝政，于谦遭到记恨和打击。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因遭诬陷，被关进了都察院，被判了极刑。后在河南、山西两省官民和周、晋诸王的请求下，于谦出狱，降为大理寺少卿。后迫于民愤，又恢复其河南、山西两省巡抚之职。正统十三年（1448）又升为兵部左侍郎，协理军务。

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族瓦剌部落发兵南下，发动了对明朝的战争，这也就是史称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唆使下，不顾群臣劝阻，亲率大军出征。由于准备不足，加上操纵朝政的太监王振的错误指



明军和瓦剌军交战图

[1] 会试：明朝的会试有3场，每场3天，考生在全封闭的考场，承受9天的饥寒和寂寞之苦，所以历来有“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之说。

[2] 监察御史：监其品秩不高，为正七品，但权限很大，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

[3] 巡抚：亦名“抚台”，乃“巡行天下，抚军济民”之意。



于谦祠（倪晴 摄）



明孝宗对于谦的祭文（来源于《于公祠墓录》卷二）

挥，结果在土木堡^[1]大败，全军覆没，英宗也在这场战役中被瓦剌军俘虏。消息传到京城，朝野上下一片惊慌，有朝臣主张迁都。于谦临难受命为兵部尚书，主持军务，坚决驳斥迁都派，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乎？”他扶郕王朱祁钰（代宗）即位，追英宗为太上皇，以定民心，并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下令坚决抗战，不准议和。蒙古军见要挟明廷不成，遂率大军进犯北京。于谦率兵22万人，精心部署，列阵九门，誓死抗敌。于谦发布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经过五日激战，击退了瓦剌部的进攻，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不久英宗也被释放。

景泰元年（1450），回到北京的英宗趁代宗病重之际，纠集旧臣冲进东华门，登奉天殿行即位典礼，复辟成功，史称“夺门之变”。英宗复位后，就清除异己，把于谦等大臣打入牢狱，并于天顺元年（1457）农历二月十六日将其处死。于谦遗体先由都督同知陈逵埋葬于北京西郊，次年归葬故乡杭州西湖三台山。成化元年（1465），宪宗即位，为于谦平反冤屈，恢复其官位名誉，改杭州故居为“怜忠祠”，并下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唯公道之独特，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万历十八年（1590）改谥忠肃。

[1] 土木堡：位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的一个城堡。土木堡坐落于居庸关至大同长城一线的内侧，是长城防御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张煌言

明清易代，写下了中国一页不忍卒读的历史，也写下了晚明一页辉煌绚丽的诗史，在这页历史和诗史上都浓墨重彩地写着一个光耀千古的名字——张煌言。



张煌言画像

张煌言（1620—1664），号苍水，字玄箸，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出身于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

一个官僚家庭。张煌言从小胸怀大

志，特别喜欢讨论兵法之道。16岁时参加县试，并考察骑射，以第一名的成绩中秀才。崇祯十五年（1642）考中举人。当时，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烽火烧遍全国，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起义军攻克北京城，欲与崇祯皇帝谈判，但最终谈判破裂，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清军在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指引下入关，击溃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北京，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明朝宗室及文武大臣大多逃到南方，在南京的明朝大臣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这就是历史上的南明。

清顺治二年（明弘光二年，1645），清军大举南下，攻陷南京，福王被俘。张煌言挺身而出，投笔从戎，与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一起率领浙东起义军抗清，开始了长达19年的抗清生涯。他先到天台请鲁王朱以海到绍兴监国，建立了南明鲁王政权，先后任翰林院修撰^[1]和兵科给事中^[2]等职。此时，礼部尚书黄道周和郑芝龙等福建地方势力奉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另一个小朝廷，建号“隆武”，历史上出现了鲁王和唐王两个南明政权。这就决定了抗清力量无法统一。

清顺治三年（明隆武二年，1646），清军乘虚突破钱塘江，绍兴、杭州、义乌、金华相继失守，鲁王被迫逃到舟山。张煌言与家人诀别后，随鲁王来到舟

[1] 翰林院修撰：官名。唐代史馆有修撰，掌修国史；宋实录院有修撰官，掌修实录；辽国史院与元、明、清翰林院皆有修撰官，明、清通常授予一甲第一名进士。

[2] 兵科给事中：明清两代参与军事监察的职官名称，为皇帝的近侍职官之一。

山。与张名振^[1]一起在舟山组织义军抗清，并一度联合其他义军对清军发动进攻，焚上虞、破新昌，逐渐成为浙东人民抗清的一面旗帜。

清顺治十五年（明永历十二年，1658），永历帝派使臣到达福建厦门，封张煌言为东阁大学士^[2]兼兵部尚书，负责浙江军事。次年，郑成功率大军联合张煌言等各部抗清军队发动反攻。张煌言抵达芜湖，将义军兵分四路^[3]，分道攻城占地，但对百姓秋毫无犯。地方官员也纷纷投降，短短旬日之间，收复了4府、3州、24县，一时江淮半壁为之震动。可是，这一大好形势，却因郑成功攻打南京失利而急转直下，最终全军溃散，张煌言也不得不退返到浙东海岛。在艰难的处境面前，有人建议他退往台湾，依附郑经^[4]。张煌言认为，与其“偷生朝露，宁以一死立信”，坚持不肯撤退，继续抗清。当时浙江总督赵廷臣通过多种渠道，一再以帛书向张煌言招降，而张煌言也两次以坚贞的气节、铿锵的言辞拒绝了他的诱惑。

清康熙元年（1662），鲁王在金门病故，张煌言见大势已去，在康熙三年（1664）六月，遣散余部，自己隐居到南田的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南）。同年七月，张煌言被清军抓捕。他先被押解到宁波。宁波提督张杰设宴招待张煌言，想诱降他，张煌言毅然拒绝：“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到此，速死而已。”接着，张煌言又被押往杭州。在途中，张煌言壮志豪情地写下了《入武林》一诗以明志：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

到达杭州后，赵廷臣再次劝降张煌言，并保证还能让他做兵部尚书，又遭

[1] 张名振：（1601—1655），字侯服，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原任台州石浦营参将。南京失陷后，与张煌言等拥鲁王富平将军，封定西侯监国。

[2] 东阁大学士：明朝、清朝内阁大学士之一，正一品衔。掌管奉陈规海，点检题奏，票拟批答等职位。

[3] 兵分四路：东出溧阳，西镇池州，北取和州，南入宁国。

[4] 郑经：（1643—1681），一名郑锦，字贤之、元之，号式天，昵称“锦舍”，福建南安人。郑成功长子。台湾明郑时期的统治者，袭封其父延平郡王的爵位。



杭州南屏山麓张苍水墓（倪晴 摄）

到张煌言严词拒绝。康熙三年（1664）九月，张煌言被带到杭州弼教坊^[1]刑场，面对刽子手，他丝毫没有畏惧。临刑前，他遥望凤凰诸山，赞道：“好山色！”又口占绝命诗一首，命书吏抄录：

我今适五九，复逢九月七。
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张煌言就义后，宁波同乡万斯大等人与和尚超直替其收尸，并由张煌言外甥朱湘玉到总督衙门买回首级殡敛，并遵照他在《入武林》中所表示的愿望，埋葬于杭州南屏山麓荔枝峰下。

张煌言的忠贞爱国、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了后世的敬仰。100多年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命录前朝“殉节诸臣”，并加以褒谥和祭祀。清廷对张煌言加谥“忠烈”，且将其牌位入“祀忠义祠”，得享定期供祭。后人将张煌言与岳飞、于谦并称为“西湖三杰”，为淡妆浓抹的西湖平添了一抹金戈铁马之色。

[1] 弼教坊：现为区片名，在杭州市平海路与中山中路交接处南侧一带。今平海路自浣纱路至中山中路段，宋时称“官巷”。

(四) 葛云飞

葛云飞(1789—1841),字鹏起,又字凌召,号雨田,清代山阴天乐乡(今属杭州市萧山区)人。葛云飞出身于军人家庭,从小在父亲的培育下读书习武,学得一手好射技。年少时,葛云飞曾去杭州西湖游玩,拜祭了岳飞墓。他对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这两句名言尤其赞赏。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葛云飞中武举人。清道光三年(1823)年,中武进士。道光四年(1824),葛云飞当上了守备,先后在浙江宁波、黄岩、温州、乍浦、瑞安、定海和福建的烽火门等地水师营任职,因缉捕“海盗”屡建军功,当上了总兵。道光十八年(1838),葛云飞代理定海镇总兵,不久后正式任命。



葛云飞画像

清道光二十年(1840)7月,英国舰队进犯舟山,侵占定海,抢劫财物,残杀百姓。在国家危难的关头,葛云飞提出《灭夷十二策》,积极布置防御。道光二十一年(1841)9月26日,英将璞鼎查率舰29艘、兵2万余名再犯定海。葛云飞同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领兵分守土城、竹山门与晓峰岭,奋力迎敌。葛云飞部驻守前沿土城,担任正面防御,兼协同指挥三军作战。他身先士



位于萧山区的葛云飞墓

卒,日夜坚守前沿阵地,亲手点燃大炮,击断英军大船船桅,打响了定海保卫战的第一炮。经过六天六夜激战,打退了英军一次次进攻,但终因弹尽粮绝,失去外援,伤亡惨重。王锡朋在鏖战中壮烈牺牲,郑国鸿身受重伤,以身殉国。葛云飞腹背受敌,

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他率领200名士兵持刀转战竹山门，呼喊杀入敌阵，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毙敌多人。他也因此身受40多处创伤，坠崖身亡。

当地百姓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英军入城的当天冒死寻找葛云飞遗体，并连夜运出定海，后移葬他的故乡。现萧山区进化镇山头埠村建有葛云飞故居宫保第和葛氏宗祠，这是英雄出生、成长和接受教育的地方，也是缅怀先烈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这两处建筑均建于清代，分别为典型的江南民居和宗祠建筑。

五、革命志士

（一）章太炎

在杭州西湖边的南屏山麓张煌言墓旁，埋葬着一位有革命业绩的大学问家——章太炎。章太炎生前非常敬仰张煌言，表示“生不同辰，死当邻穴”。后人遵循先生遗愿，于1956年4月1日从苏州移柩杭州南屏山荔枝峰，4月3日公祭安葬。

清同治七年（1868）农历十一月三十日，章太炎出身于余杭仓前镇一个书香世家，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仰慕顾绛（顾炎武^[1]）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太炎”是他的号。清光绪十六年（1890），章太炎的父亲去世，按照父亲的遗训，章太炎来到杭州诂经精舍，师从朴学^[2]大师俞樾。章太炎受其影响，埋头研究学问，8年的学习时间，章太炎收获颇大，撰写了《诂经精舍课艺》38篇、《膏兰室札记》4卷（现存3卷）以及《春秋左传读》。



在日本为革命事业奔波时期的章太炎

[1]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绛，乳名藩汉，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2] 朴学：指古代质朴之学，后泛指儒学经学。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民族危机时刻，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投身维新救国行列，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来到上海，加入了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次年，应梁启超邀，主《时务报》笔政，宣传维新变法。后来，章太炎与康有为提出的孔子“托古改制”说发生了分歧，继而离开上海返杭。

回到杭州后，章太炎与宋恕、陈虬等人发起成立了“兴浙会”，创办了杭州第一份综合性新闻报刊《经世报》，以报道国内外大事与介绍新学术、新知识为主要内容，并译载英、法、日等外国报刊上的文章。光绪二十四年（1898），章太炎应清代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1]的邀请，来到武昌，拟主持《正学报》，想借助张之洞的实力推行维新变法。因他不赞成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流露反清情绪而被张之洞下了逐客令，离开了武昌。不久，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遭到清朝政府通缉，举家南迁至台湾。次年夏天，章太炎东渡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回国后，他对维新以来的经历作反思，结集出版《馗书》^[2]。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国会^[3]上，章太炎激烈反对唐才常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宗旨，当场宣布脱会，剪下辫子，穿上西装，与坚持维新改良的人士分道扬镳。次年，章太炎赴苏州东吴大学任教，经过杭州时，他特地去看望了自己的老师俞樾，写下《谢本师》，表达了其义无反顾的革命决心：

余十六七岁始治经术，稍长，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学，未尝问文辞诗赋。先生为人岂弟，不好声色，而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顷之，以事游台湾。台湾则既隶日本，归，复谒先生，先生遂曰：“闻而〔尔〕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

[1]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是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

[2] 馗书：（馗音qiú，逼迫）是章太炎的第一部自选的学术论文集，书名的用意是“速鞠迫言”（穷蹙的环境下迫使他非说不可的话）。

[3] 中国国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组织的政治团体。由维新志士唐才常等人组织，宗旨是：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决定不认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请光绪皇帝复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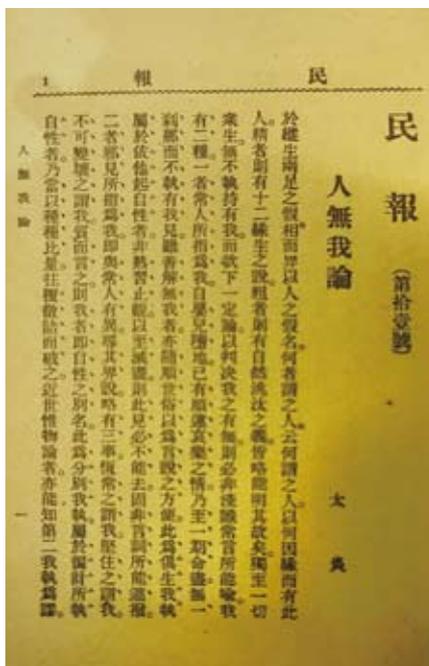
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盖先生与人交，辞气凌厉，未有如此甚者，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而以唇舌卫扞之？将以尝仕索虏，食其凛禄耶？昔戴君与全绍衣并污伪命，先生亦授职为伪编修。非有土子民之吏，不为谋主，与全、戴同。何恩于虏，而恳恳蔽遮其恶？如先生之隶通故训，不改全、戴所操以诲承学，虽扬雄、孔颖达，何以加焉。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章太炎再次遭到追捕，流亡日本。在日本，他与孙中山先生握手订交，一起商讨推翻清朝政府后中国的土地、赋税及革命成功后的政制建都等问题。同年四月，章太炎潜回故里，重新修订《尴书》。次年，康有为鼓吹“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出康有为所谓的“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实际上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他又连续在《苏报》发表文章，猛烈抨击清政府。清廷与租界当局勾结，逮捕了章太炎，他被判刑3年，造成震动中外的“苏报案”。

光绪三十二年（1906），章太炎出狱，孙中山派专使到上海迎他去日本。同年七月，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总编辑。后与孙中山、黄兴因《民报》不合而专事讲学和著述，写成《小学问答》《新方言》《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



章太炎著《文始》封面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人无我论》

等专著；研究汉字古音，定出古韵23部、古声21部。

清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胜利，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主张解散同盟会。民国元年（1912），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聘任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南北议和^[1]告成，袁世凯上台，章太炎把统一共和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他被受聘为高级顾问，又任东三省筹边使。后来章太炎很快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从长春回到上海，辞去职务，与袁世凯决裂，参加反袁斗争。民国3年1月在北京大闹总统府，被软禁，至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民国6年（1917），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并任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章太炎任军政府秘书长，与孙中山一起维护约法和民主共和制的方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严词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被定为“学阀”，遭国民党政府通缉。于是退居书斋，卖文鬻字，自称“中华民国遗民”。“九一八”事变后，章太炎以强烈的爱国热情支持抗日，他不顾老病之躯，北上会见张学良，共商抗日大计，并号召青年共赴国难。

民国23年（1934），章太炎迁居苏州，民国25年（1936）病逝。先生一生讲学、著书、革命，他的学生鲁迅是这样评价老师的：“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二）秋瑾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出现了很多杰出的女革命家，她们是中国妇女的先驱。在杭州西泠桥畔，就屹立着这么一位伟大的女革命家——秋瑾的塑像。

清光绪元年（1875）农历十月十一，秋瑾出生于福建省云霄县城紫阳书院，初名秋闺瑾，字璿（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由于出身于官宦家庭，家境富裕，秋瑾从小就不同于一般的女孩，她喜习武，善骑射，能诗善文，小小年纪就写下了“古今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

[1] 南北议和：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呈土崩瓦解的状态，截至11月末，清政府所控区域只有东三省、直隶、河南，清朝政权已是名存实亡。清政府无奈派袁世凯同南方革命党人和谈。

侯”这样有胆识有抱负的诗句。

光绪二十年（1894），19岁的秋瑾随父亲来到湖南。一年后，父亲将秋瑾许配给了湘潭义源当铺老板王黻臣的小儿子王廷钧。光绪二十二年，两人奉父母之命完婚，婚后，秋瑾随丈夫到北京做官。当时，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受康有为、梁启超等倡导的变法思想影响，秋瑾痛感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一颗追求民主的种子就此埋下。

终于，在光绪三十年（1904），秋瑾不顾丈夫的反对，毅然脱离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求学期间，她广



秋瑾像



秋瑾与共爱会会员合影（后排左二为秋瑾）

交留日的志士仁人，如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何香凝等，与一起留日的妇女组织了爱国团体共爱会，倡导振兴女学、恢复女权，号召妇女承担女国民之责任，并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口号。之后又创办了《白话报》，宣传革命思想。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瑾在回国筹措学费期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了蔡元培、陶成章等组织的光复会。同年，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秋瑾随即加入，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



西湖孤山西麓秋瑾雕塑（倪晴 摄）

光绪三十一年（1905）农历十二月，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秋瑾愤而回国，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活动。她先来到吴兴县（今湖州）南浔镇浔溪女校担任教员，与徐自华相识，并结为挚友。之后在徐自华的资助下创办了《中国女报》。她撰文提倡女权，宣传革命，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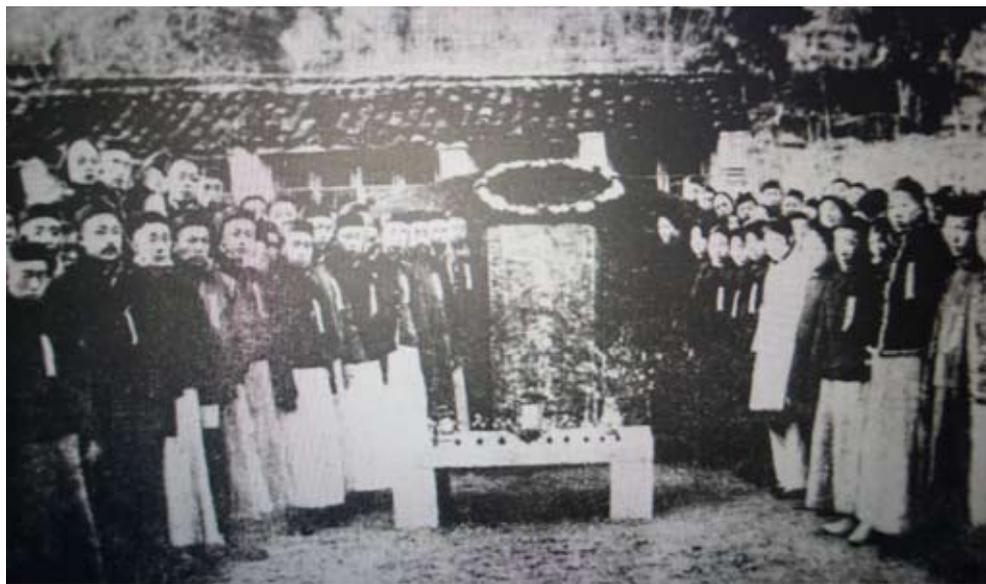
光绪三十二年（1906），将要去安徽进行革命活动的徐锡麟，把他创办的大通学堂^[1]交给秋瑾主持。徐锡麟在去安徽前，在西湖南屏山下的白云庵与秋瑾会面，两人约定在皖、浙两地同时发动起义。此后，秋瑾马上赶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校务，随时准备起义。在这段时间里，秋瑾多次到杭州进行革命活动。她与徐自华一起爬上吴山、凤凰山，把杭州的街道绘入军事地图，为日后革命党

[1] 大通学堂：是辛亥革命在浙江的重要史迹之一，位于绍兴市区胜利西路563号，全称为“大通师范学堂”。1905年9月，光复会领导成员徐锡麟、陶成章为联络、训练各地会党，培养军事干部而创立该学堂。

人攻克杭州做好准备。下山后，她俩又一起去了白云庵、孤山和西泠桥。当来到岳飞坟前时，秋瑾站了很久，并对徐自华说：“倘若牺牲，愿埋骨西泠，傍岳飞英灵，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了。”

按照原计划，由秋瑾率领绍兴光复军渡江进攻杭州，杭州城内的革命党人进行策应，以夺取杭州。由于武汉、金华的光复军失利，再加上徐锡麟被捕牺牲，清兵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率革命党人奋力抵抗，但终究寡不敌众而被捕。绍兴知府贵福设好酒宴，想引诱秋瑾说出革命计划。见秋瑾不说，又对她进行严刑逼供。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秋瑾视死如归，只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供词。

无计可施之下，清政府决定杀了秋瑾，以免后患。光绪三十三年（1907）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2岁。遇害后，她的遗体先由慈善机构同善堂草葬于绍兴府城卧龙山麓，后由挚友徐自华、吴芝瑛根据秋瑾意愿，移柩杭州西泠桥畔。后几经转移，直到1981年10月，杭州市政府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在孤山西麓草坪上重建了秋瑾墓，汉白玉做的秋瑾塑像矗立在墓上。秋瑾墓不远处还建有“风雨亭”，取“秋风秋雨”之意，以此纪念这位革命先驱、巾帼英雄。



1908年修建于西泠桥畔的秋瑾墓

（三）解放前在杭州牺牲的浙江省委书记

在杭州小车桥附近，来来往往的游客川流不息，这里是杭州最繁华的商业旅游区之一。民国期间，这里是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所在地，不少仁人志士在这里牺牲，其中就有浙江的4位省委书记：张秋人（1898—1928）、卓兰芳（1900—1930）、徐英（1907—1930）和罗学瓚（1893—1930）。

张秋人，乳名友表，学名慕翰，别号秋菀，浙江诸暨牌头水霞张人。民国10年（1921），张秋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秋人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编辑《政治周报》。民国16年（1927）9月28日，正值新婚燕尔的张秋人在杭州接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次日，他就被敌人盯梢，尽管租船游湖，仍不得脱身。他嘱咐同行的妻子回旅馆烧毁文件，自己纵身跳进西湖，将口袋里的一份党员名单丢入湖底淤泥里。被捕后，他被关进了浙江陆军监狱。次年2月8日，年仅30岁的张秋人遇害。

卓兰芳，又名卓祥和，字培卿，浙江奉化人。民国14年（1925），卓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7年（1928）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次年春天，卓兰芳带着《中央通告》70号，化名李品三去诸暨，发动农民暴动。农民军经过五六天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和缺乏作战经验而失败。随后，他又组织了浙西暴动，也失败了。之后，全省白色恐怖更为严重。杭城内外军警密布，



曾经的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

四处抓捕暴动领导人和革命群众。民国19年（1930）10月29日，卓兰芳在杭州石牌楼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会后，卓兰芳不幸被捕。被捕后，卓兰芳被关押在柴木巷拘留所12号囚笼。由于共青团杭州市委负责人叛变，卓兰芳省委书记身份暴露。不久，国民党当局把卓兰芳从柴木巷拘留所押送到浙江陆军监狱。在陆军监狱，国民党反动当局特意备了酒菜茶水，款待卓兰芳，企图收买他。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引诱，卓兰芳宁死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他坚决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外面有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你们要想从我口中得到些什么，办不到！”11月24日，卓兰芳被绑赴刑场。一路上，他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英勇就义。



牺牲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的四位省委书记

徐英，原名徐胡连，又名紫衡，化名于凤鸣，浙江武义县水碓后村人。民国14年（1925），徐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8年（1929）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同年4月，党中央决定暂时撤销浙江省委，并决定徐英负责巡视浙东、浙南一带党的工作。8月，中共宁波特别支部成立，徐英任书记。年底，正当宁波特支领导党组织开展新的斗争时，国民党当局对我党加紧破坏与搜捕活动，特支机关被发现，徐英于12月17日凌晨被捕。民国19年（1930）2月，徐英被押解到浙江陆军监狱，不久被判死刑。徐英并不畏惧，下决心只要活着一天，就要继续斗争一天。他积极组织狱中斗争活动，带领难友们坚持学习。8月27日早晨，他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昂首挺胸走向刑场，

与19名战友一起英勇就义，年仅23岁。

罗学瓚，湖南湘潭人。民国元年（1912），他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该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为同班同学。民国18年（1929）被派往杭州，参加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工作，先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随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代理书记。同年4月，罗学瓚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他坚强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民国19年（1930）8月27日，罗学瓚牺牲于浙江陆军监狱，年仅37岁。

浙江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据《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一卷（1921—1949）记载，浙江解放前在册革命烈士多达7000余人，无名烈士难以胜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前，浙江先后产生11位省委书记（代理书记），其中有王嘉谟、张秋人、夏曦、卓兰芳、龙大道、李硕勋、罗学瓚、徐英、刘英9位浙江省委书记（代理书记）在领导人民革命斗争中，无私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为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他们平均年龄不到30岁，最小的仅为21岁，最大不过37岁。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城市揭开了发展的新篇章。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杭州的发展，多次到杭州视察指导工作，并做出重要指示。

一、毛泽东



毛泽东对杭州情有独钟，他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度过了785个日日夜夜，并不止一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了杭州就像到了家，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这里，他亲自主持党的重要会议，会见重要外宾，起草了党的许多重要文件。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抵达杭州，按计划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来杭，时间达80天左右，除起草宪法外，也兼顾着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事务。在南下杭州途中，他对随行人员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他在杭期间，住在刘庄（今西湖国宾馆）一号楼，办公地点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现五四宪法资料陈列馆）前的平房里。毛泽东系统阅读、研究、比较了中外各类宪法，为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炼出了一个适合国情的根本指导方针。

宪法起草工作从1954年1月9日正式开始。1月10日，制定了宪法起草工作计划。3月初，毛泽东修改审定了《宪法草案初稿说明》。3月9日拿出“四读稿”，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本。对于这个宪法草案初稿的每份过程稿，毛泽东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字斟句酌，改了又改，批语也写了不少。

1954年3月14日晚，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离杭返京。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通过和颁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过程中，“西湖稿”可以说是奠定了一个基础，它不仅在宪法史中留有重重的一笔，也给美丽的杭州刻下了永恒的历史记忆。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来杭。此后，毛泽东到杭州52次，在杭州召集过23次重要会议，制定过许多重要文件，做出过许多重大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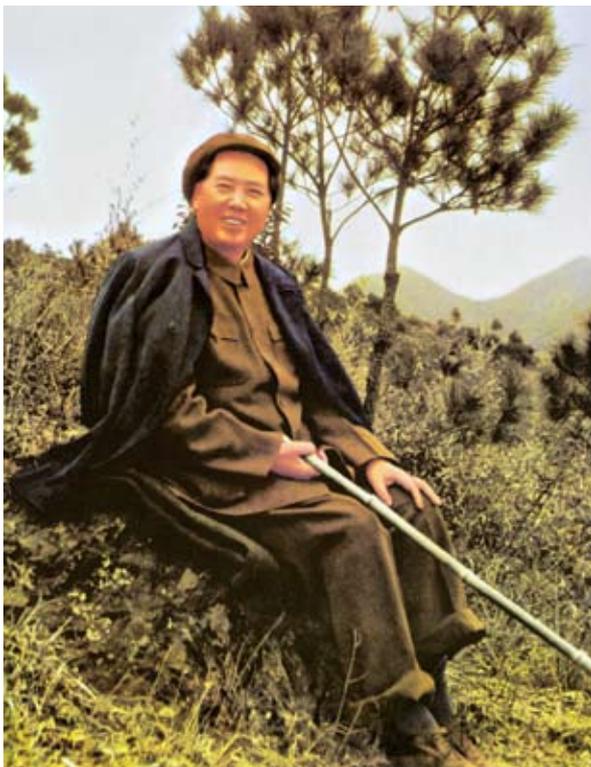
毛泽东始终关心着杭州的建设和发展，视察过杭州的农村、厂矿、军营、海塘、居民小区、科研院所等，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民意。杭州的许多大型工程得到过他的过问与首肯，杭州的许多干部得到他的关心和培养，杭州的许多



2016年12月4日，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开馆（来源于杭州图库）

问题和矛盾得到了他的协调与解决，杭州的不少成就与经验得到他的褒荐而在全中国传播和推广。

毛泽东钟情于杭州的山山水水，几乎爬遍杭州市周围所有的山峰。他被秀丽的山水所感染，诗兴盎然，挥笔书写了《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七绝·观潮》《七律·读报》（两首）《七律·改鲁迅诗》《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8首诗词。其中，《五律·看山》《七绝·五云山》《七绝·观潮》对杭州的北高峰、五云山和钱塘江进行了直接的描述，气势磅礴、引人入胜。



1957年4月，毛泽东登上杭州将军山（来源于《足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浙江》）

五律·看山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鹰。

毛泽东留在杭州的巨大精神财富弥足珍贵，留给杭州人民的深切记忆丰厚铭心。杭州人民永远忘不了：毛泽东在杭州西子湖畔激扬文字，在奔驰专列上与基层干部促膝交谈，在普通百姓家中亲切垂询，在乡间田头凝重沉思，在钱塘急流中劈波斩浪，在山峦小道上奋力攀登。

二、邓小平

邓小平非常关心杭州的发展，特别是西湖保护和旅游事业。他16次视察浙江工作，13次来到杭州参加会议、视察工作、陪同外宾。

1983年2月9日，一辆“红旗”牌轿车驶入刘庄，车停，开门下来的正是邓小平。旅途的劳顿阻挡不了他求证于实践的急迫，邓小平立即与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铁瑛、省长李丰平等地方领导谈起了浙江的发展规划，详细了解具体措施。经过为期12天的江浙地区考察，邓小平对全国实现经济翻两番、奔小康的目标更加充满了信心。这次杭州的旅程是邓小平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后的首度浙江之行，其间他与省主要领导探讨了浙江发展的有关问题，深刻影响了浙江的发展。

在视察杭州期间，他还出席省、市的春节团拜会，会见省、市领导和各方面代表人物，并游览了灵隐寺、三潭印月、花港观鱼、岳王庙、玉泉、植物园、孤山、六和塔、虎跑、苏堤、龙井和九溪等西湖风景点。在岳庙瞻仰武穆英灵时，邓小平在岳飞的手书石碑前满怀深情地吟诵了《满江红》。据当时的《浙江日报》摄影记者回忆，小平特意拉着自己的外孙女和孙子，指着岳飞墓前的四跪像对孩子们说：“英雄总被后人所纪念，坏人总被后人所唾弃。”虎跑泉的试水



1983年2月，邓小平在杭州饭店小礼堂观看戏曲演出并接见演员（来源于《足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浙江》）

表演也吸引住了邓小平，看工作人员将一枚硬币放在盛满水的碗面不下沉时，他也好奇地随手拿起一枚硬币，小心翼翼地放在水面上。随后他的3个孙辈也加入游戏，碗面上大大小小浮了9枚硬币，仍是滴水不溢。小平同志不由称赞，虎跑泉水真是天下一绝。



邓小平指着秦桧等铁铸跪像，向下一代讲述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来源于《足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浙江》）

在与西湖山水亲密接触的过程中，邓小平为杭州筹划了一个具体的发展构想。他对陪同的省委领导铁瑛等说：“杭州的绿化不错，给美丽的西湖风景添了色。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西湖名胜，发展旅游业啊！”他还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像杭州这样的风景旅游城市，在世界上可是不多的。要把杭州的旅游业好好发展起来。”



邓小平寄语（张素卿 摄）

三、江泽民

江泽民对浙江和杭州的发展寄予厚望，他多次来浙江考察，其中6次来到杭州。他指出浙江这样发达的地区，基础条件好，经济实力强，科技力量雄厚，同国际市场的联系比较紧密，要发挥优势，争取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1年10月24日至26日，江泽民到杭州视察工作，先后来到杭州汽轮机厂、东风丝绸印染厂和萧山航民村，并参观了中国茶叶博物馆。

10月25日，江泽民视察杭州萧山航民村。行前，他就已从地方领导的介绍中得知改革开放以来，航民村在党的领导下，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省农村前茅，也是全国“村镇建设文明村”。

他在仔细听取了航民村党总支书记的汇报后，参观了为村里掘得第一桶金的漂染厂，又走访了村民朱建庆和朱关友的家。

在朱建庆家，与江泽民对话的是女主人。对话从女主人怀抱的孩子开始，然后江泽民又问起了村里的集体福利和主人家的收入。当听到女主人说，全家的年收入大约5万元时，他高兴地说：“好！你们的收入，比我们还要高啊！”

听到江泽民这样的赞许，女主人一时语塞，就连在一旁陪同的总支书记也不知该如何接过话头，但谁的心里不是乐滋滋的？



2003年，江泽民在杭州钱王祠观看杭州越剧院演出的《九斤姑娘》并接见演员（来源于杭州图库）

江泽民又来到了朱关友的家。这时，关友家的院子外已挤满了村民，一见总书记到来，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江泽民向村民们挥手致意，高兴地对大家说：“你们航民村的生活真好啊！”这时，人群中的一位老妈妈突然插话道：“这全靠党中央领导得好！”顿时，全场沉静，但片刻之后，全场又响起了开心的笑声。江泽民笑了，在场的人都笑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说出了全村人的心里话。她是凭直觉说话，说的是实话而不是套话。

江泽民在航民村只逗留近一个小时，但他却在这个小村里，真切地把脉了农村生动而深刻的变化。临行前，他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把农村党组织建设好，加强党的工作，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用美好向上的东西鼓舞人民向前看，教育人民热爱中华，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让大家明白一个真理，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今天的好日子。”

此后，江泽民于1995年5月15日视察万向集团公司，2000年5月11日视察杭州富通集团公司、浙江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大地网架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并着重就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在杭州期间，江泽民还就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人士对加强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000年5月11日，江泽民视察浙江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市委组织部 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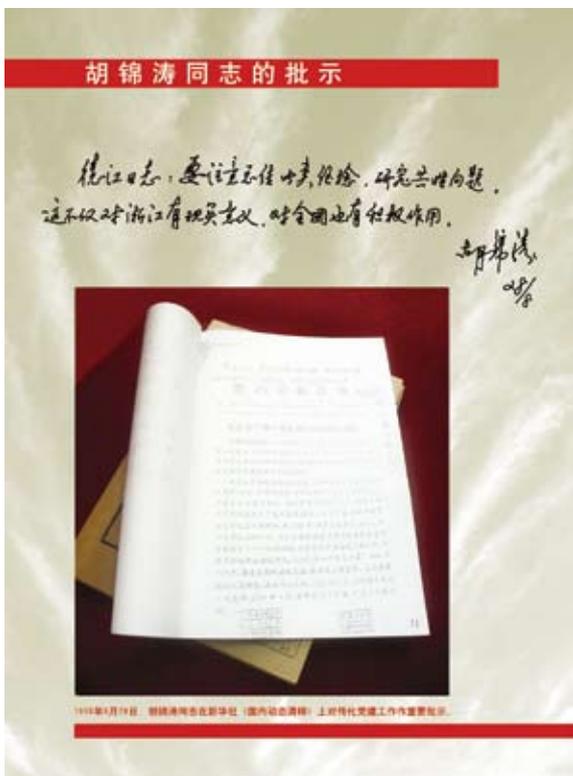
四、胡锦涛

胡锦涛一直情系浙江，多次对浙江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他鼓励浙江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全国前列。

胡锦涛对浙江和杭州的党建工作，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十分关心，给予了有力指导。2001年5月1日，胡锦涛在杭州考察社区党建工作，深入到天水街道社区服务中心、采荷文体活动中心和湖畔花园居民小区，察民情，听民声，考察社区建设和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亲切慰问基层党员干部和居民群众，与他们一起欢度“五一”佳节。胡锦涛还亲切会见在杭的全国劳动模范和浙江省劳动模范。

2007年7月28日至29日，胡锦涛冒着酷暑分别考察重点国有企业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民营高科技企业中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企业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和下城区长庆街道王马社区，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建设进行调查研究。

在室温高达38℃的杭州制氧机集团厂房里，胡锦涛多次驻足于各种部件前，仔细询问产品的用途和生产流程，听取集团负责人的汇报，与在场工人亲切握手，表示慰问。临行前，他嘱咐企业负责人：“你们要继续努力，不但要占领国内市场的制高点，还要积极走向国际市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99年8月28日，胡锦涛关于浙江传化集团党建工作的批示
(市委组织部 供稿)

在由浙江大学几位科学家白手起家创建的中控科技集团的产品陈列厅和标准件装配区里，一个个自行研发的先进自动化控制系统也吸引了胡锦涛的目光。他边看边问，对这家企业取得的业绩表示赞赏。

在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胡锦涛饶有兴致地参观能源再生电梯等一批节能新产品，询问其节能的原理和效果。他与企业经营者的对话一直离不开“节能”二字，对这家企业重视把节能降耗的理念贯穿产品设计和生产过程的做法十分满意。胡锦涛还来到自动扶梯装配车间，与工人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产品的生产过程和所需时间。他叮嘱大家，要坚持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开发和推广应用资源节约、替代、循环利用的先进适用技术，确保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7月28日下午，胡锦涛来到下城区长庆街道王马社区。王马社区是杭州市的老社区，有常住人口1.2万人，在册党员566人。该社区积极探索社区党建工作的新路子，在全国率先成立“楼道党支部”，以此凝聚、发挥社区党员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胡锦涛与社区居民一一握手，并坐下来与他们攀谈起来。77岁的老党员梁舜华高兴地对胡锦涛说：“我在贵州工作时，现场听过您的报告。今天在这里又能见到您，真是高兴！”胡锦涛笑着说：“那今天我们是老朋友见面了。”他问梁舜华：“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入党的？”梁舜华说：“我入党已经51年了。现在，我总结自己入党50多年来的感受，最深切的就是10个字：忘不了，不能忘，无怨无悔。忘不了，就是忘不了党对我的培养教育之恩；不能忘，就是不能忘自己的党员身份，时刻要发挥党员的作用；无怨无悔，就是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无怨无悔，一生忠诚。”听到这里，胡锦涛动情地对老人说：“我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了，听了你这一番话，我也很受教育，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其他同志也觉得很受教育。我相信有这么一大批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党员，有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就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够成功！”

胡锦涛叮嘱社区党委书记汪丽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作用，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和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把服务群众、造福居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多



2007年7月28日，胡锦涛在下城区长庆街道王马社区考察时，同社区居民亲切交谈（来源于央视网）

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胡锦涛始终记挂着民生。在王马社区的“小雏鹰园地”，他与小朋友亲切交谈；在社区帮扶救助站，他慰问了工作人员和警务室民警，鼓励他们好好为社区居民服务；在社区公园，他与休憩的居民群众握手寒暄，拉起家常，并询问已退休的王永根是否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胡锦涛才与在场的群众一一握手告别。

五、习近平

2002年至2007年，习近平担任浙江省省长、浙江省委书记期间，生活在杭州，工作在杭州，前后近6年，与杭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习近平非常关心杭州的发展，在省委书记任上，先后59次考察杭州的工作（据《杭州日报》）。他曾在不同场合提出，杭州市应该是浙江省的“领跑者”，不仅在全省起领跑作用，而且在全国起示范带动作用。

2003年至2006年，习近平3次到省委书记联系点的下姜村考察调研，下田间、听建议、谋发展，指导村民建沼气池，与村民建立了深厚感情。调离浙江工作后，还分别于2007年、2011年写信指导下姜村的发展。



《下姜村志》



2006年5月26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第三次在下姜村调研时，对农村党员提出要求（来源于《下姜村志》）

2003年9月29日，担任省委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到杭州进行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他在《浙江日报》特色栏目《浙江新语》专栏中写道：

杭州西湖承载着悠久的历史，积淀着深厚的文化。西湖文化在杭州文化中有着独特的位置。在西湖四周，留下了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的深刻

印记，留下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话诗篇，留下了不少民族英雄的悲歌壮举，留下了许多体现杭州先民勤劳智慧的园、亭、寺、塔。可以说，西湖的周围，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

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杭州在去年（2002）南线景区改造和今年（2003）新湖滨景区、杨公堤景区建设中，挖掘和恢复了不少历史文化景观，进一步丰富了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文化内涵。在今后的开发和建设中，还要始终坚持这一点。现在有的地方搞旧城拆迁改造，把一些文物古迹搞得荡然无存，这是非常可惜的。作为省会城市，杭州应在保护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弘扬历史文化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做得更好。

2006年，习近平在杭州调研为民办实事工作时，考察了杭州三替公司、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工程和背街小巷改善工程。他强调：我们一年忙到头，根本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完善和落实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就是要忙到点子上、做到关键处。



杭州市建立背街小巷党员责任区（市委组织部 供稿）

2007年植树节前夕，习近平等来到钱江新城的副阳台景观绿化工程现场，与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代表一起参加义务植树。他一连种下6棵山杜英和桂花树，为新城增添一抹新绿。当发现有一棵树种得不太稳当时，他就重新挖坑、培土，直到把树种好。他说，要注重植树质量，提高存活率，努力做到种一棵成一棵，种一片绿一片，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浙江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大地更加秀美，为城乡居民创造优美的环境。

2007年3月，习近平离开了浙江，但他始终关心着浙江和杭州的发展。2008年10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沿山村、皋城村、皋亭山养老院、良渚博物馆和祐康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考察。在祐康集团，习近平指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生产企业一定要以诚信为本，依法经营，严把质量关，让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全。

2015年5月25日至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浙江考察。他强调，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切实解决改革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努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首次调研浙江。

2015年5月26日下午，习近平考察了杭州城市建设。他来到杭州城市规划展览馆，看沙盘，观视频，听介绍，了解近年来杭州城市发展特别是新城区建设情况，对杭州确立并不断实现城市功能更全、生态环境更美、人民生活更好的目标表示肯定。习近平指出：“公共资源不能为少数人垄断享用，更不能搞不正之风，败坏社会风气。”习近平来到位于钱塘江边的杭州钱江新城城市阳台考察新城建设情况。正在这里休闲的市民看到总书记来了，热情围拢过来打招呼。习近平一边同大家握手，一边说：杭州这个地方环境多好啊，我离开浙江时，这片还没有建起来。他询问大家住得远不远，平时来这里有些什么活动，并祝市民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城市阳台（市建委 供稿）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来源于海康威视官网）

离开钱江新城，习近平又来到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企业研究所，当得知技术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8岁，正着眼前沿开展未来技术研究，习近平十分高兴。他对科技人员说，看到这么多年轻的面孔，我很欣慰。我在浙江工作时，省委和省政府就提出了“八八战略”。这不是拍脑瓜的产物，而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提出来的发展战略，聚焦如何发挥优势、如何补齐短板这两个关键问题。不要口号化，口号化最终就是泡沫化。要抓实实实在在的、有针对性的工作。浙江的人才优势要继续巩固和发展，还要与时俱进、更上层楼。习近平指出，要可持续的速度、有质量和效益的速度，不是“瓜菜代”的速度、少慢差费的速度、傻大笨粗的速度。这要靠创新驱动和人才。要立体化地培育人才，特别是对高端的尖子人才更要爱护。有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考察期间，习近平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各项工作给予肯定。他希望浙江努力在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水平上更进一步，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快一步，继续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

杭州刚解放时，百业凋零。1949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不到2.55亿元，人均不到90元。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在党和政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指导下，杭州人民凝心聚力、开拓进取、迎难而上，杭州经济实力大幅增强、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与自然更加和谐，不仅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2016年9月，G20峰会在杭州举行，杭州的风采更让世人惊艳。

一、改革开放至2016年的重大决策

1979年2月2日至15日

杭州市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出抓紧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加快全市国民经济发展的决定，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或半封闭到对外开放、从墨守成规到各方面改革的三个根本性转变。

1982年5月

市委提出以治理中东河为中心，兼治交通的设想，进行综合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从1983年3月破土动工，经过100多个参加工程建

东河鸟瞰图（市建委 供稿）



设单位的艰苦工作和辛勤劳动，至1988年基本完工，并陆续交付使用。中东河综合治理工程之宏，投资之巨，整治之速，为中河和东河治理史上所仅见。

1983年11月3日至8日

中共杭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将杭州的城市性质和定位明确为“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浙江省政治、文化中心”，重点发展旅游业。

1984年10月10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传达国务院领导原则同意的《关于讨论杭州市改革和开放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提出杭州的发展战略应当是以旅游业为重点，协调一致地发展经济和科学教育事业，创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1988年10月

市委决定建立杭州市新技术开发区。1990年3月2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同时报请国家科委转报国务院，要求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1年3月6日，国务院批准建立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迈向钱塘江时代（滨江区府办 供稿）



1990年6月5日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套班子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建立杭州钱江外商台商投资区的意见》。6月8日，市委、市政府向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委员会报告申请建立杭州钱江外商台商投资区，以更有利于吸引台商并增强投资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1993年4月4日，国务院批准建立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

1992年5月11日至13日

市委六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发挥杭州环境和文化优势，实行全面开放、强化改革力度、坚持城乡一体、实现跳跃发展的思路。

1993年10月22日至26日

中共杭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三外”并举，实施“科教兴市”战略。

1996年

为推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战略的实施，市委、市政府决定设立滨江区，作为杭州“江南城”的重要部分。1996年12月1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同意浙江省调整杭州市市辖区行政区划的批复》，同意设立滨江区。



1998年10月31日至11月4日

中共杭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依法治市战略，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开放型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4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1999年6月11日

市委、市政府以原市长专线电话为基础，建立“12345”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由市长担任组长的“12345”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协调小组。6月15日，“12345”市长公开电话正式开通。



1999年，建立“12345”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直播“12345进社区”活动（来源于《杭州年鉴（2011）》）

2000年11月13日

杭州市科技创新大会召开。会后下发《关于实施以“两港三区”为重点的“一号工程”的若干意见》。自此，声势浩大的“一号工程”在杭州拉开序幕。

2000年12月22日至23日

市委八届六次全会提出“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战

略，推进杭州由“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迈进，提出“住在杭州、游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品牌口号。

2000年12月

根据市委八届六次全会精神，加快钱江新城建设。2001年7月1日，杭州大剧院开工建设，标志着钱江新城建设正式启动。通过数年努力，钱江新城核心区建成市民中心、国际会议中心、杭州大剧院，以及商业、餐饮、文化娱乐等服务设施等一大批地标性建筑，钱江新城已成为杭州城市的新地标，成为21世纪杭州城市的一张“金名片”。



崛起中的钱江新城（来源于杭州图库）

2000年

市委、市政府决定，对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滨江区的管理体制进行调整。2002年6月，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滨江区管理体制调整，即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滨江区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体制。

2001年1月1日

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复建西湖南线景区、部分公园和重建万松书院、雷峰塔。2002年，中共杭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西湖核心景区要整合南线资源，改造北山路，实施“西湖西进”，建设湖滨商业特色街区。从此，西湖风



湖滨路旧貌（2000年3月）（来源于《杭州日报》）



湖滨路新貌之湖滨国际名品街（张素卿 摄）

景名胜区开启历时5年的西湖综合保护工程。该工程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加以补充完善，于2007年完成。

2001年2月1日

中共杭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宏伟目标。市委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将萧山、余杭划入市区。2001年2月2日，国务院《关于同意浙江省撤销萧山市余杭市设立杭州市萧山区余杭区的批复》，明确以原县级萧山市、余杭市的行政区域为萧山区、余杭区的行政区域。

2001年

随着萧山、余杭撤市建区，为配合新的城市形态和发展，市委对杭州地铁规划做了调整，组织编制《地铁1号线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2002年2月，中共杭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地铁1号线建设为首轮“十大工程”之一。

2001年4月开始

杭州市编制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该规划中提出“一主三副、双心双轴、六大组团、六条生态带”的空间格局。2002年2月1日，中共杭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南拓、北调、东扩、西优”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最终形成“一主三副、双心双轴、六大组团、六条生态带”城市空间结构。

2001年7月18日

市委、市政府制定《关于加快推进“旅游西进”战略的实施意见》，提出“合理开发、永续利用”原则，重点抓好西溪湿地生态区建设，使其成为核心景区延伸扩展的重要方面和杭州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新增点。2002年2月1日至4日，中共杭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把实施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列为全市“十大工程”之一。

2002年2月1日至4日

中共杭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城市化”“工业兴市”“旅游西进”“开放带动”“环境立市”五大战略和“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

中共杭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把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列为杭州城市建设的“十大工程”之一。

2003年9月9日

九届市委常委会第58次会议，同意市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做出的推进杭州市生态市建设的决议。2003年10月9日，市政府召开杭州生态市建设工作会议，与各区、县（市）和18个部门签订生态市建设目标责任书。2003年12月25日，

中国大运河（杭州段）十景之一“武林问渡”（刘浩源 摄）



市委九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将“以生态市建设为重点，推进‘环境立市’”作为2004年五大战略之一。

2005年1月28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背街小巷改善工程的若干意见》。计划3年内改善1500条背街小巷，明确工程达到的目标、要求。同年12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杭州实施背街小巷改善情况，该工程被市民誉为“家门口”的实事工程民心工程。

2007年2月10日至13日

中共杭州市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构建“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杭州新人文精神，以“和谐创业”为根本途径，全力打造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

2012年2月25日至28日

中共杭州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提出民生优先、环境立市、创新强市、实业兴市、文化引领、开放带动“六大战略”，着力建设“三城三区”，为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提供坚强保证。

湘湖夜景（陆国庆 摄）



2014年1月

市委提出，杭州要“完善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体系，探索建设网上自由贸易试验区”。2015年3月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这是国内唯一跨境电商试验区。

2014年2月10日

杭州市市长张鸿铭在杭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推进富阳、临安撤市设区工作，加快融入主城区步伐。”随后，浙江省政府常务会议原则同意，将杭州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方案上报国务院审批。2014年12月13日，《国务院关于同意浙江省调整杭州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同意撤销县级富阳市，设立杭州市富阳区，以原富阳市的行政区划为富阳区的行政区划。

2014年7月

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围绕“一基地四中心”战略定位和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目标要求，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智慧产业化和产业智慧化为重点，坚持基础建设、产业发展、应用服务“三位一体”，加快发展信息经济、智慧经济，着力提升经济增长质效、生态环境质量、群众生活品质和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动生产美、生态美、生活美的“美丽杭州”建设，努力建成“美丽中国”先行区。



2015年8月17日

中国奥委会向亚奥理事会递交杭州代表中国申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的意向书。北京时间2015年9月16日，亚奥理事会在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第34届OCA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杭州获得2022年亚运会主办权。”杭州成为继北京和广州之后，中国第三个举办亚运会的城市。杭州亚运会将以“绿色、智能、节俭、文明”为特色。



2015年9月16日，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杭州市市长张鸿铭（从左至右）在签署亚运会主办城市合同后合影
(市体育局 供稿)

杭州市奥体中心（来源于杭州图库）





“喜迎G20杭州峰会”西湖风光大型立体花坛（来源于杭州图库）

2016年9月4日至5日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投资治理格局、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

二、G20杭州峰会

二十国集团（G20）由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于1999年倡议成立，由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以及欧盟等20方组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G20峰会仅举行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国际金融货币政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世界经济发展等问题交换看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美国倡议下，G20峰会提升为领导人峰会。2009年9月举行的匹兹堡峰会将G20峰会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目前G20峰会机制已形成以峰会为引领、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

（一）峰会概况

2016年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闭幕词。与会领导人围绕“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重要共识。

习近平在开幕辞中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国际社会对二十国集团充满期待，对这次峰会寄予厚望。希望杭州峰会能够为世界经济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让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习近平就应对世界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提出“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五点主张。习近平强调，面对当前挑战，二十国集团要与时俱进、知行合一、共建共享、同舟共济、为世界经济繁荣稳定把握好大方向，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主会场（来源于杭州图库）

习近平在闭幕式上强调，二十国集团有必要进一步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侧重短期政策向短中长期政策并重转型。我们决心合力支持二十国集团继续聚焦实际经济面临的最突出、最重要、最紧迫的挑战，加强政策协调，完善机制建设，扎实落实成果，引领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习近平感谢各方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二十国集团发展做出的贡献。习近平指出，在我们共同努力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取得了丰硕成果，画上了圆满句号。相信此次会议将成为一个崭新起点，让二十国集团从杭州再出发。

2017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介绍主办汉堡峰会的设想和考虑。会议通过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

（二）G20杭州峰会文艺演出

2016年9月4日晚，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的G20成员和嘉宾国领导人及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在西湖景区观看了G20杭州峰会文艺演出《最忆是杭州》。

钱江新城灯光秀（钱江新城管委会 供稿）





G20杭州峰会文艺演出《最忆是杭州》(来源于杭州图库)

当晚的雨后西湖，水光潋滟，风荷正举，中国的艺术家们为中外嘉宾献上了一道道精美的文化大餐。从借助高新科技演绎的水上芭蕾《天鹅湖》，到新编民歌《难忘茉莉花》，再到经典《欢乐颂》，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进行着一轮轮的跨文化对话，从而传递出人类共通的情感元素和情感力量。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既能奏响本民族的文化经典，也能演绎其他民族的传世之作，这种既向先人学习，又向外人学习，既强调本国传统，又学习他国所长的心态，正是文化自信的充分体现，有这样的一种文化自信，我们不但能成为世界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而且更应成为全球文明大潮中的弄潮儿。

范成大《吴郡志》记民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元杂剧家奥敦周卿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自古以来，天堂杭州的美就是全方位的。进入新世纪后，杭州更是迸发出持续的创新活力，成为中国人最向往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新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缩影与典范。现在的杭州既是安定团结的全国治安最好城市、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双拥模范城；也是风光秀丽的国际花园城市、自觉礼让的全国文明城市；是事业与生活相得益彰的天堂，在人们心中，杭州就是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一、誉满神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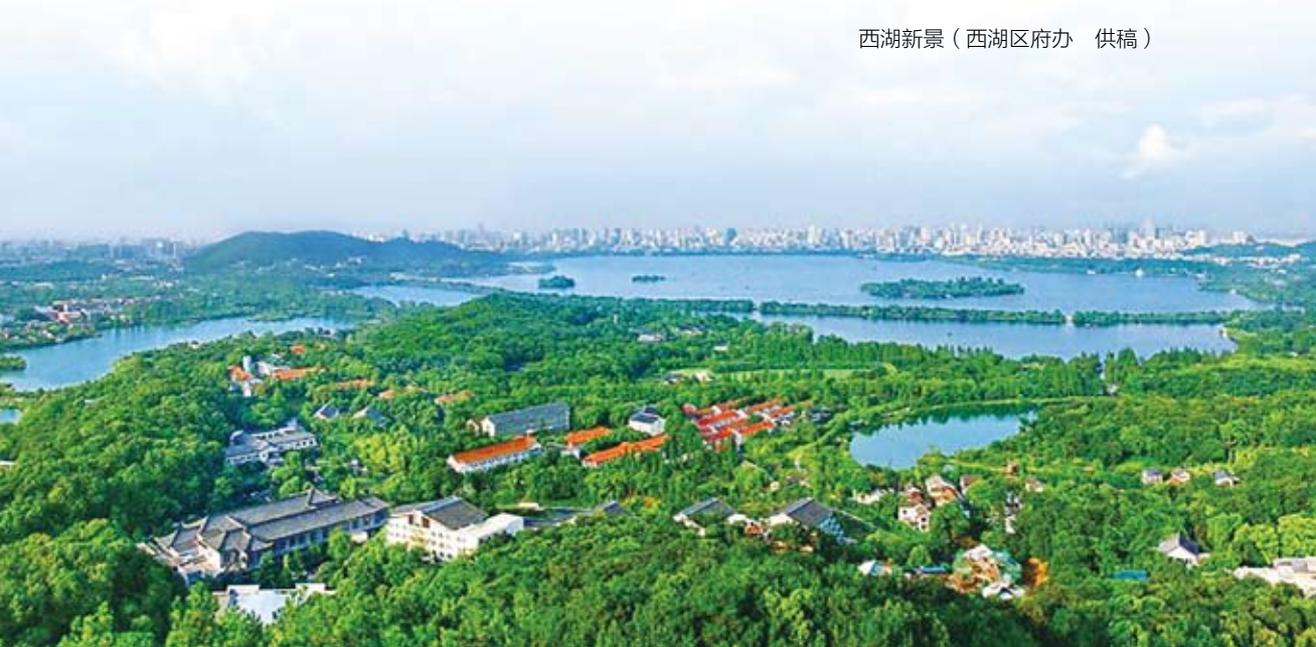
历年来，杭州市获得了无数荣誉称号，现将主要的荣誉列举如下：

2001年

联合国人居奖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西湖新景（西湖区府办 供稿）



2002年

国际花园城市

2003年

中国城市总体投资环境最佳城市

“浙派古琴”被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4年

中国城市总体投资环境第一名

2005年

中国十大协调发展城市第一

2006年

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金牌城市”

西溪湿地项目获世界休闲创新奖

2007年

首批中国最佳旅游城市

2008年

十佳和谐可持续发展城市排行榜榜首

2009年

国家森林城市

中国创业之城

中国大陆最具软实力城市

中国电子商务之都

“金石篆刻”和“清水丝绵”被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0年

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

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榜首

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

全国治安最好城市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2011年

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首批国家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城市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2年

杭州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

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2013年

全国平安综治优秀市

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十佳城市

全国电子社保示范城市

两岸文创产业合作实验区

中国快递示范城市

2014年

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2015年

“全国双拥模范城”七连冠
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连续第四次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评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中国（合作）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

2016年

国家级生态市
中国全面小康特别贡献城市
加入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
连续第十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中国可持续发展城市
入选《纽约时报》推荐最值得到访的旅游目的地



最具幸福感城市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联合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共同主办，迄今已连续举办10年，累计8.9亿人次参与，是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城市调查推选活动之一。活动的评价体系广泛吸取了国内外专家学者意见，调查采集的大数据涵盖居民收入、生活品质、城市向往、旅游向往、就业、生态环境、治安、诉讼咨询、交通、教



杭州图书馆环保分馆（来源于杭州图库）



杭州城市数据大脑计划（来源于杭州图库）



太子湾赏樱（来源于杭州图库）

育等十六大类50个指标。

2016年12月1日下午，中国幸福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召开，杭州入选“2016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并荣获“2016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十周年·最高功勋奖”殊荣，同时，获得“中国可持续发展城市”荣誉。

国家森林城市

2015年末，杭州有1762.27万亩林地，森林面积1644.3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5.22%，实现了从1986年至2015年连续30年增长。森林覆盖率居全国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首位，是名副其实的森林城市。

双拥模范城

“全国双拥模范城”是我国“双拥”工作的最高荣誉。杭州市自1994年以来，已连续6次获此殊荣。杭州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特别是2012年以后，杭州市紧紧围绕“中国梦、强军梦”，以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七连冠”为抓手，大力开展国防教育宣传、爱国拥军活动，有力推动了军民整合深度发展，促进了杭州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和驻杭部队战斗力提高。



二、文明样本

2016年杭州接待中外游客1.4亿人次，一位游客说：“西湖的山水确实比电视里看到的还要美，但印象最深的，是杭州人的文明素质。”斑马线礼让、自助小红车、红帽子志愿者、没有围墙的学校、见义勇为的最美杭州人，构成了杭州最美的风景——文明。文明基因渗透于每个角落，因为文明，杭州有了更深层次的美。

（一）斑马线让行

杭州的“斑马线让行”最早从公交车开始。2007年，杭州市公交集团制定了《公交营运司机五条规范》，其中明确规定“行经人行横道时减速礼让”，开始了“斑马线礼让”的倡议。到2015年10月30日，杭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斑马线“礼让行人”首次被写入了地方性法规。自此，杭州的“斑马线让行”从最初的文明倡导升格为地方法规条款。这一举措受到杭州市民和外地游客的点赞：“快节奏的城市里，杭州愿意为你慢下来。车让人，真好！”



斑马线让行——为你点赞（来源于《浙江日报》）

（二）公共自行车

在杭州，有一群身穿红马褂的“宝马”，带着市民和游客穿梭在大街小巷，它就是被誉为“小红车”的杭州公共自行车。



市民积极参与公共自行车骑行活动（来源于《杭州年鉴（2009）》）

自2008年杭州推出公共自行车系统来，已经从试运行初的61个服务点、2800辆公共自行车，发展到2016年末的3726个服务点、8.58万辆公共自行车，日最高租用量47.3万人次，累计租用量达到7.37亿人次，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租用人次数最多、便捷度最高的公共自行车项目。2016年，小红车还实现了扫码租车和主城区24小时不打烊，从而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

（三）红帽子

文明也会“传染”，文明孕育出的暖意感染着每个杭州人。“红帽子”志愿者就是他们的代表。红帽子作为政府部门和专业工作人员的助手，在服务公共应急领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不仅为市民和中外游客提供旅游咨询、交通引导、综合宣传、文明倡导、环境保洁、应急翻译等服务，成为展示杭州城市文明形象和市民风采的一个生动窗口，他们的微笑服务也成为杭州城市名片。截至2016年末，全市所有社区都建立了志愿服务站，形成了市、区县（市）、街道（乡



“小青荷”热情为游人指路（来源于浙江在线）

镇）、社区（村）四级志愿服务工作梯队，建立了志愿者工作指导中心、志愿者协会、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三大组织化服务平台。截至2016年末，全市共有注册志愿者185万余人，志愿队伍2.22万支，社会组织8000余个。

（四）勇士义举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杭州就是美好的天堂。

2011年7月2日下午一点半，杭州市滨江区某住宅小区内，一个2岁女童从10楼坠落，正在现场的吴菊萍毫不犹豫地伸出手，用左臂接住了孩子，挽救了一个稚嫩的生命，但吴菊萍的手臂由于瞬间冲击，被撞成粉碎性骨折。后来，有人问吴菊萍的救人动机，她说：“这是本能，是作为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情。”原来，她也是一名母亲，当时她的孩子只有七个月大。这一感人事迹令无数人动容，称吴菊萍为“最美妈妈”。

2013年，“最美杭州人”的评选活动正式开展。到2016年末，全市共评选出了市级、区县（市）级和各条战线“最美杭州人”6000余人。他们来自各行各



邻居节上，邻居为“最美妈妈”吴菊萍系上黄丝带（徐舜阶 摄）

业，或无私奉献，或见义勇为，或爱岗敬业，或身残志坚……就是这些普通人、小人物，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传递着爱和力量，影响了身边的人，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最美精神在杭城生根发芽，在百姓中口口相传，传递着这座城市被广泛认同的价值取向。

三、平安杭州

爱上杭州这座城市的缘由很多，最根本的是城市安全感。

早在2001年7月，公安部警务督察局的调查结果显示，杭州市民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程度全国第一，对公安民警接待群众态度的满意程度同样全国第一。2006年，在新浪网与《小康》杂志联合调查中，杭州被评为“全国治安最好城市”。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发布的《公共服务蓝皮书（2012）》，杭州位列全国最具安全感城市第五名。同年，杭州市被中央政法委、综治委授予“全国平安综治优秀市”荣誉称号，这是全国平安建设、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最高荣誉。

2016年，浙江省的安全满意度创历史新高，达96.43%，G20杭州峰会期间的安保工作圆满成功，浙江被公认为全国最安全、社会公平指数最高的省份之一。作为浙江省省会城市、G20峰会举办城市的杭州，被授予平安浙江建设中最难获得的荣誉之一——“平安金鼎”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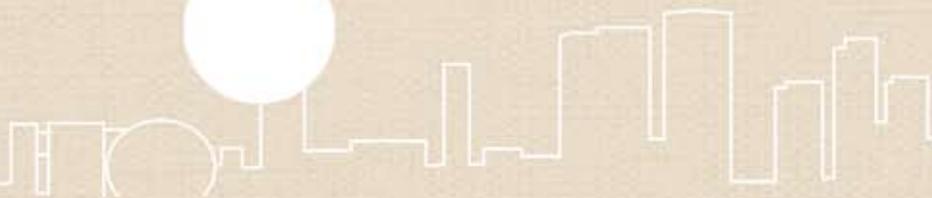
2017年5月3日，在杭州解放68周年纪念日，杭州市万余名公安民警共同宣誓，以实际行动打造“全国最具安全感城市”。让每一个在杭州生活的人，每一个路过杭州的人，都感受到踏实、舒心、安全。



正在执勤的交警

第五章

文化渊薮



杭州人杰地灵、钟灵毓秀，历来是文人向往之所、集聚之地。几千年来，杭州“代有才人出”：白居易、柳永、范仲淹、苏轼（苏东坡）、毕昇、杨万里、陆游、李清照、岳飞、于谦、洪昇、张苍水、龚自珍、章太炎、李叔同、郁达夫、夏衍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医学家和民族英雄，或出生于杭州，或寓居于杭州，或成名于杭州，或安葬于杭州，都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数千年来，杭州形成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和近现代文化的完整历史文化序列。其中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是杭州发展史上的“四大高峰”。历史文化积淀丰厚、传承有序、特点鲜明。古代文明与自然景观相互交融。农耕文化与商贸文化共同发展。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互为补充。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的《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其背景就在西湖。明清时期的文学名著——《水浒传》和《红楼梦》都带有杭州的影子。在这些无形文化遗产中，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有除暴安民的侠义行动，使杭州作为“爱情之都”的同时又彰显阳刚之气。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交融。杭州佛教寺庙众多，南宋末期就有480余座，早在元代就有“东南佛国”之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事业呈现出新景象，形成杭州文化事业发展的新高潮，为文化发展奠定基础。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杭州的文学创作、戏曲艺术不断繁荣。1982年，凭借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文物古迹众多，西湖风景名胜闻名于世的优势，杭州被列为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杭州找准国际风景旅游城市 and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位，为不断推进杭州文化建设奠定基础，城市文化建设呈现更加欣欣向荣的景象。

进入21世纪后，杭州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城市发展的战略位置。继1999年初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杭州建设文化名城的若干意见》后，先后制定《杭州市大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带来杭州的文化产业与事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2007年2月，市第十次党代会第一次把“文化生活品质显著提升”，作为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五个奋斗目标之一写入报告。2008年7月，市委十届四次全会又第一次把“软实力提升”作为杭州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确立下来，并提出和强调构建“3+1”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杭州文化发展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强化。2012年1月，市委十届十二次全会通过《中共杭州市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文化名城文化强市建设的若干意见》，开启杭州建设文化名城文化强市的新篇章。杭州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深入推进，文艺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加快，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取得丰硕成就，为推进杭州文化名城文化强市建设、向世人展示“最美杭州”“文化杭州”“创意杭州”提供有力支撑。

杭州历来崇学重教，在唐代，已有书坊。唐武德七年（624），富阳已设有县学。北宋天圣六年（1028），杭州知州李谿创修文宣王庙为学宫，招收士子入学就读。此后，钱塘、仁和、盐官、余杭、临安、於潜诸县先后建立县学。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杭州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杭州成为全国刻书出版中心之一。南宋时，杭州的教育进入兴盛时期。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建太学、十四年建武学、二十六年建医学。至于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1]。当时的杭州书坊林立，逐步形成繁华的书市。元朝，临安府学改称杭州路学，各县县学依旧。明清两代，杭州均为府一级建置，设有府学，各县设县学。同时，杭州书院文化发达，西湖书院、万松书院（敷文书院）、紫阳书院、诂经精舍被誉为杭州四大书院。清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后，新式学堂开始兴办。光绪二十三年，铅字排版技术开始应用于杭州图书业。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杭州知府林启先后创办求是书院、蚕学馆、养正书塾，对杭州乃至浙江的近代教育起了奠基作用。杭州的藏书事业也在清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八千卷楼主丁丙为当时全国四大藏书家之一。

民国时期，西方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办学方式传入，促进了杭州近代教育的进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浙江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民国8年（1919）五四运动中，成为江南传播反帝爱国思想和开展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此后，杭州的幼稚园、小学、中学数量大量增加，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门类繁多。同时，杭州的图书业集出版、印刷和发行于一体，发展更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进步，杭州教育和图书业得到快速发展。

[1]（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耐得翁系别号，姓赵，余无可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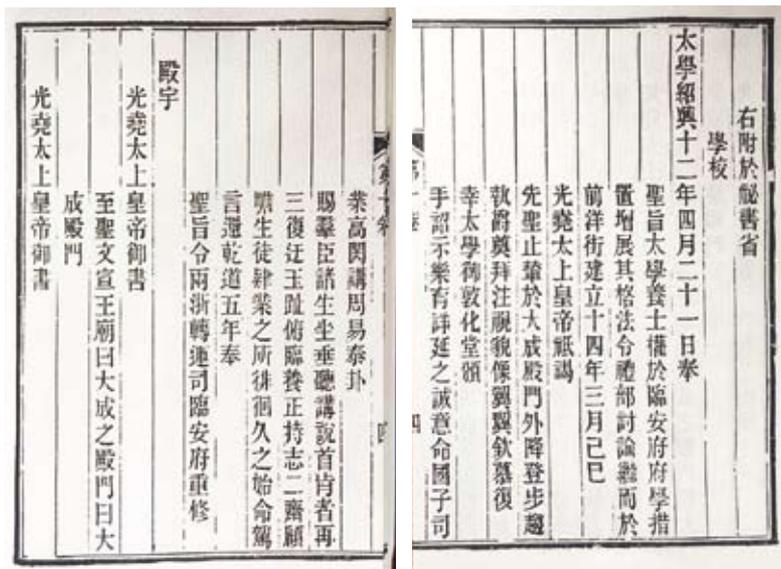
一、书院学府

(一) 南宋太学

太学，是我国古代官办的最高学府。

北宋太学，约始创于庆历四年（1044），靖康二年（1127）初，金军攻占汴京（今河南开封），北宋灭亡，太学解散。

南宋绍兴八年（1138），定都临安后，经官员多次上书请求，于“十三年，兵事稍宁，始建太学”^[1]，以位于纪家桥东、前洋街北原岳飞府邸^[2]作为太学址，进行扩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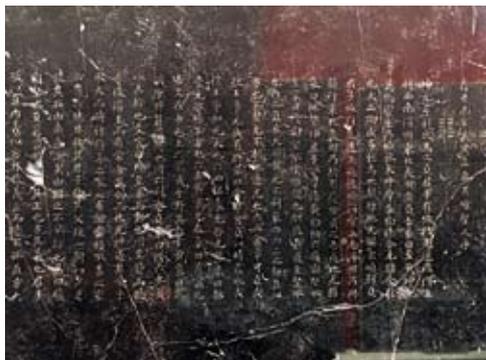
南宋（乾道）《临安志》卷一中对南宋太学的记载

太学初创时，仅有生员300人，初定每年春秋两次考试招生，后改成三年一试。经逐步发展，至宁宗时（1195—1224）共有生员1560人，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时，共有生员1636人。关于入学资格，高宗时规定，凡在州学修满一年，三试中选者，送入太学肄业；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又定混补

[1] 引用自《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2] 今位于小车桥东，延安路庆春路交叉口东北处。

法，即每三年应试科举后，所有落第举人皆可应试，合格者补入太学；淳熙年间（1174—1189），因应试者过多，立待补法，各州落第举人，每百人中只能挑选6人送太学补试。升迁方法则沿袭王安石所创“三舍法”，将太学生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始入太学的为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参考行艺（操行与学业）表现或升入内舍。



南宋太学石经（俞美娜 摄于杭州孔庙）

内舍生每两年一试，入优、平二等，参以行艺，可升入上舍。上舍生经二年学习后考试。考试成绩行艺并重，分为三等。上等荐于中书省授官，例补承事郎及太学正、录，名额2名；中等免礼部试，身份与进士同，名额5名；下等可免乡试，直接参加进士考试，名额10名。太学生员来自全国各地，且以平民居多，成为平民学子走上仕途的晋身之阶。

据吴自牧在《梦粱录》卷十二《学校》中记载，太学“规模宏阔，舍宇壮丽”。太学学舍由四部分组成。

太学中部为讲学区，有崇化堂、首善阁。首善阁内存有历朝关于教育的御札。崇化堂为讲堂，原名敦化堂，南宋庆元元年（1195）改为崇化堂，内藏有理宗亲书的朱熹《白鹿洞学规》石碑和宁宗御札《更学令》，以及乾道二年（1166）所列历任监学官题名。

太学西侧为孔庙，门列二十四戟，中建大成殿，祀奉孔子，十哲^[1]配享，两旁彩绘孔子七十二弟子（贤）像，前代贤哲从祀。殿后有光尧石经阁，内陈高宗和吴皇后手书儒家经典刻石。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高宗又将所作《文宣王赞》和《七十二贤赞》并《序》刻石，存于太学，并复制刻本颁发各学。

太学东侧为学生斋舍。崇化堂后两侧有学官廨舍。

太学后部有射圃，是学生射箭或开展文体活动的场所。

南宋太学课程，以“五经”为教本，“四书”也列为教材。学生各习一经，

[1] 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十位学生（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的合称。

每经设博士授教，诗、词、赋、策也随时兼习。

南宋太学自绍兴十八年（1138）创建，到至元十三年（1276）春元军进占临安后被废，历经138年。其间，著名学者陆九龄、陆九渊、吕祖谦、叶适等先后入职任教。

（二）万松书院



万松书院（顾益民 摄）

万松书院位于凤凰山麓万松岭。

明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参政周木将原报恩寺改建为万松书院，奉孔子像，请孔子第五十八代孙孔衢、孔绩兄弟掌供祠事，并世代相守。

书院中有仰圣门、大成殿、明道堂、毓秀阁、飞跃轩，右有居佳斋、颜乐亭，左有由义斋、曾唯亭，并备有祭田、祭器。后历有扩充修建，至明嘉靖四年（1525）时，有楼居斋舍36间。明万历五年（1577）增建穷理、居敬二斋。七年，根据张居正的建议，朝廷下诏禁毁天下书院，万松书院因祀原宋太学孔子像而得以保存。清康熙十年（1671），改称太和书院。康熙五十五年，康熙皇帝巡视书院，御笔“浙水敷文”（“敷文”取“君子博学于文”之义）匾额悬于中堂，并题诗赐书，遂改名为“敷文书院”，并扩充房舍，增置学田。清雍正十一年（1733），下诏“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饬行，有所成就”^[1]，以“兴贤育才”敷文书院由此增置学田。清乾隆十六年（1751）起，乾隆皇帝4次亲临敷

[1]（清）龚嘉儒：《（光绪）杭州府志》。

文书院，并颁赐武英殿所刊《十三经》《二十二史》，先后六次题诗，两次提写屏联，又屡增经费。清咸丰十一年（1861），书院毁于兵火。清同治五年（1866）重建。清光绪十八年（1892），浙江巡抚叶赫崧骏和布政使刘树堂筹款购屋，在葵巷东面，另建敷文讲学之庐^[1]。



（乾隆）《杭州府志》裁敷文书院图

万松书院是明清时期浙江省规模最大的书院，生员遍及全省十一府，明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清著名学者齐召南、秦瀛等都曾在书院讲学，“随园先生”袁枚曾就学于此。万松书院因梁山伯与祝英台“三载同窗情如海”的美丽传说而闻名，成为杭州著名的爱情圣地。

2000年7月，市政府公布万松书院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9月，启动万松书院复建工程，依照明代格局重建此书院。现书院主体建筑包括仰圣门、明道堂、大成殿、毓秀阁等。

（三）紫阳书院

紫阳书院，原址位于今紫阳山麓太庙巷内，清代时此处为凤山门内馨如坊。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由两浙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高熊徵捐钱购地，众盐商们集财建成。因书院位于紫阳山麓，恰巧与朱熹别号同名，遂定名为“紫阳别墅”，又称紫阳祠或朱子祠，是商籍子弟会文和祭祀朱熹之所。在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盐商们取得了商籍，其子弟可以进杭城书院读书和参加各项考试，获取功名，入仕做官，所以紫阳别墅的开办费，以及其后一

[1]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敷文讲学之庐改为浙江安定中学堂。1956年2月，学校改为公立，校名为杭州第七中学。原院舍因年久失修而倒塌。

段时期的经常岁费，都由当时在杭取得商籍的盐商们集资捐款。

紫阳书院襟山抱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时任浙江巡抚张泰交如此描述书院景观之清幽：“枕山面江，中有层楼，楼旁有池，池有泉水，清涟可爱。后有花厅，红绿参差，掩映阶砌。再折而此，渐登吴山高处，凭而远眺，钱江、圣湖悉在几席间。又有石门天成，石径迂折，古木森阴，花香鸟语，饶山林之趣，而无城市之嚣。”^[1]书院“中为乐育堂、奉考享朱子（朱熹）位。后有五云深处、簪花阁、近水楼诸胜处，凡十有二景，皆极岩泉之美”^[2]。那时的书院院长称“山长”，多聘有名学者任之；下设提调，称监院，类似今天的教导主任。学规秉承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条规》，严订课程，朝稽夕考。

清雍正三年（1725），宁绍副使徐有纬捐俸重修。乾隆年间（1736—1795），随着生徒人数的增加，书院费用单靠盐商捐资已不够开支，于是在两浙盐务项下拨官款，以资应用。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和乾隆三十八年两次重修。《重修紫阳书院记》记道：“武林三书院，皆踞湖山之胜，代鍾伟人杰士，紫阳独在城南山之麓，为之较近，士之秀而能文肄业其中者亦较盛。”正是当时的写照。

清嘉庆八年（1803），书院生徒达328人，席不敷坐。巡视盐政延丰，在看潮台故址，建高楼五楹（列），使“生徒之登斯楼者，莫不志于大道，成章乃达”^[3]。嘉庆二十五年，林则徐任杭嘉湖道，对杭州的书院实行“随课升降发津贴”^[4]的制度，使士风为之一变。

清咸丰五年（1855），杭州知府王有龄建昭忠祠于书院后山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紫阳书院毁于兵火之中。

清同治四年（1865），布政使蒋益澧拨用专款重修紫阳书院。监院陆宗翰拆去昭忠祠额，改揭紫阳书院额于门楣，从此正式定名为紫阳书院。次年，按察使杨昌濬以俸钱买地，请出官资，增屋二十楹。同治七年，拓造楼厅斋房共三十八间。至此，紫阳书院设施日益完臻，成为当时一流的书院。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浙江巡抚廖寿丰在题为《奏为浙江省城专设书

[1]（清）张泰交：《紫阳别墅碑记》。

[2]（清）张泰交：《紫阳别墅碑记》。

[3]（清）阮元：《紫阳书院观澜楼记》。

[4] 即由原来的以录取入院名次定发放“膏火”（津贴）等次的制度改为按每次考试成绩定津贴等次的制度。

院兼课中西实学恭折》的奏折中，有“紫阳书院今方以制艺取士……因势倡导，择庠序有志之士奖进而培植……各书院奖赏存典生息项下，岁提息洋三千元”^[1]的建议。可见，此时的紫阳书院已有西学渐进之风。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下令，将各州、县书院改办为学堂，兼习中学、西学。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农历），紫阳书院改制为仁和县高等小学堂，是杭州最早的官办小学。

辛亥革命后，仁和县高等小学堂改称杭县第一小学；后学校屡次易名，至1958年，更名为“紫阳小学”，沿用至今。

紫阳书院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创设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被改为学堂，历经199年。先后有卢文弨、项梅侣、孙衣言、龚自珍、屠倬、王同等30多位著名学者担任山长，其生徒人数远在敷文书院、崇文书院之上，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紫阳书院的著名生徒，有“鉴湖女侠”秋瑾之父秋寿南，晚清著名经学家黄以周、杭州维新思想家汪康年等。

现今的紫阳小学依然在紫阳书院的原址上，校舍修葺一新，古建筑已不复存在，“观澜楼”“景徽堂”虽名称保留，但已不复旧观，只有“紫阳书院”的刻石还是当年之物，还有“听经岩”“垂钓矶”“看潮台”等景点依稀可辨。

（四）诂经精舍

诂经精舍原址在杭州孤山南麓。

清嘉庆六年（1801），浙江巡抚阮元创建诂经精舍。他认为“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助新知也”^[2]，遂孤山用房50间，选两浙诸生习古籍（按例须由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选送）读书其中，名为诂经精舍。阮元捐俸为学生膏火（经费）。书院祀东汉学者许慎、郑玄于雍肃堂，以示办学宗旨在研习经史、训诂。生徒初定32人，后曾增至60名。课程以经史为主，旁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辞章，一变自宋以来专习理学之风。学习时以讲议辩难代替扃试糊名法^[3]，以观其学识。每月课试时，由阮元、王昶、孙星衍轮流命题评文，只课经解史策、古今体诗，不用八股文、八韵诗。课业优秀者，编为《诂经精舍文集》刊行。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杭城御批奏折》，西泠印社2003年版。

[2]（清）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

[3] 扃试糊名法是指为了公平起见，把名字给盖起来改卷，称为糊名法。类似于今天的密封试卷。



《诂经精舍文集》

清嘉庆十四年（1809），阮元因受浙江学政刘凤诰科场舞弊案牵连被革去浙江巡抚之职，精舍无人主持，亦无经费，遂停办。道光四年（1824），原精舍肄业生、嘉庆十年会员胡敬呈请浙江巡抚、布政使修缮精舍。道光十年，巡抚富呢扬阿再次修缮，并定生徒名额，亲加课试，精舍逐渐中兴。咸丰年间（1851—1861），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加之太平军两次占领杭州，精舍再次停办。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兵燹。同治五年（1866）布政使蒋益澧捐俸重建。同治七年，俞樾受浙江巡抚马新贻之邀，任诂经精舍山长。光绪十二年（1886）第一楼遭大火，次年改建许、郑祠，于旧址增建式古堂为诸生讲习所。光绪二十二年，诂经精舍因为经费不足而大受影响，光绪二十四年冬（1899年初），俞樾辞去山长之职，光绪三十年精舍停办。

诂经精舍培养人才甚众，据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载：“不十年间，上舍之士多致位通显，入玉堂、进述密，出则建节而试士；其余登甲科，举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之言者，不可胜数。东南人材之盛，莫与为比。”碑刻讲学之士91人，举荐孝廉方正及古学识拔之士62人，纂述经诂之士5人，中式进士^[1]23人。晚清著名学者朱一新、章炳麟等皆出于此。

诂经精舍以“明经训，储高才”为宗旨，卑视举业^[2]，崇尚经史辞章，它一变近六百年（自宋理宗起，至清嘉庆初年）理学占据书院讲坛的局面。“精舍不

[1] 中式进士是指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中央考试取中者。

[2] 卑视举业指看不起为应科举考试而准备的学业。

但影响于浙省者至大，抑且泽盖全国，堪谓为我国教育史上极光荣之一页矣。”^[1]

（五）崇文书院

在今西湖跨虹桥西、曲院风荷南侧，有一座汉白玉石碑，碑上镌刻着“崇文书院旧址”。

此处原为明吏部尚书张瀚别墅。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两浙巡盐御史叶永盛因新安（今徽州）盐商在杭子弟失学甚多，遂在西湖跨虹桥西筑西湖讲院，称紫阳崇文会。据《西湖志纂》之《孤山胜迹·崇文书院》载，叶永盛视嵯之余，常召集盐商子弟抽查课程，往往于命题后要学子回船中作文，定时集合交卷，面定甲乙，称作“舫课”，并为他们奏立“商籍”，使之有机会进身入学，很受士商称道。“崇文舫课”在清代也被列为杭州二十四景之一。叶永盛去职后，盐商及士人就原址建崇文书院以作纪念，中奉朱熹，祀叶永盛于后堂，春秋饷祭，并作为新安子弟肄业场所。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在歙县汪秦镗倡议下重修崇文书院，并撰写《修崇文书院记》。四十四年，康熙南巡时题“正学阐教”及“崇文”匾额，从此“崇文书院”誉满江南，为清代浙江四大书院之一。清雍正十一年（1733）时，参加月课的学子多达三四百人。当时有享堂、敬修堂、诸生斋舍等建筑，后历有修葺。清乾隆八年（1743）“西湖书院”并



崇文书院旧址

入“崇文书院”。乾隆二十四年，盐道原衷戴在崇文、紫阳两书院设膏火，严课程，并遴选委派监院。乾隆年间著名学者蒋士铨作《杭州崇文书院训士七则》，为生员之讲义与课艺。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林则徐任杭嘉湖道，对崇文书院、敷文书院和紫阳书院实行随课升降发津贴的制度^[2]。清咸丰十一年（1861），

[1]（民国）张鉴：《诂经精舍志初稿》。

[2] 详见《紫阳书院》。

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攻占杭州，“崇文书院”毁于兵燹。清同治四年（1865）重建。至清光绪五年（1879）时，书院有食旧德斋、知不足斋、劝学斋、愿学斋。著名学者戴熙和王国维曾在书院讲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下令将各州、县书院改办为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中国近代初等教育的历史由此开始。次年，“崇文书院”改办为“钱塘县学堂”，首任堂长汪崧。光绪三十二年，钱塘县学堂从西湖跨虹桥西金沙港迁入城内馨如坊太庙巷与仁和县学堂合并，称“仁钱县学堂”。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仁钱县学堂重新分为两所，原钱塘县学堂单独设立，迁入太平坊周公井民居（今惠民路三元地附近），更名为“钱塘县高等小学堂”。

民国期间，学堂几经易名。杭州解放后，于1952年被定为浙江省重点小学后，曾易名为“上城区第三中心小学”和“杭州市佑圣观路小学”。1965年，学校改名为“杭州市胜利小学”，并沿用至今。

（六）惠兴女学堂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发表《倡设女学堂启》^[1]一文，倡导中国人一定要开办自己的女子学校，以图唤起妇女的觉醒和解放，真正打开“兴国智民”的局面。

在杭满族人瓜尔佳·惠兴女士，清军驻杭协领昆璞之女，粗通文墨，关心时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春，报考女学堂，却因“满人”身份被拒。于是六月延请多位有声望人士，商议创办学校之事。当时，她当众挥刀割臂发誓：“今日为杭州旗城女学校成立之日，我以此血为纪念。如此学校关闭，我必以身殉之。”学堂于同年九月十六日开学，初名贞文女学堂，校舍在旗营迎紫门北首金钩弄^[2]，惠兴自



惠兴女士像

[1]（清）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二》。

[2] 今惠兴路。惠兴女士殉学后，官府在校侧建有石坊，上书“贞心毅力”四字以示表彰。清亡后，旗营墙拆去，因有此石坊，遂定名为惠兴路。

任校长，是杭城最早的、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两所女学堂之一^[1]。然而次年，原来应允捐款者纷纷反悔，学堂因经费无着，面临夭折困境。惠兴女士信守誓言，“愿将一死，以动当道”^[2]，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二十五日服毒自杀，年仅35岁。惠兴女士的殉学，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东方杂志》《申报》《教育杂志》《顺天时报》《大公报》《北京女报》《警钟日报》等都先后对惠兴女士的办学、殉学事迹做了报道，并给出了相关的评论。人们还编撰了《惠兴女士传》《惠兴女士》《女子爱国》等戏本，将惠兴女士的形象搬上舞台，观众座无虚席。据《大公报》报道，“在湖广会馆演戏，所收戏价，悉数汇寄杭州贞文女学校，以资经费”。惠兴女士的殉学使贞文女学堂得以继续生存。学校改名为官立惠兴女学堂，经费以社会义捐为主，官府也承担部分费用，拨专款作为补助。学堂初开办时，设初等、高等各一级，共有学生54人，至清光绪三十三年，学堂已有教员6人，学生60人。光绪三十四年，在洪福桥堍添办模范女学堂。清宣统二年（1910），惠兴女学堂添办师范预备班。



惠兴中学（俞美娜 摄）

辛亥革命爆发后，学堂因被疑为满清官僚财产，一度被没收。所幸汤寿潜、蔡元培等知名人士以“五族共和”为由联合申请，据理力争，始得发还。汤寿潜及蔡元培等还出资担任校董，鼎力襄助，学校得以重新开办，并按新制更名为杭县城区惠兴国民学校，为4年制初小，男女学生兼收。民国4年（1915），增设高小，成为完全小学。民国8年，学校增办中学部（旧制，4年制），专收女生，

[1] 另一所学堂为清光绪三十年（1904）5月2日创办的杭州女学堂。由邵章、陈叔通、郑在常、钟濂等人稟请浙江巡抚聂缉槩立案开办，是杭州十四中学的前身。

[2] 出自惠兴女士绝命书。

定校名为浙江私立惠兴女子中学校（仍附设男女兼收的小学部）。

民国12年（1923），中学部改新制（3年制初中），改校名为浙江私立惠兴女子初级中学校。学校以“教育”为职业科，经省教育厅批准，毕业生可充任初小教师。至民国23年，在校学生达600余人。民国26年冬，日军逼近杭州，学校撤往浦江尺寸桥。次年春，日本侵略军进犯桐庐，学校奉命停办。民国35年2月，在惠兴路原校址复校。次年8月，增办高中部，改校名为私立惠兴女子中学。

1949年9月，在校学生503人，有初中9个班，高中5个班；教职员55人。1955年9月，高中部并入杭州女子中学（即今杭州第十四中学）后，改称私立惠兴初级中学，男女生兼收。1956年9月，与东瓯中学合并后，改校名为杭州第十一中学。

2000年4月，根据省、市政府的有关决定，学校高初中分离，初中部在惠兴路原址办学，恢复杭州市惠兴中学校名，高中部依旧称杭州第十一中学。2017年1月18日，惠兴中学加入杭州市建兰中学教育集团，签约集群发展联盟，走上了全新的发展道路。

（七）杭州高级中学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杭州府知府林启利用位于大方伯^[1]的圆通寺书屋创办养正书塾^[2]，这是浙江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普通官立中学。

时值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一方面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守旧势力控制朝政，命令各省停办新式学堂；另一方面民族危机加剧，变法呼声日甚。为避免保守派对新教育的梗阻，虽袭用“书塾”旧称，但采用新式中学堂的教学形式，设置经学、小学（说文）、算学、格致^[3]、英文等新课程，“延名师讲授致用之学”。

[1] 里弄名，原位置在今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附近。

[2] “养正”二字，取《易经》中“蒙以养正，圣功也”之意。

[3] 即“格物致知”，是清末对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统称。

书塾初创时订有章程^[1]，对办学宗旨、学制、班级设置、课程安排、课内外教学的方式方法、招生和考试办法以及教职员工编制分工、待遇、师生纪律要求、经费开支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因为章程比清政府制定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早4年，所以成为当时杭城各学堂制定规章的参照蓝本。



浙江省立高级中学

学制初定为五年，名额60人。学生经考试入学。学生学习期满，由书塾总理请知府和钱塘、仁和两知县会同教习命题考试。成绩优等者，给予文凭，升入本省高等或专门学堂，或保送出国留学。清政府《各学堂奖励章程》颁布后，又根据其中相关规定给予“拨贡”“优贡”“岁贡”^[2]等出身奖励。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区（来源于浙江省高级中学官网）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养正书塾改名为杭州府中学堂，由省拨银圆13000元为经费，另有10000元作资送留学生费用^[3]。

清宣统二年（1910）九月，浙江省咨议局决定全省十一府各设一所中学堂。杭州府中学堂遂改称浙江官立第一学堂。

民国元年（1912），学堂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民国12年8月，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4]合并，校名不变，学制为初、高中各3年。大方伯校舍为

[1] 在章程中，阐明办学目的为“端童蒙之趣向，植人才之始基，先授以中国根柢之学，使之正心术，明伦理，通晓故实，广识门径，而后以通经用诸学进之。蒙生于本塾功课毕业后，能自锲而勿舍，继长增高，蔚为国栋，庶有合于设立本塾之意”。

[2] 清代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生员的其中三种。

[3]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杭州府中学堂资派陈蔗清、韩士弘、王凯旋、石铎与章某（名已佚）5人赴日留学。

[4] 即原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分部，专办初中；贡院前校舍为本部，专办高中。高中分普通（文、理两组）、师范两科，原省立一师学生就读师范科。民国16年8月，浙江省立女子中学^[1]并入，男女生名义上同校，但实际各设高中、初中和附属小学。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钱江校区（来源于浙江省高级中学官网）

民国17年5月，更名为浙江省

立第一中学。民国18年8月，省立第一中学高中部与省立二中（嘉兴）高中部、省立高级商科中学合并，在贡院前成立浙江省立高级中学，简称“浙高”。规模的扩大，等级的升高，为学校走向新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22年（1933）8月，浙江省立高级中学改名为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简称“杭高”。此时，学校师资、设备为全省之冠。学校管理严格、教学成效显著，毕业生升入高等学校者为数众多，以突出的教育质量位列江浙“四大名中”，雄踞全国中学界前列。

民国26年（1937）11月，因日本侵略军逼近杭城，学校被迫内迁。次年8月，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和其他6所学校合并，在丽水碧湖成立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简称“联中”。民国28年8月，联中高中部改名为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级中学，简称“联高”。民国34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1月“联高”迁回杭州，恢复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校名。这一时期，学校师生追求民主、自由和光明，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至1951年，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相继合并浙江省立建国中学、杭州市立中学后，更名为浙江省立杭州市第一中学，恢复为初高中兼备的完全中

[1] 前身为创办于1904年的杭州女学校，由顾文郁任首任校长。1907年，学校改名为杭州女子师范学堂。1912年改校名为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31年改校名为浙江省立女子中学，增设高中部。1933年8月，学校迁至铜元路（即现凤起校区校址）。1938年，学校迁往丽水碧湖，与杭州高级中学等七所省立学校合并组成省立临时联合中学。1947年初，恢复为浙江省立杭州女子中学。1952年和1954年，弘道女子中学初中部、惠兴女子中学高中部先后并入。1958年，学校改名为西湖中学。1968年5月，改校名为杭州五七中学，男女合校。1971年9月，学校改名为杭州第十四中学。2000年，与杭州第十二中学合并，校名为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学，被评为浙江省重点中学。

经“文化大革命”动乱与拨乱反正，学校于1988年3月改校名为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为省首批一级重点中学。20世纪90年代，学校率先推行“轻负担高质量”教学改革。21世纪，学校秉承“文化立校、师资立业、道德立人”的办学精神，以“科学与人文并重、规范和个性共存”为教育理念，注重培养深具潜力并能持续发展的学生。2005年9月，天文社丁舒珊成为全球天文史上快速移动天体（FMO）^[1]的首位女性发现者。

学校继承“杭高”的优良传统，教师严谨执教，学生勤奋学习。1987年被评为浙江省首批重点中学。校园环境优美，人文景观丰富，有贡院碑亭、鲁迅亭、叔同亭、养正园、亨颐园、树人园、鲁迅纪念室、校史馆等，是杭州一处风景优美底蕴深厚的历史人文景观。

（八）杭州第二中学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基督教北浸礼会差会传教士甘惠德（W. S. Sweet）在石碑楼淳祐桥东堍创建蕙兰学堂。“蕙兰校地，初不过数亩，课室不过数椽，屋小而隘，四周荒草颓垣，因陋就简而已。”^[2]5月17日，蕙兰学堂开学，教职员只有甘惠德夫妇和一名中国人。首届学生仅4人。甘惠德自任学堂监督，因学生程度不一，“人自为班”，实行个别教学。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起义，学堂暂时关闭。次年春，恢复开办。定学员名额为20人，学制5年。学校的办学宗旨为“授诸生以圣道”。毕业生可保送至美国滕纳逊大学等校学习。光绪二十九年，应美国基督教北浸礼会女差会华东支会的要求，学堂招收了一批女学生。此举开杭州市中学堂男女生同校之先河，但因不符合当时国人风俗，遭到反对，于是将女学生迁移至珍珠巷^[3]，另辟校舍，取名蕙兰女学堂^[4]。清宣统三年（1911），更校名为蕙兰中学堂，改学制为4年。^[5]

[1] 快速移动天体：Fast Moving Objects，是近地小行星的一种。

[2]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百年回眸》。

[3] 今金衙庄附近，1959年拆除，并入解放路。

[4] 民国元年（1912），蕙兰女学堂与贞才女学、育才女学合并，成为私立弘道女子中学。

[5] 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杭州市志（第六卷）》，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第136页。

民国元年（1912），蕙兰中学堂更名为蕙兰中学校。民国8年（1919），五四运动爆发，学校学生组织了蕙兰“劝用国货会”，并编印《雪耻会旬刊》《众擎》等刊物，进行爱国宣传。民国11年11月，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按照此规定，学校于次年增设高中部，学制改为初中、高中各三年。民国16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浙江省收回外国教会的办学权，徐钺成为蕙兰中学首位华人校长，深受师生爱戴崇敬。民国17年5月，学校更名为蕙兰中学。至民国25年，学校有高中和初中春、秋季共17个班，学生1300余人，教职员65人，图书4万册，仪器数百套，大小房舍16幢，占地52亩。



蕙兰中学首位华人校长徐钺

民国26年（1937）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10月14日，由于杭城形势危急，学校暂迁至富阳场口，设立分校。留校的葛列腾（美国人）等，因目击日本侵略军之暴戾行为，在国际红十字会浙江分会支持下，利用校舍开办第八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近万人。民国27年，学校再迁上海，加入华东区基督教15所学校合办的联合中学。民国28年，与弘道女子中学、嘉兴秀州中学、绍兴越光中学等校在绍兴设联合中学分校。民国30年，联合中学绍兴分校和上海华东地区基督教联合中学先后停办。同年12月9日，蕙兰中学校舍被封，所有物资被冻结，难民被遣散。民国31年6月10日，蕙兰中学校舍被日伪特务机关“政治保卫局”强占。

民国34年（1945）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0月9日，学校收回校舍，但因战争浩劫，校舍残破不堪，图书损失达1.2万册。10月12日，学校与杭州私立弘道女中联合招生，并于10月23日正式开学。至1949年，学校先后招生逾2万人，共有毕业生47届，先后肄业学生人数逾2万人，收藏各类图书13615册。

1951年8月1日，蕙兰中学和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1]合并，在蕙兰中学原址成立杭州第二中学。1969年5月，学校改名为杭州玻璃厂五七学校。1971年12月，

[1] 民国29年（1940）9月，迁于贵州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湄潭开设的附属中学。10月，与湄潭县立中学合并，定校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实验中学。民国30年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民国35年夏迁回杭州。历任校长：竺可桢、沈金相。

学校恢复杭州第二中学校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校重视教师、业务双提高，教学面向全体学生，也重视培养尖子。各学科“第二课堂”十分活跃。

1979年8月，与日本岐阜市本庄中学结为友好学校。

1978年，学校取消“革委会”，实行校长领导体制。1月11日，杭州第二中学被列为省市重点中学。1980年1月，被定为“浙江省首批办好的十八所重点中学”之一。1982年9月，学校提出“方针、人才、基础”的口号，强调人才在德智体三方面的基本素质都是成才的基础。

2000年，学校组建杭州二中教育集团，包括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杭州国际学校、杭州第二中学滨江校区、杭二中树兰实验学校、滨江区政府兴办的委托杭州二中教育集团全面管理的九年一贯制杭州江南实验学校。^[1]

（九）蚕学馆

我国第一所蚕桑学校——蚕学馆，诞生于杭州西湖金沙港。

蚕学馆创始人林启，自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任杭州知府后，见蚕桑生产衰退，农民蚕茧歉收，遂于次年七月请浙江布政司拨银3万6千两，八月选址西湖金沙港原关帝庙及怡贤亲王祠^[2]，并购得邻近的土地三十亩，建校舍，设桑园，创办蚕学馆，揭开了我国近代纺织丝绸教育的帷幕，被誉为“全国蚕桑改良之先声”。

蚕学馆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三日（1898年4月1日）正式开学，试办一个班，招生25名。办学宗旨是：“除微粒子病，制造佳种，精求饲育，改良土丝，传授学生，推广民间。”招生要求是“家世业蚕，文理通顺，年二十左右，明敏笃静者”。课程设置有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动物、气象、土壤、桑



蚕学馆旧照（来源于浙江理工大学官网）

[1] 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杭州市志（1986—2005）》第四卷，方志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54页。

[2] 今曲院风荷公园内。

树栽培、蚕体生理、蚕体病理、蚕体解剖、养蚕法、缫丝法、蚕茧和生丝检验、肥料论等共十余门。

蚕学馆主持人为总办，初由林启兼任，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林启去世后由接任杭州知府的朱启凤继任。总办下设馆正（掌管馆中事务）、正副教习（掌管教务）。蚕学馆在教学上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面向生产实际，推广科研成果。编译了《微粒子病肉眼鉴定法》《饲养新法》《蚕业述要》《饲育要览》《缫丝法》等学术著作，对普及科学知识，推广育蚕、缫丝新技术起到积极作用。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巡抚任道镛以“浙本蚕乡，素习养蚕，何必设学校”为由，拟令停办。经校方和热心人士据理力争，在清泰门内长庆寺^[1]中设试验场，进行新旧养蚕法比较，结果新法远胜，使蚕学馆声名大振，远道求学者络绎不绝。因办学卓有成效，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更名为浙江高等蚕桑学堂。宣统二年（1910），因学额扩增，借西湖跨虹桥下的崇文书院旧址设分部。

民国元年（1912），学校更名为浙江公立蚕桑学校。民国2年1月，学校改为浙江公立甲种蚕业学校，12月，改称浙江省立甲种蚕业学校。民国14年，学校在艮山门、湖墅、塔儿头^[2]、海宁长安等地改良养蚕场；同年4月，在海宁、诸暨等县设改良土丝传习所；次年2月，学校增设推广部，在杭县、余杭、临安、萧山等县新办改良养蚕场12所，均由学校派毕业生巡回示范指导，扩大新法养蚕的影响。民国15年3月，校名改为浙江省立高级



位于曲院风荷内的蚕学馆旧址

[1] 今上城区长明寺巷一带。

[2] 今云居山至清波门一带附近。

蚕桑科职业学校；民国17年4月，改名为浙江省杭州高级蚕桑科中学，次年秋迁入笕桥。民国25年8月，迁移至古荡新建校舍。

从民国元年（1912）到民国25年（1936）间，学校虽然受到军阀混战的影响，仍不断发展。设有养蚕、制丝两科，拥有相应的教职员队伍和教学、生活设施，还办有原种蚕场、普通蚕场和缫丝厂。在吴兴（今湖州市）、海宁等县办有模范丝厂5所，有较好的实习基地。科技成果展品在民国2年（1913）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民国9年，获浙江省学校成绩展览会一等奖；民国15年，在浙皖丝茧展览会上获一等奖。

民国26年（1937）12月，杭州沦陷，古荡校舍遭焚毁。学校师生在临安、寿昌、龙游、新昌等乡间辗转迁徙。民国31年3月，学校长驻于缙云县壶镇，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民国34年（1945）12月，学校迁回杭州，暂于黄龙洞护国寺^[1]一带复课招生；次年1月迁回古荡原址。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学校称浙江省杭州蚕丝职业学校。从蚕学馆创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52年间，学校共毕业学生80批、1400余人，分布于全国各地。

1952年2月，根据中央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实行专业化办学的指示，学校制丝部分成立浙江制丝技术学校，蚕桑部分与国立湖州高级蚕桑学校合并为浙江省蚕桑技术学校。同年底，浙江制丝技术学校改名为浙江纺织工业学校，原浙江工业干部学校的纺织科同时并入。1953年夏，浙江工人技术学校并入浙江纺织学校，改称杭州工业学校。1958年，改办为浙江纺织专科学校。1960年，与浙江大学部分科系合并成立杭州工学院，称纺织系。一年后，再次划出单独建立浙江纺织专科学校。1962年，改为浙江丝绸专科学校。1964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浙江丝绸工学院，1970年改名为杭州工业学校。

1975年，国务院批准恢复浙江丝绸工学院，校址在文一路，设制丝、丝织、印染、丝绸机械4个专业。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更名为浙江工程学院。2004年，学校更名为浙江理工大学。

[1] 今曙光路黄龙洞附近。

（十）笕桥中央航空学校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以下简称“中央航校”）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规范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养基地，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学校前身为民国17年（1928）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民国18年6月改为航空班，隶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民国20年7月1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班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次年8月扩编为中央航空学校，于9月1日在笕桥正式成立，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航空署。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东北征用土地，划入以原驻笕桥的清军部队营地（第八十一标马队、炮营校场）为主的土地，建造笕桥军用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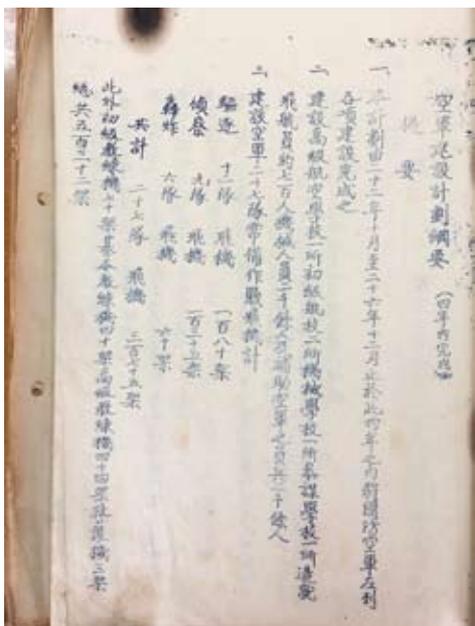
中央航校的中国教官主要由原中央航空班以及东北、南苑、保定等航校的优秀毕业生担任，经严格考核后，留校任教。学校还聘请了以美国军人裘伟德上校为首的外籍顾问团，包括以 H. T. 罗立德为首的10名飞行教官、以 G. B. 克拉克为首的5名机械师以及航空军医亚当博士等，来校指导飞行训练工作，采用的也是美国式的训练方法和飞行技术标准，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关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信及英语。民国24年（1935），国民政府军政部在笕桥修成一条长1400米、宽60米的机场跑道，并完善了机场辅助设施。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

中央航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班的学员为年龄在空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学生班的学员为年龄在18—24岁、高级中学毕业以上学历、体格良好、志愿从事飞行事业的年轻人。入学生班的学员先接受为期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级、中级、高级，每级学习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中央航校从民国20年（1931）起，每年招生1期，每期招生100余人。民国23年，因场地不敷，在河南洛阳设立分校，将第六期一半学员送至分校训练。从民国24年第五期开始，分甲、乙两班，甲班为军校毕业生，乙班为普通高中毕业生，两班共200余人。民国25年，在广州设立分校。洛阳分校和广州分校负责学员的初级训练，杭州本部进行中级、高级训练。



《空军建设计划纲要》



笕桥中央航校鸟瞰图（摄于民国22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航空学校迁至云南昆明巫家坝原云南航空学校旧址，并改组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民国32年（1943）冬，迁至今属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杭州笕桥，仍在洛阳和广州设立分校。民国37年冬迁往台湾冈山。

中央航校校训

第一，至高无上，为空军救国独一无二的责任；第二，为国捐躯，为空军救国杀身成仁的精神；第三，有我无敌，为空军救国至大无畏的胆量；第四，服从命令，为空军救国共同一致的要求；第五，再接再厉，为空军救国尽忠党国的气节；第六，冒险敢死，为空军救国死中求生的出路；第七，精密周到，为空军救国持颠扶危的基准；第八，亲爱精诚，为空军救国共同生死的德性；第九，质素朴实，为空军救国光明磊落的本色；第十，自强不息，为空军救国雪耻复仇的志气；第十一，克服天然，为空军救国战胜一切的本能；第十二，坚忍不拔，为空军救国最后胜利的要素。

中央航校校歌歌词

得遂凌云愿，空际任回旋，报国怀壮志，正好乘风飞去，长空万里，复我旧河山。努力，努力！莫偷闲苟安，民族兴亡责任，待吾肩。须具有牺牲精神，凭展双翼一冲天。

（十一）中国美术学院

民国16年（1927）11月，蔡元培提出：“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教育当务之急，应在长江流域，设一国立艺术大学以资补救。”他认为办学地址最适宜者为杭州西湖^[1]。

民国17年（1928）3月26日，国立艺术院应运而生，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校址在杭州孤山南麓罗苑（又名“哈同花园”，系向浙江大学租借），首任院长林风眠。学校主张“艺术学校应当成为纯粹研究艺术的学

[1] 蔡元培：《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

府”；“艺术学校所给予学子者，是艺术的基本方法及经验，使之成为未来的艺术家或大艺术家”。学校的口号是：“介绍西方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培养高深艺术人才，建校初期，即设研究部、研究室和毕业生研究室，招高等艺术学校毕业生入学，开创了我国艺术教育中培养研究生的历史。

学校重视基础技能训练，突出素描，也重视艺术理论课。设中国美术史、西洋美术史、美学、色彩学、解剖、透视等课程。对一般的文化知识要求很高，设有国文、外国文（包括法语、德语、英语、日语）、几何画、博物等课程，尤重视外国文。

学校提倡课外艺术活动，曾出有《亚波罗》《亚典娜》《神车》和《艺术旬刊》等刊物，作为学术交流和介绍国外艺术的园地。

民国19年（1930）秋，学校易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并改系为组，修业期限改为3年。因认为3年不易造就人才，从而附设艺术高中部，招初中毕业生，修业3年后，升入专科学习。民国21年增设音乐组。民国22年增设建筑艺术组。民国23年秋，艺术高中部改名为“高级艺术科职业学校”。民国28年，中国画、西洋画重新分开。学制分本制、新制两种。本制3年，招收高中毕业生；新制5年，招收初中毕业生。5年制一、二年级不分科，着重普通教育。3年制及5年制三年级以上分国画、西画、雕塑及图案四科。附设的高级艺术科职业学校停办。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学校在民国26年（1937）11月先迁浙东诸暨，未及10天，又西迁江西贵溪。民国27年3月，遵教育部令，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改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址设在湖南沅陵。废校长制，设校务委员会，林风眠任主任委员，赵畸^[1]、常书鸿^[2]为委员。6月又恢复校长制，滕固^[3]为



林风眠

[1] 戏剧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毕业，原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2] 法国巴黎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原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3] 德国柏林大学博士，擅长美术史。

校长。同年冬，迁云南昆明。民国28年（1939）夏，迁滇池东岸呈贡县安江村。学校初创时，院长林风眠主张中西艺术交融，把国画系和西画系合并为绘画系。同年，在潘天寿等教授提议下，国画、西洋画分开。



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俞美娜 摄）

民国29年（1940）秋，吕凤子^[1]继任校长之职。同年，音乐组因教师难聘，停止招生，次年归并于国立音乐院。建筑组并入国立中山大学。民国30年春迁重庆青木关。民国31年迁重庆沙坪坝。同年暑假，陈之佛^[2]继任校长。民国33年春，潘天寿继任校长。民国34年创画室制，一位教授主持一个画室，画室以教授姓名命名。西洋画本科二年级学生均可自选入某一画室学习。这种做法，成为学校艺术教育开创流派的先例。

抗日战争胜利后，师生于民国35年（1946）暑假陆续返杭，并定校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潘天寿任校长。因原校舍罗苑被浙江大学收回，于是在孤山照胆台旧址（今孤山路）添造办公楼和教室。10月上旬正式上课。民国36年，汪日章^[3]任校长，直至1949年5月杭州解放。

1950年11月，学校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952年，院系调整，设绘画、雕塑2系。1955年撤销绘画系，设彩墨、油画、版画3系。1956年改称“杭州美术学院”。1957年6月迁至南山路。设绘画、雕塑、实用美术3系。同年12月，彩墨系改为中国画系。1958年6月，学校更名为“浙江美术学院”。同年，增设工艺美术系和民间美术系。1960年被文化部列为直属重点高等美术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校址一度迁至桐庐县阳普大队，后迁回。1977年恢复系科，招收本科生。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0年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

[1] 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国画手工科毕业，曾任中央大学国画主任教授。

[2] 日本东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专攻图案及艺术理论，曾任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

[3] 法国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毕业，曾任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主任。

1993年，学校改名为“中国美术学院”，并沿用至今，是国内学科最完备、规模最齐整的综合性美术学院之一。学院现有南山、滨江、张江（上海）和象山4个校区，校本部位于南山路218号。总占地面积66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29.5万平方米。设有造型学院、设计学院、建筑艺术学院、传媒动画学院、上海设计艺术分院和国际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分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等教学机构。美术学和设计艺术学两大主体学科均已获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俞美娜 摄）

美术学院、传媒动画学院、上海设计艺术分院和国际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分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等教学机构。美术学和设计艺术学两大主体学科均已获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

（十二）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曾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民国16年（1927）秋，以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2]为基础，在原浙江高等学校^[3]旧址上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设有工学院和劳农学院。民国17年4月改称“国立中华民国大学院浙江大学”。同年7月1日起称“国立浙江大学”，并增设文理学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学校西迁贵州。民国28年4月，在浙江龙泉县设立分校。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民国35年9月迁回杭州。

至1949年5月杭州解放时，全校共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

[1] 民国9年（1920）秋由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改组建立，校址在报国寺原铜元局。课程参照美国工学院设置，课本用外文原本。

[2] 前身是浙江农业教员养成所农学科，民国13年（1924）秋由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改组建立，校址在笕桥。

[3] 前身为求是书院，是杭州知府林启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1897年5月21日）在蒲场巷普慈寺（今大学路）创办。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正月改称“浙江大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定名“浙江高等学堂”。求是书院自创建至改为浙江高等学堂，师生中逐渐形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求是学风。学生中不少是有志于新学的人，教师更不乏有识之士，学校成为杭州暨浙江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学生中人才辈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是书院早期学生。辛亥革命后，改称“浙江高等学校”。民国3年（1914）停办。

院，24个系，10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学生1600余人。同年8月，国立英士大学^[1]并入。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学校部分系科转入其他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留在杭州的主体部分被分为多所单科性院校，后分别发展为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同时将私立之江大学^[2]部分系科并入，调整后的浙江大学设4个学系，10个本科专业，10个专修科。



位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竺可桢两问石（俞美娜 摄）

1954年春，学校陆续从大学路迁到老和山下新址。1957年重建数学系和物理系。1963年9月被列为全国重点高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增设管理学科、社会学科和文科。1981年11月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之一。1984年12月建立研究生院。1985年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制度。同年，成为国家教育委员会直属重点高等学校。

1998年9月，浙江大学与同根同源的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实现合并，组建新浙江大学，迈上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

浙江大学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点大学。设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11大门类，115个本科专业。有39个博士后流动站，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1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81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312个，另有临床医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及法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教育、农业推

[1] 初名“浙江省立战时大学”，于民国27年（1938）11月开始筹备，民国28年2月正式办公。同年5月为纪念革命先烈陈英士，将校名改为“浙江省立英士大学”，分设工、农、医三院于松阳、丽水。民国31年12月改为“国立英士大学”。民国34年11月迁至永嘉，民国35年3月奉令移址金华。1949年8月为金华市军管会接管，并解散了英士大学，其院系分别并入浙江大学、复旦大学。

[2] 前身为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差会设于宁波的崇信义塾。同治六年（1867）迁至杭州，改名“育英义塾”，初设皮市巷，后迁大塔儿巷。光绪二十三年（1897）更名“育英书院”。宣统三年（1911）迁址二龙头，改名“之江学堂”。民国3年（1914）改名“之江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之江大学文、工、商三学院各系分别并入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上海同济大学 and 上海财经学院。之江大学结束。

广、风景园林、兽医、公共卫生、工程、建筑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13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有国家重点学科24个、重点(专业)实验室13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3个、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7个、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4个、战略产业人才培养基地3个、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1个、国家大学科技园1个(含南昌、宁波、温州、嘉兴、绍兴等分园)。

浙江大学坚持“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的教育理念，打造卓越教育品牌。“十二五”以来，作为牵头单位获得国家科技奖励一等奖5项、二等奖34项。

截至2016年12月，浙江大学教师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8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9人、文科资深教授9人、国家“千人计划”学者88人、“973计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等首席科学家41人、“长江学者”127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29人、国家级教学名师10人。学校拥有紫金港、玉泉、西溪、华家池、之江、舟山、海宁7个校区，占地面积426.57万平方米，校舍总建筑面积257.60万平方米，图书馆总藏书量693.5万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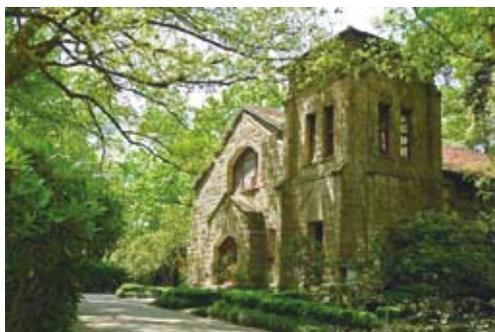
(十三) 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

“功如忠肃，学似文成，自古名贤数浙人。山川钟毓，代有奇英，六百同堂步后尘。文章惊海内，科学究专门，新旧中西一贯行。今日为多士，他年铸国民，教育前途定有声。”

这是杭州师范大学的前身——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的校歌。时隔百余年，依然能感受到豪迈深厚的人文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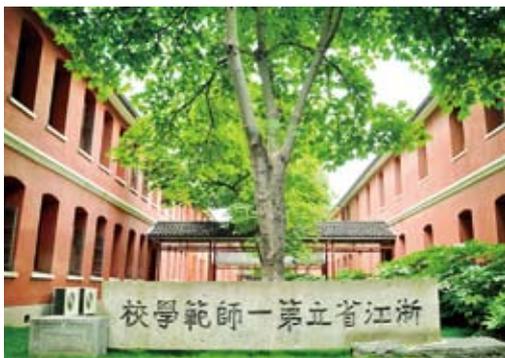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王惟惟 摄)



浙江大学之江校区(王惟惟 摄)

中国的师范教育起始于晚清，当时新式教育兴起，但与之相对应的师资力量却十分缺乏。“故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颁布《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将师范教育纳入国家办学体制。光绪三十一年，浙江巡抚张曾敷奏请创建全浙师范学堂^[2]，次年获得批准，定校名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分为优级师范和初级师范两部分，分别培养中学师资和小学师资。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俞美娜 摄）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校舍在浙江贡院旧址上建成，面积136亩，建有两层教学楼7幢，可容纳千人，另有模范小学（后改称“附属小学”）及风雨操场等建筑。学校在全省范围内招生，凡年龄在18~40岁的禀、贡、生、监，均可报考，报考者数以万计。当年5月14日（农历四月十五日）正式开学，初级师范有简易科生328名，体操专修及体操、英、数兼修科生110名，成为当时浙江唯一特建的、办学规模最大的新式高等学堂，也奠定了浙江近代师范教育的基础。

学堂历任监督^[3]多为科举出身，并有多人曾留学日本。历任教务长则都是留日学生。所聘日本籍教师在新知识、新教法的传授和示范方面都起过重大作用。本国教员亦多为才识兼优之士，学有专长，教授得法，著名的有经亨颐、马叙伦、许寿裳、周树人（鲁迅）、夏丏尊、钱家治、张宗祥、沈尹默、姜丹书等。

民国元年（1912）1月10日，依据《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要求，校名更

[1]（清）梁启超：《师范论》。

[2] 张曾敷在《奏请办全浙师范学堂折》中阐明了创建的原因和目的：“窃维自强之道，以造就国民为始基；于学之方，以养成教员为急务。是以《奏定学堂章程》载明急办师范为入手第一。浙省地滨江海，风气早开。自科举奉停，公私学舍林立。然学科程度之未能合格，实由教员、管理员骤难得人。虽高等学堂亦附设师范，并前经派百人赴日学习，然卒业期远，无夕旦可程之功；且人数无多，亦不足供通省教员之用。”因此请准设立全浙师范学堂，“为全省教育发达厚植其基础”，使“数年后一省之教员足敷一省中小学堂之用”。

[3] 历任监督：邵章、喻长霖、王廷扬、沈钧儒、夏震武、袁嘉谷、孙智敏、徐定超。

改为“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经亨颐任校长。同年夏，根据《师范教育令》，普通科优级部的师生并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优级部停办。民国2年5月，根据《筹设省立师范学校决议案》规定，初级部在原址改设第一师范学校。7月，学校改称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至民国4年6月，最后一届图画音乐手工专修科学生毕业，学校成为中等师范学校，以培养小学教员为主。

民国8年（1919），五四运动爆发。同年11月，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二期发表《非孝》一文，主张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道，一石激起千重浪，引发“一师风潮”，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一师”在浙江和杭州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经亨颐任校长12年，为学校树立了优良的教风与学风。他倡导“人格教育”，提出“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尊重学生个性发展，主张合理引导。定“勤、慎、诚、恕”为校训，作为教导学生的标准。

优秀教师团队使“一师”在教育界领一时风气之先，如：浙江最早的美术展览（1913年春）、浙江最早的音乐会（1913年夏）、中国最早的人体写生教学（1914年，李叔同）、中国最早的现代版画艺术实践（李叔同、夏丏尊编《木版画集》）、中国人自行编撰的第一部西洋美术史（李叔同）、中国音乐史上最早的合唱曲（李叔同《春游》）、中国最早的美术史教科书（姜丹书《美术史》）、浙江最早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浙江新潮》（1919年）、《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1920年，陈望道）、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1922年《诗》）、浙江最早的新文学团体（1921年“晨光社”、1922年“湖畔诗社”），等等。^[1]

民国12年（1923），根据北京政府教育部和浙江省教育厅相关要求，学校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合并，称“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设师范部和中学部。后高、初中分办，高中部改为浙江省立高级中学，设师范科和普通科。



杭州师范大学下沙校区（俞美娜 摄）

[1] 万润龙：《经亨颐、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中国师范教育》，新华网-文汇报，2008年6月27日。

两校合并后，师范科部分教学规模日渐萎缩。至民国17年时，浙江省立高级中学师范科3个年级学生人数仅为70人。

民国20年（1931）4月，为解决初等教育师资欠缺的燃眉之急，浙江省议会通过《整理浙江省师范教育方案》，决定恢复师范独立办学体制。同年6月，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学校成立，9月正式开学。浙江省立高级中学师范科的师生并入，同时浙江省立高级中学不再设立师范教育。学校重视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社会实践，并着重提高在职小学教员的业务水平，多次举办各种讲座和进修班、函授班。

民国26年（1937）11月，学校为避战火，初迁建德，后迁至丽水碧湖，与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合并为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师范部。民国28年7月，师范部独立，改称“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师范学校”。

民国35年（1946），学校迁回杭州南山路校舍，恢复“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学校校名”。学校采取了一系列训导措施，培育民主精神，培育“负责、建设、力行”精神，加强课外活动，注重生产劳动训练。

1951年4月，学校更名为“浙江省杭州师范学校”，同年11月，被确定为浙江省重点师范学校。1953年9月，将学校幼稚师范划出，单独成立浙江省杭州幼儿师范学校。20世纪50年代，由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的办学需要，学校于1956年迁入文二街校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受到很大冲击，停止招收师范生，1970年又改办杭州第十三中学。在这一时期，学校经历了杭州师范学校—杭州师范学校中学部—杭州第十三中学—杭州师范学校的过程，办学对象也经历了培养小学教师—培养初高中学生—培养初中教师的变迁。

1978年12月28日，教育部下达《关于同意恢复和增设一批普通高等学校的通知》，核准杭州师范学院开办。至此，杭州师范学院以杭州师范学校为基础筹建，成为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主要培养初中和高中教师。

2000年，杭州师范学校、杭州教育学院、杭州市法律学校、杭州工艺美术学院先后并入学院。2001年，杭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并入学院。

[1] 今为中国美术学院。

2007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杭州师范学院更名为“杭州师范大学”。至2016年12月，杭州师范大学有仓前、下沙、玉皇山、古荡湾等校区，占地面积202.46公顷，校舍面积73.46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价值6.2亿元，图书馆藏书248.1万册。学校设有18个学院、1个基础教学部、1个国有民办独立学院（钱江学院）和1个直属附属医院（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刻书藏书

（一）文澜阁

文澜阁位于西湖孤山南麓原清代圣因寺行宫（今浙江省博物馆）内。它的命运与《四库全书》密不可分。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皇帝下诏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书成。“因思江浙人文渊藪”，“再行缮写全书三分，分贮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内拟改建文澜阁”^[1]。

据《清史稿》记载，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丙申，建浙江文澜阁”。据军机处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档载：“杭州西湖添建文澜阁，所有碑刻匾额，现奉旨发下墨



文澜阁图（来源于《文澜阁志》）



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封面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宝四张”。由此可见，此时文澜阁尚未竣工。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三月到达杭州，此时文澜阁已建成，由两浙盐运分司掌管，“当钟声催暝，见碧琉璃瓦，鳞鳞然与雷峰之夕照遥相掩映^[1]”。乾隆皇帝御览之后，题“敷文观海”匾额，下谕旨：“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而使“读书稽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2]从此，杭州有了一座供众人阅览的皇家藏书楼，西湖边添了一处端雅秀丽的胜迹。

《四库全书》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开始陆续颁发，交由两浙盐政领运度阁，至乾隆末年颁齐，共计35990册。书为绢面包背装，其色为经部绿，史部红，子部蓝，集部灰。“书用泾县白棉纸，长官尺准七寸七分，阔连中折准三寸九分。半页凡八行，行二十一字。每部首列提要一篇，附总纂官、总校官臣姓名，末缀誊录生、校对生臣姓名。另粘黄签，详校官臣姓名。每册首页印钤‘古稀天子之宝’白文，后页印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印上另衬素纸，以御油硃。每册底面绢裹粘钉，不压线。每函用香楠木匣收储，匣内衬以香楠夹板，便抽纳也。素绫牙签，册中夹冰麝、樟脑包各二，以避蠹。”^[3]储藏方式仿照文渊阁，排架度藏。《四库全书》全部入阁后，另编有手抄清册档。清道光十九年（1839），文澜阁归诂经精舍监院掌管^[4]。

清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九日，太平军占领杭州。文澜阁一度作为太平军兵营，加之战场就在附近，导致阁圯书散，所藏书籍大半流落民间。清同治元年（1862）正月，杭州钱塘县人丁丙、丁申兄弟避兵祸于城外，偶然见小贩所用包物纸竟是《四库全书》书页，才知文澜阁被毁，阁中藏书散佚。于是召集胆大者数人，许以厚酬，乘夜潜入杭州城内，在文澜阁旧址摸黑捡拾残书，昼伏夜出，“每夕往返数十里”^[5]，所得残书辗转运至上海，并嘱托杭州书商继续搜寻散佚民间的文澜阁藏书。同治三年，太平军兵败撤离杭州，丁氏兄弟将所收集到的藏书悉数运回杭州，“所有陆续收获阁书共八千六百八十九

[1]（清）孙峻、孙树礼：《文澜阁志》卷下《艺文》。

[2]（清）孙峻、孙树礼：《文澜阁志》卷首《纶音》。

[3]（清）孙峻、孙树礼：《文澜阁志》卷上《图说》。

[4]徐荣：《题陈勤斋西湖掌管图书》：“诗第四句‘百年监管到儒官’注云：‘阁中书向掌于盐运两分司，道光十九年始议归诂经精舍监院掌管。’”

[5]（清）孙峻、孙树礼：《文澜阁志》卷下。

本”^[1]暂存于杭州府学尊经阁^[2]。缺失部分，丁氏展开补抄，以八千卷楼藏书为主，兼有5省16家民间藏书楼，北至京城，南到广东，补抄3103种。因经费不足，所抄书卷全部换成了纸面，楠木匣改用银杏夹板，易架为橱。

清光绪六年（1880），丁氏兄弟向浙江巡抚谭钟麟建议重修文澜阁，于十月初八动工，历时一年修复，基本还其旧观。重修后的文澜阁坐北朝南，背山面湖。入围墙大门，内为待漏房9间和垂花门，从正门而入，迎面是一座狮象群假山，假山上东为月台，西为趣亭，中开洞径，玲珑奇巧。走过假山是厅，厅中新建平房5间，厅前有大水池，环绕三边为太湖石，一边为石栏。池中矗立太湖巨石“仙人峰”^[3]，因石形似人而得名。厅分二道，西往游廊，东通御碑亭。碑正面刻清高宗《题文澜阁》七律诗，背面刻乾隆四十七年（1782）复抄江南三部《四库全书》上谕。池北为文澜阁。文澜阁建筑风格参照文渊阁式样，而庭院、假山、水池等布置，又有着自己特色。阁脊两头为龙头，檐端前后各有两尊神像。阁木结构，双檐，东西两面砖风火墙，以防火。阁外观为两层，中间有一夹层，实为三层楼房。楼有六楹，其中西边一楹为楼梯，取“天一成水，

[1]（清）孙峻、孙树礼：《文澜阁志》卷上《公牍》，《候选主事丁丙恭缴阁书拟暂储杭府学尊经阁禀》。

[2] 原址位于劳动路杭州碑林。

[3] 与杭州曲院风荷之“绉云峰”、苏州留园之“冠云峰”合称“江南三名石”。

文澜阁局部（俞美娜 摄）



地六成之”意。窗扉皆为绿色，意取水色克火。楼建于台基上，台前有护栏。阁上檐中间悬挂“文澜阁”满汉文匾额。原匾额题字为清高宗御书，已毁。今匾额题字本请光绪御书，结果由南书房代笔，由北京制好送至杭州。阁东有御碑亭，碑正面刻“文澜阁”满汉文，字与匾额相同，背面刻有光绪七年（1881）上谕，由浙江巡抚谭钟麟书写。整体文澜阁为古典园林建筑，阁苑相得益彰，宽朗清雅，疏密得宜。

重抄后的《四库全书》，经部14橱，史部24橱，子部24橱，集部32橱，合计94橱。庋藏仍按原式，只是子、集二部位置出现了变动，改为中贮集部，两边贮子部。藏书《古今图书集成》，为雍正四年（1726）内府铜活字印本，原有5020册，兵乱后仅寻回673册。浙江巡抚谭钟麟向杭州鲍氏知不足斋后人购进其家藏原印开化纸本，入藏文澜阁^[1]。光绪十七年（1891）又颁武英殿刊清世宗雍正皇帝撰写的《劝善要言》一册，入藏文澜阁。光绪二十一年升任闽浙总督的谭钟麟将闽刻《武英殿聚珍本丛书》143种1000册送藏文澜阁。此四种书合装4橱，储一楼中。

修复后的文澜阁仍继承对外开放的传统，“如有士子请书观览……就别舍翻览，或抄、或摘，不得移借流损”^[2]。

清宣统元年（1909），学部下文限各地于宣统二年一律建立图书馆。浙江巡抚增韫据浙江提学使袁嘉穀提奏请，以文澜阁旁空地建浙江图书馆。奏准后，于宣统三年开始建新图书馆。经省咨议局讨论，决定将文澜阁归属图书馆。民国元年（1912）浙江图书馆孤山馆（今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落成，将文澜阁所有藏书全部移至图书馆，从此书阁分离^[3]。民国17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成立，因馆舍不敷，文澜阁借为该馆历史文化部之用。杭州解放后，文澜阁由浙江省博物馆使用。1981年，文澜阁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座皇家藏书楼经过1974年、1984年、1993年、2006年四次较大规模的修缮，仍保留原建筑的格局与风貌。

[1] 其书为乾隆间编《四库全书》时因鲍士恭进呈623部书而得的赐赏。

[2]（清）孙峻、孙树礼：《文澜阁志》卷上《公牍》。

[3] 童正伦：《文澜阁与藏书》，《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6年第2期（总第106期）。

（二）浙江图书馆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有识之士邵章^[1]和胡焕借城东菜市桥畔的东城讲舍旧址^[2]开设杭州藏书楼，是浙江图书馆的前身。杭州藏书楼确定开设之时，比清朝政府颁布图书馆章程早了9年，是杭州第一所具有近代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

建楼之初，有藏书718种、9499册，报章14种，均可借阅^[3]。光绪二十九年（1903），易地大方伯里扩建藏书楼，更名为“浙江藏书楼”。经浙江学政张亨嘉汇通抚院奏请，十月二十七日，光绪赐“敦彝牖慧”^[4]匾额，并准奏调取各省官书局所出书无偿送缴浙江藏书楼，遂使浙江藏书楼成为我国最早接受政府出版机构呈缴出版物的省级藏书机构。在同年付梓《浙江藏书楼书目》甲编2册、乙编1册中，共收录藏书7万卷、3.5万册。清宣统元年（1909），浙江官书局并入浙江藏书楼。为充实馆藏，宣统三年六月，文澜阁及所藏《四库全书》并其他阁藏图书拨归。

民国2年（1913），藏书楼改称“浙江省立图书馆”。3月，以孤山路馆舍为总馆，正式开放，原大方伯馆舍改设分馆。民国4年12月，浙江图书馆馆刊《浙

[1] 邵章（1872—1953），近现代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字伯炯、伯纲，一作伯裂，号倬盒、倬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邵懿辰长孙。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历任杭州府学堂、湖北法政学堂及江三省法政学堂监督，奉天提学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北京政府评政院评事兼庭长、院长等职。

[2] 位于菜市桥西，原为孝义庵，清同治四年（1865）由杭州知府薛时雨改建为东城讲舍。

[3] 记载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邵章撰写的《杭州藏书楼书目》。

[4] 意为促进法理，开启智慧。

浙江图书馆曙光路总馆（来源于浙江图书馆官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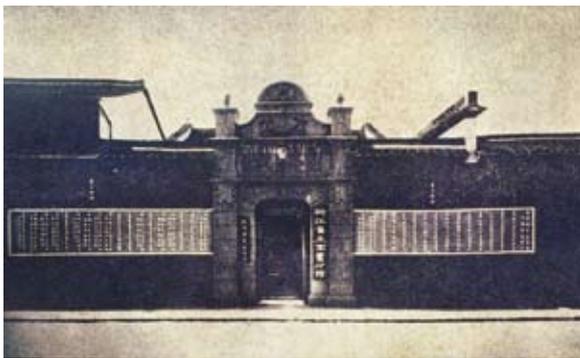
江公立图书馆年报》创刊，开创了中国图书馆界专业期刊编辑出版之先河。

民国5年（1916），改称“浙江公立图书馆”。民国6年，制定《浙江公立图书馆办事细则》，对馆内业务工作首次做了详细规范。

民国16年（1927），改称“浙江省立图书馆”，设国文、西文两部。自民国19年起，开展馆外图书流通工作。民国21年1月，著名学者陈训慈出任馆长后，有感于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重藏轻用及借阅欠发达^[1]，积极推行普及社会教育与提高学术研究并举的方针，在全国率先实施新型办馆模式，开办省内通信借书，扩大馆外图书流通，大方伯里分馆实行图书开架借阅。

民国21年（1932）9月15日，大学路馆舍作为总馆投入使用，更名为“浙江图书馆”，原孤山总馆改为孤山分馆，大方伯里分馆称“新民分馆”。民国24年，全年购买图书4925种、12956册，达到了民国时期的最高点。除开展图书借阅外，浙江图书馆还较早地开展学术研究服务，民国24年（1935）创刊《文澜学报》，邀请当时学界名流如张寿镛、朱希祖、竺可桢、张其昀、马寅初、郁达夫、夏丏尊、夏承焘、蒋复璁等来馆开设讲座。

民国26年（1937）12月1日，为避战火，浙江图书馆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抢运至龙泉，后经庆元、贵州，最后运至重庆。馆部自民国26年11月至34年9月，先后搬迁至建德、兰溪、永康、龙泉、丽水、青田等地，并在各地设置了办事处、流通部或分馆。民国34年底，迁回杭州，另接收原汪伪图书馆^[2]书刊22万余册，全馆共有藏书40万册。



浙江省立图书馆新民分馆（摄于1913年）

[1] “惟以往昔观念，典藏为重，致用多忽，为好学之士研读之所，未尝广一般社会之应用。”“然阅览手续有未尽，设备不逮今兹，而借书必以保证金为保证，清寒或畏烦者裹足，尤为阅借不能发达之要因。”（浙江图书馆：《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2] 民国28年（1939）6月，汪伪政权以搜得的藏书为基础，以原新民分馆为总馆，设立浙江省立图书馆。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浙江图书馆由杭州市军管会文教部接管。1951年起，先后在城区建立8个流通站、61个农村图书馆。“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机构陷于瘫痪，被迫停顿。1966年底，全馆闭馆，被用作“红色工人运动史”展馆。1972年底，动工扩建大学路馆舍外借楼书库，至1977年9月建成，建筑面积2300平方米。1978年以后，经过内部整顿，加强各项基础工作，管理逐步走上科学化，多层次多渠道为读者、为科研服务，充分发挥传递信息的职能。

1998年12月，曙光路总馆投入使用。曙光路总馆条件优越，设施先进，有中文报纸阅览室、中文文学图书借阅室、电子阅览室、多媒体视听室等20个服务窗口。

浙江图书馆现有4处馆舍：以曙光路馆为总馆，另有大学路馆舍（大学路102号）、孤山馆舍（孤山路28号）、湖州南浔镇嘉业堂藏书楼。总建筑面积4.9万平方米。现有藏书逾421万册，古籍珍藏丰富，地方文献齐全。宋元明清善本图书约18万册，尤以文澜阁藏书《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著称。

（三）杭州图书馆

杭州图书馆成立于1958年7月，原名“杭州市图书馆”。初建时，借新华书店会议室作为借阅场所，同年11月迁青年路见仁里6号。1961年5月改为现名，



杭州图书馆总馆（俞美娜 摄）

1963年成立杭州图书馆儿童分馆。1978年后，杭州图书馆经费、人员逐年递增。1986年5月1日，杭州图书馆迁址浣纱路254号，馆舍面积5288平方米，其中书库885平方米、阅览室750平方米，有座位300个。另有见仁里馆舍面积774平方米，作为古籍部。藏书总数645206册。其中古籍57128册（内有善本3417册），英文图书1015册（种），报刊合订本28587册。订期刊1549种、报纸152种。藏有《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杭州新志稿》《杭县志稿》《玉皇山志稿》等重要地方文献。各类参考工具书有4000多种。设公务书名目录、分类目录和读者分类目录、书名目录、著者目录。古籍图书按四部法分类，设分类目录、书名目录各两套。期刊阅览室设有刊名目录。杭州图书馆除提供图书外借、阅览等服务外，还担负着对全市各图书馆（室）的业务辅导与组织协办任务。

2008年9月30日，杭州图书馆迁址钱江新城市民中心J座裙楼，馆舍面积4.4万平方米。杭州图书馆以“平等、免费、无障碍”为宗旨，打造“平民图书馆、市民大书房”。同年，率先取消在全国公共图书馆实行多年的借书证押金制度，杭州市户籍居民可持市民卡与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到馆免费、免押金开通借阅功能，该举措随即在全市推广。11月，《文汇报》以“杭州图书馆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凸显平民意识”为主题，解读杭州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其中《豪华图书馆的平民取向》一文首次在公开媒体披露杭州图书馆接纳乞丐与拾荒者进门读书看报的现象。

杭州图书馆现有5处馆舍，分别为：总馆（解放东路58号市民中心J座）、生活主题分馆（浣纱路254号）、佛学分馆（上天竺317号）、运动分馆（文一西路荆长大道以东200米八方城六号楼）、环保分馆（天子岭静脉小镇，拱墅区临平路90号）。

至2016年，杭州图书馆藏书总量4647000册，读者持证量3385000个。实现年读者到馆量3529000人次，文献外借量3350000册次。

（四）杭州刻书印刷业

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中国印刷史的发展过程中，杭州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唐代，杭州已有书坊，印刷业在全国享有一定声誉。

吴越国时期，杭州已有雕版印刷精美的佛经。吴越国刻印佛经的活动，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刻板、印刷能手，为宋代杭州成为全国重要的印刷基地打下基础。

北宋时期，杭州的刻书业名声已居全国之首，刻印的书籍不仅雕刻技术精良，而且印书的纸张、刻板的木质俱佳。因此，北宋官府出版的书籍，多选择到杭州镂刻。杭州刊印的有监本《新唐书》《资治通鉴》《史记》《汉书》《后汉书》《周易传》《十三经》等计1662卷，以及医书等。杭州除承办国子监刻书，还有其他官刻本，如《旧本杭州图经》《吕氏春秋》《楚辞》《东坡集》等。当时的“市易务”刻书机构，为官办刻书所。鉴于杭州雕版印刷业发达，宋哲宗旨令将《资治通鉴》送往杭州雕印，于北宋元祐七年（1092）刊印行世，是当时最好的版本。

除官方经营的刻书业外，私人刻书业也十分兴隆，行销全国。北宋淳化年间（990—994），有陈氏万卷堂《史记》印行。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有前后《汉书》印行。北宋哲宗年间（1086—1100），福建泉州商人徐戩受高丽国委托，曾在杭州刻印《华严经》。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杭州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它的应用开创了印刷史的新纪元。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延续了近千年的时间，对促进世界文明的进程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南宋时，杭州成为全国刻书出版业中心之一。今天鼓楼至众安桥一带是当时书坊集中之地，亦是出版发行中心。南宋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八中评论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

南宋初年，杭州猫儿桥^[1]河东钟家印行的《文选五臣注》，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图书馆。当时有名可考的刻书铺有20余家，以陈解元父子^[2]刻的唐宋名人诗集与笔记小说100多种最为有名。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南宋“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都是当时杭州刻印的精品。杭州刻本用笔方整，刚劲挺秀，刀法娴熟，转折笔画轻细有角，成为后世

[1] 今光复路平津桥弄附近。

[2] 即陈起、陈思父子。所经营的书坊有位于棚桥北睦亲坊（今粥教坊）的陈宅书铺和传于棚北大街的陈解元书籍铺。他们拥有刻坊，刻印的书籍颇受时人欢迎。后称“书棚本”。

刻书的范本。

元代，杭州仍是重要刻书地之一。元朝廷所修的三部大型史书：《辽史》160卷、《金史》135卷及《宋史》496卷，都是杭州路儒学“钁梓^[1]印造装褙”^[2]的。另有官刻本《礼经会元》《说文解字》《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六书统》《国朝文类》等20余种。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所刻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为元代刻本中的代表。西湖书院还藏有南宋国子监书版20多万片。

元代寺院刻佛经甚多，最著名的有：杭州南山大普宁寺于元初刻印的《大藏经》567函、6000余卷，世称《普宁藏》；大德年间（1297—1307）在杭州路大万寿寺^[3]刻的《河西字大藏经》3620余卷。“河西字”即西夏文，说明杭州当时已能刻印少数民族文字。另外，还有勤德堂、万卷堂、董氏翠岩精舍等民间书坊，刻有《关大王单刀赴会》《赵氏孤儿》《李太白贬夜郎》等元杂剧本。

明代杭州印书质量不如宋元，但数量不少。官府在杭州刻印《大唐六典》《西湖游览志余》等44种，在严州府刻了《观光集》等8种。私家刻印有《唐宋丛书》《楚辞章句》《吴越春秋》《广汉魏丛书》《清平山堂话本》等15种。

明代杭州还刻印多种佛经：灵隐寺刻有《指目录》，昭庆寺刻有《妙法连华经》，以余杭径山寺刻印的《径山大藏经》6956卷最有名。当时，杭州的书铺大多设在涌金门、弼教坊、清河坊一带，有清平山堂、勤德书堂、藏珠馆、容与堂、郭宅纸铺等24家，其中以容与堂刻印的小说、戏本最为精美。

清代杭州官刻书不如宋、明时期之盛。清同治六年（1867），官府在杭州设立浙江官书局，所刻书籍多半是“御纂”“钦定”的本子，此后到光绪十一年（1885），先后刻印《钦定七经》《御批通鉴》《九通》《二十二子》等200多种。清光绪二十三年，杭州有了铅字排版的技术。

清代的私家刻书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著名文人的著作和前贤诗文，大多是手写上版，即所谓“写刻”，是刻本中的精刻本。有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赵起杲的《聊斋志异》青柯亭本，卢文弨的《抱经堂丛书》，丁申、丁丙兄弟的《武林掌故丛编》《当归草堂丛书》《武林往哲遗著》等。另一类是藏书家和校勘

[1] 钁梓即刻板印刷。书板多用梓木，故有此称。

[2] 《金史附录·进金史表》。

[3]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又名“径山万寿禅寺”。

学家辑刻的丛书、逸书或影摹校勘付印的旧版书，有卢文弨的《群书拾补》等。

书院刻书是当时特色，特别是以经史训诂为主的书院，刻印学者自己的著作，汇印有学术价值的书籍。如阮元创立的诂经精舍，刊有《诂经精舍文集》8集；紫阳书院刻印的《铁桥志书》2卷、《文喜堂书集》3卷、《婺源山水记》2卷，都是清刻本中的善本。

资料链接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刻本

民国13年（1924）9月25日，杭州雷峰塔倒塌，发现塔内经卷，印有“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字样，系北宋开宝八年（975）刻印。雷峰塔陀罗尼经卷全长210厘米，高7.6厘米，卷首刻礼佛图，次为经文，经文首行11字，其他每行10字，全卷271行，共2700余字。经纸分棉纸和竹纸两种，卷端题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岁八月日记”等字。该经卷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版画实物。

一、诗词歌赋

据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记载，从先秦到近代，杭州籍的文学家共有310余人。东汉时，淳安方济、方储和方俨兄弟3人，即以文学知名。唐代，杭州是浙东“唐诗之路”的必经之地。宋之问、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著名诗人均曾先后来此游历。“钱塘风景今古奇，杭州太守例能诗。”白居易在长庆二年至四年（822—824）任杭州刺史期间，吟遍杭州四时景色，使西湖声名鹊起，四方文士麇集，多名篇佳作传世，促进了杭州文学的发展。杭州籍诗人贺知章、方干、罗隐等诗作著称于世。皇甫湜是中唐著名的散文大家。其子皇甫松以词为时人称许。诗歌皆得江山助，风光各以文章显。杭州由此逐渐名显海内，并成为诗人重要的创作园地。

宋代，杭州文学趋于繁荣。苏轼于北宋熙宁四年（1071）出任杭州通判，北宋元祐四年（1089）又出任杭州知州，“居杭积五载”，所到之处，皆有题咏，留下诗词400余首。更因苏轼的文名，在他周围集合了一批文人墨客，文学创作相当活跃，杭州一时成为南方文坛的盛地。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人荟萃，名家辈出。两宋期间，杭州的著名文学家有：西昆派重要诗人钱惟演，“以乐府独步”而成为两宋词脉纽带的周邦彦，杰出女词人朱淑真，以及宋末元初格律词派的重要代表周密、张炎等。此外，市民文学戏文和话本的崛起，也是南宋临安文坛空前繁荣的一大特色。

明清以降，除诗词曲宏富以外，杭州的文言小说、传奇、拟话本和长篇白话小说作者甚多，作品数量可观，并不乏有全国影响的上乘之作。明代瞿佑的传奇小说《剪灯新话》，上承唐宋传奇的余绪，下开《聊斋志异》之先河。清代毛奇龄与毛先舒、毛际可有“浙中三毛，文中三豪”之誉。厉鹗为浙西词派的重要作家，主盟江南江北词坛数十年。袁

枚是乾嘉时期的代表诗人和诗论家。龚自珍则开创了中国近代文学的新篇章。

近代后期，杭州有识之士开始创办文学报刊，运用文学手段，引入世界潮流，启蒙民智；反映社会现实，激人奋起。夏曾佑是“诗界革命”倡导者之一，谭献为近代词坛大宗师之一，章炳麟为近现代的著名学者和散文家。他们的作品既促使了新旧文学的交替，也闪现出变革社会、寻求强国的思想曙光。



王旭烽《茶人三部曲》(俞美娜 摄)

“五四”文学革命开启了杭州现代文学的新篇章。我国新文学前辈作家鲁迅、朱自清、俞平伯和叶圣陶等曾先后来杭任教，培养了一批新文学的后起之秀。20世纪30年代，以在杭报刊编辑、大中学校师生为基本作者队伍，文学创作、理论研究和民间文学采录整理，一度颇有成绩。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的进步作家和文学青年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活跃于敌占区和浙西战区，以文学宣传群众，弘扬民族解放之精神。民国时期，杭州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夏衍、戴望舒、施蛰存、陈大悲、濮舜卿、孙用、冯亦代等，以他们的创作和理论，为现代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文学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一支以工人文艺骨干为主的创作队伍崭露头角。他们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文坛富有生气，但其作品以突出为政治中心服务的居多。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杭州文学界备受摧残，活动基本停止。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杭州文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随着杭州市作家协会的恢复活动、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成立，创作队伍日益壮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杭州文学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繁荣发展局面。1985年底，全市有作家协会会员211人，其中省作家协会会员86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3人；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103人，其中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30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9人。

至2005年，杭州文学队伍稳定扩大，作家素质大有提高。全市有作家协会会员648人，其中省作家协会会员236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53人；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245人，其中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83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17人。各区、县（市）的文学队伍相应扩大，创作实力大为增强。全市共出版中短篇小说集94部、长篇小说141部、诗歌集134部、散文集253部、儿童文学集92部、文学丛书19种120部、文集1套8卷、文学理论批评专著169部、民间文学集68部。杭州作家在全国性文学评奖中获得各类奖项12人次，其中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第一部、第二部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各类文学作品获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有长篇小说14部、中短篇小说集33部、诗集14部、散文集25部、杂文集4部、报告文学集8部、纪实文学集5部、儿童文学集10部、文学评论32部（篇）。

2014年，杭州文学界组织作家、文学爱好者参加国内外各种文学创作活动及评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文学、民间文学等领域均有获奖。余华获意大利2014年度G. Acerbi文学奖；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在英、美等21个英语国家同步上市，并被收入“企鹅经典文库”，成为被该文库收录作品的首位中国当代作家；朱晓军、梁春芳的长篇报告文学《天地良心——中国最美渔民郭文标》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出版重点选题，是浙江省唯一入选的文学作品；朱晓军、李英的报告文学《让百姓作主——浙江省琴坛村罢免村主任纪实》获第六届“北京文学”奖。在第六届鲁



麦家《解密》

迅文学奖评选中，杭州作家有8件作品入围，涉及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和文学翻译5类。长篇报告文学《护航亚丁湾沉思录》《地上地下》《动漫之都》等12件作品分别获省、市“五个一工程”奖。

二、墨色丹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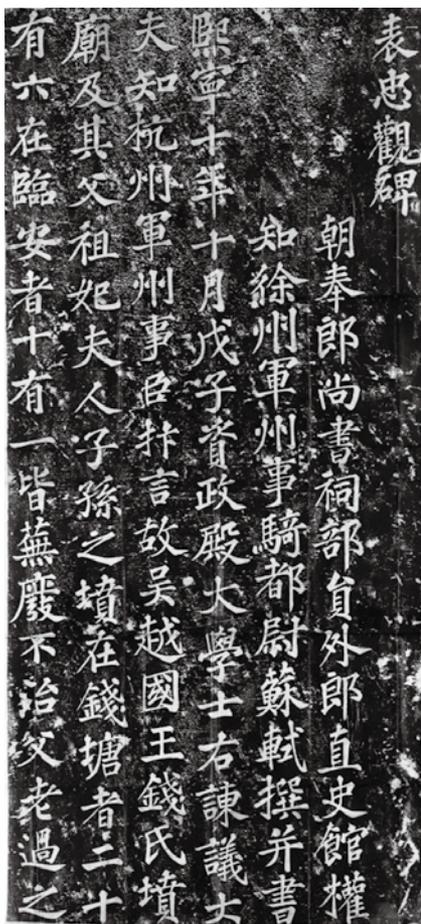
杭州，物盛人众兼有山水之美，书画艺术传统悠久。

东晋葛洪的书法被米芾称赞为“飞白大字之冠，古今第一”^[1]。

唐代，杭州经济的发展带来文化艺术的繁荣。唐初书法四大家之一的褚遂良，其书疏瘦劲炼、丰艳畅达，代表作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兰亭集序》临本等。白居易在杭书有《钱塘湖石记》《冷泉亭记》等墨迹，“不失书家法度”^[2]。还有孙过庭的草书《孙过庭书谱》《千字文》，贺知章的《孝经》《洛神赋》等。杭州画家萧悦，是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画竹高手。

宋代四大书家之一的苏轼，《表忠观碑》是其在杭期间的代表作。

南宋定都临安后，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充分融合，反映在书画艺术上，则是风格多样、名家辈出。宋高宗赵构在书法艺术上颇有造诣，其鸿篇巨制《南宋太学石经》影响深广。有“南宋第一”之评价的吴说，传世作品有《三诗帖》《二事帖》《叙慰帖》等。绍兴年间（1131—1162）



（宋）苏轼《表忠观碑》局部

[1]（宋）米芾：《海岳名言》。

[2]（宋）《宣和书谱》卷九《宛陵帖》。

重建画院，盛况不减北宋，有姓名可考的画院画家近120人，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李唐是其中杰出代表，在画风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代表作有人物画《采薇图》、山水画《万壑松风图》。刘松年擅长描写江南胜景，被誉为画院人中“绝品”。南宋画院后期著名画家马远与夏珪，发展了南宋院体绘画风格，他们的山水构图都取边角之景，人称“马一角”“夏半边”。李嵩的《西湖图》卷是现存宋代最完好的一幅描绘西湖全景的名作。

元代，杭州虽不再是都城，但江山如旧，吸引大量文人墨客。赵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1]，《杭州福神观记》《佑圣观重建玄武殿碑》是他留给杭州的艺术瑰宝。与赵孟頫同被誉为元代书坛“巨擘”的鲜于枢寓居杭州，他的楷书雄逸健拔，行书结构严谨，草书气魄恢宏，传世书法作品有《真草书千字文》《渔夫问》《青天词》等。著名画家黄公望于耄耋之年画就《富春山居图》^[2]，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达到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

明代，杭州聚集了大量隐逸之士，一举成为江南文化重地。在书画上，上窥魏晋，下法唐宋，又有创新。董其昌、陈洪绶在杭州曾留下传世名篇。于谦擅长行书，商辂运笔遒劲。钱塘画家戴进继承了南宋画院马远、夏珪的风格，形成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浙派”，其作品《风雨归舟图》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南屏雅集图》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春耕图》藏于



(明)蓝瑛《白云红树图》

[1]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

[2] 在清代遭焚时被抢出，现保存下来的前段长54.4厘米，人称“剩山图”，今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段长636.9厘米，人称“无用师卷”，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浙江省博物馆。被称为“浙派殿军”的蓝瑛，集浙派、吴门派风格于一身，开创武林画派，后人将他与沈周并重，在晚明影响很大。他画的《白云红树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明清时期的武林版画在中国美术史上享有很高声誉，明代代表作有顾炳摹辑、双桂堂刻的《历代名公画谱》，张梦徵绘、黄一彬刻的《清楼韵语插图》；陈洪绶的《张深之正北西厢》《博古叶子》等绣像插图，均为明清时期复制版画的精品。清代由任熊绘、蔡绍初刻的《列仙酒牌》《於越先贤传》《剑侠传》《高士传》等，为武林版画中的后起作品。

清代，康熙皇帝五次南巡^[1]，乾隆皇帝六下江南^[2]，为西湖山水留下了不少翰墨题咏。梁同书“负盛名六十年，所书碑版遍寰宇”，《寒夜诗轴》是他的代表作。“扬州八怪”重要成员杭州人金农，独创别具一格的“漆书”，他的《梅花图》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赵之谦客居杭州，他书法独树一帜，绘画笔墨豪放，是“海上画派”的重要先驱之一。俞樾中年定居杭州，其书法擅长八分，别具一格。清代后期“有海上画派三任”之称的萧山人任熊、任薰、任颐，其作品均属上乘。

吴昌硕是中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也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最擅长写意花卉，他以书法入画，形成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传世书迹有《苦铁碎金》《缶庐近墨》《西泠印社记》等。陈鸿寿，西泠八大家之一，《陈鸿寿隶书》是其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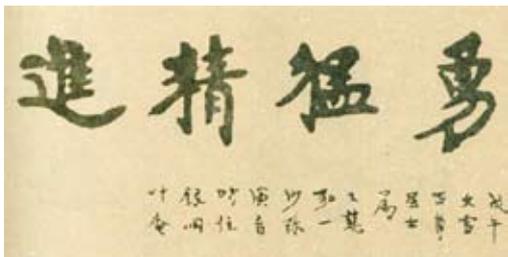
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传统书画艺术带来冲击和新机遇，油画、水彩画、素描、漫画和现代美育思想，以至国画改良应运而生。杭州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林风眠、李叔同、丰子恺、潘天寿、倪貽德、常书鸿等，或是杭州人，或活动于杭州，都是具有时代影响的重要人物。民国17年（1928）3月，在西湖孤山创办的我国第一所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3]，揭开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篇章。民国19年5月，国立艺术院进步学生陈卓坤等组织一八艺社，并

[1] 分别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康熙四十二年（1703）二月、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月、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

[2] 分别为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乾隆三十年（1765）闰二月、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月、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

[3] 即中国美术学院前身。

从事木刻版画创作。其中，汪占非的《纪念五死者》（即左联五烈士）、胡以撰的《饥民》等是中国现代最早的木刻版画作品。民国37年（1948），黄宾虹出任杭州国立艺专科学校^[1]国画教授，从此“黄山归客滞西湖”，创作了《湖山清晓》《西泠烟云》《栖霞岭上晓望》等佳作，成为山水画一代宗师。



李叔同书“勇猛精进”

有“二十文章惊海内”之誉的李叔同（弘一法师），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他的绘画创作主要在出家以前；其后多作书法。现存世《自画像》《素描头像》《裸女》，以及《水彩》《佛画》等画作。《自画像》，画风细腻缜密，表情描写细致入微，类似清末融合中西的宫廷肖像画，有较高的写实能力。《素描头像》是木炭画，手法简练而泼辣。《裸女》受其师黑田清辉影响，造型准确，色彩鲜明丰富，有些接近于印象主义。书法是李叔同毕生的爱好，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洗练，晚年之作谨严明净。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书画艺术得到重视并不断创新，形成了浙派风格，代表人物有潘天寿、黄宾虹、陆俨少、吴弗之等，其后有诸乐三、陆维钊、顾坤伯、陆抑非、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宋忠元、顾生岳、卢坤峰、吴永良、童中焘等。

活跃在当今画坛上的浙派新生代书画家继往开来，风貌纷呈，他们更具有当代意识，已与传统意义上的浙派拉开了较大的距离，在继承中开拓创新，在当代中国书画界独树一帜，其中不乏佳作。如陆秀竞《东海渔村》、张谷旻《鱼塘春晓》获首届中国山水画展铜奖。张谷旻《都江堰》《西域遗迹》入选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其中《都江堰》获优秀作品奖及浙江展区银奖。何水法《凌寒怒放》《春菜图》《翠蔓凌霄》《灼灼红芳》分别入选由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第六、第七、第八、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一串红》《迎春》《海棠花》分别入选全国第一、第二、第三届花鸟画展。

[1] 前身为国立艺术院，民国27年（1938）3月改校名为“杭州国立艺术专业学校”。

三、文学大家

(一) 贺知章

大多数人认识贺知章（659—744），是从他的一首诗开始的：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是贺知章在唐天宝三载^[1]（744），辞去朝廷官职，告老回到故乡越州永兴（今杭州萧山）时所写，当时他已86岁，距他中年离乡已有50多个年头了。

唐武周证圣元年（695），36岁的贺知章中进士、状元，是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资料记载的状元。初授国子四门博士，后任太常博士。唐开元十年（722），入丽正殿书院撰修典籍，后转太常少卿。开元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不久，又为太子右庶子，充侍读。开元二十六年，调任工部侍郎。不久，迁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贺知章为官之路虽然大器晚成，但也一路顺遂。



贺知章画像

盛唐时天下太平，涌现出了一批个性张扬的文人学士，贺知章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诗文以绝句见长，特别是写景、抒怀之作，风格独特，清新潇洒，深受人们的喜爱。他自号“四明狂客”，嗜酒如命，放浪不羁，与李白、张旭、李适之、李璡、崔宗之、苏晋、焦遂一起被称为“饮中八仙”。诗圣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写的头一位就是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贺知章越老越精神，与一帮文化名人饮酒作诗，而他又是之中的老者，年轻人都

[1] 天宝三载：“天宝”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共计15年。天宝三载正月朔改“年”为“载”，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二月复改“载”为“年”。



《饮中八仙图》

喜欢与他交谈。史书中是这样记载的：“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1]可见贺知章的随和和影响力。贺知章的诗作大多已散失，有19首被选入《全唐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要属《咏柳》了：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贺知章不仅能说能诗，他的书法也很有名，尤其擅长草隶，唐代书法家窦泉在《述书赋》^[2]中写道：“湖山降祉，狂客风流，落笔精绝，芳词寡俦，如春林之绚采，实一望而写忧。”窦蒙注云：“（贺知章）每兴酣命笔，好书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诗笔惟命……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窦氏



贺知章草书《孝经》

[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列传中·贺知章》。

[2]《述书赋》：作者窦泉，概述历代书家及其作品，上篇所述由上古至南北朝，下篇则由唐代高祖、太宗、武后以下，而终于其兄窦蒙及刘秦之妹。

兄弟评唐名家书多讥贬，唯推崇贺知章“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可知贺知章当时书法之声誉。但其留传下来的墨迹却很少，现尚存有绍兴城东南宛委山南坡飞来石上的《龙瑞宫记》石刻和流传到日本的《孝经》草书。

回乡后不久，贺知章便在故乡的一湾湖水中，安然睡去。若干年后，唐肃宗李亨评价他“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情致逸，学富才雄，挺会稽之美箭，蕴崑岗之良玉”^[1]，并追赠他为礼部尚书。

（二）朱淑真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才女辈出，代不乏人。如东汉末年的蔡文姬，唐代的薛涛和李冶，宋代的李清照。同样是在宋代，钱塘（今杭州）涌金门内的保康巷^[2]里，住着一位能与李清照相提并论的女词人——朱淑真。

朱淑真（1135—1180）是南宋著名的女词人，号幽栖居士，生于官宦家庭，她的父亲曾经在浙西做官，所以朱淑真从小家境优越。她善绘画，通音律，尤其擅长诗词，是当时有名的才女。她在快乐和无忧无虑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在她早年的诗句中可见一斑：



朱淑真画像

万水初阴莺百转，千花乍拆蝶双飞。
牵情自觉诗豪健，痛饮唯觉酒力微。
穷日追欢欢不足，恨无为计锁斜辉。

但是到了婚嫁的年龄，在封建制度的影响下，朱淑真的命运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朱淑真被迫嫁给了一个与自己情趣迥异、没有

[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列传中·贺知章》。

[2] 保康巷：在今杭州中山中路历史文化街区靠近开元路的北侧，现属东平巷社区。

共同语言的小官吏。婚后不久，她便因这不幸的婚姻和乏味的生活终日抑郁，发出了这样的抱怨：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依。
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以休生连理枝。

朱淑真自比文采斑丽的鸳鸯，而视其丈夫为鸥鹭，两个才貌不相配之人，强成匹偶，格格不入，深刻地表达了她对丈夫乏才异趣，以及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不满。

史书对朱淑真本人的生平事迹记录并不多，我们大多是从她的诗词中了解她的生活。朱淑真主要生活在杭州，婚后又随丈夫宦游异乡，从诗中可以看出她曾到过淮南，也曾远渡潇湘。因婚姻不幸福，所以精神极其痛苦，悒悒抱恨而终。

朱淑真去世后，她的作品大多被父母一把火烧了，今天流传下来的，已百不存一。南宋淳熙九年（1182），有一个叫魏伯恭的人，将朱淑真残存的作品辑录起来，取名《断肠集》，并为之作序。序文开头说：“比在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颂朱淑真词，每茄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这些作品大多是抒发朱淑真个人感情生活的不幸和由此带来的悲伤，但也有通过描写历史人物来借古讽今、抒发心中理想抱负并告诫当朝的《咏史十首》^[1]：



魏伯恭辑录的《断肠集》

盖世英雄力拔山，岂知天意主西关。
范增所用非能用，徒叹身亡顷刻间。

[1] 《咏史十首》：朱淑真的咏史诗，宋郑元佐注的断肠诗词虽题十首，但只存项羽二首、韩信一首、张良一首，共四首。近人张璋等注朱淑真集，除上列几首外，还添上陆贾一首、贾生一首、董生一首、晁错一首、刘向二首，共十首。本文引用的是描写西楚霸王项羽的诗句。

朱淑真还是唯一一个有作品入选我国旧时启蒙读物《千家诗》^[1]的女诗人。入选的两首均是七言诗，分别是《落花》和《即景》。我们可以跟随朱淑真的《即景》来感受她所看到的美景和当时的心境：

竹摇清影罩幽窗，两两时禽噪夕阳。
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

（三）陆游

北宋宣和七年（1125）十月十七日，淮河上狂风暴雨。时任直秘阁^[2]、淮南计度转运副使^[3]的陆宰奉诏入朝，在赶往开封的水路上喜得自己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爱国诗人陆游。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绍兴）人。陆游出生在名门望族、书香门第，他的高祖陆轸是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进士，官至吏部郎中；祖父陆佃，师从王安石，精通经学，官至尚书右丞；父亲陆宰，通诗文、有节操，北宋末年出仕；母亲唐氏是北宋宰相唐介的孙女，亦出身名门。陆游虽出身名门，但生于两宋之交，国家的不幸、家庭的流离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风格埋下了伏笔。



陆游画像

陆游三次来到杭州参加考试，前两次都没有及第。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陆游第三次来到杭州参加锁厅试^[4]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因秦桧

[1] 《千家诗》：是由宋代谢枋得《重订千家诗》（皆七言律诗）和明代王相所选《五言千家诗》合并而成。

较为广泛地反映了唐宋时代的社会现实，所以在民间流传非常广泛，影响也非常深远。

[2] 直秘阁：宋官名，简称“直秘”。淳化元年（990）置，以京朝官充任，掌宫廷藏书事务。

[3] 淮南计度转运副使：官名。掌一路或数路财赋，监察各州官吏；其后职权扩大，兼理边防、治安、钱粮、巡察等事，成为府州以上的行政长官，号称“漕司”。各路或唯置使，或增置副使、判官，或以二员同为转运副使，并无定制。

[4] 锁厅试：宋代现任官员及恩荫子弟的进士考试。陆游少年时，因长辈有功，以恩荫被授予登仕郎之职。

的孙子秦垾位居陆游之下，秦桧大怒。次年，陆游参加礼部考试，秦桧指示主考官不得录取陆游。直到秦桧去世，陆游才在仕途上大展拳脚。

陆游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作，在南宋的诗坛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现在存世的就有9300余首。陆游诗歌的题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坚持抗金，讨伐投降派，抒发慷慨激昂的报国热情和壮志未酬的悲愤；另一类是描写田园风光、日常生活的闲暇。在其《闻虏乱次前辈韵》中，对南宋统治者向敌人投降的卖国政策表示了无比的愤慨：



位于孩儿巷的陆游纪念馆

中原昔丧乱，豺虎厌人肉。
犍金输虏庭，耳目久习熟。
不知贪残性，搏噬何日足。
至今磊落人，泪尽以血续。
后生志抚薄，谁办新亭哭。
艺祖有圣谟，呜呼宁忍读。

陆游多次来到杭州，也曾在杭州居住，杭州西湖的山水之间也留下了他许多足迹。当时陆游就住在保和坊砖街巷（今孩儿巷），而在其住所中，陆游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陆游还具有史才。南宋嘉泰二年（1202），宋宁宗赵扩诏陆游来到临安（今杭州），主持编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史》。这也是陆游第三次到

临安供职为史官。他还私撰了《南唐书》，其目的在于借古鉴今，为南宋王朝竖一面历史的镜子，并凭借记述南唐国君治国、治民及用兵之法，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感。

南宋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1月26日），陆游谢世。临终时，他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示儿》诗作为遗嘱：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一生致力于抗金斗争，一直希望能收复中原。虽然频遇挫折，却仍然未改变初衷。他一生所释放的耀眼光芒，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为国家民族的事业奋斗不息。

（四）厉鹗

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先居住在浙江慈溪，后迁至钱塘（今浙江杭州）。他在家排行老二，少时家境清贫，祖父和父亲都是布衣，而父亲又早逝，全家人都靠兄长“卖淡巴菰叶（烟草）为业以养之”。生活上的艰苦，让厉鹗更加刻苦努力，“始学为诗，即有佳句。于书无所不窥，所得皆用于诗，故时多异闻轶事”。厉鹗又非常喜欢游历山水，凡事所见，无不暗识于心。这不仅丰富了他的视野，而且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山水诗人。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厉鹗参加乡试。当时的考官是内阁学士李绂，是一个为官清正的爱才之人。他看到厉鹗的试卷和谢表后拍案叫绝，感叹道：“此必诗人也！”立刻将之钩名录取。就这样，未到而立之年的厉鹗一举中试。他登舟北上，准备进京参加会试。但厉鹗本人不谙世事的性格断送了科举的大好机会。回乡后的厉鹗更加寄情于山水，孜孜于书堆之中。他寄寓于扬



厉鹗画像

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之中，阅读了大量书籍，与马氏兄弟、杭世骏等浙江诗人结邗江吟社，成为一时佳话。雍正九年（1731），浙江总督李卫奉敕修《浙江通志》。厉鹗、杭世骏等28人受聘担任分修。在厉鹗、杭世骏等各位分修的努力下，《浙江通志》“越二年始削稿，又一年劖劂^[1]葺事^[2]”。

清乾隆元年（1736），浙江总督程元章举荐博学鸿词^[3]18人，厉鹗、杭世骏都列名其中。但是，厉鹗无意应试。全祖望特地从京师写信相劝，希望他“与葑浦诸君勉之”。在朋友的劝告下，厉鹗再次赴京。在这科征士中，厉鹗的诗学出类拔萃。可惜在考试中，厉鹗误将论写在诗前，再次落第。朋友们都为此叹息，他却淡淡地说道：“吾本无宦情，今得遂幽慵之性，菽水以奉老亲，薄愿毕矣。”从此，厉鹗的功名之心更加淡泊，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潜心学术和游山玩水上。

《樊榭山房集》是厉鹗的诗文集，乾隆年间刊行于世，被收入《四库全书》。对于自己的诗文，厉鹗在他的《樊榭山房集》自序中是这样评价的，“闲居羁旅，怡愉忧悴”。在他的山水诗中，尤其以题咏故乡杭州为最多，之江、西湖、西溪都是他笔下的常客。当然，厉鹗虽好山水，足迹却并不远，只在苏杭一带往来，因此，阅历和游踪决定了厉鹗山水诗的格局有限。他往往采用清幽的笔法刻画细节和局部，营造一种宁静典雅的小家碧玉之美。



厉鹗《樊榭山房集》

晚年的厉鹗贫病多磨，著书立说却达到高潮。他有感于《辽史》的简略，

[1] 劖劂：读音为jī jué，意为雕板、刻印。

[2] 葺事：读音为chǎn shì，意思是事情办理完成。

[3] 博学鸿词：清朝特别开设的制科之一，为笼络山野之人及知识分子而设。康熙十七年（1678）第一次开设，此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门槛很低，只需各省督抚推荐即可应试。

采摭300多种书籍，写出《辽史拾遗》24卷。这部书有注有补，以旧史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都分析考证，加以按语。他常自比裴松之作《三国志注》。他还利用在小玲珑山馆里看到的大量宋人文集，并博引诗话、说部、山经、海志等书，撰写了《宋诗纪事》100卷。

清乾隆十七年（1752），厉鹗病重，是年九月去世。他的朋友闻讯，纷纷撰文为挽。全祖望为之墓碣铭云：“余自束发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谓工于语言者，盖未尝不识之，而有韵之文，莫如樊榭。”确实，厉鹗的诗文上承“清初六大家”，下启“乾隆三大家”，是清中叶浙西词派的中坚人物。

（五）袁枚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晚年又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袁枚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东园大树巷，7岁迁居葵巷。他一生跨越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是乾嘉时期有名的诗人、散文家。

袁枚的文学才能从他小时候就已经体现。他8岁登吴山时，曾吟出“眼前两三级，足下万千家”的佳句。他11岁便中了秀才，17岁时在浙江总督程元章的举荐下入杭州万松书院学习。当时万松书院是浙江府院合办的书院，也是杭州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袁枚在万松书院受到了严格的经史训练，文章大有长进。清乾隆四年（1739），袁枚参加朝廷科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袁枚任江苏省溧水知县，之后的7年，他还任过江浦、沐阳、江宁（今南京）等县的知县。他为官清正廉明，断案中正有持，深受老百姓的爱戴。《清史列传·文苑传·袁枚》中记载道：“其为政，终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多设耳目、方略，集乡保，询盗贼及诸恶少姓名，出所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则榜其姓名，许三年不犯湔雪之，奸民皆敛迹。”



袁枚画像

乾隆十四年（1749），袁枚决定辞官。他在《示送行吏民》说：“我闻萧嵩乞归日，正是明皇宠渥时。道待陛下厌臣日，臣且惧罪何敢辞？……”^[1]表达了自己做好急流勇退的思想准备。袁枚自小立志以“文章报国”，但官吏的这种社会角色使他极其痛苦，便义无反顾地恢复到书生的角色。

辞官后的袁枚定居江宁。他在江宁府内西隅上元县的地界上购得了一处风景优美的园林，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基本建成，取名“随园”，取“随之时义大矣哉”之意。他作有《随园二十四咏》。他在《遗嘱》中写道：“建设随园，我平地开池沼，起楼台，一造三改，所费无算，与我贫贱起家光景相似。奇峰怪石，重价购来；绿竹万杆，亲手栽培。……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也。”可见袁枚建设随园的一片用心。

袁枚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从他造园子这件事情就能看出。他主张写诗要抒发性情，反对复古模拟风气，强调要直接抒发人的性灵，表现真实情感。袁枚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所以袁枚的文学作品除了写随园生活的，还有就是抒发对故乡杭州的情感。他将杭州的自然山水与人文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其中后人最常吟咏、引用的就是《谒岳王墓》其七：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袁枚对中国的饮食也很有研究，自称“好味”。他所著的《随园食单》是中国饮食史上一部重要著作，虽然在当时看来有些不务“正业”，但从今天视之则功德无量。他以文言随笔的形式，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1736—1795）江浙地区汉民族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用大量的篇幅详细记述了中国14世



袁枚《随园食单》

[1]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五。

纪至18世纪流行的326种南北菜肴饭点，也介绍了当时的美酒名茶，是清代一部非常重要的汉族饮食名著。现在杭帮菜中的白斩鸡、荷叶粉蒸肉、芙蓉肉、蜜汁火方、卤鸭等菜肴，在袁枚的《随园食单》中都可以找到母谱，足见袁枚对杭州饮食文化的影响。

到了晚年，袁枚最感兴趣的事就是四处云游，登山临水，到过黄山、武夷山、天台山、雁荡山、四明山、南岳（衡山）、桂林等山水名胜之地。恰如汪汝弼诗所云：“青山到处属先生。”^[1]随性无忧的生活，使得袁枚活到了82岁高龄。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1798年1月3日），袁枚辞世，葬于随园西侧墓地。其主要传世的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随园诗话补遗》《随园食单》《子不语》《续子不语》等。

（六）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字璦人，号定庵，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龚自珍是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他出身于一个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滕山房诗》；父亲龚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亲段驯，是著名文学家段玉裁之女。

龚自珍自幼受到母亲影响，好读诗文。他8岁便开始研究《经史》和《大学》；12岁跟随外公段玉裁学习《说文》，很快便展现出了文学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15岁编诗集。

但是在仕途的道路上，龚自珍却走得格外不顺。清嘉庆十五年（1810），他



龚自珍画像

[1]（清）汪汝弼：《赠随园太史》。

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二十八名。三年后的乡试，龚自珍再次落榜。嘉庆二十三年，才在浙江乡试中中举。次年，28岁的龚自珍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后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直到道光九年（1829），经过六次会试的龚自珍，终于考



位于马坡巷16号的龚自珍纪念馆（倪晴 摄）

中进士，列三甲第十九名，但仍为内阁中书。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他又忤其长官，便决计辞官南归。

道光十九年（1839）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龚自珍辞官离京返乡，又北上迎接妻儿。在南北往来途中，他百感交集，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共315首。《己亥杂诗》中的诗句或议时政，或述见闻，或思往事，题材十分广泛，内容复杂，大多借题发挥，抨击社会，集中反映了诗人高度关怀民族、国家命运的爱国激情。其中的第二百二十首流传最广：“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用奇特的想象表现了他热烈的希望，期待着杰出人物的涌现，期待着改革大势形成新的“风雷”、新的生机，一扫笼罩九州的沉闷和迟滞的局面。既揭露矛盾、批判现实，更憧憬未来、充满理想。

龚自珍的许多诗既有抒情又兼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他的诗别开生面，开近代诗之新风貌。

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但同年9月26日，他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在他的故乡杭州，位于城东马坡巷16号的小米

园内，有一处清代风格的中式宅院，这便是龚自珍纪念馆。这是清代桐乡人汪维所建“小米山房”，俗称“小米园”。1988年至1989年，小米园整修后作为龚自珍纪念馆。该馆占地约0.7公顷，建筑面积498平方米，上下五开间，兼有耳房，雕梁画栋，古朴典雅，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七）郁达夫

在中国现代文学家中，郁达夫是与杭州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位。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郁达夫出生于杭州富阳满洲弄（现更名为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民国22年（1933）4月，郁达夫由上海移居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的一幢朝西的两层楼中式花园别墅，后来经过自己设计，取名“风雨茅庐”。

“风雨茅庐”收藏的中国书籍就有八九千册；线装类书中，上至《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下至《李氏五种》等，都是极为难得的珍本。而收藏的英、德、法、日文书，则达2万余册。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风雨茅庐”中卷帙浩繁的中外书籍，全部散尽，毁于兵燹。郁达夫嗜书如命的特点在他学生时期就显露出来了。在杭州读书期间，他常常一个人到丰乐桥、梅花碑等一带书店较多的地方，翻阅各种图书，读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著作，并在杭州的《全浙公报》《之江日报》和上海的《神州日报》上发表自己的诗作。

民国2年（1913）9月，郁达夫随长兄郁华赴日留学。次年7月，郁达夫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郭沫若同班，由于他们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很快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民国4年秋天，郁达夫考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医科专业。此后的一段时间，郁达夫觉得中国之所以不能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落后的政治制



位于场官弄63号的“风雨茅庐”（倪晴 摄）

度。为了实现改革社会、拯救中国的心愿，他于次年秋天开始，从医科转到法学部政治学科。这时，郁达夫开始发表旧诗，练习写白话小说。

民国10年（1921），郁达夫与同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与此同时，他不断从事创作。10月，郁达

夫的小说《沉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沉沦》的主人公喊出了：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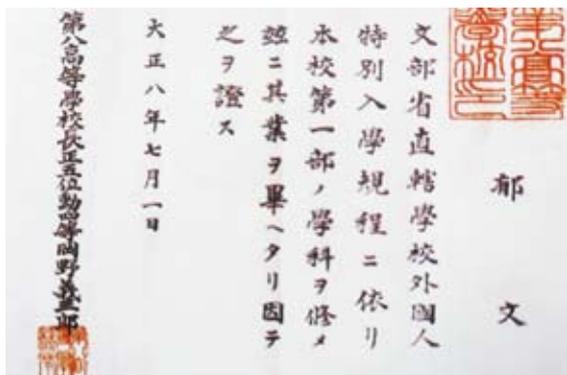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也是当时亿万青年的呼声。该书出版以后，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了风行一时的畅销书。

民国11年（1922）7月，郁达夫结束了留学生涯，搭船回到他日思夜想的祖国。回国后，他先后到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民国12年至民国17年是郁达夫创作的旺盛期，他创作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表达了他从日本回国时满怀希望的心情和见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后无限失望的感叹，既有他对革命前途的悲观思想，又有对革命疾声呐喊的激进理论。

民国19年（1930）12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限制革命出版物的《出版法》，实行文化专制。一些文化人纷纷离开上海，外出躲避，这些人中也包括郁达夫。他来到杭州居住，并游历浙皖山水，写下了不少游记和小说，有的以杭州为背景，有的则是直接描写杭州的山水景色和风物人情。然而，郁达夫在西子湖边，只度过了短短两年多时间。

民国25年（1936），郁达夫应邀前往福建就任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随后的几年，他一直用笔参加战斗，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用自己热情的声音来



郁达夫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的毕业证书

鼓舞人们战斗。民国27年，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前往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在船上，他写下了《岁朝新语》，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民国31年2月，新加坡沦陷，郁达夫与其他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亚公务市。郁达夫化名赵廉，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后来日本宪兵得知他精通日语，胁迫他当了7个月的翻译。其间，他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郁达夫与创造社同人，右起：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王独清

民国34年（1945）9月17日，由于汉奸告密而被捕的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丛林。郁达夫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是一位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家。1952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郁达夫在杭州的故居“风雨茅庐”至今尚存，已成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四、书画巨匠

（一）褚遂良

杭州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风水宝地”，有着悠久的书法艺术传统，曾经孕育了一大批流芳百世的翰墨名家，产生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书法艺术精品。唐朝初期大书法家褚遂良就是其中一位。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祖籍阳翟（今河南禹州）。据《武林坊巷志》记载，“褚堂巷亦名褚家塘，为遂良故里。清泚为池

塘巷”。褚遂良的名字早已融入杭州历史文化之中了。

隋开皇十六年（596），褚遂良出生于名门贵族，父亲褚亮时任散骑常侍^[1]一职，与虞世南^[2]、欧阳询^[3]等人为好友。少年时的褚遂良向虞世南学习书法，虞世南的书法继承了王羲之、王献之的精髓，褚遂良也深得王羲之书法之精要，成为王羲之书法的主要传人。

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李世民非常痛惜，他对魏徵说：“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魏徵就向李世民推荐：“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王羲之）体。”李世民见到褚遂良的书法后，果然非常赏识，即召为侍书。此后李世民对褚遂良逐渐信任并加以重用，官至黄门侍郎，后又为高宗辅政大臣。



褚遂良画像



《大字阴符经》（局部）

唐太宗喜爱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天下人皆知，于是争相敬献，这当中自然鱼龙混杂，真伪难辨。李世民便把甄别真伪的任务交给了褚遂良。褚遂良凭借自己对王羲之书法的研究，对众多作品一一辨认，无一差错。他还编写了《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对后人了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帮助很大。

褚遂良书法最为突出的特色为“空灵”。梁巘《评书帖》^[4]中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

[1] 散骑常侍：官名。汉有散骑，为皇帝侍从；又有中常侍，性质同。

[2] 虞世南：南北朝至隋唐时著名书法家、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3] 欧阳询：唐朝著名书法家，官员，楷书四大家之一。

[4] 《评书帖》：是清代一部评论书法笔记，共1卷，收论书随笔札记141则。梁巘在世时并未成书，后由方士淦搜辑而成。其中有品评各家优劣，论述执笔法为多。

是绝品。”书法的空灵，正是通过运笔与提笔而体现出来的。晚年的褚遂良，在书法上达到了一个至高的境界。他的楷书所表现出来的笔意华美，不同于欧阳询的严谨和虞世南的内敛。褚遂良刻意处理每一笔画，每一根线条，每一个点与每一个转捩，使之充满了生命。这种刻意却超出了字形，具有一种脱离了形体的独立意义，体现了中国艺术美学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飞动之美。

历经千百年的岁月沧桑，褚遂良的书法作品已难寻真迹，真正可靠、确为褚遂良所书的有《伊阙佛龕碑》^[1]《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2]《房玄龄碑》^[3]和《雁塔圣教序》^[4]等几种碑刻。我们大多只能通过拓本、影印本等书帖来领略褚遂良的艺术才华。



亦称“褚遂良碑”的《伊阙佛龕碑》

（二）黄公望

在浙江省博物馆内，收藏着被后人誉为“画中之兰亭”的巨作——《富春山居图》。虽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这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无一不在向世人展示着满纸空灵秀逸、气度沉雄。这幅旷世巨作的作者就是被称为“元四家”^[5]之一的黄公望。

黄公望（1269—1354），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井西老人，江苏常熟人（一说富阳人）。本姓陆，名坚，幼年父母双亡，族人将其过继给永嘉州

[1] 《伊阙佛龕碑》：亦称“褚遂良碑”。篆额题《伊阙佛龕之碑》。唐贞观十五年（641）刻于河南省洛阳龙门石窟壁冥阳洞内。

[2] 《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唐代正书碑刻，唐岑文本撰，褚遂良书，唐贞观十六年（642）刻。碑石佚失，仅有清代李宗瀚藏唐拓本传世。

[3] 《房玄龄碑》：全称《大唐故尚书左仆射司空太子太傅上柱国赠太尉并州都督梁文昭公之碑文》。碑额阳文篆书“大唐故左仆射上柱国太尉梁文昭公碑”16字，褚遂良书。立于公元648—649年之间，碑在陕西醴泉昭陵。

[4] 《雁塔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唐代褚遂良书。楷书，共1463字。唐永徽四年（653）立。共两石，均在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

[5] 元四家：主要有二说：一是指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四人，见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二是指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人，见明代董其昌《容台别集·画旨》。

(今浙江温州)平阳县(今属苍南县)黄氏为子,因改姓黄。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经、史、九流之学无不通晓。年轻时在浙西廉访使署充当书吏,因经办田粮征收的事情被诬陷而坐牢。出狱后,改号“大痴”,从此不问政事。其后信奉全真教,成为清修道士,卖卜云游杭州、松江等地。

黄公望真正开始专心从事山水画创作时,已有50岁。由于长期浪迹山川,开始对江河山川产生了兴趣。为了领略山川的情韵,他居常熟虞山时,经常观察虞山朝暮变幻的奇丽景色,得之于心,运之于笔。他的一些山水画素材,就来自于这些山林胜处。他居松江时,

观察山水更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有时终日在山中静坐,废寝忘食。晚年,黄公望酷爱富春山水,在春茗笥箕泉(今富阳新民乡庙山坞)结庐定居。黄公望所作的山水画,继承了五代至宋初董源、巨然一派,又受宋末元初赵孟頫熏染,融合自身对自然实景的感受,加以发展,自成一派。其特点在于:作浅绛^[1]色,山头多矾石,笔势雄伟;作水墨,皴纹^[2]稀少,笔意简远,超逸有致。清王



黄公望画像



《富春山居图》之《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原祁《麓台题画稿》云：“大痴画以平淡天真为主，有时而敷彩灿烂，高华流丽，俨如雪松（赵孟頫之号）。”

元至正七年（1347），年过八旬的黄公望在富春江畔“小洞天”居所，为同门师弟郑樵（字无用）创作《富春山居图》。他以水墨披麻皴描绘富春江一带初秋景色。构思之时，足迹遍及富

[1] 浅绛：中国山水画中的一种设色技巧。即凡以淡红青色彩渲染为主的山水画，统称“浅绛山水”。

[2] 皴纹：中国画的一种技法，用淡干墨涂染以表现山石纹理、峰峦折痕及树身表皮的脉络和形态。



位于富阳区东洲街道黄公望村的黄公望纪念馆，也曾是黄公望的隐居地（来源于杭州图库）

春江两岸，用三四年时间才画成。整幅画作由8张画纸连成，全长848厘米，高33厘米。后几经辗转，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清顺治七年（1650），极为喜爱此画的吴洪裕，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所幸被他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称《无用师卷》，长636.9厘米、高33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称《剩山图》，长51.4厘米、高31.8厘米，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此后300多年，杭州、台北，这幅绝世佳作隔海相望。2006年，浙江省博物馆开始多方沟通联系，希望促成双画合璧。终于，在2011年5月，《剩山图》第一次离开浙江省博物馆，奔赴台北。6月1日，已经分割361年的中国山水画“第一神品”《富春山居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第2110号陈列室展出，为期4个月。这也揭开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三）吴昌硕

在杭州的孤山南麓，有一处僻静、雅致的园子，这里就是有着“天下第一名社”称号的西泠印社。在它100多年的历史里，出了多位金石篆刻名家，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首任社长——吴昌硕（1844—1927）。

吴昌硕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生于浙江省孝丰县（今湖州市安吉县）郭吴村一个读书人家。受父亲的影响，吴昌硕从小便对印章感兴趣，因买不起

章石，就在砖瓦上刻，或到溪边捡石头练习刻字。经父亲指点后，初入篆刻门径。

吴昌硕对金石书画的喜爱超出了对仕途的渴求，22岁中秀才后就不再应试。清同治八年（1869），为了在艺术上有更深的造诣，吴昌硕离家来到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学习辞章和文字训诂。



吴昌硕与友人在西泠印社小龙泓洞前留影

中年后又到苏州跟杨藐翁学习书法，向任伯年学习绘画艺术，以后吴昌硕与任伯年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其好友诸贞元在《缶庐先生小传》中说吴昌硕“平生所服膺者，惟藐翁与伯年，书画师承在二师间”。由于刻苦钻研，广交名师益友，吴昌硕的艺术造诣日益精进。

民国2年（1913），西泠印社在杭州创立，吴昌硕被推举为首任社长。此后，吴昌硕每次来西湖，必扶级孤山，攀石题襟馆^[1]，称“每居此，则湖山之胜，必当奔集于腕下，骈罗于胸中”。

吴昌硕是我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兼诗、书、画、印四绝于一身。他23岁开始学诗，起初是学习王维、杜甫，后来广学唐宋诸家，



1927年，吴昌硕（右二）与钱瘦铁夫妇、吴藏龛（左二）合影于汉三老石室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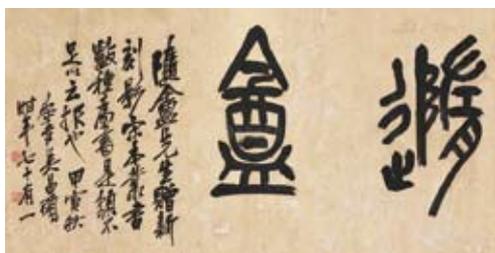
诗风清新淳朴。西泠印社有一幅著名的楹联：“印岂无原？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甃，一耕夫来自田间。”便是吴昌硕所作。吴昌硕书法作品以篆书、行草为主，晚年所书隶书，结体变长，取纵势，用笔雄浑、饱满，具有篆书痕迹，将篆、隶融为一体，形成独特面貌。他的篆刻从“浙派”

[1] 题襟馆：建于民国初年，属中式花园别墅，位于西泠印社的最高处，面积约70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子依山取势，坐北朝南，古朴典雅，为吴昌硕在杭州的“创作别墅”。

入手，后专攻汉印，也受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人影响，善于留白，或对角欹斜，气象峥嵘，构图块面体积感极强。在继承前人冲刀法和切刀法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融诸家之长，自创冲切结合的刀法。吴昌硕绘画的题材以花卉为主，偶作山水。前期得到任伯年指点，后又参用赵之谦画法，并吸收了徐渭、石涛和扬州八怪诸家之长。用篆、隶、狂草笔意入画，色酣墨饱，雄健古拙。吴昌硕自言：“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他一生酷爱梅花，也经常画梅花，以写大篆和草书笔法为之。为了观察梅花各个时期的生长情况，亲自栽种梅花。他尤其喜欢到余杭超山赏梅。超山报慈寺旁有一株宋梅，虬枝枯干、苍老遒劲，逢时开花。吴昌硕每次来超山，总要在宋梅下反复观赏，不忍离去。



吴昌硕绘画作品



吴昌硕书法作品

民国16年（1927），吴昌硕病逝于上海寓所，终年84岁。民国22年，吴昌硕的家人按照其生前愿望，将先生迁葬于超山报慈寺西侧的宋梅亭旁。1957年，西泠印社内建立了“吴昌硕纪念馆”。

（四）黄宾虹

曾有人评说：黄宾虹（1865—1955）假使在70岁谢世，只能在画史上传个名；假使在50岁谢世，也许连个名也传不下去。他是典型的早学晚成的画家，70岁以后才画风初成，80岁达到艺术巅峰，90岁后更有一次蜕变。可谓2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奇观。

清同治四年（1865）（农历乙丑年）正月初一子时，黄宾虹出生在浙江金华县城西的铁岭头，祖籍安徽歙县。因前一年甲子年是闰年，多一个闰月，这时离立春还有十几天，按中国民间算法，还算是前一年冬。这样，黄宾虹生下来

就算虚两岁。他对自己这个特殊的生日很是自豪，一直按传统方法来算年龄。黄宾虹的父亲虽在金华经商，但经商之暇爱好收藏书籍字画，尤其喜爱画梅花，还喜爱读书、吟咏诗文。幼年的黄宾虹就在父亲的熏陶下，痴迷上了作画。

黄宾虹说自己平生无一日不作画，日日与笔墨为友。50岁以后，他的画风逐渐趋于写实；80岁以后，才真正形成了人们所熟悉的“黑、密、厚、重”的画风。黄宾虹晚年的山水画，所画山川层层深厚，气势磅礴，惊世骇俗。这一显著特点，也使中国的山水画上升到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他总结出了“平、留、圆、重、变”的五笔法和“浓、淡、破、积、泼、焦、宿”的七墨法。黄宾虹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经常深入名山大川，游览了大半个中国，曾九登黄山，五上九华山，四攀岱岳，到过峨眉、三峡、武夷、雁荡等山，旅行纪游画稿当以万计。

民国26年（1937）上半年，黄宾虹应北平古物陈列所和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之聘，移居北平，担任教授。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宾虹闭门谢客，拒绝参加任何活动，埋头创作和著述。著有《宾虹论画》《书画之道》《八十自叙》等。

民国37年（1948）夏天，黄宾虹应国立杭州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之聘，担任国画教授。他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寓居在栖霞岭19号。1952年，黄宾虹从栖霞岭19



黄宾虹《西溪泛舟图》



黄宾虹（中）在西湖边写生

号搬到了31号这座两层小楼中，这也是黄宾虹最后一个歇脚的地方。他在这个小小的庭园里养花栽树，读书作画，自称“愿做西湖老画工”。甚至在折磨多年的白内障越来越重、看不清任何东西的时候，黄宾虹也不肯停下手中的画笔。他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拿着画笔，凭借着一丝微弱的亮光，艰难地摸索着在纸上作画。直到1953年6月，黄宾虹做了白内障手术，他的视力才有所恢复。眼睛刚有好转，黄宾虹就不顾医生嘱咐，迫不及待拿起画笔，来到灵隐、飞来峰、北高峰写生。1954年，91岁的黄宾虹仍身材笔挺，背不驼、腰不弯，走路也不用拐杖。11月，黄宾虹在画家诸乐三和洪世清的陪同下，再次来到灵隐、飞来峰写生。那天黄老银须飘洒，一副儒雅之态，这也是老人最后一次外出写生。

1955年3月，黄宾虹因胃癌住进了医院，在病床边依然放着作画的笔墨和纸。25日清晨，这位国画大师口中念着“是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悄然转身，走向杭州的云山深处，离开了人世。

（五）潘天寿

书画家辈出的杭州，一直是名家向往的地方。他们或是用画笔写意，或是在此求学，抑或是教书育人，培养更多可塑之才。近现代闻名全国的画家潘天寿就是其中之一。

潘天寿（1897—1971），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又号雷婆头峰寿者。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3月14日出生于浙江宁海县北乡冠庄村。出生那天正逢农历二月十二日，汉族传统节日花朝节，也被称作百花的生日。潘天寿很是喜欢自己的这个生日，所以成名后，他往往在得意之作上盖上“百花生日生”的印章。



潘天寿

潘天寿的绘画天分大多遗传自他的母亲，母亲也是他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母亲从小给他讲故事、背诗文、做灯笼、剪纸人。但7岁那年，母亲过世。同年夏天，潘天寿入村中私塾读书。课业之余，他喜欢写字、作画，偶然得到《三国演义》，非常喜欢其中的插图，常常模仿描绘。私塾先生虽惊叹于潘天寿



潘天寿代表作品《朝霞》

小小年纪竟能画得如此传神，但私塾旧制不允许其画画，因此让潘天寿挨了不少先生的板子。14岁那年，潘天寿去宁海县城小学读书，偶得一本石印的《芥子园画谱》^[1]，才知道绘画门类之复杂，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画。这本《芥子园画谱》成了潘天寿学画的“无言老师”，也让14岁的潘天寿决心要成为一个中国画家。

民国4年（1915），潘天寿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的校长经亨颐有着“一师蔡元培”之称，而潘天寿的绘画课老师就是鼎鼎有名的李叔同。李叔同主张教育“应使文艺以人传，莫使人以文艺传”。民国7年，李叔同在虎跑寺剃度出家，潘天寿也想追随老师而去，但弘一法师打消他出家的想法，嘱咐他在家信佛。潘天寿从此与佛结缘，他的画也常以佛教为题材，如《达摩》《贫衲》《老僧》等。在潘天寿的画室里，还悬挂着一幅弘一法师赠给他的对联：

[1] 芥子园画谱：又称《芥子园画传》，中国画技法图谱，诞生于清代。清代著名文学家李渔曾在南京营造别墅“芥子园”，并支持其婿沈心友及王氏三兄弟（王概、王著、王臬）编绘画谱，故成书出版之时，即以此园名之。此画谱堪称中国画的教科书。

戒是无止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

潘天寿的中国画大多是花鸟和写意山水，偶作人物。他笔下的花鸟山水神采灵动、传神，尤其是他画的秃鹫和老鹰奇崛无比。他的一幅《松鹰图》，现藏于中国美术馆。潘天寿认为，绘画是一门综合性艺术，需要诗、书、画、印紧密结合，因此他的诗文、题跋和用印都很讲究、精致。

让潘天寿在绘画上再进一阶的大师便是吴昌硕。民国12年（1923），潘天寿来到上海，在民国女子工校任教。他时常到上海吉庆里523号拜访画坛泰斗、海派宗师吴昌硕。彼时，吴昌硕已八十高龄，潘天寿常去同他谈诗论画，在绘画上颇有见地，每每使老先生震惊。为此，吴昌硕特地写了一副篆书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赠予潘天寿。

民国17年（1928），潘天寿任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国画系主任教授，并定居杭州。从此，西湖里的荷花便时常出现在他的画中，《映日》《朝霞》《露气》等荷花图成了他的代表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潘天寿随校迁移，曾在西南联大、英士大学艺术系任教。民国33年，潘天寿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民国36年秋，他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国画系主任。



潘天寿代表作品《露气》

1957年，潘天寿又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1958年后，潘天寿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及浙江分会主席，当选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

1971年9月，潘天寿在杭州去世。1981年9月，其位于杭州南山路景云村1号的晚年居所辟为潘天寿纪念馆，陈列有潘天寿的画室、生前活动照片等。1983年5月，潘天寿子女遵照母亲何培的遗嘱，将潘天寿120幅遗作捐献给国家，由纪念馆收藏，这里也成为国内保存潘天寿作品最多的地方。

自南宋以来，中国戏曲两大体系——以北曲为主的杂剧和以南曲为主的南戏，先后在杭州得到发展。杭州成为全国戏曲活动中心之一。据周密《武林旧事》卷十记载，南宋临安（今杭州）盛行杂剧，上演的宫本杂剧有280多本，当时最有名的杂剧组织为绯绿社。元代许多杂剧艺人从大都（今北京）来到南方，杭州的戏曲也日益昌盛。元曲大家关汉卿曾到过杭州，与杭州剧作家和演员有广泛接触，写下了散曲《杭州景》。到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前后，杭州出现了罗贯中、郑光祖、乔吉、杨梓、萧缜强等一批著名的杂剧作家，并成为与大都齐名的南北两大杂剧创作中心之一。

从12世纪30年代至14世纪60年代，一种新的戏曲形式——宋元南戏（又称“温州杂剧”）在杭州开始流行。杭城内外众多的固定演出场所（瓦舍勾栏）为南戏的演出提供有利条件。入杭城后的南戏，大量吸收说唱、话本的故事题材和北方伎艺的成就。钱塘人沈和苗首创南北词调合腔，进一步发展了南戏。杭州还出现以萧天瑞为代表的南戏剧作家群，和以龙楼景、丹墀秀为代表的南戏演员群，巩固了在南戏界的地位。南戏在杭州流传盛行达200余年。

明代，杂剧日渐衰落。南戏因城市经济繁荣，在民间得到广泛发展，形成了传奇剧，并有多种声腔。据魏良辅《南词引正》记载，当时已是“腔有数种，纷纭不类”，主要有昆山腔、海盐腔、余姚腔、杭州腔、弋阳腔等。“杭州腔”的形成，表明杭州戏曲活动的繁盛。明中期以后，杭州出现了一批名噪一时的剧作家和作品，如陈所闻的《狮吼记》《种玉记》《彩舟记》，高濂的《玉簪记》《节孝记》，王鏊的《彩楼记》《寻亲记》等。

清初，杭州戏曲作家洪昇撰著的传奇剧《长生殿》，在全国广泛流传。他与孔尚任齐名，合称“南洪北孔”。大约顺治七年（1650），李渔移居杭州，其间所著的《闲情偶记》为中国一部较为概全的戏曲理论著作。光绪二十年（1894）建于拱宸桥的天仙茶园，为杭州早期的戏

馆^[1]，谭鑫培、周信芳、盖叫天等均曾在此演出。清末，京剧开始在杭州流行。光绪三十二年（1906），越剧首次在于潜外伍村和余杭陈家村登上舞台。光绪年间（1875—1908），淳安出现“三脚戏”，由江西、安徽传入的采茶戏与当地流行的民间歌舞“竹马班”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睦剧。民国初年，宣卷首次在杭州搬上舞台，当时称“化妆宣卷”，后称“武林班”，解放后定名为“杭剧”。民国16年（1927），杭州滑稽戏演员首次到上海演出，杭州成为滑稽戏的发源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成立杭州市戏曲改进协会和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1956年成立杭州市剧目整理小组，发掘传统剧目，记录、整理、改编了许多京剧、杭剧、越剧的传统剧目。“文化大革命”中，戏曲团体被迫停止演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县剧团相继恢复和重建，创作演出了一批新剧目。一批新剧作和年轻演员在全国和省、市会演连连得奖，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享誉全国，桐庐越剧团的《绣花女传奇》《桐花泪》先后被搬上银幕。同时，新建了杭州剧院、杭歌剧院、东坡大剧院等一批现代化的剧场，进一步推动了杭州的戏剧繁荣。

一、京剧

清同治年间（1862—1874），杭州就有京剧^[2]演出。当时杭州拱宸桥是繁盛的水陆码头，先后建有一批可演戏的茶园。京津沪等地的京剧班社顺京杭运河南下，拱宸桥是进入杭州演出的第一站。同治十三年（1874），一班天津演员首先来杭州，搭富春昆班，在戏院演出《金水桥》等剧。自此，到杭州演出的京剧班社日益增多。光绪年间（1875—1908），京剧演员谭鑫培、王鸿寿、周信芳、盖叫天等相继在拱宸桥一带登台，然后进入杭州市区演出。光绪二十七年（1901），7岁的周信芳以“七龄童”艺名在杭州天仙戏馆唱红。同年，14岁的张英杰搭杭州天仙戏馆的戏班演出，一人饰老生、武生、老旦、花旦4个行当，崭

[1] 位于拱宸桥东今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附近，已不存在。

[2] 京剧诞生于1840年前后，经过几代艺术家实践改良，形成了以唱、念、做、打四种艺术手段和西皮、二黄两大声腔有机融合的完整艺术表演体系。在2010年11月16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露头角而取艺名“盖叫天”。光绪三十年，谭鑫培来杭州荣华戏馆^[1]献艺。

民国元年（1912），浙江第一新剧模范团在杭组建，上演京剧和文明戏。团内有筱奎官、侯双臣、赛彩霞等南北京剧名伶60余人，经常演出的剧目有《取西蜀》《莲花河》《九更天》等。当时，杭州相继兴建剧场，开设京剧戏院，经常邀请上海等地的京剧名角来杭演出。民国3年（1914），



盖叫天剧照

李谷湘、周云天等人发起，在鼓楼附近开办“三义堂”京剧科班，挑选40名学生学戏。这是杭州第一个京剧科班。科满后组成群芳小京班，登台演出，其中有文武老生王全芳、老生白玉芳、文武花旦碧艳芳、名丑刘福芳等。民国6年，开办京剧科班第二期，续招新生30名。科满后加入群芳小京班，在杭嘉湖一带演出近10年。民国10年春，京剧名旦冯春航率团来杭，在西湖共舞台^[2]演出《小青影事》。同年6月中旬，欧阳予倩率南通伶工学校师生来杭，演出改良京剧《人面桃花》《宝蟾送酒》《尼姑思凡》等。民国11年11月，程砚秋首次来杭演出。民国12年3月至7月，周信芳在西湖共舞台连续演出，日夜场不辍。同年6月，李吉瑞、欧阳予倩、尚小云、马连良、朱素云、李春山等先后来杭，在城站第一舞台^[3]演出。同年7月至8月，夏月润、夏月珊兄弟在西湖共舞台演出。民国18年，梅兰芳、金少山、盖叫天等在西湖博览会大礼堂演出。民国23年，梅兰芳、金少山来杭义演，筹款救灾。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兵团文艺工作团在大世界游乐场京剧剧场^[4]演出京剧《闯王进京》；接着，杭州警备司令部文艺工作者演出京剧《快活林》。10月，浙江省军区文工二团在大世界连续公演京剧《三打祝家庄》《皇帝与妓女》《七擒孟获》《关羽之死》《打渔杀家》《木兰从军》

[1] 位于拱宸桥东，1952年改建为大众电影院。

[2] 前身为西湖凤舞台，抗日战争中杭州沦陷期间毁于火灾。

[3] 建于民国3年（1914），民国31年改为杭州影剧院，原址在今杭州铁路工人文化宫区域内。

[4] 民国11年（1922）由浙江军阀张载扬创办，民国24年改建为东坡剧院，位于东坡路与湖滨交叉口附近。

《逼上梁山》等，历时一月余，观众达10万人次。1953年5月，程砚秋来杭演出，主演《柳迎春》《锁麟囊》等。1954年，毛世来、贯世习来杭州市人民京剧团演出大型历史剧《木兰从军》，并参加慰问团，为浙江边防驻军演出。1956年10月，梅兰芳在杭州人民大会堂公演《贵妃醉酒》《宇宙锋》《霸王别姬》《洛神》《凤还巢》等剧目，观众达3.6万人次。同年，以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为主要演员的北京京剧团，来杭演出《借东风》《将相和》《谭记儿》等剧目。1959年，盖叫天与杭州京剧团合作在杭州演出《垓下之战》，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剧目。1960年，组成以赵麟童、宋宝罗、鲍毓春、李瑛、陈幼亭、陈大濩、刘云兰、张二鹏为主要演员的阵容，排练《西游记》，赴沪演出，获剧目奖、演出奖。1965年，将越剧《山花烂漫》改编为京剧《花明山》，参加华东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其间还上演了新编历史剧《林则徐》《卧薪尝胆》《于谦》，传统剧《济公大闹秦相府》《红楼二尤》，现代剧《白发红心》《首战平型关》《红旗谱》《社长的女儿》《霓虹灯下的哨兵》《龙马精神》等。

1971年，新建杭州市“五七”文艺学校京剧班，招收青少年97名（包括乐队），入科学习。1977年，以“五七”文艺学校京剧班毕业生为主，新建杭州京剧团，演职员120人。杭州京剧团公演的第一出戏是《蝶恋花》，相继又演出了《杨门女将》《苗岭风雷》《红色娘子军》《磐石湾》《七侠五义》《白蛇传》等。1979年，排演了现代京剧《锁龙渡》，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剧目在杭公演。1981年底，杭州京剧团撤销，部分演员调入浙江京剧团。

1981年10月，为纪念辛亥革命60周年，浙江京剧团排演《孙中山》，并参加省现代戏调演。1984年10月，举办“纪念梅兰芳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演出活动，演出梅派名剧《贵妃醉酒》《凤还巢》《霸王别姬》《宇宙锋》等。1985年3月，举办“纪念周信芳先



大型现代京剧《大渡河》剧照

生诞生九十周年”演出活动，演出麒派名剧《萧何月下追韩信》《徐策跑城》等。

近年来，浙江京剧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作排演了《孔雀翎》《网络恋曲》《红拂》《宝莲灯》《雷峰塔》《大渡河》等诸多新创大戏，传承学习了《桃花村》《万花楼》《红娘》《王宝钏》

等诸多传统大戏和折子戏，并推出了浙京“五朵京花”青春组合，为诸多优秀青年演员策划举办了个人京剧表演专场。



神话贺岁剧《雷峰塔》剧照

资料链接

盖叫天

盖叫天（1888—1971），原名张英杰，号燕南，河北高阳人。年少时入天津隆庆和科班学武生，后改学老生。演剧讲究人物神情气质，注重造型美，以短打武生为主，人称“盖派”。盖叫天在表演艺术上精益求精，别树一帜，有“江南活武松”之称。所演京剧《武松》《三岔口》《一箭仇》等，在戏剧界享有盛誉。1952年和1956年，获文化部授予的荣誉奖。曾任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代表剧目拍成《盖叫天舞台艺术》《武松》等影片。曾寓居西湖金沙港，“文化大革命”中被折磨致死。其墓在杭州杨公堤丁家山。

二、越剧

越剧以唱为主，声腔清悠婉丽，表演真切动人，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多以“才子佳人”题材的戏为主，艺术流派纷呈。越剧是我国第二大剧种，也是杭州

最大的剧种。

越剧起源于绍兴嵊县（今嵊州市）。清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在嵊县农村，有一些半农半艺的说唱艺人分别用宣卷调、道情调等唱一些劝世的词曲；后创造了一种结合嵊县乡音，编唱当地新闻传奇故事的“四二合调”，被称为“嵊书”，是越剧的雏形。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嵊县桃源乡南派唱书艺人李世泉、高炳火、钱景松、李茂正等到於潜乐平乡外伍村，在祠堂前搭起露天舞台，演出《十件头》《倪凤扇茶》《赖婚记》等。越剧由此从“落地唱书”走上舞台表演。剧目以反映农村生活为主，有《蚕姑娘》《卖青炭》《卖草囤》《箍桶记》《相骂本》等。



《藏书之家》剧照

民国5年（1916），早期越剧小歌班“梅朵阿顺班”在杭州美纪公司（大世界前身）游乐场^[1]演出，演员是男班，并尝试配乐。在音乐方面改变了“口代喷呐”的做法，为越剧音乐革新打下了基础。

为了扩大观众市场，小歌班艺人们从京剧、绍剧中借鉴艺术元素，在表演、音乐、服装、化妆等方面进行改良，语言改用易听易懂的嵊县官话。这一改在越剧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意义。民国9年（1920）起，小歌班集中了一批较知名的演员，编演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孟丽君》等新剧目，因契合了五四运动后争取女权和男女平等思潮，受到观众欢迎。民国10年9月起，男班艺人相继将剧种改称“绍兴文戏”，吸收京剧、绍剧的表演程式，向古装大戏方

[1] 位于今东坡路与湖滨步行街附近。

面发展。剧目则受海派京剧影响，主要编演连台本戏，在西湖大世界游乐场^[1]以及茶楼、旅社、小型剧场演出。

民国12年（1923），嵊县戏班班主王金水和艺人金荣水在嵊县施家岙办起第一个女子科班，以“绍兴文戏”“绍兴女班”名义，于民国13年到杭州大世界游艺场演出。

20世纪30年代，女子科班在杭州大量涌现。民国22年（1933），新登创办东安剧社，培养出徐玉兰等一批知名度较高的演员。民国23年，姚水娟随“越新舞台”进西湖大世界游乐场演出绍兴女子文戏。同年，“高升舞台”在杭州城站第一舞台演出绍兴女子文戏《梁山伯与祝英台》，运用了转台布景。民国25年，嵊县“四季春班”从萧山到杭州羊坝头中华国货商场^[2]演出，14岁的袁雪芬在杭州第一次挂头牌，演出《玉蜻蜓》，被观众称为“小王杏花”。当时，越剧名伶姚水娟、筱丹桂、王杏花均分别在杭州大世界、城站第一舞台等剧场担纲主演。至此，女子越剧团因扮相俊美、曲调流畅而取代了男班。

民国36年（1947）1月，嵊县旅杭同乡会举办越剧名伶大汇串，在大世界剧场演出。参加演出的有傅全香、范瑞娟、筱丹桂、徐玉兰、尹桂芳、竺水招、姚水娟、竺素娥、陈金莲、黄笑笑、姚月红、贾美凤、陈佩君等。



新版传统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来源于《杭州年鉴（2004）》）

[1] 位于今东坡路与湖滨步行街附近。建于民国11年（1922），创办人张载扬（时任浙江省省长）。游乐场占地7亩左右，砖木结构，三层楼，走廊环转，包括露天场子，共有大小演出场8处。其中，场西有可容千人的剧场一座，演京剧为主（民国13年改为东坡剧院）。大门左首有供扬州班、武林班、越剧等地方戏演出的中等场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人民游艺场”，1954年改名为“中苏友谊馆”。今仅存东坡剧院。

[2] 位于羊坝头三元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定剧种为“越剧”。1949年12月15日至16日，浙江省教育厅文化科为探讨旧戏改革，组织杭州市各剧院举行越剧改革公演，演出剧目有《赖婚记》《前游庵》《牛郎织女》《九件衣》等，广泛征求各界人士对旧戏改革的意见。



越剧《西厢记》剧照（杭州文广集团 供稿）

1950年1月1日，杭州市举行越剧大汇串，上演《李闯王》《东方红》《林冲夜奔》《吕四娘》《花木兰》《逼上梁山》等新编越剧。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了戏曲改革“改人、改戏、改制”三大任务，越剧的革新、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53年4月，华东行政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在剧团进行民主改革的通知，市文化局在杭州市联友越剧团进行试点，结合发掘失传的戏曲剧目。1956年10月，杭州越剧团在新中国剧院演出了重新整理的传统剧目《碧玉簪》。同年成立杭州市剧目创作整理组，记录越剧剧目40个，上演的有《龙凤锁》《双贵图》《玉蜻蜓》《碧玉簪》《大会堂》等12个剧目，出版发行的有《碧玉簪》《龙凤锁》《双贵图》等5个剧目。

“文化大革命”中，越剧团体被迫停止演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越剧迎来了复苏和发展。在政府支持下，于1982年10月成立了浙江越剧“小百花”集训班，并精选了26名新秀，组成浙江越剧“小百花”演出团。1983年11月16日，演出团首次赴港演出，一炮而红，14天中演了15场，演出剧目有《五女拜寿》《汉宫怨》《双玉蝉》等，大获成功，盛况空前。1984年3月3日，浙江越剧“小百花”演出团在上海人民大舞台首场演出，再次引起轰动，连演一个多月，演出42场，观众近10万人次。同年9月，浙江越剧“小百花”演出团正式组建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1985年，桐庐越剧团演出剧目《绣花女传奇》被拍摄成电影，杭州越剧首次走上银幕。1986年，杭州越剧院成立。12月，杭州越剧院二团演出剧目《桐

江雨》被拍摄成电影《桐花泪》。1988年，杭州越剧院三团演出剧目《无情剑》由杭州电视台拍摄成多集戏曲电视剧。同年，谢群英、张卫群、许志英、吴益群、蓝玉珍、陈雪萍、汤敏华、陈澄、马红红、胡国琴获“杭州越剧新姐妹”称号。此后，专业剧团在人员配置、剧目产出、人才培养、跨地区演出和出国演出、演出设备等方面，都有较大变化，演出质量、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1995年5月，杭州越剧院排演的《莲花湖》首次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党校、中南海等处演出。1997年，杭州越剧院排演的《梨花情》参加在广州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戏剧节，获曹禺戏剧奖优秀剧目奖，演员陈晓红、陈雪萍、石蕙兰获优秀表演（主角）奖。9月，杭州越剧艺术研究会成立。2004年，西溪越剧工作室成立，研究中国越剧的诞生和发展。2006年5月20日，越剧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6月25日至29日，杭州越剧传习院^[1]陈晓红一行7人到香港参加“2014中国戏曲节演出”。其间，陈晓红等人演出《红楼梦·焚稿》《哭灵》等剧目，受到香港观众欢迎。2016年9月4日，G20杭州峰会文艺晚会《最忆是杭州》在杭州西湖震撼上演，越剧演员茅威涛、谢群英唱响《美丽的爱情传说》^[2]，惊艳世界。

三、杭剧

杭剧，是杭州独有的地方戏，源于宣卷^[3]。民国12年（1923），几位宣卷爱好者组成民乐社，将宣卷演唱搬上舞台，排演以杭州民间故事改编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曲调除宣卷外，又采用扬州清音中的“梳妆台”等唱腔，以胡琴、三弦、小锣、鼓板伴奏。民国13年1月在杭州大世界游艺场首次公演，深受欢迎，人称“化妆宣卷”。因杭州古名“武林”，于是定名为“武林班”。此即杭剧之雏形。民国15年（1926），武林班开始招收女演员，成名的有杨文英、吴秀英、

[1] 前身为杭州越剧院。

[2] 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

[3] 宣卷始于元明，兴于民国。宣卷调无乐器伴奏，仅以木鱼击拍，一人独唱，众人合唱一句尾声“南无阿弥陀佛”，内容多为劝人为善。至清末民初已成为人们自我娱乐的一种说唱形式，并逐渐在杭城内外流行。

徐美英和绿牡丹（艺名），被誉为“三英一牡丹”。至民国22年（1933）前后，杭剧先后成立16个班社。



新编杭剧《银瓶》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林班正式定名“杭剧”。1961年，杭州市政府提出抢救和振兴杭剧的口号。同年3月，杭州市文化局召集

编剧、导演、音乐、美术专业人员和青年演员、演奏员，以及散落民间的老艺人共108人，充实杭州杭剧团，对杭剧进行全面改革。为了丰富杭剧的音乐唱腔，将杭州古老曲种“杭州滩簧”（简称“杭滩”）的曲牌和唱腔糅合在杭剧中，并将杭滩的传统书目《双下山》《昭君和番》《断桥》《貂蝉拜月》《六月雪》等搬上舞台，得到了田汉、周贻白、苏堃、顾仲彝等专家的肯定。

杭剧改革积累了一定经验后，便排练富有杭州地方特色的大型历史故事剧《银瓶》。音乐唱腔激昂处选用武林调，优美抒情处选用杭滩。1961年国庆前夕在新中国剧院^[1]首演。这是杭剧改革后正式公演的第一出戏，剧目、音乐唱腔、舞台美术、演员阵容等都以崭新的面貌与观众见面，演出受到普遍欢迎。1962年，杭剧又新编《李慧娘》，在音乐上则以杭滩音乐为基础，融合武林调的唱腔，并借鉴合唱音乐中的哼鸣法，渲染气氛，一段“游魂调”婉丽缠绵、优美动听。



新编杭剧《人逢喜事》剧照

1963年元旦前夕在胜利剧院首演。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看了演出后，十分高兴地说：“与北昆相比，各有所长。”《银瓶》《李慧娘》的先后演出，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使处于危机中的杭剧喜获新生。同年创作演出了《雷锋》《王杰》，改编演出了《年青一代》《雪里红梅》等现代戏，也

[1] 原址位于今青年路和开元路交叉口。

受到观众欢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慧娘》受到批判。1968年,杭州杭剧团撤销。

1973年,杭剧改革组成立,意在重新振兴杭剧,但由于经费、场地困难,演员后继无人等问题没有解决,不久解散。至1985年,杭剧已基本不存在。

2000年1月,由市文化局牵头,召集杭剧改革组、杭州黄龙越剧团和原杭剧团部分演员、作曲者等,举办了“杭剧问题”座谈会,并由黄龙越剧团排练演出杭剧折子戏《双下山》和杭剧表演唱《西湖美名天下扬》。

2005年,杭剧被列入浙江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6月,杭州市市长蔡奇率杭州市各界领导、专家对杭剧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调研,之后下发了《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振兴发展杭剧的若干意见》,对杭剧的保护和传承提出了具体详尽的办法。同年12月15日,杭剧又被定为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12月31日,在杭州黄龙越剧团的基础上,成立杭州黄龙杭剧团,以传承古装戏为主。2009年6月8日,杭州杭剧团正式揭牌。它以杭州滑稽艺术剧院为基础,致力于传承现代戏。陆续排演《母亲的泪》《永远的雷锋》等新编大型现代杭剧和《电脑风波》《和睦一家亲》《杭州大妈》《微能量》《承诺》《考验》《拆迁趣事》等现代杭剧小戏近20个,先后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下乡巡演、新春文艺精品展演、“万场文化下基层”等演出活动。2014年,杭剧《永远的雷锋》获第十二届市“五个一工程”奖。

四、睦剧

睦剧,原名“三脚戏”,亦称“三脚班”,流行于浙江淳安、开化、建德、分水(今属桐庐)、遂安(今属淳安)一带和安徽歙县等地,解放后改名“睦剧”。

淳安人素尚歌舞,每到春节元宵,市井乡间均有演傩神戏和表演各种歌舞的习俗,跳竹马尤为盛行。清光绪年间(1875—1908),湖北黄梅采茶戏和江西赣东采茶戏传入浙西后,与民间歌舞跳竹马(竹马班)相结合,以采茶戏的剧目、曲调及表演形式,融合本地的民间音乐、地方语言及风俗习惯,由歌舞向

戏曲演变，于清代末年逐渐形成浙西的地方小戏——三脚戏^[1]。

清光绪十六年（1890），开化菖蒲乡宋村徐龙福（淳安人）最早开办“三脚戏班”。经徐龙福传艺，遂安、淳安一带有了一批三脚戏艺人。此后，三脚戏在淳安扎根、发展。前期多为半农半艺的业余班社，仍保留竹马班



睦剧《鸳鸯马》剧照

的形式，但增加了三脚戏剧目的演出。这种又跳竹马又演戏的班社，称“三脚戏竹马班”。后来，出现了三脚戏艺人组织的半职业性班社，不跳竹马而专门演戏。这种日趋职业化的戏曲班社，称“三脚戏常班”，农闲季节到外地农村草台、祠堂庙台演出。常班一般有七八个演员（增加了正生、正旦、老生、老旦等）和三四个敲锣鼓的。

民国初期，淳安已有三脚戏竹马班10多个，三脚戏常班一二个。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进入三脚戏的鼎盛时期，三脚戏竹马班发展到50多个（最多时达90多个），三脚戏常班发展到10个左右。三脚班最活跃的地区是新安江南岸的淳安东乡、南乡和西乡一带。到了40年代，由于三脚戏常班没有整本大戏以及大戏班的一套规矩，不能演会戏，不能进城市，难以维持演出。三脚戏日趋衰落，三脚班逐渐减少，艺人大多弃艺归田。

1950年12月，淳安县举办三脚戏艺人讲习班，为期10天。1951年春，三脚戏改名为“睦剧”。同年，省文化部门先后派人挖掘、整理传统剧目，进行音乐改革。1954年，参加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南山种麦》《牧牛》获优秀剧目奖，《看花灯》《补背褙》被列为全省15个推广剧目之一，郑百庭获演员二等奖，项文法、章渭贞获演员三等奖，老艺人方光庭、江苟苟、方樟顺获荣誉奖状。随后，《南山种麦》《牧牛》被选送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郑百庭获三等奖。195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睦剧专辑，选入《牧牛》《南山种麦》

[1] 通常是生、旦、丑三个脚色演一出小戏，故名。

《看花灯》《补背褙》等小戏的剧本和曲谱。

1956年，在杭州胜利剧院上演《南山种麦》《两兄弟》等剧目。《浙江日报》以“戏曲中的一朵朴素的鲜花——睦剧”为题，首次向读者介绍了睦剧剧种。1957年秋，参加省二届戏曲会演，大型现代戏《雨过天晴》（施振楣编剧）获剧本二等奖，陈金良获导演奖；《落布》（施振楣、余征夫整理）获剧本三等奖，郑百庭获演员二等奖，章渭贞、王润隆获演员三等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剧团撤销。

1973年恢复睦剧团建制，坚持上山下乡，为本县山区农民服务。1980年，参加省专业剧团青年演员会演，汪晓青获演员二等奖。1982年，参加省、市“小百花”会演，施桂英获省、市优秀“小百花”奖，方有禄获市优秀“小百花”奖和省“小百花”奖。同年，新编历史故事剧《方百花》参加市创作剧目调演，获剧目奖和演出奖。

1983年至1985年，排演《张羽煮海》《凤冠梦》《红楼夜审》《白蛇前传》和《白蛇后传》等8个剧目，共演出618场。1984年，组成睦剧改革小组，对睦剧历史进行社会调查。1985年，对睦剧曲调进行改革。1987年，《花子闹婚》获浙江省第三届戏剧节演出奖，剧本、导演、舞美三等奖。淳安各地的民间睦剧艺人根据各自条件，在每年冬季农闲时，或进行小戏演出，或是坐唱取乐，活跃在山区乡村。

进入21世纪后，市文联戏剧艺术协会和淳安县睦剧艺社联合在杭州各大专院校举办睦剧音乐欣赏会和推介会，并在杭州和淳安举办各类睦剧培训班和组织睦剧小型演出。演出剧目有《蔡鸣凤》《李仕卖妻》《马房逼女》《南山种麦》《乌金记》《金莲送茶》《白蛇前传》和现代戏《雨过天晴》《山谷朝阳》等20余部。2005年，睦剧被列入浙江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五、小热昏

小热昏是一种流行于苏浙沪等地的民间说唱艺术，源于清末杭州街头的“说朝报”。始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原为一种采用杭州方言，以唱新闻、宣传商品的形式卖梨膏糖，曲调滑稽诙谐，唱词通俗易懂，唱腔采用百姓熟悉

的民歌和小曲，很快深得百姓喜爱。多在露天演唱，形式简单，一副三脚架，一张长凳，代表舞台，一人或两人搭档说唱，以小锣或三巧板伴奏。一般先敲小锣，招揽观众，接着讲笑话、说新闻，最后唱长篇。常用曲调有“锣先锋”“三巧赋”“东乡调”以及“五更”“四季”“十叹”等流行小调。



小热昏艺人徐筱安（左）、周志文（右）表演《小热昏》
（来源于《杭州市志》）

小热昏创始人杜宝林，年轻时曾到苏州拜卖梨膏糖的陈长生为师，学唱小曲卖梨膏糖。清宣统三年（1911）前后，杜宝林回到杭州，把杭州朝报上的新闻编成通俗易懂的唱词，并吸收“文明戏”和“隔壁戏”的长处，加入更多的方言、噱头和口技等元素，唱腔也日渐丰富，使小热昏在杭州城里的影响越来越大。因内容以讽刺抨击黑暗势力为主，为了避免当局找麻烦，杜宝林就以“小热昏”作为自己的艺名，意思是头热发昏，满口胡言，不必当真。小热昏形式灵活简便，一只架子上摆着盛梨膏糖的木箱，艺人站在一条长凳上，乐器只有一面小锣、三块毛竹板。民国初年，杜宝林经常演唱于迎紫路^[1]、羊坝头、旗下^[2]、众安桥、城站一带的空地广场。

民国3年（1914），杜宝林进入盖世界游艺场^[3]演出。为了丰富演出节目和表演技巧，他把隔壁戏的段子如《绍兴人乘火车》《瞎子借雨伞》《火烧豆腐店》等改编移植过来，还吸收了“学乡谈”（学方言）和口技的表演技巧。

20世纪30年代，是小热昏的全盛时期，杭州有小热昏艺人二三十人。杜宝林的徒弟小如意（丁有生），是小热昏的第二代传人。此外，还有小如意的徒弟小长根（程长发）、开口笑（赵文生）。他们流动演唱于杭州、宁波、金华、嘉兴和上海等地，深受群众欢迎。这一时期，小热昏说唱形式上出现了双档，如

[1] 今解放路新华书店对面，惠民路附近。

[2] 今龙翔桥至开元路一带。

[3] 建于民国6年（1917），位于今湖滨一公园，为民初杭州第一个游艺场所。民国9年拆毁。

小如意的徒孙朱玲赛与妻子王玉琴便是夫妻双档。

民国17年（1928），小如飞（俞笑飞）拜丁有生为师。俞笑飞擅唱九调十八腔，与其妻赵美英搭档，演唱于杭嘉湖和苏南各地。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杭州小热昏艺人除了俞笑飞外，还有小乐福的徒弟徐乐天、罗笑峰、陈锦林等。经常说唱的长篇，既有《火烧红莲寺》《顾鼎臣》《孟丽君》《八美图》《济公传》等古代题材的曲目，又有《啼笑姻缘》《黄慧如陆根荣》《枪毙阎瑞生》等当代题材的曲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成立杭州市戏曲改进协会。1958年9月，杭州曲艺团成立。

20世纪50年代的小热昏以安忠文（筱翔飞）为代表。他擅长南腔北调，是一位能编善唱、坚持创新的爱国艺人。他创作的小热昏现代曲目《敢想敢做孙才尧》，于1958年8月参加全国曲艺会演，并作为优秀曲目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同志演出。安忠文本人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安忠文创作并演唱的《敢想敢做孙才尧》《曹老五养猪》《连环洞》《斩纛记》《便宜货》《纠察队员张老头》以及改编的《比媳妇》《菜场新貌》《水果招亲》等久演不衰，并多次得奖。

周志华为小热昏的第六代传人。他创作的《没有拆迁的“拆迁户”》获得文化部颁发的第十三届群星奖，2005年参加第五届中国曲艺节并获得牡丹奖。

2006年，小热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安忠文、周志华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徐筱安（徐长根）被评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随着老艺人相继离世，小热昏面临后继无人的难题。为了繁荣小热昏，让这门传统艺术更好地传播发扬，周志华于2011年前开办了“老开心茶馆”，既是演出场所，也是曲艺艺人交流平台。

六、杭州评话

杭州评话，俗称“杭州大书”，也称“说书”，由南宋的讲史演变而来。它采用杭州方言表演，评说历史、讲述故事，贴近生活，富有浓郁的杭州地方特色。它讲究口、眼、身、法、步、神结合，只用一人、一桌、一扇、一醒木即

可，虽然表演形式十分简单，但描述入微，渲染有方。

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南宋乾道（1165—1173）、淳熙年间（1174—1189），在杭州瓦舍勾栏中，专业的讲史艺人有23人。当时瓦舍中经常演说的书目有评说《汉书》《三国志》《五代史》等。咸淳年间（1265—1274），讲史艺人王六大夫还把当朝发生的岳飞、韩世忠等抗金英雄的事迹，编成《复华篇》《中兴名将传》进行说讲。南宋末年，杭州瓦舍出现了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长部讲史《大宋宣和遗事》，为后来《水浒传》成书提供了蓝本。

元代，杭州的讲史继

承了南宋讲史的传统，逐渐成为杭州说唱艺术的主流。明代，杭州评话艺人把杭州评话扩展到杭、嘉、湖地区各个州县。当时最流行的杭州评话书目有《济公》《岳传》《水浒》等。

清代是杭州评话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评话艺人组织杭州评话社，进行评话艺术的交流和学习，形成了王派、谢派两大流派。王派的创始人王春乔擅长说表，以说《三国》著称，也擅说《西汉》《东汉》《唐书》《宋八部》等。谢派的创始人谢万春，以表演取胜，擅长说《三国》《飞龙》



杭州评话艺人李自新



杭州评话艺人王宝善（魏志阳 摄）

《水浒》等。

民国12年（1923），杭州评话社改名“评话温古社”，王春镛为社长。此后，杭州评话界人才辈出，各有拿手书目。如王春镛的《岳传》、任栋祥的《东汉》、陈鉴春的《三国》、丁松樵的《飞龙传》、叶鸿声的《大明英烈传》、胡文熊的《隋唐》、林文元和秦少云的《水浒》、徐筱云和潘锡林的《济公》、戚芝麟的《大红袍》、童子祥的《七侠五义》、胡国良的《金台传》、苏瀛洲的《彭公案》、郭有堂的《封神榜》、李宝渊的《包公》等。其中王春镛、陈鉴春、童子祥、戚芝麟、苏瀛洲被誉为杭州评话界“四柱一栋梁”。

1958年，杭州市举行首届曲艺会演，张一飞创作演出的《模范李裕银》获会演创作奖。“文化大革命”中，评话艺人被下放工厂劳动。1979年5月，杭州市第二届曲艺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同年，恢复杭州市曲艺工作者协会。1981年9月，杭州曲协、杭州滑稽曲艺团联合举办杭州评话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青年评话演员。

1982年9月，杭州市文化局、市文联、市曲协联合举办杭州、苏州、扬州三地曲艺会演。演出的杭州评话有李伟清的《韩信挂帅》、陈俊芳的《华容道》、王超堂的《马兵王玉》。

1985年5月，杭州市曲协、市曲艺团联合举办“千岁书会”，15名评话老艺人演出《三国》《水浒》《杨家将》《包公》《海公案》《英烈》《济公》《金台传》等13部长篇的27回折子书。

2008年，杭州评话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杭州滑稽艺术剧院成为杭州评话的保护单位。

杭州中医药历史源远流长，在浙江乃至全国的医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晋代葛洪首创免疫疗法，最早发现脚气病和最早描述恙虫病、天花病的临床特征与传染媒介，比国外早1000多年。南北朝南齐时(479—502)，曾出现“武林为医薮，大作推钱唐”的兴旺景象。名医徐道度，所著《疗脚弱杂方》是世界上最早治疗脚气病的专著。宋元祐四年(1089)，杭州知事苏轼捐献私帑，与官家合办安乐坊于众安桥，是我国最早的民间救济医院。南宋绍兴六年(1136)，临安设医药和剂局，后改称“太平惠民局”，是最早出现的官办药局。明清两代，浙江的中医药学进入全盛时期。其中张志聪等对《黄帝内经》理论的研究及文献考注，张逐辰等对《伤寒论》的研究与注解，均在全国医界产生重大影响。赵学敏编著的《本草纲目拾遗》，是继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后的又一部有重要价值的中药学巨著。全书汇集药物921种，还收录了当时从国外传入的药物资料，并对《本草纲目》纠正异误。至清代，杭州传统医学已发展为内、外、妇、儿、眼、喉及医理等分科，集祖国医学之大成。

清末，国力日衰，中医药学处境艰难。杭州中医界人士在困境里竭力奋争。民国11年(1922)，裘吉生建立三三医院，开创联合中西医共同办院之始。民国16年，虞翔麟建立以骨伤科为主的祥林医院。邢涌华开设延龄医寓，他与王邈达、史沛棠合办的六通中医疗养院，则集治疗和保健于一体。这些医院的相继建立，突破中医坐堂门诊的传统模式，并注意吸纳西医药技术，有的还添置西医设备，在科室设置与管理制度的已有相当水平。同时，不少医家开始自觉采用近代教育方式，走办学兴医的路子。“国医大师”何任创办的杭州中医函授学校，也为浙江中医药事业培养了许多人才。民国18年，南京国民政府以“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

由，明令“不准中医开业”“不准中医带徒弟”“禁止中医办校”“禁止报社登载中医广告”，一时舆论哗然。经全国中医界两度组织赴京请愿，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宣布提案^[1]无效。至1949年，杭州国医公会有中医662人，其中负有盛名者有陈绍裘、王幼庭、周凤荪、何稚香、詹子翔、宣振元、余步卿、王泽民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事业枯木逢春。1950年7月，杭州市卫生局改组成立杭州市中医师协会。8月，中央召开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确定团结中西医的方针。1955年，市卫生局组建中医科，吸收中医师参加中医药管理工作，促进中医事业的发展。1958年，组织力量发掘、整理名老中医学术经验。1965年，根据省卫生厅《关于中医学徒满师后的有关问题的通知》，进行全市中医学徒满师考核与定职工作，使中医学徒培养逐步走上正轨。

进入21世纪后，杭州市大力振兴中医药事业。恢复中医学术团体，以学校研读、进修、中医带徒等方式培养中医人才，开展名老中医学术传承工作，实施全国中医“杏林计划”^[2]；办好中医院与综合性医院中医科，创办中西医结合医院；支持民主党派、社团、民间多层次办医模式，开展名院、名科、名中医评选和中医中药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发掘与保护中医药学术遗产，弘扬中医文化，使中医事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

一、知名药号

（一）张同泰药号

张同泰药号位于杭州市中山北路99号孩儿巷口。创始人张梅，浙江慈溪县马经村人。清嘉庆十年（1805），于现址盘进沈同泰国药号，改名为“张同泰国药号”，简称“张同泰”，单开间铺面，职工仅八九人。

清道光年间（1821—1850），药号由张梅之子张耐仙继承。至咸丰初年，在附近购地4亩余，扩大规模，广选各省道地药材，苦心经营管理，一举成为杭城有名的药店。当时众多的中药铺在杭城兴起，零售、批发、坐堂看病……竞争

[1] 《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2] 即自找老师、自费学习、结业后自找出路。

十分激烈。然而这些药铺大都以零售和坐堂看病为主，鲜有批发药材的。张同泰恰好抓住了这一机遇，开始了中药材的批发，同时也兼营零售。前店后厂式的经营模式给张同泰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一些周边以及外埠的小药铺纷纷托“航船”的人去张同泰进药材、饮片。清同治元年（1862），张同泰在靴儿河下增开益元参号（在今杭州市方志馆内）。清宣统二年（1910），张鲁庵继业，药店进行了大规模翻建。建石库墙门，上刻“万象”商标，大门两旁悬挂



张同泰（正门）（俞美娜 摄）



张同泰（内厅）（俞美娜 摄）

“张同泰道地药材”铜牌。进门第一厅，两侧悬挂黑底金字的丸散膏丹功效牌，正中有八角雕花亭子，内竖黑漆木碑，书“进内交易”贴金大字；二进为营业铺厅，上书“药局”两字，两侧设和合柜台。中药柜和丸散柜内，百眼橱、彩瓶、锡瓶、锡盒无不具备；柜侧分别悬有“万汇滋生”和“岐黄正传”烫金招牌，古朴雅致；三进为客厅，是经理接待宾客、洽谈业务场地。其四周拱房，分设拆兑、栈房、鹿栓间、改制间等，颇具规模。是年全店职工有60余人。

民国26年（1937），受抗日战争战局影响，张同泰停业2年。民国37年，金圆券^[1]贬值，商品限价，张同泰名产十全大补药、阿胶、八珍糕、人参再造丸、辟瘟丹及各种药酒等被抢购一空，企业难以为继。

[1] 解放战争后期，中华民国政府为支撑其崩溃局面而发行的一种本位货币。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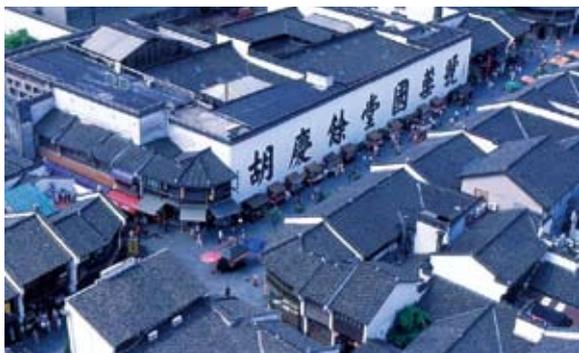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同益堂、大生祥、孙泰和、美华四店先后并入，改名为“春光药店”，直到1988年才恢复“张同泰”原名。

2000年，张同泰被列为杭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因道路扩建，经市文物保护部门批准，对张同泰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全新改造后的张同泰分为国医馆、国药馆和养生馆。2006年12月，商务部认定张同泰国药号为首批“中华老字号”。2007年，张同泰“道地药材文化”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胡庆余堂

胡庆余堂位于杭州历史文化街区清河坊大井巷内，创始人人为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

清同治十三年（1874），胡雪岩在杭州直吉祥巷九间头^[1]设立“胡庆余堂雪记药号”筹建处。胡雪岩邀请名医及国药业商人共同研究，确定了“创办大规模企业、自制丸散膏丹、开设门市部”的经营方针，设置制丹丸大料部、制丹丸细料部、切药片子部、炼拣药部、胶厂等部门。清光绪二年（1876），在杭州涌金门外（今南山路）购地10亩，设晒驴皮工场、铲驴皮工场、丸散工场、养鹿园等。光绪三年，胡雪岩派人广收名方，选



胡庆余堂（远眺）



胡庆余堂老药工展示手工泛丸传统制药技艺

[1] 今为直吉祥巷平阳里。

出验方400余张，用于配制各种丸散膏丹胶露油酒，汇编成册，并亲撰序言。同年，胡雪岩在杭州大井巷购地8亩，建造店堂。光绪四年，胡庆余堂雪记药号正式开张营业。经数年苦心经营，享誉江南，当时民间有“天下药店二家半”^[1]之说。



胡庆余堂（内厅）（吴璜 摄）

清光绪九年（1883），因经营生丝失败及清廷腐败等原因，胡雪岩在全国各地的阜康钱庄、银号等宣布关闭。光绪十年，胡庆余堂雪记药号被时任清政府刑部尚书文煜攫取。

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胡庆余堂由独资变为合伙经营。民国5年（1916）11月5日，胡庆余堂上海分号在上海北京路开张营业。在民国18年召开的西湖博览会上，胡庆余堂获饮片特等奖^[2]。

民国26年（1937）12月，日本侵略军从金山卫^[3]登陆，杭城形势紧张，胡庆余堂歇业。次年11月，胡庆余堂复业。民国28年，上海胡庆余堂与杭州胡庆余堂正式分离，独立经营。由于时局动荡，至1949年杭州解放时，胡庆余堂有职工187人，生意萧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庆余堂枯木逢春。1950年，胡庆余堂进行工商登记。1952年，进行了工资制度等4项改革，逐步恢复生机。1955年12月11日，胡庆余堂正式实行公私合营。1957年在北高峰北麓桃源岭下征地40亩，建成制胶车间。1958年7月，胡庆余堂与叶种德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胡庆余堂制剂厂”，“古医”商标正式作为注册商标使用。1959年，杭州市商业局决定将新药站所属

[1] 其中北京同仁堂和杭州胡庆余堂各占其一，广州陈李济药店占了半家。

[2] 获奖饮片主要有茯苓、元参等。

[3] 金山卫镇，位于杭州湾北岸、上海市西南境金山区南部，浙江省嘉兴市正东部。

中药制剂部分的生产设备、厂房并入胡庆余堂，厂名改为“公私合营胡庆余堂制药厂”。1961年4月，胡庆余堂附设中药制剂学校成立。1963年，为区别于上海胡庆余堂，厂名改为“杭州胡庆余堂制药厂”，“腰痛片”“全鹿片”被批准为中成药出口产品，新产品“双宝素”胶囊投入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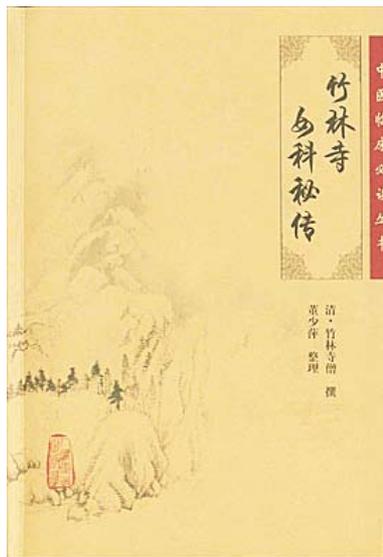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所谓“破四旧”的浪潮下，厂名改为“杭州中药厂”。1968年，杭州中药厂遂昌分厂建成并投产。1972年，杭州中药厂原厂改称“杭州中药一厂”，制胶车间成为杭州中药二厂。

1979年4月，杭州中药一厂恢复为“杭州胡庆余堂制药厂”。1980年9月，胡庆余堂门市部恢复营业。1986年4月，胡庆余堂成为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胡庆余堂药膳厅开张营业。1988年1月，胡庆余堂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维护整修。2002年，胡庆余堂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6年，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中医世家

（一）竹林寺妇科医学世家

竹林寺位于萧山城厢街道惠济桥北堍，原名“古崇寺”，建于南朝齐时（479—502）。开山祖为悟真禅师。至后晋天福八年（943），寺僧高昙“得异授而兴医业”。高昙禅师集资筹金，扩建振兴寺院，更名为“资国看经院”，创建了竹林寺女科。到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更名为“惠通院”。此后医术由师徒代代相传，僧医皆以治妇科病而著称。竹林寺妇科名声最隆的是静暹（晓庵）禅师，他殚精竭虑研究妇科，医术高超。南宋绍定六年（1233），他用秘方治愈宋理宗赵昀皇后谢道清的重病，被赐封为“医王”，上溯四世，世



《竹林寺女科秘传》

袭五世，御赐“十世医王”，并御书“惠济寺”，又赐“晓庵”“药室”两匾，从此医名远播。清道光年间（1821—1850），第九十二世莲尘师徒以医金所积，复加修建，占地8亩，设有药房和诊室。民国初年，经楼事益堂失火。民国26年（1937），寺院被侵华日军炸毁。1995年，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竹林寺旧址建惠济亭，并立碑纪念。

竹林寺妇科擅长治疗疑难杂症，在辨证上以肝、脾、肾三脏主论，治则注重调和气血、疏肝解郁、补肾益精。所传秘方为调经、胎前、产后三门，共117症及110方，用药119种，内服有汤、丸、散、酒等剂；外用有洗、熏、搽等剂和药灸；秘制太和丸、回生丹，遐迩闻名。治疗方法与用药均记载于历代所刻和传抄的《萧山竹林寺女科秘方》中。1958年至1959年，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实地考察调查，各方搜集，经版本校勘研究，编撰成内容比较全面的《萧山竹林寺妇科秘方考》。现保存在浙江中医研究院的古籍有《竹林寺女科秘方》《宁坤秘籍》等37种。

资料链接

竹林寺十世医王

一世涵碧（静霞），二世广严（天岩），三世志坚（商岩），四世子传（允云），五世静暹（晓阁），六世大有（会源），七世华玉（丹邱），八世道印（梅石），九世德宝（雪岩），十世性间（迪庵）。

（二）富阳东梓关张氏中医骨伤科

张氏中医骨伤科创始人张世炎，出生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是富阳东图乡图山村人。第二代传人张士彬、张士芳，四乡闻名。第三代传人张清高（1889—1952），后由其幼子张绍富（1922—1992）继承衣钵，为第四代传人。张绍富之子张玉柱（1948—），1965年在东图继承祖业，成为第五代传人。1959年，张绍富收汪木英为外姓弟子，三年后独立悬壶于浙北地区，1994年创办新登骨

伤科医院并任院长。至今张氏中医骨伤科已有170年的传承历史。

张绍富10岁从父学医，17岁独立应诊，20岁已深谙祖传医道。先后创办图山村巡回医疗站、东图乡中医联合诊所、东图联合医院等。1985年7月，张绍富担任富阳中医骨伤科医院名誉院长。1992年，张绍富去世，其子张玉柱担任富阳骨伤科医院院长。

张绍富从医50余年，总结出“整体辨证、手法整复、杉皮固定、内外兼治、筋骨并重、动静结合、功能锻炼”的治疗原则，使张氏中医骨伤学术内涵不断丰富。张氏中医骨伤科是浙江中医骨伤重要学术流派之一。主要特色有手法、用药、固定三项。有50余种正骨手法，能稳、准、巧地将断骨重新复位。利用杉树皮轻巧、可塑性、通透性强的特点，用于骨折固定，是张氏骨伤科一绝。体现中医骨伤动静结合的治疗特点。

张绍富还研制出艾火熏针、益肾糖浆、丹参蔓荆散等10余种内服外用的中药，疗效显著。学术论文有《豨莶狗脊仙灵脾汤治疗外伤性截瘫》《中药分期治疗脊髓损伤》《旋前屈肘法整复治疗肱骨踝上骨折伸直型尺偏型的体会》等。张绍富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赢得“富春江畔活华佗”的美誉。

张玉柱继承父业，刻苦钻研，把生物力学等现代医学融入传统医学之中，在治疗四肢骨折和脊椎损伤、脑挫伤后遗症等方面有独到之处。撰写《中药分期治疗外伤性截瘫的临床分析》等论文10余篇，其中《杉树皮夹板固定治疗肱骨踝上骨折预防肘内翻的力学研究》获浙江省科协1999年至2000年度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其课题研究获杭州市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富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创伤性骨弯曲的生物力学分析》《手法整复杉树皮外固定结合皮牵引治疗小儿股骨干骨折》获2005年浙江省中医药科学技



张绍富

术创新三等奖。他本人则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定为“十五”计划中医骨伤科（柯雷氏骨折、肱骨髁上骨折、肱骨外科颈骨折、外伤性截瘫）重点医生。

（三）陈木扇女科

“陈木扇”女科医学世家起源于唐代。唐乾宁年间（894—897），有陈仕良，以善医闻名，官至药局奉御。乾宁二年（895），奉昭修撰《圣惠方》，著有《食性本草》。陈仕良之后有陈天益、陈明遇、陈元忠等，数传而至陈沂。陈沂为木扇陈氏之祖，生于汴梁（今河南开封），长于临安（今杭州）。建炎元年（1127）高宗南渡后，陈沂奉诏为高宗妃吴氏急诊获效，敕授翰林院金紫良医，并得赐宫中掌扇，以便随时奉诏出入宫禁，凡金吾^[1]阍侍^[2]皆不得阻。陈沂后代以医为业者，南宋有陈静复、陈清隐，悬刻木扇^[3]以传术，被民间称为“陈木扇女科”。元以后有陈玉峰、陈仪芳、陈明扬、陈南轩、陈东平、陈恒崖等。

陈恒崖的后代均供职于太医院。陈恒崖之孙陈谏，字直之，号苕斋，明嘉靖（1522—1566）时钱塘（今杭州）人。陈谏精通医术，能治人所不能治之疾，并预测妊娠男女生死。著有《苕斋医要》、《陈氏秘藏妇科》5卷、《素庵医要》15卷。陈谏之孙陈引泉、陈引川皆继承祖业。陈氏后代在钱塘、石门、海宁、嘉兴一带繁衍，执医女科。清初，陈梦熊继承家业，其子德潜亦具医名。清道光年间（1821—1850），陈善南为陈沂第二十二世裔孙，著《医案略综》。陈加言之



（明）陈谏《苕斋医要》

[1] 负责皇帝大臣警卫、仪仗以及徼循京师、掌管治安的武职官员。

[2] 守门的奴仆。

[3] 木扇上书“宋赐官扇南渡世臣”八字。

子陈宜南继承祖业。陈宜南之子陈维枚，熟谙典籍，博通诸家，名震一时，誉称“八百年世医”。

2013年1月，设于浙江省中山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浙江陈木扇女科流派传承工作室入选全国中医学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单位名单（第一批），项目负责人陈学奇为陈木扇后裔。



《陈木扇女科临证辑要》

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跨湖桥文化时期，杭州先民已掌握用火焦法制作独木舟的技术。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杭州先民已掌握水稻种植、农具使用技术，以及石器、陶器、玉器和竹器的原始加工技术，其中玉器制作工艺达到相当水平。秦汉时，农田水利、种桑养蚕、海塘修筑技术发展较快，造纸、制盐、酿造技术陆续发展。隋唐时，丝绸、瓷器生产技术享有盛誉。吴越国时期，丝织业发展迅速，精缣皆制于官。据《吴越备史》卷一载，杭州城中有锦工200余人。宋代，活字印刷及天文、历法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1]南宋时，丝绸生产技术日臻成熟，使用脚踏丝车和花楼提花机，丝绸数量、质量为全国之冠，杭州成为丝绸之府。元、明、清三朝600余年间，杭州科技界人才辈出，在数学、天文、历法、农业技术和地学等领域建树颇多，代表人物有吴敬、项名达、戴煦、李之藻等。民国时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杭州成为以轻纺为主的工业及以工艺为主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相结合的城市，开发纺织、印染技术，应用电力，引进国外设备，兴办农业技术学校推广良种，科学技术水平明显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技事业呈现崭新景象。1956年后，杭州市相继成立冶金、机械、纺织、建筑、农业等行业的科研机构，制定推动科技进步的政策和规划，宣传与普及科技知识，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研究推广新技术。1978年10月，杭州市科学大会召开，成为推动杭州市科技发展的动力。1988年，中共杭州市委提出“科技兴市”战略；1992年10月，提出“科教兴市”战略，实行依靠科技进步、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措施。1996年，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杭州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全面启动钱江科技潮综合工程，建设以“两港三区”为重点的“天堂硅谷”工程，科技进步成效显著。

[1]（宋）叶梦得：《石林燕语》。

进入21世纪，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本是第一资源”“高新技术产业是第一增长点”的观念，以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为主线，以营造科技进步环境、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天堂硅谷”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速优势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促进全市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一、崇学明道

汉魏六朝时期，杭州涌现范述曾、朱异、杜之伟、干宝等一批经学家和史学家，诞生了《易文言注》《礼易讲疏》《梁史》《晋纪》等传世作品。南宋时，杭州兴盛繁华，人才荟集。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张九成，是我国心学史上稍前于陆九渊的主要人物，他创立的横浦心学体系和流派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吴自牧所著的《梦粱录》20卷，是迄今研究南宋杭州经济文化的一部主要史书。18世纪末，阮元在杭州编辑训释经义的名著《经籍纂诂》。近代，杭州涌现出龚自珍、俞樾等誉满海内外的



吴自牧《梦粱录》影印本

大师。

五四运动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杭州社会科学研究人才辈出，成果累累。民国9年至18年（1920—1929），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杭州传播。民国26年初版的《资本论》中译本，是王亚南、郭大力在西子湖畔翻译出版的。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沈志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理论，他的《新经济学大纲》《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等著作，在当时国内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杭州的社会科学在古希腊哲学、吴越文化、地方志、语言文字、教育学、社会学等研究方面成果也较为突出，涌现了章炳麟（语言文字学家）、严群（哲学家）、施昕更（考古学家）、余绍宋（方志学家）、张相（语言文字学家）、陈达（社会学家）、许璇（农业经济学家）、孟宪承（教育学家）、李浩培（法学家）

等一批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并取得了许多重要学术成果。其中，章炳麟的《馗书》、严群的《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施昕更的《良渚》、余绍宋的《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许璇的《农业经济学》、孟宪承的《大学教育》、李浩培的《国际私法总论》等论著，在当时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同时，杭州还出现了中国科学社杭州社友会、浙江省教育会、吴越史地研究会、西泠印社、中国民俗学会等学术社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杭州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有了较大的拓展。杭州社会科学门类逐步齐全，建立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研究机构，以及浙江省历史学会、浙江省教育学会、浙江省哲学学会、浙江省经济学会等社会科学学术团体；创办了《浙江学刊》等社会科学专业刊物。同时，发表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如沈善洪的《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著作）、薛克诚的《实践是主客观矛盾统一的基础》（著作）、雷云的《因果论》（著作）、张宗祥校注的《越绝书》（著作）、汪济英的《良渚黑陶又一次重要发现》（论文）、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著作）、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著作）等。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前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大多遭到批判，杭州与全国一样，社会科学研究基本停止。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杭州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哲学研究，在传统优势学科古希腊哲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的基础上，在中国哲学史、美学、伦理学方面进行拓展，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美学、伦理学、古希腊哲学为主要内容的杭州哲学研究的基本格局。经济学研究，开始跳出传统的书斋式的研究框框，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研究和回答经济建设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国家科学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并出现了金融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乡镇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史学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拓展和深化，其中较突出的有吴越文化研究、宋史研究和地方党史研究。教育学研究得到迅速发展，涉及的领域有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幼儿教育、比较教育等。语言文字研究在楚辞研究、训诂学和现代汉语语法修辞方面有新的发展。人口研究开始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法学研究也逐渐繁荣。

进入21世纪，杭州哲学理论研究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强烈的时代特点，突出表现在开始重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人学观研究，提出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为重要背景的“浙学”思想，发展体现杭州山水文化特征、服务杭州城市建设的城市美学等。

此外，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呈现交叉发展的态势。人口流动与政策控制研究，女性、青少年与婚姻、家庭研究，人口老龄化与老年问题研究，社区研究均成果丰硕。历史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考古学研究主要围绕跨湖桥遗址和良渚遗址展开，方志学研究，南宋史研究及岳飞、于谦等人物研究著述颇丰。文学与语言学研究在良好的历史基础上，涌现出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戏剧与夏衍研究、明清戏曲小说研究、唐宋词学研究、训诂学研究等优势研究领域和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教育学研究则更加注重与实际教育情况相结合，针对杭州的教育实际，探索教育制度、教学方式和课程改革等方面的经验，形成一批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

二、格物致知

杭州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当时的先民已掌握了水稻种植和农具使用，以及石器、陶器、玉器、竹器等原始加工技术。

秦汉以后，杭州的农田水利、种桑养蚕和海塘修筑技术发展较快。制盐、造纸、酿造、医药、丝绸织造、雕版印刷等技术也陆续发展起来。五代吴越国天文历法已达较高水平，杭州碑林保存的吴越国王钱元瓘及次妃吴汉月墓上两块天文石刻星图，经考证系公元941年至951年所刻，是国内已发现的最早的石刻星图。

宋代，杭州的科学技术有了较大发展。沈括晚年所著的科学巨著《梦



沈括《梦溪笔谈》影印本（俞美娜 摄）

溪笔谈》一书，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宋朝以前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和医药学等领域的科学技术成就，首次用文字记载了我国的四大发明。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系杭州书籍铺的布衣毕昇于宋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比国外约早400年。



南宋官窑青瓷花式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南宋杭州成为国都后，科学技术

发展进入繁荣时期。其重要特点是朝廷直接办科学技术机构：在杭州通江桥北重建的太医局，成为开展医药研究和教学、培养高级医药人才的国家级专门机构；和剂局与熟药所，专门管理中药制剂生产。南宋官窑的青瓷“釉色莹澈，为世所珍”，丝绸、造船、兵器制造、天文、数学、园林建筑等方面的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西方科学技术传入杭州后，动力机器的使用，电灯、电话的出现，公路和铁路的开通，大大推进了社会进步。求是书院、蚕学馆、浙江农业教员讲习所、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及一些藏书楼等教育文化单位的建立，加快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

民国时期，杭州的科学技术又有新的发展。农业以品种改良和栽培技术为主，开展了稻麦杂交育种、家蚕品种改良和人工孵化等试验。浙江大学农学院等单位针对当时水稻虫害较多的状况，组织科技人员指导农民治虫，试制新农药，推广化学肥料，使粮食产量有了提高。工业科技重视引进西方技术，促使杭州的手工业向近代化、机械化转变。机器生产日益兴盛，交通邮电科技发展较快。在发展中医药的同时发展西医药，引进国外的手术器械，提高了医疗水平。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创建，保险伞、小型飞机的制造成功，钱塘江大桥的落成把科学技术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全市科技事业进入一个全新时期。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科技队伍迅速壮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1957年8月12日，我国第一根静电

纺纱在杭州第一棉纺织厂试纺成功。随后，浙江大学和浙江电机厂（杭州发电设备厂前身）研制了国际上第一台并网运行的双水内冷发电机。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发展中的杭州科技事业带来很大摧残。广大科技人员排除干扰，在困难的环境下坚持科研，先后取得高精度7150平面磨床、6000全钣式制氧机、6130汽车发动机、黄麻纺织一条龙等一批具有当时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成果。

1978年10月，杭州市科学大会召开，成为推动杭州市科技发展的动力。至1985年，杭州科技队伍人数发展到6.8万人，市属独立科研机构17个，企业科研机构190余个，获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1598项（次），奠定科技进步发展的良好基础。1988年，中共杭州市委提出“科技兴市”战略方针；1992年10月，改为“科教兴市”战略方针，实行依靠科技进步、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措施。

1996年，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杭州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全面启动钱江科技潮综合工程。该工程包括促进农村科技进步的兴农工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先导工程、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产业升级工程、促进城市建设现代化水平的城建科技工程和培育重点人才的跨世纪科技人才工程5部分，贯穿整个“九五”时期。

2015年，杭州市以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为契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挥科技创新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三、科教英才

（一）毕昇

900多年前，一项伟大的发明在杭州诞生。它就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的其中一类——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毕昇（约970—1051），是一介布衣，杭州人（一说浙东人）。家庭贫寒。幼年时，毕昇就跟着父母家人避灾逃荒，一路流落到了杭州，住在望江门外一带，也就是现在海潮路北段的始版桥新村附近，当时，那里是

菜农聚居的地方。十几岁时，他就进了杭州一家私人书坊当学徒，这家书坊是杭州一个书商设立的专门刻书的机构。当时印刷的主要手段便是雕版印刷，发明于唐朝。具体的步骤是在雕刻前，先将文字抄写在薄纸上，翻转过来后贴在木版上。等纸张干透后，将纸背刮去，只留一层近乎透明的纸膜，可以看到文字的反文。然后再用刀、凿等工具顺着字的笔画雕刻凿削，使字的每一笔画都凸出来。木版雕好以后，在上面刷墨，再把白纸铺在木版上，用软刷在纸背上均匀地刷，将纸揭下后就能看到清晰的正文。毕昇初为印刷铺工人，专事手工印刷。他在印刷实践中，深知雕版印刷的弊端，如工作量大、容易返工、耗时太长等。



毕昇画像

于是，毕昇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经过自己的反复思考和实践，在宋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起初，毕昇用木头刻成一个个字，进行拼版，但因木材纹理疏密不一，容易变形，拼起来不够平整，印刷效果不是很理想。后来，他看到小孩用黏土做成骰子进行游戏，从中得到了启发，改用胶泥刻字为字印，再用火烙使之坚硬，另置一铁板，在上面涂上松脂、蜡及纸灰混合制成药剂。印刷时在铁板上放一块铁模，于模内密密排上字印，以火烙板使药剂溶化，然后用平板按压其表面，使字印平整如砥。为了适应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备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以备同一版内重复时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没有准备，可以随制随用。为便于选字，还把胶泥活字按韵分类放在木格子里，贴上纸条标明。这一技术在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著作《梦溪笔谈》中也有记载。

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技术，具有一字多用、重复使用、印刷多且快、省时省力、节约材料等优点，比雕版印刷术有了质的飞跃，比德国人谷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要早400年。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因循守旧，不重视科学，也不提倡新的科技发明，毕昇经过若干年的艰难摸索发

明出来的泥活字印刷术被视为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他耗尽心血制作的一套泥活字也没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加之毕昇是一个普通工匠，地位卑微，更引不起达官显贵们的丝毫注意，书坊主人也认为他是不务正业。毕昇在发明泥活字的几年工作中，积劳成疾，又见到自己凝聚多年的心血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心中十分愤懑。活字印刷术发明后没过几年，毕昇便郁闷而逝。



活字印刷示意图

在毕昇去世后的很长时间，印刷的主流仍然是雕版印刷。16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非洲、美洲和俄国的莫斯科，19世纪传入澳大利亚。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传遍了全世界。因此，我们可以说印刷术的发明也给人类文明的传播开辟了极其广阔的道路，对于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马克思曾联系欧洲的历史发展阐述道：“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



元大德九年（1305）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梦溪笔谈》中对于活字印刷的记载

（二）沈括

《梦溪笔谈》是我国古代科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总结了中国古代主要是北宋时期的许多科技成就，在中国和世界史上有重要地位。《梦溪笔谈》也被英国著名现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教授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

[1] 《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

程碑”。而其作者沈括（1031—1095）也被称作“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沈括出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一个官僚家庭里。祖父和父亲都当过官，因此，沈括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此后，他经常随父亲外出宦游州县，到过泉州、润州、简州和汴京等地，接触社会，增长见识。沈括从小便要求自己“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1]，这种严谨的学风为他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沈括画像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沈括的父亲沈周去世。三年后，沈括以父荫入仕，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沭阳县主簿，开始了他的仕途。此后的几十年，他到江苏东海、安徽宁国、河南淮阳当过县令，参与过王安石变法，也出使过辽国，与契丹贵族谈判。

而沈括能完成《梦溪笔谈》这一著作，与他在从政时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是分不开的。他的研究兴趣很广，在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全书有17目，凡609条。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药、天文、地理、历法、气象、地质、矿物、冶金、水利、工艺、建筑、制图、文学、史学、考古、音乐等各个门类学科，其价值非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的科学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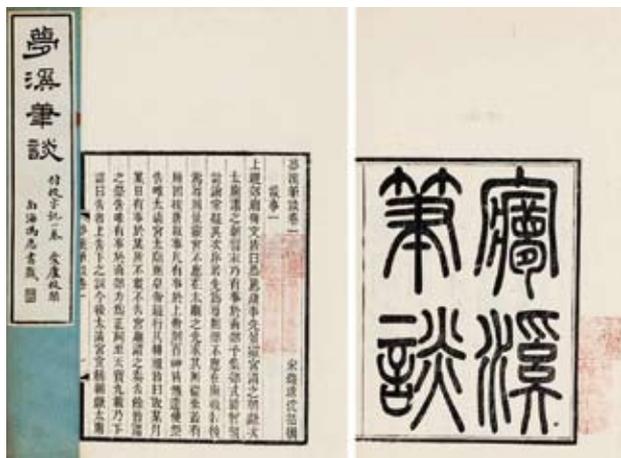
在社会历史方面，沈括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揭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翔实的记载。在数学方面，沈括首创了“隙积术”和“会圆术”，前者在中国数学史上开辟了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研究领域，后者则是中国数学史上第一个求弧长的近似公式。

[1] 语出《中庸》第二十章，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作者为孔子后裔子思，后经秦代学者修改整理。意为要广博地学习，要对学问详细地询问，要慎重地思考，要明白地辨别，要切实地力行。

在物理方面，沈括是世界上最早经实验证明了磁针“能指南，然常微偏东”，即地磁的南北极与地理的南北极并不完全重合，存在磁偏角。这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发现磁偏角现象早了400多年。在地质方面，沈括在延州（今陕西延安）看到当地人采集一种油，并将其命名为“石油”。在叙述石油的用途后，他认为其今后一定会大行于世。在地理方面，沈括历经12年不懈努力，完成了奉旨编绘的《天下州县图》，图幅之大，内容之详，前所罕见。全套地图共有20幅，包括全国总图和各地区分图，比例为90万分之一。在制图方法上，沈括提出分率、准望、互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等9种方法，并按方域划分出“二十四至”，从而大大提高了地图的科学性。可惜南宋战乱频发，此图竟毁于战火之中，成为千古遗憾。

沈括晚年谪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在那里修筑了一座梦溪园，《梦溪笔谈》就是在此成书。沈括去世后，家属将其归葬钱塘，其墓位于今余杭区安溪乡太平山下。1983年，余杭县文物普查，在太平山南麓发现了沈括墓。1986年，沈括墓被列为余杭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被列为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梦溪笔谈》中，沈括怀着对广大普通劳动者的敬意，详细记载了五代吴越国时期杭州著名建筑大师喻皓和北宋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的情况。他对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的记录，成为最早、最翔实的珍贵史料。这不仅记录了中国人的光荣，也记载了杭州人的骄傲，丰富了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



沈括的《梦溪笔谈》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三）林启

明清时期，杭州书院文化发达，近代教育事业发展较早，基础较好，这与清

代杭州知府林启兴办学校有很大的关系。林启也被称作杭州近代教育的奠基人。

林启（1839—1900），字迪臣，福建侯官人。他是清同治三年（1864）举人，于清光绪二年（1876）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担任过编修、陕西学政，后又任浙江道监察御史。

甲午战争中，清军战败。林启听闻慈禧太后挪用建海军的经费去建颐和园，十分气愤，毅然上书：“请罢颐和园之役，以疏民困。”因而得罪了慈禧太后和亲贵大臣，被外放到浙江任衢州知府。虽被外放，但林启却觉得能为一方百姓做几件好事、实事，也不愧于他这一生。



林启

光绪二十二年（1896），林启调任杭州知府。在杭的这四年时间里，他开创了近代教育的先河。他建议浙江巡抚廖寿丰利用位于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的普慈寺寺屋兴办新式学堂，取名“求是书院”。他在申请创办求是书院的代拟奏折中这样写道：“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林启也成为求是书院总办，负责确定章程、延聘师资、招收学生等事宜。求是书院后来发展成为誉满全国的浙江大学。



《浙江求是书院章程》

林启在任衢州知府时就曾大力提倡发展蚕桑。调任杭州知府后，他看到由于蚕桑技术落后等原因，“蚕病蚕羸而丝劣”，蚕丝生产衰退，农民养蚕连年歉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兴办了注重课堂教学与实习的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



1898年11月，日本清国视察员前来考察蚕学馆，并和师生合影

学)，目的在于除去蚕微粒子病，选育佳种，把优良的饲养技术传授给学生，然后推广到民间。林启自兼总办，请在法国留学时学过选种的江生金任总教习，聘请了日本蚕学家轰木长子、前岛次郎、西德德太郎等为教习，还派毕业生去日本学习养蚕和制丝技术。蚕学馆的兴办，对全国蚕桑丝绸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光绪二十五年（1899），林启又在大方伯原圆通寺内建立了养正书塾。这圆通寺里的和尚不守清规，倚仗官势，做了许多坏事，被百姓告发。林启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掌握确凿证据后，查封了寺庙。由于当时维新派刚失败，清朝廷下令各省停止办学，因此林启只能使用“书塾”的旧名来应付朝廷。而实际上，养正书塾是一所中等学校，开设了许多现代课程，培养适应时代发展、能为社会所用的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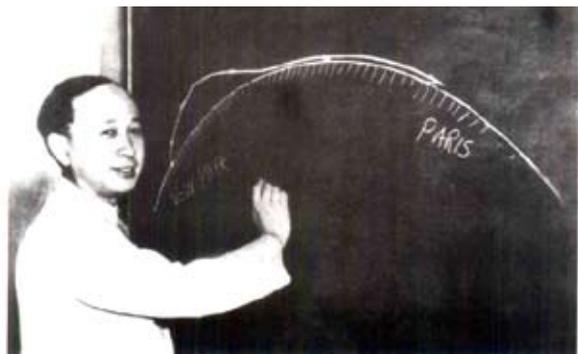
光绪二十六年（1900）4月24日，林启在杭州去世。其后人欲将其遗体运回家乡福建安葬，杭州人民则要求把他安葬在西湖旁，双方争执不休。最后，还是因为林启生前有“为我名山留片席，看人宦海渡云帆”的诗句，林家子孙才

同意将林启安葬于孤山北麓。后人为了纪念林启先生，在他的墓旁建林社，现供奉着林启先生的塑像，其中有一副挽联这样写道：

教育及蚕桑，三载贤劳襄太守；
追随有梅鹤，一龛香火共孤山。

（四）钱学森

繁衍于江南一带的钱氏家族，自唐末以来开枝散叶，人才辈出，载入史册的名家逾千人。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1911—2009）就是吴越王钱镠的第33世孙。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给研究生讲授火箭科技

清宣统三年（1911），钱学森出生于上海，祖籍杭州临安。钱学森出生不久就回

到杭州方谷园2号的家中。幼年的钱学森显示出了过人的天赋，3岁时已能背诵百首唐诗、宋词。他还很爱读一些启蒙读物如《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他还会心算，简单的加减乘除，竟然对答如流。民国23年（1934），钱学森从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毕业，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1]中唯一一个航空留学生——这个奖学金在全国也只有20个名额。

民国24年（1935）9月，钱学森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攻读硕士学位，仅用了一年时间便获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随后，他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冯·卡门^[2]的学生。民国26年，少有社交活动的钱学森，加入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小组”。当时，“火箭”这个

[1] 庚子赔款奖学金：随着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而开始颁发，对象是中国留学生。1908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

[2] 冯·卡门：匈牙利犹太人，1936年入美国籍，是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开创了数学和基础科学在航空航天和其他技术领域的应用，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

词还只是出现在科幻小说中，很少有人认为火箭是一个值得投入力量研究的科学领域。在冯·卡门的鼓励下，火箭小组不断地推进自己的试验。终于，在民国27年（1938）5月，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研制的火箭引擎运行了整整1分钟，发出巨大的声响。人类终于意识到：太空飞行是有可能的，而且已经离我们十分近。

民国30年（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在冯·卡门的推荐下，钱学森获得了“国家安全认证”，获准参加美国海陆空三军、国防部、科学发展局等一切核心军事机密工作。他在美国的火箭研制工作中做出了重大贡

献，自此，钱学森的研究中心彻底从航空转向火箭，走上一代火箭专家的巅峰之路。民国36年，钱学森接受了母校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回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并在那一年成为终身教授。同年回国探亲的时候，钱学森遇到了钱家世交的金蒋英，一句“跟我去美国吧”，他娶到了后来成为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的蒋英。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便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经过不懈努力，钱学森夫妇终于在1955年9月17日携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10月1日清晨，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10月15日，钱学森一家回到杭州，祭扫母亲章兰娟的墓。在杭州五天，钱学森一家参观了浙江大学，访问了方谷园2号和积善坊巷3号，会晤了亲友，游览了西湖，于10月20日返回上海。

回国后，钱学森迅速投入工作。从成功地指导设计了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导弹的发射，到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成功；从组织领导运载火



钱学森一家四口在回国的船上

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到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的设计制造，以及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成功发射，他始终站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最前沿，突破无数科研难题，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贡献。

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为共同缅怀和纪念这位杰出的科学家，2011年12月1日在钱老百年华诞之际，由中共杭州市委主办、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中共上城区委共同承办的“纪念钱学森诞辰一百周年暨钱学森故居揭牌仪式”在方谷园2号隆重举行，钱学森故居的正厅及二楼卧室、书房等展厅正式对外开放。



位于小营巷方谷园2号的钱学森故居（倪晴 摄）

杭州的佛教，始于东晋。咸和初年，印度僧人慧理来杭，“连建五刹、灵鹫、灵山、灵峰等，或废或更，而灵隐独存，历代以来，永为禅窟”^[1]，杭州佛教传布由此而始。南朝时，门阀士族大力提倡佛教。梁武帝萧衍更是将佛教奉为“国教”，一时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隋朝，隋炀帝推崇天台宗。圣达贞观法师扩建下天竺翻经院，成为在杭州传布天台教规第一人。

自唐、五代至宋，由于历代帝王支持佛教传播，杭州成为东南佛国。唐时，杭州不仅新建寺院无数，同时也是高僧云集之地，有著名诗僧韬光，被誉为“僧中十哲”的道际^[2]、寰中、道峰、法洗以及法钦^[3]等。唐会昌二年至五年（842—845），武宗李炎“恶僧尼耗蠹天下”，命令废全国佛寺，僧尼还俗，史称“会昌法难”。五代后周显德年间（954—959），再次“灭佛”，杭州寺庙虽受到了破坏，但在吴越兴佛的背景下，获存佛寺达480所。五代时期，杭城寺院遍布，佛塔林立。现在杭城著名的六和塔、保俶塔、白塔以及原雷峰塔均为吴越时所建。

宋太祖统一中国后，杭州佛教发展进入高峰期。南宋时，四方来杭参学的僧人日益增多。日本僧人也纷纷渡海来杭求法。

元代，在灵隐飞来峰、吴山宝成寺等处留下一批有蒙藏技法特色的摩崖石刻佛像，其造型生动，艺术价值之高为国内罕见，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明代初，一些佛寺得到重建。明太祖朱元璋下旨重建上天竺观音菩萨殿，逐渐吸引了四方信众。每年春节后至端午，上天竺内“数

[1]（清）孙治：《灵隐寺志》开山卷。

[2] 即西岭和尚。

[3] 即道钦，径山开山祖师。

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月方罢”^[1]，形成天竺香市，延续至今。

清康熙、乾隆两朝，对杭州佛门颇为崇信。康熙五到杭州并上天竺；乾隆六到杭州，十上灵竺，并御题匾额。清道光后，国力衰落，佛教也逐渐不振。

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侵杭，寺院被日本侵略军占据，僧尼四散各自谋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佛教得到保护。1956年8月1日，杭州市佛教协会成立。

“文化大革命”期间，杭州佛教界受到冲击，寺庵的文物被砸毁、散失，宗教活动停止。

1975年，灵隐寺得到重修，对外开放。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杭州市佛教协会及各寺庙恢复了正常活动，被占用的寺庙，发还自行管理。1980年，灵隐寺再次重修，净慈寺及天竺三寺在政府协助下进行了大规模整修。

改革开放后，杭州佛教界三宝重兴、众善奉行。寺院开放，信徒众助。各地佛教协会及寺院组织加强管理，倡导文明进香。佛教界人士关心国家建设和社会事业，扶贫救灾，开展对外友好交往活动，弘扬中华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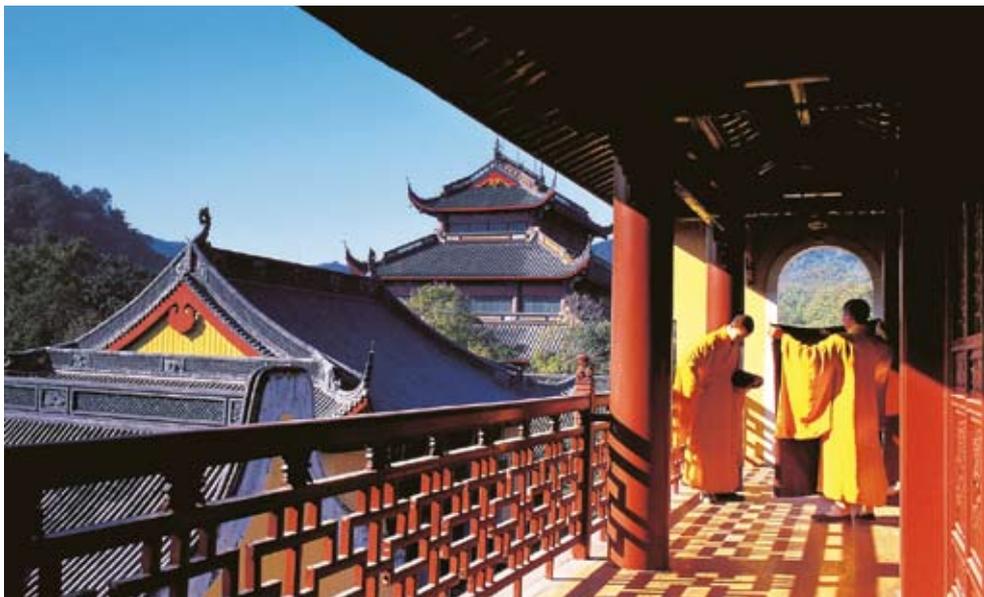
一、梵宇古刹

（一）灵隐寺

灵隐禅寺又称“云林禅寺”，位于杭州西湖西北的灵隐山法云弄。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印度高僧慧理来杭弘法，见此处“仙灵所隐”，遂建灵隐寺。此为杭州佛教寺院之始源。

南北朝时，梁武帝（502—549在位）好佛，得以赐田扩建。唐大历六年（771），灵隐寺曾作过全面修建，香火日盛。唐长庆时（821—824），灵隐寺僧道峰专修华严宗，常在灵隐寺和各寺讲经说法，信徒甚众，听众有时达数千人之多。唐会昌年间（841—846），武宗灭佛，寺毁僧散。至五代时，吴越四代

[1]（明）张岱：《西湖香市记》。



灵隐禅踪（张望 摄）

钱王大力支持杭州佛教中兴，灵隐寺又日趋兴盛。吴越王钱弘俶于宋建隆元年（960）请来延寿禅师主持灵隐寺，广建僧舍500余间，继而大建殿宇房舍1300余间，全寺有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堂，住寺和挂单僧众达3000余人，是灵隐寺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赐名“景德灵隐禅寺”。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评定江南禅院，灵隐为第二，有“禅窟”之称。元至正三年（1343）、至正十九年，灵隐寺两度毁于兵火，直至至正二十三年才得以修建方丈室和伽蓝堂。

明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封灵隐寺住持见心为十大高僧之一，授以金襴袈裟，赐田3000亩给灵隐寺。洪武十七年，住持慧明重建觉皇殿，改称“灵隐禅寺”。永乐初年（约1404），由豁堂继席，重开云门宗法，求法者与日俱增，成为杭城“禅林盛事”。

清顺治七年（1650）和顺治十五年，灵隐寺两度整修，至康熙五年（1666）全面竣工。当时灵隐寺有：七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轮藏殿、伽蓝殿、金光明殿、大悲殿、五百罗汉殿；十二堂：祖堂、法堂、直指堂、大树堂、东禅堂、西禅堂、东戒堂、西戒堂、斋堂、客堂、择木堂、南鉴堂；四阁：华严阁、联

灯阁、梵香阁、青莲阁；三楼：响水楼、看月楼、万竹楼；一林：玉树林。崇楼杰阁，冠绝江南。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南巡至灵隐寺，御书“云林禅寺”题额。康熙三十八年，又获御书“禅门法纪”额和“禅心澄水月，法鼓聚鱼龙”联。

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进杭城，寺庙大多被毁，灵隐寺仅存天王殿及罗汉堂。清宣统二年（1910），朝廷赐木建灵隐寺，重建大雄宝殿。

民国时期，灵隐寺屡经修建。当时，大雄宝殿西侧西禅房边建有罗汉堂，五百罗汉均与人高，众相各异，佛像背列，四面可通，是我国佛教雕塑中的精品，惜于民国25年（1936）10月14日毁于一炬。次年底，日本侵略军侵占杭州，灵隐寺收容难民五六百人，半夜失火，焚毁客堂、伽蓝殿、梵香阁及东山门。至此，灵隐寺前代所遗之佛像，仅存天王殿南宋时用香樟木雕刻的韦驮一尊。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灵隐寺因年久失修，已破败不堪。浙江省民政厅于1952年夏组成“杭州市灵隐寺大雄宝殿修复委员会”，主持修复工作，工程于1955年4月竣工。1962年，灵隐寺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灵隐寺开始全面整修，1980年冬完工。1983年，灵隐寺被列为全国重点寺院。1987年，制订《修复灵隐寺总体规划》，并分期实施，于2005年10月全部完工。

重修后的灵隐禅寺坐北朝南，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占地面积约10.2万平方米。中轴线上有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藏经楼、华严殿。东副轴线上是钟楼、华严阁、联灯阁、大悲楼、伽蓝殿、功德堂、念佛堂等。西副轴线上分布鼓楼、罗汉堂等。天王殿前两座八面石经幢，建于宋开宝二年（969），左边石塔顶上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故称“尊胜塔”；右边石塔刻有《佛



（清）康熙御书“云林禅寺”题额（俞美娜 摄）

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因称“大自在塔”。天王殿入口的弥勒佛坐像，建于民国21年（1932）。天王殿前东侧有御碑亭1座，刻有清乾隆皇帝游灵隐寺诗4首。天王殿上檐“云林禅寺”匾额，为清康熙皇帝题字。殿内弥勒佛和四大天王塑像，形象生动，宝相庄严。弥勒佛阁背后，立着面朝大雄宝殿的护法神像韦驮菩萨，为南宋遗物，由多块香樟木用榫头拼嵌而成。大雄宝殿为单层三重檐歇山顶结构，阔7间，进深5间，高33.6米，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单层重檐寺院建筑之一。殿前平台两边，有东西两塔，均为八面九层楼阁式古塔，高约12米，始建于北宋建隆元年（960）。塔基呈莲花状，底层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大雄殿内正中有贴金释迦牟尼佛像（1953年重修），像高19.6米，加莲花座高达24.8米，用24块香樟木雕刻而成。佛像跌坐在莲花须弥座上，释迦牟尼佛两眼向前凝视，右手微微抬起，左手伏膝，此乃说法印。大雄宝殿后平台上，一字横排长串建筑物，药师殿居中，两边紧连东西罗汉碑室，再相连是东西禅堂。“药师殿”匾额由赵朴初书。殿内正中供奉药师佛，手持五层宝塔，端坐在莲花座上，两边日月菩萨胁侍，大殿东西两侧站立着十二药叉神像，顶盔贯甲、神态威武。罗汉碑室藏有500块石碑，为500尊罗汉线刻画像，形象各异。第四进是藏经楼，内设云林藏室、法堂（直指堂）、藏经楼。第五进是华严殿，殿内供奉“华



灵隐寺石塔（俞美娜 摄）



灵隐寺内的释迦牟尼像（俞美娜 摄）

严三圣”，中为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亦称“法身佛”），左为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右为大行普贤菩萨，三尊佛像用一根缅甸楠木雕刻而成。天王殿入口处至华严殿水平进深300米，高差50米。大雄宝殿西侧坐落五百罗汉堂，面积3116平方米，500尊青铜罗汉坐像，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每尊青铜罗汉高1.70米，宽1.30米，重约1000千克。罗汉堂中央设置四大名山铜殿1座，分别供奉五台山文殊、峨眉普贤、普陀观音、九华地藏4尊菩萨，象征佛法智、行、悲、愿的境界。

（二）径山万寿禅寺

径山万寿禅寺又称“万寿禅寺”或“径山寺”，位于杭州西北余杭区境内天目山东南余脉。

唐大历四年（769），唐代宗下诏为法钦禅师（亦称“道钦”）而建，并定名为“径山禅寺”。法钦之后，寺宇逐渐破败，一蹶不振，直至唐咸通三年（862）高僧鉴宗禅师任住持，才得以复兴。唐乾符六年（879），唐僖宗赐名为“乾符镇国院”。南宋时，临济宗风名传四方，住持大慧宗杲、蒙庵元聪、无准师范、虚堂智愚均为海内外崇敬的佛教宗师。日本佛教临济宗诸派法系大多出自径山。宋乾道二年（1166），宋孝宗偕显仁皇后登径山时，将寺改名“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并亲书寺额，拨内帑建千佛阁。宋嘉定年间（1208—1224），径山寺被定为禅宗“五山十刹”之首，成为东南第一禅院。宋端平年间（1234—1236），日僧圆尔辨圆在径山寺求法，回国时带去了茶种籽，播种于安倍川一带，并传播了径山茶研制法。宋咸淳年间（1265—1274），日僧南浦绍明在径山修学5年，回国时又将“茶台子”“茶道具”带回日本崇福寺。径山“茶宴”逐渐演变为日本“茶道”，至今日本佛教界仍认为日本“茶道”的故乡在径山。

径山寺自法钦开山至民国时期共历8次毁建、2次大修，至民国22年（1933）由本沅法师重建，已是第8次，但日渐衰落。

杭州解放后，径山寺因年久失修，逐渐倾圮。1964年，大殿倾毁，仅存宋孝宗御碑、明永乐铜钟、明代铁香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保护明永乐元年（1403）铸造的大铜钟^[1]，修建

[1] 铜钟高2.34米，下口径1.8米。金龙盘顶，铸有铭文，钟声洪亮，撞之可闻数十里。



宋孝宗题“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御碑

钟楼，并将3尊铁佛和历代祖师名銜石碑供于钟楼内。1989年7月，省政府批准修复开放径山万寿禅寺。杭州市宗教事务部门和余杭县政府重新确认径山寺使用土地面积4.20万平方米，制订规划并获批准。1990年7月18日，钟楼起火，明代铜钟被熔化近半，径山寺房屋全毁。1990年12月至1997年5月，杭州市佛教协会在海内外，特别是日本佛教界的支持下，先后建成大雄宝殿、山门、先德堂、客堂、库房、天王殿、钟鼓楼、僧房、左右回廊、斋堂及九龙石雕照壁等，计6000平方米，并重塑佛像、庄严法器，径山寺殿宇重现古刹重光。1997年5月，举行大雄宝殿殿宇落成暨佛像开光法会，浙江省诸山

长老、长者、居士近千人出席，日本佛教友人福岛庆道、有马赖底、南泽道人、四律谷道宏分别率团参加法会。2001年5月，韩国汉城大学院佛教宗务行政高位者课程会长、莲法精舍住持林法性，赠送径山万寿寺《高丽大藏经》1部（8帙），以怀念径山祖庭之恩。

重建的径山寺山门外古木参天，黄色墙上刻有“唐代古刹”4个字，上挂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书“径山万寿禅寺”匾额。门前有九龙石壁1座，为杭州寺院仅有。进天王殿而出，两边是钟楼、鼓楼，钟楼内有仿明代永乐径山大钟，钟声洪亮，远传深山幽谷。两廊围绕



径山万寿禅寺

连通大雄宝殿，殿内供奉一佛二弟子，中为释迦牟尼佛，右胁侍目犍连（神通第一），左胁侍舍利弗（智慧第一）。中轴线三进为法堂藏经楼，两层歇山顶建筑，下为法堂，上为藏经楼，堂楼合二为一。东副轴线上分布客堂、僧舍、禅

堂、龙王殿、方丈室等。西副轴线分布祖堂、迎客楼、斋堂、香积厨等。寺院内外有龙王井、醍醐井、御碑亭、洗砚池、望江亭、吉游步道、紫柏禅师塔、斤线池、鸡啄泉等古迹及古代名人书法石刻。

（三）净慈寺

净慈寺位于南屏山慧日峰下，面向西湖，为五代吴越忠懿王钱弘俶于后周显德元年（954）创建。初建时，名“慧日永明院”，迎慈化定慧禅师为开山祖师，并被吴越王赐紫伽黎。道潜禅师道行较高，各地僧众来寺参学者，常在500人以上。后周显德二年，道潜向钱弘俶提出请求，将黄妃塔下地宫内的金铜罗汉十六尊移置净慈寺，钱弘俶也以梦见十六尊者要求隧道潜入寺，以为应验，故又加道潜师号“应真”，所建罗汉殿亦称“应真殿”。道潜于宋建隆二年（961）圆寂后，吴越王从灵隐寺请延寿禅师主慧日永明院，为净慈寺第一代住持。道潜和延寿都研习修持法眼宗^[1]，延寿禅师住持净慈寺15年，有弟子1700人，并在寺内建造东西两阁，广集各宗精通教义徒众，研讨佛学，著《宗镜录》百卷，全书80余万言，是佛教界有名的经典著作。由于《宗镜录》是在永明院演法堂定稿，故将该堂改名为“宗镜堂”，延寿为法眼宗三世祖师，名扬海内外。高丽^[2]国王也特遣使臣送来礼品，派国僧36人前来求法。延寿圆寂后，宋太祖加谥为“智觉禅师”，后人以寺名称其为“永明禅师”，称其塔为“永明祖塔”。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净慈寺改“称寿宁禅院”。建炎二年（1128），改为“净慈禅寺”，绍兴十九年（1149）



净慈寺（大雄宝殿）

[1] 是佛教禅宗五家之一，创始人文益禅师（885—958）出生于杭州余杭，他吸收佛教禅、律各宗，融云门、曹洞禅法自成“家风”，并著有《宗门十规论》。文益死后，南唐中主李璟追谥他为“大法眼禅师”，故后人称为“法眼宗”。

[2] 高丽：又称“高丽王朝”“王氏高丽”，是朝鲜半岛古代国家之一。公元918年王建创立，1392年为李氏朝鲜（李朝）所取代。历经34代君主，共475年。

改为“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嘉泰四年（1204），净慈寺失火，除山门外，其余均成灰烬。

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经古田德昼、愚及至慧、方山文宝等禅师悉心策划，先后修建了观音殿、大殿、罗汉殿、法堂等，并重建山门，恢复旧貌。



由弘一法师手书的“具平等相”匾额

明洪武、正统两朝，净慈寺又遭火灾，损失严重。先后由住持法净、宗妙募资修复。清康熙五年（1666），将原建在大慈山下的永明祖塔迁建于净慈寺东，门额为“极乐世界”。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南巡时题“净慈禅寺”额。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南巡，御书“敕建净慈禅寺”门额。咸丰十年（1860）、咸丰十一年，太平军两次攻城，曾将净慈寺作为屯兵之所，几为荆墟，后虽有兴建，但并未复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5年全面整修，1959年整修大殿并在殿西建济祖殿，天王殿前建有“南屏钟声”碑亭。“文化大革命”时，净慈寺一度被占，有所损毁。“文化大革命”后落实政策，发还寺产。1982年，净慈寺划归杭州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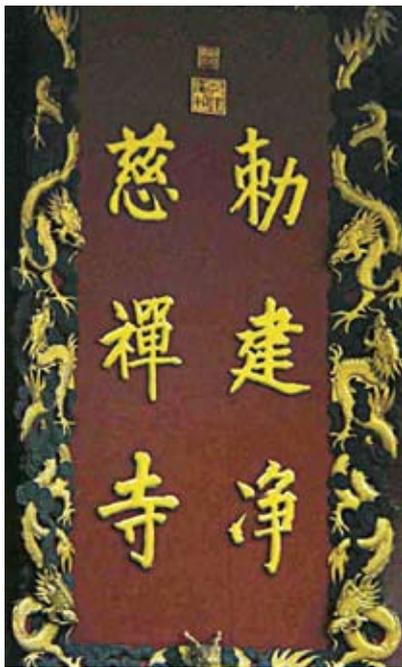
净慈寺



佛教协会管理后，第一期工程整修了后大殿、客堂，第二期工程整修了金刚殿、南屏晚钟亭、御碑亭、运木古井及照壁，1985年竣工。

1984年12月14日，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捐赠3000万日元，由杭州制氧机厂铸造大梵钟1只，作为中日友好的纪念。铜钟高3.6米，直径2.3米，重1万余千克，造型古朴，外面铸有《大乘妙法莲华经》，共6.8万字，每敲一下，余音续响2分钟之久。1988年，大雄宝殿整修，放生池重建。1990年，重建永明塔院。1993年，大殿内安装完成毗卢遮那大佛像。2001年11月，清康熙皇帝题写的“南屏晚钟”碑重建完成。同年，获政府批准，扩大用地面积至12.30万平方米。

重修的净慈寺放生池金鱼成群，池后黄色大照壁上书“南无阿弥陀佛”。山门前的古樟树左右各立一个御碑亭。东边亭内有清康熙皇帝题写“南屏晚钟”景碑及对联一副，西边亭内有清乾隆皇帝御书诗碑。第一进是金刚殿，也即山门殿，门额上挂“敕建净慈禅寺”匾额，殿内两边供奉金刚神将两尊。进山门右转，是三檐歇山顶钟楼。大雄宝殿建筑面积1370平方米，高22.15米，24根高15米的圆柱保持明代古建筑外形，琉璃瓦歇山顶屋面。殿前“具平等相”匾额为弘一法师手迹。殿内正中供奉毗卢遮那佛，莲花座花瓣1000枚，每1枚花叶雕刻1尊佛像，故又称“千佛朝毗卢”。佛像由青铜浇铸，重达60吨。自大雄宝殿后拾级而上，中轴线上坐落三圣殿，殿内供奉西方三圣，正中阿弥陀佛，右胁侍大势至菩萨，左胁侍观世音菩萨。大殿西侧是千手千眼观音殿。寺东部有永明塔院，为纪念永明延寿大师而建。中轴线西侧有“运木古井”，旧名“神运井”^[1]，内外引汲不竭。



清乾隆御书“敕建净慈禅寺”门额（俞美娜 摄）

[1] 民间传说净慈寺修建时，“活罗汉”济公（道济）水运木材从井口而出。

（四）天竺三寺

1. 上天竺法喜讲寺

法喜讲寺又名“上天竺寺”，在乳窦峰北、白云峰南，距中天竺约1千米。五代十国后晋天福元年（936），僧人道翊在白云峰下结庐修行，为上天竺开山祖师。吴越王钱弘俶在上天竺开路筑基，建“观音看经院”，于后晋天福四年（939）五月建成，这是上天竺最早的寺院。北宋年间，元净法师^[1]住持上天竺看经院19年，在白云峰下建白



法喜寺（俞美娜 摄）

云堂，“白云堂印”成为朝廷授予僧官的官印。乾道三年（1167），宋孝宗赐钱2万，重建十六观音堂。淳熙二年（1175），宋孝宗再次到上天竺寺进香，改寺名“灵感观音讲寺”。庆元三年（1197），改名“天竺教寺”，评定为教寺“五山之首”。元至正二年（1342），寺毁，至正五年重建。明代270余年间，上天竺寺完全靠僧人募化整修。清顺治十七年（1660），殿毁，清康熙五年（1666）重建。清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乾隆初次南巡，两到上天竺寺，赐名“法喜寺”。太平军进入杭州后，寺损。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杭州知府薛时雨奏请修复，由布政使蒋益澧发起重建法喜寺，清同治五年（1866）竣工。大殿原系木质，民国17年（1928）改用钢筋水泥浇制，民国20年完工。民国22年农历九月初四，寺毁；民国36年盖平房3间。

杭州解放后，人民政府曾拨款重修。“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殿中供奉的观音佛像被窃，房屋被改作他用。

1985年后，杭州市重新落实宗教政策，法喜寺发还杭州市佛教协会管理。首先修复圆通宝殿，继而更新照壁。1990年后，法喜寺进行较大规模修复工程。先后重建五观堂、客堂、山门牌坊，整修放生池、念佛堂，在原天王殿遗址上

[1] 元净法师受法于下天竺慈云大师，善诗能文，学行甚高，深受宋神宗器重，赐号“辨才”。

拆除厂房，重建天王殿，又重建大雄宝殿、东西庑廊，修建梦泉亭、寮房等。1998年11月，法喜讲寺举行大殿落成。2000年12月，经市政府批准，法喜寺扩大用地面积至10.10万平方米；2004年，又扩至10.36万平方米。

重建后的上天竺法喜寺，过了山门牌坊，左边就是照壁，上有“观自在菩萨”题字，字大丈许，为清代书法家汪于高原迹镌刻而成。右边即是重新建造的天王殿，殿后门额“圆融无碍”，是当代书法家刘江所书。天王殿后为放生池，小桥穿越，古色古香。法喜讲寺主供奉本尊菩萨殿——圆通宝殿，殿内正中建有龙亭，形成殿中殿景观。龙亭内供奉神木观音（现用檀香木按原样雕刻而成），佛座下有井，叫“观音菩萨示现井”。龙亭后壁是浮雕八十四大悲观音。圆通宝殿后平台是重建的大雄宝殿，殿内供奉“三世佛”，中间供奉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东侧供奉东方琉璃世界药师佛，西侧供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殿两侧塑有五百罗汉山。

2. 中天竺法净禅寺

法净禅寺又名“中天竺寺”，距法镜讲寺不到500米，位于稽留峰下。隋开皇十七年（597）由宝掌禅师创建。宝掌禅师系印度人，因而中天竺又称“中印峰”。隋文帝仁寿中期（601—604），慧颯法师携神尼舍利在飞来峰造神尼塔，为杭城第一塔。吴越王钱弘俶在中天竺建寺，名“崇寿院”，香火兴盛，香客甚多，成为游览名胜。



法净寺（俞美娜 摄）

宋政和四年（1114），改称为“天宁万寿永祚禅寺”。元天历年间（1328—1329），改称“天历永祚禅寺”。明洪武元年（1368），赐号“中天竺寺”。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僧惠鏞、法琦、清琳等募建殿刹圣像及白衣观音堂。清乾隆三十年（1765）春，乾隆皇帝南巡，为中天竺寺御题寺额为法净寺。清光绪十八年（1892）重修，当时寺内有天王殿、正殿、后殿、地藏殿、摩利支天殿、神御殿、白衣观音堂，并建有桂子堂、天香阁、诸天阁、御书阁以及供寺僧退

院养老的六房。

杭州解放后，人民政府拨款整修法净寺。1958年“大跃进”时移作他用。1981年，市政府将法净寺发还杭州市佛教协会管理。1985年修复观音殿。

20世纪90年代，相继重建圆通宝殿、莲池海楼。1993年底，杭州市佛教协会在法净寺创办居士学佛座谈会。1999年，又挂“杭州佛学院（筹）”牌子。21世纪初，市政府批准《修复法净禅寺总体规划》，用地面积3.27万平方米。

重修后的法净禅寺群山环抱，朝东偏南。一进为天王殿。二进为重建的圆通宝殿，殿高23米，殿内供奉12米高的大光普照观音^[1]。在圆通宝殿后的大平台上重建大雄宝殿。中天竺东侧坐落两个四合院，中西结合的楼房，粉墙黛瓦，围廊亭柱，上下四周呼应，现为省佛教协会会址。寺院西侧楼房是杭州佛学院教学、生活用房。

3. 下天竺法镜讲寺

法镜讲寺又称“下天竺”或“三天竺”，位于灵鹫山麓、飞来峰南。东晋咸和五年（330），印度高僧慧理创建，初称“翻经院”。历朝来，或名“南天竺寺”，或名“灵山寺”，或名“天竺灵山教寺”。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皇帝御题寺额，改称“法镜寺”。法镜寺为杭州著名古刹。

“文化大革命”期间，寺院被迫停止宗教活动，房屋被工厂占用。1982年，寺庙归还杭州市佛教协会和僧众管理。1984年，对外开放，恢复宗教活动。法镜寺改为比丘尼道场。1985年始，对全寺殿堂偏房进行整修，到1989年下半年，中轴三殿齐全，全寺49尊佛像全部贴金，10月底，举行药师佛开光仪式。

整修后的法镜讲寺朝南偏东，群山环抱，殿房大都为清道光年间（1821—1850）的古建筑。天王殿后是圆通宝殿，殿内正中供奉用



法镜寺（俞美娜 摄）

[1] 密宗称为“十一面观音”，有十一面四十八臂。据佛教说法，大光普照观音破“修罗道”三障，除恶扬善，成就众生。

香樟木雕刻而成的净瓶观音坐像和西方三圣立像，两边是十八罗汉像。圆通宝殿后是药师殿。重新塑建的药师坛场呈宝塔造型，分3层，第一层须弥座上站立十二神将（药叉），第二、第三层分别为7尊东方琉璃世界药师如来坐像，其后上方远角是日光、月光菩萨。坛场护栏上刻有十二生肖，与十二药叉对应，中国民间流行十二生肖寓合于佛教十二药叉神将，每一生肖众生都有保护神可求。法镜寺东面厢房，有客堂、僧寮。1999年新建成戒香楼，古建筑风格，正厅作接客用，两边厢房楼式结构，能安寝贵宾。客堂及其后面僧寮均为古建筑，门楼砖雕，工艺高超。西边厢房为现代砖木结构，为法物流通和香客住房所用。2000年12月，市政府批准扩大用地面积至2.87万平方米。

二、出世僧人

（一）延寿

延寿(904—975)是唐末五代时期的僧人，俗姓王，字仲玄，号抱一子。本是江苏丹阳人，后迁至杭州余杭。他自幼喜诵《妙法莲花经》^[1]，并开始吃素。16岁时，曾向吴越王钱镠献《齐天赋》，钱镠赞叹不已，认为他是奇才。

吴越宝正七年(932)，延寿先任余杭县库吏，后任华亭镇将，负责督纳军需。文穆王钱元瓘在位时，延寿挪用公款放生了一满船的鱼虾，结果事泄问斩。延寿在刑场上面无戚容地说：“我于库钱毫无私用，尽买放生，莫知其数。今死，径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亦乐乎？”钱元瓘钦佩其胆识，便将延寿免刑释放，允他“薙(tì)发为僧”。两年后，延寿三十岁，舍妻在四明山(宁波余姚)龙册寺出家，师从翠岩禅师。后又上天台山，从法眼宗传人德昭初习禅定，成为德昭的传法弟子，传承法眼宗。



永明延寿禅师画像

[1]《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是佛陀释迦牟尼晚年说教，宣讲内容至高无上，明示不分贫富贵贱，人人皆可成佛。

后周显德元年（954），钱弘俶创建了慧日永明院，也就是后来的净慈寺，请衢州的法眼宗道潜禅师前来住持，开坛说菩萨戒。后周显德七年（960），钱弘俶见灵隐寺已荒芜颓败，便力邀延寿来杭州，主持灵隐寺的重修，并赐号“智觉”。在延寿的竭诚努力下，灵隐寺迅速复兴，规模空前。道潜禅师圆寂后，钱弘俶就把当时在灵隐寺的延寿请来，出任慧日永明院（净慈寺）住持，前后共15年，“永明延寿”法号由此而来。延寿住持永明院时，弟子达1700多人。

延寿倡导禅净双修之道，主张“以心为宗，以悟为旨”，禅、教一致。曾召集慈恩、贤首、天台三宗僧人，“分居博览，互相质疑”，最后“以心宗之衡以准平之”，写成《宗镜录》100卷。高丽国王见到此书，派遣使者送礼求见，并派国僧36人前来学法。

北宋开宝八年（975），宋灭南唐后威胁吴越国。因延寿重病在身，吴越王钱弘俶前往探病。延寿竭力劝谕钱弘俶，应“舍别归总，纳土归宋”。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延寿圆寂。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俶听从延寿禅师的遗言，“上表入宋，尽献十三州之地”，使得吴越国十三州百姓免遭战争之苦。对此，北宋朝廷十分重视，追谥延寿为“宗照师”。

（二）道潜

说到道潜，一般人比较熟悉五代时净慈寺的第一任住持道潜禅师。此处说的道潜则是北宋著名诗僧。道潜（1043—1106）出生于北宋庆历三年（1043），俗姓何，本名昙潜，更名道潜，字参寥，於潜（今杭州临安於潜镇）浮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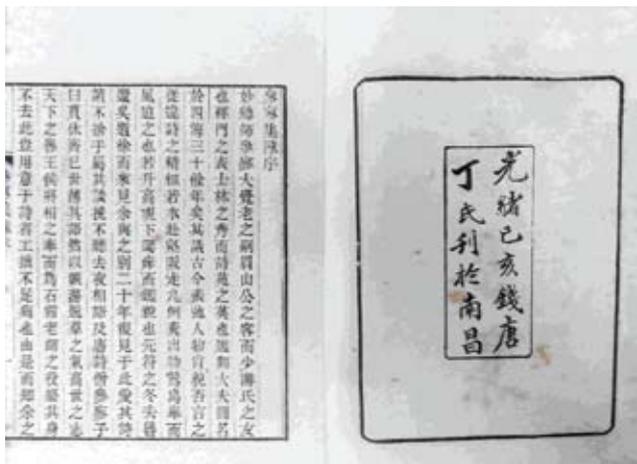
道潜与佛家很是有缘，他从小就不吃荤腥，少年时期因流畅读诵《法华经》被大众称奇，得以剃度出家。他悟性非常高，内外典籍无所不读，且擅长文章，尤其喜欢作诗。道潜最初与词人秦观十分友好。苏轼任杭州通判时，道潜隐居杭州智果精舍。一日，苏轼前往拜访，道潜在坐赋诗，挥笔而就。苏轼对他的诗歌成就非常欣赏，称赞道潜“诗句清绝，可与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义，见之令人萧然”（《与文与可》）。此后，两人交往甚笃，经常吟诗酬唱，相互结为忘形之交，还同住在智果精舍。据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载，道潜本名“昙潜”，苏轼改为今名，由此可见两人关系的亲密无间。

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调任彭城（今

江苏徐州)知州。其间，道潜曾多次前往探望。两人谈诗论道，乐在其中。据《东坡集》及《苕溪渔隐丛语》记载：某日，苏轼宴请宾客。他想跟道潜开个玩笑，看看道潜如何应对。于是他叫了个官妓挑逗纠缠道潜，并向道潜求诗。道潜随即作诗一首：

寄语东山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

在这首诗歌中，道潜告诉这位官妓，虽然她容貌如花似玉，令人心动，但你这种美貌只能像当年的美妓朝云于襄王先父梦中恼乱他一样，使帝王神魂颠倒，但对自己专修禅定的僧人来说，却难以起到作用。满座宾客听后大惊，齐声称赞他的诗才超群。自此，道潜诗名名扬四海。



道潜传世诗集

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心情十分抑郁。为了安慰他，道潜不远千里前往黄州探望，并在黄州居留一年多时间。结束探望之后，道潜又回到於潜西菩提山中。等到苏轼被贬到南海为官时，道潜准备渡海相随，苏轼写诗劝阻。由于道潜与苏轼关系密切，苏轼被治罪时，道潜也因为诗歌涉嫌讥讽朝政，而被勒令还俗，谪居兖州(今山东兖州)多年，直到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方才受诏重新削发为僧。北宋崇宁三年(1104)赐号“妙总大师”。崇宁五年，归老于江湖。有《参寥子诗集》传世。

(三) 李叔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

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送别》，其歌词便是李叔同于民国3年（1914）所写，为送别挚友许幻园^[1]。

李叔同（1880—1942），即人们尊称的弘一法师，他是中国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也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清光绪六年（1880）农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儒商望族。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号漱筒。李叔同的家族祖籍浙江平湖，因经营盐业而迁籍北上，遂定居天津，家业殷实。出生时，父亲68岁，母亲则刚满20岁。在他5岁的时候，父亲因病辞世，丧仪殊为显赫，延请高僧诵经念佛多日，并为其举行“焰口施食”^[2]的仪式。这些都给年幼的李叔同留下了奇特而又深刻的印象。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叔同以“李广平”之学名考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经济特科班，受教于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门下。次年秋天，李叔同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到杭州参加乡试，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杭州，待了约一个月光景。后因乡试未中，继续回南洋公学读书。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专攻西洋美术，兼习音乐。其间，他与同学共同发起成立“春柳社”，被公认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话剧团体，其成立是中国现代话剧艺术诞生的一个标志。

李叔同第二次来杭州已是民国元年（1912），他应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教务长经亨颐之邀来杭任教，在该校图画手工科负责音乐、美术课程。在李叔同

[1] 许幻园：诗人，小说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沪上新派诗文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李叔同在俗时挚友。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李叔同与许幻园、袁希谦、蔡小香、张小楼结为金兰，号为“天涯五友”。

[2] 焰口施食：即行仪轨、诵密咒，超度恶鬼，令其方便得食以息止苦痛。流传民间，渐亦成为追荐死者、济度亡灵的佛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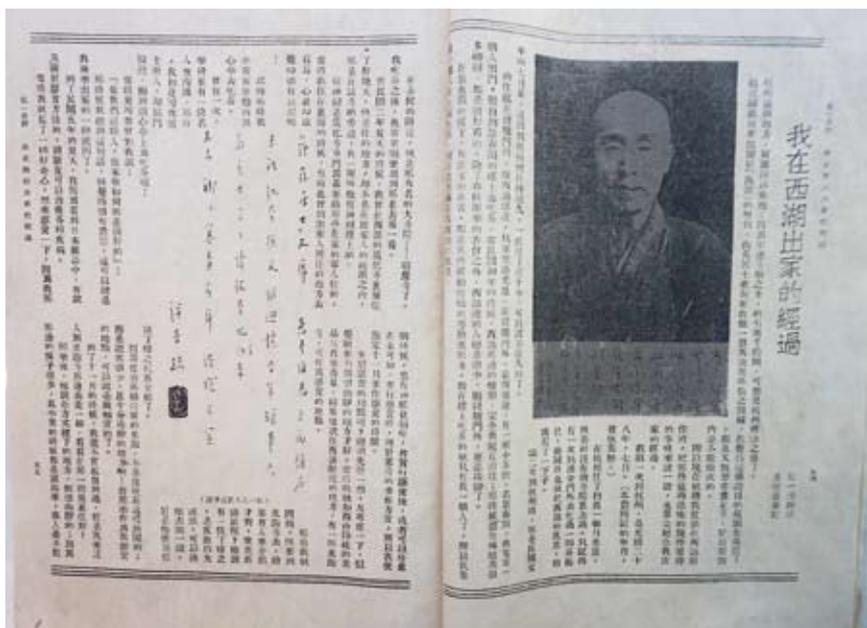
任教的时间里，他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一批负有盛名的画家、音乐家。在他的教学中，首先重视人格修养，其次才是文艺学习。同校任教的夏丏尊先生这样评价他：“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



弘一法师（中）（来源于杭州市档案馆资料）

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正是由于李叔同的出色工作，该校的艺术教育在当时国内同级别的学校中可谓首屈一指。

民国5年（1916）夏天，李叔同在一本日本杂志上读到一篇介绍断食的文章，非常感兴趣。年底，他利用寒假入杭州虎跑寺断食18天，并记下详细的《断食日志》。这次断食使李叔同有了深刻的宗教体验，有身心化灵的感觉，成为他此后开始学佛乃至剃度出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契机和原因。自虎跑断食以来，李



弘一法师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叙述了其出家的情况

叔同对佛教兴趣日浓，渐渐开始茹素、阅经及供佛。民国7年正月十五，李叔同正式皈依三宝，受法名演音，号弘一，真正成为一名佛门在家弟子。同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在虎跑寺正式剃发出家。李叔同曾写有《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叙述了其出家的情况。对于为什么要在那一天出家，他在文中写道：“于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出家以后，弘一法师静修律宗，也曾云游四方，对佛教进行了很深的钻研，尤其对“南山宗”做了深入研究，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华严集联三百》等书籍，被佛门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

民国31年（1942）10月13日晚八时左右，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圆寂前几日，弘一法师手书“悲欣交集”四个大字，交给妙莲法师，是为弘一法师的临终绝笔。这四个字，凝结着法师一生的人生体验和临终的心境，一面欣庆自己的解脱，一面悲悯众生的苦恼。

1954年，丰子恺、叶圣陶、钱君匋等将弘一法师的部分骨灰从泉州运来杭州，安葬在虎跑寺后的山坡上，并建弘一大师纪念塔。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80年重修，成为杭州一处历史文化景点。

（四）苏曼殊

在西湖的青山绿水间，一南一北，长眠着两位僧人，南边的是位于虎跑泉后大慈山的弘一法师李叔同，而北边的是位于孤山北峦里西湖畔的苏曼殊。苏曼殊是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诗僧，南社主要诗人之一。



位于杭州虎跑内的弘一法师舍利塔（倪晴 摄）



苏曼殊（来源于网络）

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戡，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笔名印禅、苏湜，出家后法号曼殊。他35年的短暂人生充满了传奇，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流光溢彩的一笔。

清光绪十年（1884），苏曼殊出生在日本横滨，他的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出生未满3个月，苏曼殊就被生母抛下，由他父亲在日本的侍妾，也是生母的姐姐抚养长大。6岁时，他随父亲回国，备受父亲正室虐待。

光绪二十四年（1898），苏曼殊东渡日本求学。他先在横滨大同学校学习，后又到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读书，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接收了进步思想。

光绪二十八年，在日本东京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与章太炎、陈独秀等人有着密切关系。作为一名诗人，苏曼殊著有诗集《燕子龕遗诗》《燕子龕残稿》。在他的诗句中，常见其关心祖国命运的拳拳之心，如：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然而面对复杂的社会和黑暗的现实，加上自己坎坷的生活经历，苏曼殊常常产生悲观的思想，他常常选择逃避现实，渐渐有了遁入空门的想法。光绪二十九年（1903），苏曼殊在惠州的一间小寺剃度出家，法号曼殊，人称“曼殊大师”。

苏曼殊一生居无定所，四海漂泊，却对西湖情有独钟，与杭州结下了难解难分之缘^[1]。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天，苏曼殊第一次来到杭州。初到杭州的

[1] 苏曼殊在小说《碎簪记》中说自己先后13次到杭州，但根据确凿的文字记载，实际上只有11次。

他被西湖秀美的风景和众多的禅寺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先是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住了几天，不久便住进了南山路雷峰塔下的白云庵。白云庵是僧众供佛和起居修行的处所，风景秀丽，肃穆静谧。在这里，苏曼殊白天或与禅院里的住持得山法师和意周法师谈禅论世，或去孤山写生作画；傍晚或静坐打禅，参悟佛法，或眺望雷峰夕照、聆听南屏晚钟；夜晚则就着佛灯画画，或继续撰写佛学著作《梵文典》。

民国7年（1918）5月2日下午4时，久病的苏曼殊留下一句“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的遗言，结束了他35年的红尘孤旅，溘然长逝。遵照他的遗愿，柳亚子、汪兆铭（汪精卫）等好友为他穿上僧衣，将他安放在上海广慈医院。

民国13年（1924）的夏天，苏曼殊的朋友柳亚子、陈去病等为他寻找墓地，苏曼殊毕生钟爱的西湖，自然是他长眠的首选之地。在杭州的徐自华^[1]主动捐出了西湖孤山北麓的一块地，以安顿大师的英魂。6月8日正午，绿风拂柳，湖光粼粼，曼殊大师的朋友们和杭州各界人士在西湖孤山北麓、西泠桥南堍，为苏曼殊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

朋友们还在他的墓前竖立了一座石塔，上面镌刻着六个大字——“曼殊大师之塔”。苏曼殊大师栖息处与南朝名妓苏小小墓南北相对，与鉴湖女侠秋瑾墓隔水相望，刘半农这样写道：“残阳影里吊诗魂，塔表摩挲有阙文。谁遣名僧伴名妓，西泠桥畔两苏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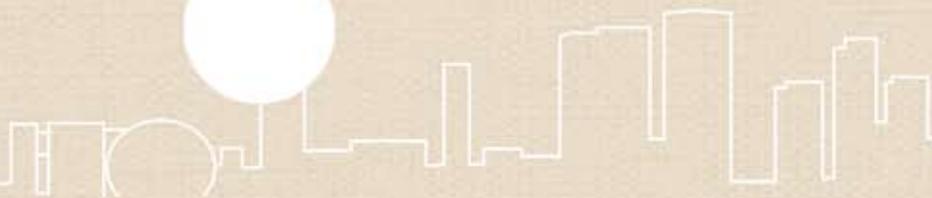


剃度后的苏曼殊

[1] 徐自华（1873—1935），字寄尘，号忏慧，浙江桐乡人。出身名门望族，是南社女诗人、也是秋瑾女侠的挚友。其一生由封建社会的大家闺秀转变为革命志士的挚友，从哀怨命运多舛的旧式妇女成长为投身革命的文艺战士。

第六章

民俗风情



杭州的民俗，是随着杭州社会经济以及自然条件的变化发展，逐步衍变而成，为杭州增添独特的江南风情。

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说明，杭州最早人类活动的原始村落已具有江南特征的风俗。他们从事稻谷等农耕生产，进行捕鱼作业，形成了原始农业生产的整套习俗。

秦汉时，杭州临江滨海。《汉书·地理志》记载：“吴粤之君皆尚勇，故其氏好用剑，轻死易发，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数与楚接战，互相兼并，故吴越风俗，略与楚同。”

隋开运河，对杭州城市发展起到奠基作用。《隋书·地理志》记载：“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饿。其俗信鬼神，喜淫祀”。“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

至唐代，随着杭州城市的发展，社会风俗也渐趋都市化。诗人白居易曾在他的诗中，讴歌当时杭州“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的社会风俗，“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岁时风俗，“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的西湖夜游风俗。北宋末年，赵宋政权南迁，大批士庶渡江南下，将原有的家法礼俗一并带到南方，使杭州原有的风俗起了很大变化。据《武林旧事》等书对当时御街的描述，从北首的斜桥向南，一直通到凤山门，两旁商肆林立，“无一家不买卖者”。当时杭州市民宴饮、品茗成风。特别到南宋末年，经近150年的糅杂以后，南北风俗已渐趋于融合。

元、明、清三代都继承、发展了这些风俗。同时，元、清两代因少数民族掌握中央政权，影响所及，杭州风俗还渗透、融合了蒙古族和满族的部分风俗。清时还有因对清廷统治不满，专敲穿黄马褂的清贵族的竹杠，出现了“刨黄瓜（褂）儿”等杭州俗语。辛亥革命后，杭州旧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婚姻礼教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社会风俗、礼仪习俗相应起了变化。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杭州的风俗发生了除旧布新、移风易俗的巨大变化，新的社会风气逐步形成。经济发展和生活富裕促进传统节日春节、端午节等内涵传承和形式变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和旅游的推动产生许多新兴的节日；国外的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也逐渐受到市民尤其是年轻人的青睐。在饮食、服饰、婚嫁、喜庆、祭祀等方面，传统文化与“新潮”文化碰撞，呈现“返祖”和追求时尚两种趋向。

杭州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天地氤氲滋气脉。”8000年的文明，给杭州留下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闻名遐迩的茶文化、宗教文化，丰富多彩的戏曲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代表我国各个时期工艺最高水平的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浙派古琴艺术、西泠印社金石篆刻艺术等，在今天依然散发恒久魅力。

2012年4月10日，杭州市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被命名为“工艺和民间艺术之都”。杭州市“非遗”资源十分丰富，名录体系的建立完善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工作，为“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全面而深入地开展奠定了基础。全市“非遗”宣传展示体系粗具规模，建有中国刀剪刀博物馆、中国伞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手工艺活态展示馆、朱炳仁铜雕馆等类型的专题馆、展示中心等30余个。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简称“市非遗展示中心”）在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建，“非遗”实物与老物件的征集工作持续开展。

杭州市注重运用文化遗产日、传统节日、文化节庆等活动展示“非遗”项目。通过中国（浙江）“非遗”博览会、中国（杭州）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中华老字号博览会等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和较大影响力的“非遗”展示展销平台，促进手工技艺项目的市场开发。运用丰厚的传统表演艺术资源，培育演出市场，余杭滚灯、五凤朝阳、桐庐剪纸、东吴水狮等优秀节目在国内外重大节庆活动中演出。举办中秋文化节、西溪花朝节、端午龙舟赛等传统节日节庆活动，吸引游客，并推动“非遗”与旅游结合，在宋城景区、西溪湿地等旅游景区内融入“非遗”元素。

如今，杭州不仅拥有3个世界级“非遗”项目，还拥有44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居全国同类城市第一。从保护到发扬再到传承，工匠精神在“非遗”传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并将这些古韵打磨出闪亮的光泽，让城市品牌烙上厚重的历史沉淀。

一、西泠篆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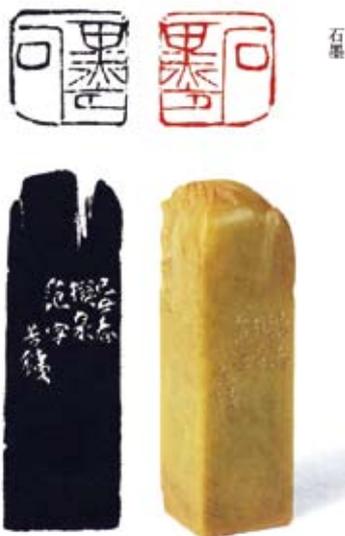
中国篆刻印章起源于殷商时期，一直是权力地位、人群交往的凭信标志，唐宋以来，逐渐进入艺术领域，成为中国特有的一个艺术门类。杭州在中国篆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早在元代，金石学家吾丘衍寓居杭州。他提倡以汉代铜器、碑额上的文字入印，于元大德四年（1300）写成《学古篇》一书，叙列汉印篆体与印式的纲要，阐述篆隶演变及篆刻知识，对古印的篆法、格式等做了论述，是我国最早的印学理论指导书，被后世推崇。明末流派印章勃兴，杭州陆惠、丁良卯均为一时名家。清代，钱塘丁敬篆刻直接取法明人，既师承朱简，又以汉印为宗，孕育变化，借古开今，成为浙派篆刻的开创者。其后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先后继起，称为“西泠八大家”，印脉绵衍，名家迭出。清乾隆年间（1736—1795），久寓杭州的歙县汪启淑，晚清印学家、籍属仁和的魏锡曾，都是印学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们辑拓印谱、撰写印学著作和推动篆刻



2003年11月8日，在孤山举行西泠印社100周年纪念石碑揭牌仪式（来源于《杭州年鉴（2004）》）

艺术交流的行为，进一步确立了杭州在篆刻史上的重要地位。有了篆刻创作和印学研究两方面的推动，经过明清以来数百年发展，玩石赏印、摹拓辑谱，成为杭州文人雅士赏玩的重要内容，融入杭州士民的日常文化生活。晚清时期，杭州研究篆刻之风更甚。清光绪三十年（1904），杭州篆刻家叶为铭、丁仁、吴石潜、王福庵创建西泠印社。民国2年（1913），近代艺术大师吴昌硕出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日本名家河井荃庐、长尾甲渡海来归，一时文采风流，声闻远布。民国22年后，时局凋敝，社务随之暂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泠印社归为国有。1957年，社务重整，逐渐显现繁荣景象。至“文化大革命”期间，



吴昌硕印章

印社活动再次陷于停顿。1979年后，印社活动步入正轨，学术研究、对外交流、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文化影响扩大，规模空前繁荣。2003年，西泠印社创社百年华诞，天下印人汇聚孤山，共襄盛典。

西泠印社秉承“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之宗旨，融诗、书、画、印于一体，于艺术创作、学术研究、文物考藏、出版交流等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为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学术团体。

2009年9月，以西泠印社为主要申报单位和传承代表组织的“中国篆刻”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资料链接

西泠印社历任社长

吴昌硕（1844—1927），初名俊卿，初字香朴、香圃，又字苍石、仓石、昌硕，一作昌石，号缶庐，浙江安吉人。民国2年（1913）被公推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诗书画印博采众长，自成一派，为近现代的杰出艺术大师。书法初师颜真卿，后法钟繇、王羲之，得力于石鼓文，笔力遒劲，气势磅礴。篆刻钝刀直

入，苍劲雄浑。他将书法和篆刻的行笔、章法、体势融入绘画，形成独特画风。著有《红木瓜馆初草》《元盖庐诗集》《岳庐诗》《岳庐别存》《岳庐集》《岳庐印存初集》等。

马衡（1881—1955），字叔平，别署凡将斋，浙江鄞县人。民国36年（1947）被推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现代著名金石书画家、篆刻家、印学家、鉴赏家、考古专家。著有《金石学概要》《中国铜器时代戈戟之研究》《新嘉量考释》《石鼓为秦刻石稿》《汉石经集存》《中国书籍制度之研究》《凡将斋金石丛稿》等，印作编有《凡将斋印谱》《凡将斋印存》等。

张宗祥（1882—1965），原名思曾，字阆声，号冷僧，别号假山，又署铁如意馆主，浙江海宁人。1963年被选为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著名书法家、版本学家，擅长古籍校勘。校勘古籍《说郛》《罪惟录》《国榷》等10余种，编有《铁如意馆手抄书目录》，其著作有《书法源流论》《临池随笔》《铁如意馆碎录》《卓文君》《临症杂谈》《冷僧书画集》等。

沙孟海（1900—1992），原名文若，号石荒、沙村、兰沙、僧郭、孟公，浙江鄞县人。1979年被选为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书法学、古典文学、古文字学、篆刻学、金石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问渊博，研究精到，造诣精深。其书法篆隶真行草诸体皆精，以气势磅礴见称，世有定评。篆刻不多作，然博纵古今，朴拙而富韵致，公推大家。著有《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兰沙馆印式》《沙孟海论书丛稿》《印学史》《沙孟海书法集》《沙孟海写书谱》《中国书法史图录》《近三百年的书学》等，并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卷》等。

赵朴初（1907—2000），安徽太湖人。1983年起任西泠印社名誉社长，1993年任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长。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他十分



吴昌硕



马衡



张宗祥



沙孟海

关心西泠印社建设，多次在京听取汇报，指导工作。1997年为筹建中国印学博物馆，他上书国家有关部门建议给予扶持，并为中国印学博物馆题写馆名。

启功（1912—2005），姓爱新觉罗，字元白，满族，居北京。2002年10月起担任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长。早年受业于著名史学家陈垣，长期从事中国美术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历代散文、中国历代诗选和唐宋词的的教学和研究，对红学、佛学等亦有精深研究，学识渊博，涉猎宽广。他的书法、绘画、旧体诗词亦享誉国内外，有诗、书、画“三绝”之称。他还是我国著名的文物鉴赏家和鉴定专家，对古代诗画、碑帖的鉴定尤为专精，独具慧眼，识见非凡。主要著作有《古体字体论稿》《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述札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等。

饶宗颐（1917—2018），字固庵、伯濂、伯子，号选堂，生于广东潮安，后定居香港。2011年12月13日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在传统文史研究和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近东文明以及艺术、文献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精深研究，出版学术专著逾80种，发表论文500多篇。又精通琴、诗、书、画，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擅山水与人物画，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画取法白描，于李龙眠、仇英、陈洪绶诸家之外，开一新路。书法植根于金石文字，行草书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篆书兼采金农、邓石如之长，自成一格。



赵朴初



启功



饶宗颐



二、清水丝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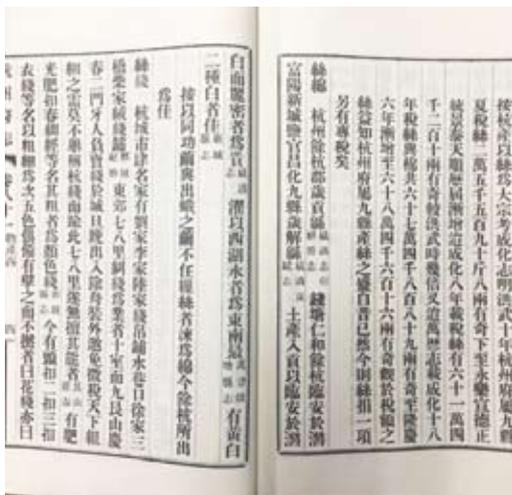
余杭清水丝绵制作历史悠久。余杭地处杭嘉湖平原，周朝时，种桑养蚕已是该地重要的农耕生产活动，遍及家家户户。到了唐代开元年间（713—741），丝绵被列为贡赋。从宋代起，浙江上调的丝绵占全国上调的2/3以上。南宋《咸淳贡赋志》记载：“钱塘、仁和、余杭……九县岁解绵，以同功（宫）茧与出娥蚕非缫丝者涑为绵，今余杭所出为佳。”元、明亦然，民国《杭州府志》记载：“杭州余杭郡岁贡绵。”清时，余杭丝绵名声更大，康熙年间（1662—1722）曾远销日本。民国时，余杭“老恒昌”清水丝绵享誉国内外。民国18年（1929），余杭苏晋卿制作的优质清水丝绵曾在西湖博览会上获得特等奖。

余杭清水丝绵以水净漂清而得名。从水源上看，余杭位于苕溪两岸，天目万山之水倾泻于苕溪，日夜流动，温而不寒，这种含杂质较少的淡水，对制绵很有利。清水丝绵制作经过选茧、煮茧、漂洗、剥茧做“小兜”、扯绵撑“大兜”、晒干6道工序完成，是一个去除蚕丝外层丝胶的过程，丝胶除去愈净，丝绵质量愈好，在技艺上极需要掌握分寸。

长期以来，余杭清水丝绵制作技艺以母女相传和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丝绵制作更依靠个人的悟性及长期实践体会掌握，余杭人民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奇特而精细的工艺。



扯绵兜



民国《杭州府志》中的相关记载

据现代科学分析，蚕丝中含有18种氨基酸，具有一定的抗过敏作用，有着“纤维皇后”的美誉，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余杭清水丝绵洁白如凝脂、轻柔如浮云，边道薄而匀称，无块状，无杂质，柔软，韧性强，放置长久不泛黄，其制作技艺是一份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家家户户都能制作丝绵。随着经济的发展，丝绵生产日渐稀少，被现代免翻技术所取代。清水丝绵只在小范围内生产，供自家使用，其传统技艺难以为继。

2008年，“余杭清水丝绵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余杭清水丝绵制作技艺”作为“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之一，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浙派古琴

古琴是我国最早的弹拨乐器，至今已流传了3000多年。浙江的古琴艺术，因地理环境、气候风物、语言习俗的不同，在艺术风格上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域琴派的“浙派古琴艺术”。“浙派古琴艺术”追求“微、妙、圆、通”的“希声”音色以及“清、微、淡、远”的艺术境界。经典曲目有郭沔^[1]的《潇湘水云》，毛仲敏的《渔歌》《樵歌》，徐天民的《泽畔吟》等数十首。传世浙派琴谱有《紫霞洞谱》《霞外琴谱》《梧冈琴谱》等10余种，内含多种琴论。

浙派古琴艺术的发展，按时代分可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时期。

古代浙派古琴艺术始于南宋，郭沔被认为是浙派古琴艺术的创始人之一。郭沔传艺于刘志方，刘志方传于毛仲敏、徐天民，形成当时琴界最重要的派别“浙派”。徐天民传艺三代：徐秋山（元）—徐晓山（元）—徐仲和（明）。徐氏祖孙四代为世人推崇，被誉为“浙操徐门”“徐门正传”，把浙派古琴艺术推向顶峰。清代，浙派古琴艺术逐渐式微。乾隆年间（1736—1795）的苏璩、曹尚纲编撰《春草堂琴谱》，清末范季英、释德辉曾重刊此书。今人查阜西（1898—1976）所编《历代琴人传》将他们编入，并称他们为“新浙派”。

现代浙派古琴的兴起，首推我国著名琴家徐元白（1893—1957）。徐元白

[1] 郭沔（1190—1260），字楚望，浙江永嘉（今温州平阳）人。南宋末年古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浙派古琴的创始人之一。

原籍浙江黄岩，定居杭州。琴艺得清末民国初著名琴家大休上人真传。徐元白的许多古琴理论观点，源于《春草堂琴谱》中的《琴论》《弹琴八法》。徐元白曾协助查阜西组建“今虞琴社”，出版《今虞琴刊》。民国28年（1939），徐元白在南京与徐芝荪等组建了“清溪琴社”。民国34年，与杨洁武等人在重庆组建了“天风琴社”。民国35年，徐元白返杭后，与张味真等人组建了“西湖月会”，成员均为当时社会名流，如马一浮、张宗祥等。徐元白著有《天风琴谱》及琴论多篇，由他自琵琶曲移植的琴曲《思贤操》，成为经典曲目之一。他提出的“左一纸，右一指”的制琴口诀，被制琴界奉为定律。



徐元白



徐匡华与宋景濂合奏《思贤操》

与徐元白同时代的主要还有张味真（1882—1967）、徐文镜（1895—1975）、黄雪辉（1898—1974）、姚丙炎（1921—1983）。以他们为代表人物，浙江琴界逐渐复兴。其共同艺术风格与古代浙派古琴是一脉相承的。徐元白嫡传弟子有姚丙炎、徐匡华、徐晓英等。徐匡华传子徐君跃。徐晓英传女章怡青、章怡雯。

现杭州有“西湖琴社”和“霞影琴馆”，是现代浙派古琴活动的主要平台。在徐晓英、徐君跃及其他传人的经营下，进行着组织琴会、内外交流、授徒讲学、著书立论等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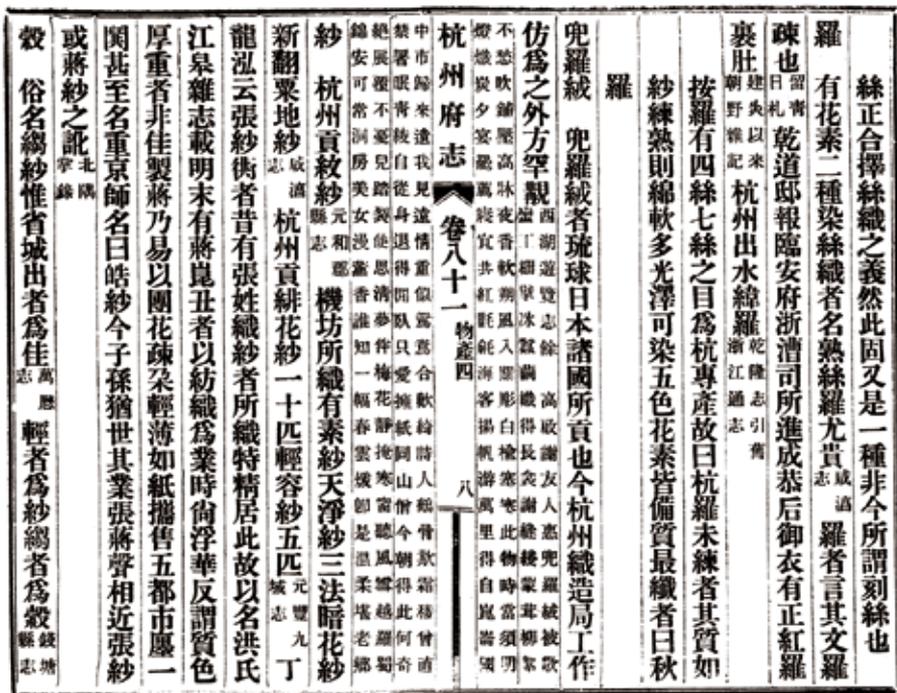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古琴艺术”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国务院将“古琴艺术”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0年，“浙派古琴艺术”被追加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四、杭罗织造技艺

杭州素称“丝绸之府”。

隋唐时，杭州地区的蚕桑业已相当发达。《隋书·王谊传》记载：新安（今淳安）、遂安（今属淳安）等地“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织”。晚唐时，褚载将广陵（今扬州）的“机杼之巧，归杭传里人”，使杭州丝绸织造技艺水平有了提高。五代吴越国时期（907—978），杭州设立了官营织造工场——织室，开创了杭州官营织造的先河，使杭州的蚕桑丝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宋靖康二年（1127），宋室南迁，汴梁的官营织造机构和大批工匠随之而来，促使杭州丝绸业急速发展。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记载，杭产丝织品有绫、罗、锦等10多个大类。“罗：有花、素两种结罗，染丝织者名熟罗，尤贵。”周密《武林



乾隆《杭州府志》相关记载



杭罗织造工人现场演示传统杭罗织造技艺

旧事》卷二记载：“罗帛灯之类尤多，或为百花，或细眼，间以红白。”可见当时杭州出产的罗已轻薄透光，且花色繁多。明洪武二年（1369），朝廷在杭州斯如坊设织染局（南局）。永乐二年（1404），又在涌金门设立新的织染局（北局，又称“红门局”）。由于朝廷对蚕桑丝绸业实行鼓励政策，使杭州“习以工巧，衣被天下”。《松窗梦语》中称当时外市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缁帛”。清代是杭州绸业发达时期，杭州的绸缎销往全国各地。特别是民间丝织业迅速发展，围绕着丝织业，在江南形成了一批繁荣富庶的丝绸城镇。在清代，杭罗成为罗里面的一个知名品牌而广被认可。民国以后，是丝织业品种大发展、大变化的时期。罗作为杭州历代丝织品中有生命力的品种而被保留了下来。20世纪70年代，在市场上供应的较有名气的丝绸品种中仍有杭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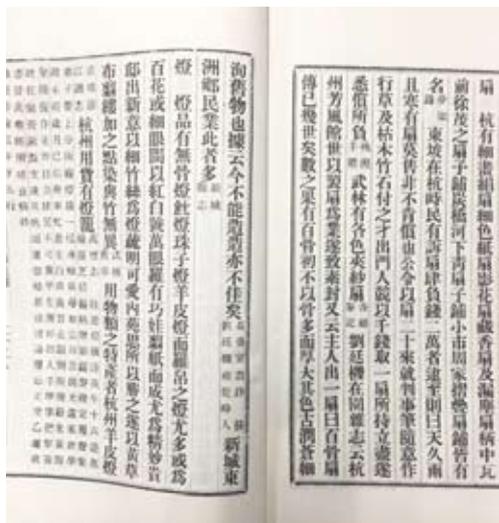
杭罗织造技艺工艺复杂，整个织造过程有10余道工序，整个工序流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大的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原料蚕丝加工。有3道工序，分别是筛选、浸泡和晾干，目的就是进行有效的脱胶，准备好松软柔顺、宜于织造的蚕丝。第二个步骤是经纬线准备。经线要经历翻丝、牵经、穿综、穿枷身线、穿筘、打蜡6道工序；纬线则要经历翻丝、摇纤2道工序。经纬线准备好以后，就开始第三个步骤了，即上机织造，就是用织机将纵向排列的经线和横向排列的

纬线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交织，形成罗帛。上机织造后织成的杭罗，还不能直接做衣服，这时它还是粗坯，要进行第四个步骤——精炼加工，即需要对其进行精炼、染色处理。

“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于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杭罗织造技艺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的重要子项目之一，也被列于其中。

五、王星记扇制作技艺

杭州的制扇技艺源远流长。春秋时期，杭州属越国，当时吴越一带民间已流行麦草扇。宋时，北方许多制扇名匠和画扇艺人随王室南渡，促进了杭州扇业的发展。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描述，当时杭州的扇子有“细画绢扇、细色纸扇、影花扇、藏香扇、漏尘扇”等。到了清代，杭扇走向鼎盛时期，与杭州丝绸、西湖龙井茶齐名，被视为“杭产三绝”。清光绪元年（1875），王星斋在杭州扇子巷^[1]开设了王星斋扇庄。民国18



民国《杭州府志》内相关记载

年（1929）更名为“王星记扇庄”，设于太平坊内^[2]，并以“三星”商标注册。同年，杭州举行西湖博览会，王星记扇子参加展出，被购买一空，还收到外国订单，名声鹊起。

王星记扇品种主要有黑纸扇、白纸扇、檀香扇、绢竹扇、宫团扇、羽毛扇、红木扇、象牙扇、白骨扇等传统名扇，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黑纸扇。黑纸扇有“一

[1] 扇子巷，南起河坊街，北至清泰街。南宋时，巷内有多家制扇作坊，为杭城扇子制作中心，故得此名。

[2] 今中山中路。

把扇子半把伞”之称，雨天可暂时用以遮挡雨水，堪称扇中精品；清代时曾多次作为杭州特产进贡朝廷，为宫廷贵族所喜爱，被称为“贡扇”。梅兰芳演出《贵妃醉酒》时所用的道具泥金牡丹扇，也是由王星记老艺人精工制作的。

1981年，王星记扇厂“三星牌”黑纸扇获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1983年，王星记扇厂推出工笔彩绘《红楼梦》《白蛇传》以及西湖民间故事等连本戏套扇，深受日本和东南亚人士的喜爱。

王星记扇制作工艺工序极其复杂、精细，且因不同扇种使用材料不同，所需工艺工序又有明显差别。如黑纸扇要经过制骨、糊面、折面、上色、整形、砂磨、整理等86道工序。而每个工序中又需要很多程序来完成，如制骨有9法：锯料、劈篾、削篾、编晒、煮浸泡、检验、蒸揩、刀边、成型。经过大小86道工序，黑纸扇方能过“三关”，即“雨淋不透，暴晒不翘，纸不破、色不褪”。

檀香扇制作除扇面图案处理外，骨架扇片主要工序有：选料、断料、开方、锯片、造型、装工、模具、喷花、打洞、拉花、打磨、拷钉、串带、装饰、检验、刻系流苏或扇坠。装饰上汇合了拉花、烫花、雕花、镶嵌和绘画等。

王星记扇制作技艺的最大特色是纯手工制作，而且装饰技艺丰富、精湛。其扇面的艺术加工有泥金、泥银、剪贴、绘画、书法等形式。扇子大边的艺术加工有阴雕、浅浮雕、银丝螺钿镶嵌及烫花等装饰手法。而扇头造型有圆头、平头、玉兰关、琴燕尾、葫芦等近百种之多。王星记扇在发展过程中，制扇艺人已将多种技法融于一扇，雕刻与镶嵌融会贯通，金箔剪贴、书法与绘画巧妙结合。

王星记扇制作技艺传承一直采用“师带徒”方式传授技艺、培养人才。一般制扇工需要3—5年才能胜任，欲成“能工巧匠”则需要十



梅兰芳剧照



七彩螺钿漆雕边剪贴三格景泥金彩绘黑纸扇（民国） 童子拜观音檀香扇（俞美娜 摄）
（俞美娜 摄）

几二十年的潜心磨炼。

“王星记扇制作技艺”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六、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

张小泉剪刀创始于明崇祯年间（1628—1644），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起初挂“张大隆”招牌，清康熙二年（1663）改为“张小泉”。张小泉故后，其子张近高继业，为防冒牌，在“张小泉”牌号下，加上“近记”两字，以示正宗。嗣后，“张小泉近记”剪刀相继传于张树庭、张载勋、张利川、张永年，子袭父业，世代相传。清乾隆年间（1736—1795），张小泉剪刀被列入朝廷贡品，乾隆皇帝御笔亲题“张小泉”，赐为牌号。清光绪十六年（1890），张小泉近记剪刀店经官府批准，在招牌上加上“泉近”两字。张小泉剪刀成为杭州剪刀的代名词，据光绪刻本《杭州府志》记载：“杭州大井巷成市，外方购者以杭剪名。”清宣统二年（1910），张小泉剪刀在南洋劝业会上获银质奖牌；民国18年（1929），在西湖博览会上获特等奖。

1956年2月21日，张小泉近记、老昌记等32家剪刀商号实行公私合营，成立杭州张小泉近记剪刀总店。同年3月，毛泽东在《加快手工业社会主义的改造》一文中指出：“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王麻子、张小泉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这段话极大地鼓舞了制剪工人，更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1961年，为恢复和发展传统名牌产品，成立了有生产企业、商店、百货

站员工参加的张小泉剪刀质量研究小组，企业重新制订质量标准和管理制度，并规定市场出售的剪刀一律实行“三包一免”（包用、包修、包换和免费修理）。剪刀质量在10项指标中，壶瓶、宕磨、脚样、刻花、扎丝5项超过历史最好水平，杭剪雄风重振。1963年，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五国，在送给外国元首的随带“国礼”中，有25套张小泉民用剪刀。

张小泉剪刀用料考究，制作精良，镶钢锻制与良钢精作是历数百年而不衰之精髓。其首创的镶钢锻制技艺，在刃口镶钢，使其锋利耐用；剪体仍用全铁，易于弯曲造型，使钢的坚硬与铁的相对柔软有机结合，所产剪刀剪刀锋利、剪体柔美。镶钢锻制剪刀须经试钢、试铁、嵌钢、出头、锉里口、锉外口、淬火、粗磨、细磨、检验、凿花等72道工序。关键工序极为讲究，镶钢是在坯料冷却的状态下，将刃口钢料镶嵌于铁料中，必须严格控制钢料顶端与槽口的距离，否则会出现纯钢头或缩钢头，会影响剪刀的使用功能；出头是将镶钢后的坯料经红炉加热，出炉后在铁墩上敲一下，使用于刃口的钢与作为剪体的铁粘合，然后快速锤击，使钢和铁完全粘合，确保钢料处于刃口部位，一把剪刀的好坏在此定型；直缝是用手锤敲出剪刀里面的扭曲角度（俗称“缝道”），以保证两刃剪刀组合在一起时，剪刀只有两点接触，其他部分都分开。这是剪刀轻松灵巧



清光绪十六年（1891）钱塘县立“永禁冒用”碑保护“张小泉”品牌



刻花工序（俞美娜 摄）



锉外口工序（俞美娜 摄）

的重要工序之一，全凭钳手师傅多年的经验和感悟手工打制。

张小泉镶钢锻制剪刀具有“镶钢分明、磨工精细、刃口锋利、销钉牢固、开合和顺、式样精巧、经久耐用”的特色。产品花色品种有民用、工业用、农业用3大类81个品种300余种花色规格。

“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七、杭州雕版印刷技艺

杭州雕版印刷技艺是我国传统书籍印刷的重要技术，以其悠久的历史 and 独到的技法，在印刷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乃至世界印刷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杭州雕版印刷术起于隋末，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到宋代，杭州已成为全国刻书出版中心之一。至南宋，杭州刻书进入鼎盛时期。元、明、清直至民国，杭州雕版印刷一直盛行不衰。1957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成立木刻水印工厂，杭州雕版印刷技术有了质的飞跃，成为当时全国4处木版水印基地之一。

杭州雕版印刷术，是将需印刷的文字或图像，书写于薄纸上，再反贴于木板表面，由刻版工匠雕刻成反体凸字，即成印版。印刷时先在印版表面刷墨，再将纸张覆于印版，用干净刷子均匀刷过，揭起纸张后，印版上的图文就清晰

[1] 今中国美术学院前身。

地转印到纸张上，从而完成一次印刷。整个过程大体分为选材、雕刻、印刷3个程序，共有浸蒸、取板、刨涂、磨板、描稿、拳刀、崩刀、重刀、铲底、成型、对稿、夹纸、对版、调色、干印、湿印、“刷”、“研”、“掸”、烩版、拱花21种技法。



书籍印版

印版使用的主要是纹理细密、质地均匀、加工容易的木材，主要有梨木、枣木、梓木、楠木、黄杨木、银杏木等。枣木、黄杨木等质地较硬，多用于雕刻较精细的书籍和图版；而梨木、梓木等质地较软，多用于常见书籍和图版的雕刻。雕刻印版的过程可以大致分为勾描、拳刀、崩刀、重刀、铲底（剔空）、成型6个步骤，在校正无误后，方可进行印刷。

印刷过程中，纸张和颜料的质量决定着印刷的质量。印刷流程分：描对版稿、夹纸、对版、印刷，技法有刷、研、掸3种。为增加艺术感染力，雕版印刷技艺中运用“烩版与拱花”技艺。所谓“烩版”就是分色、分版的套印方法。通过分色的雕版套印，表现出画面的色彩、墨色、浓淡、枯湿的变化。“拱花”就是在木版平面刻上凹型的物象轮廓，再将宣纸覆盖在版面上，施加一定的压力，使之表面产生浮雕的暗纹，使作品体现出清逸淡雅的意味。

杭州的雕版印刷产品历来以“选材精良、刻工精巧、印刷精美”而著称。所制的水印作品，特别是印刷仿制的潘天寿等名家书画作品，更被称为“下真迹一等”，而且存世优秀作品众多。

“杭州雕版印刷技艺”于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八、中式服装制作技艺

中式服装制作技艺始创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是以手工制作中国式传统服装的独特技艺。“振兴祥”是国内完整保留至今且从未间断过中式服装生产的知名老字号。民国21年（1932），诸暨人翁泰校在杭州开设振兴祥成衣铺，由于技艺精湛独到，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高超制作技艺。1956年，振兴祥成衣铺等30余家前店后工场的成衣铺合营，更名为“杭州利民中式服装供销生产合作社”，云集了杭城早期中式服装制作业的大部分精英。翁泰校作为技术顾问，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裁剪缝制技术，使“振兴祥中式服装制作技艺”得到完整保留。振兴祥中式服装的款式，继清代的长袍马褂、旗袍、短衫之后，多数是男式长衫、女式旗袍、男式对襟短衫、女式大襟短衫、马甲，裤子多系大脚口折腰裤等。

100余年来，振兴祥中式服装制作吸收和传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服饰文化精髓，并结合现代服饰文明不断创新发展，形成了大襟、立领（又称“中国领”）、一字扣、镶、嵌、滚、宕、盘、钉、勾、绣等具有鲜明中华民族服饰风格的独特技艺。秉承“量身定制，精工细作”的宗旨，强调手工制作、个性化制作，能充分彰显穿着者的高雅气质。技艺传承完全是以师带徒，口口相传。

主要工艺流程包括：款式构思，强调量身定做，个性化制作；量度尺寸，要求态度必须谦恭，手脚麻利，一量即准；选用面料，面料全部选用杭州本地所产的高档织锦缎或丝绸面料；裁剪，分大裁、小裁、锁壳裁、对花裁等，要



振兴祥服装店（俞美娜 摄）



盘扣（俞美娜 摄）

求确定面料图案纹饰的方位，不得随意颠倒；缝制，对针迹密度、纱线走向、缝制规定、整烫等工艺都有非常严格的具体要求。一件服装制作完毕，外观浑然天成，看不出一点针头线脚。盘扣是振兴祥服装制作最鲜明的特色，也是纯手工的“绝活”。钉扣用灌针，钉上形态各异的花扣，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最后为成衣整烫和包装。“振兴祥”始终倡导环保、舒适、典雅、时尚的中国传统服饰理念。

“振兴祥中式服装制作技艺”于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九、西湖龙井茶采摘制作技艺

杭州西湖种茶最早的文字记载出于《茶经》。唐代，西湖产茶基本集中在天竺、灵隐一带。宋度宗咸淳年间《咸淳临安志》记载：“岁贡。见旧志载，钱塘宝云庵产者名‘宝云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产者名‘白云茶’。”足见南宋时期杭州西湖产茶已堪称茶中佳品。“宝云白云又垂云，无味之味乃至味”，说的就是宋朝西湖茶区产的“贡茶”。明万历《杭州府志》《钱塘县志》均对龙井茶的生产有记载。

龙井茶的优良品质源自于其采摘的时间点和采摘手法。西湖龙井茶采摘，以细致著称，归结起来有3个特点：“早、嫩、勤”。“早”，历来龙井茶采摘以早为贵，茶农们的茶事谚语为：“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变成草。”“嫩”，除采摘时间的把握外，龙井茶鲜叶采摘的细嫩度与完整性也很重要。“勤”，是指西湖龙井茶乡中世代相传的及时分批采摘制度。

西湖龙井茶的炒制工艺流程全靠手工完成，精致细腻。西湖龙井茶从枝头采下鲜叶



2016年杭州茶文化博览会开幕式上，现场炒制龙井茶

后，还要经历鲜叶摊放—青锅—揉捻—回潮—二青叶分筛与簸片末—辉锅—干茶分筛—挺长头—归堆—贮藏收灰10道工序。在龙井茶整个炒制的工艺流程中，“青锅”和“辉锅”工序是关键点，而控制火力锅温和掌握手法手势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炒制时，火力过高，细嫩的茶芽极易粘锅，使干茶形成焦边，滋味略显焦火味；火力不足，则茶芽易发腻，导致红梗红叶，茶色、汤色暗沉，香气、滋味稍逊一筹。

随着西湖龙井茶需求的增加，近现代开始，龙井茶的加工逐步融入机器加工的元素，如“青锅”等初制环节中，使用杀青机等制茶机器，以提高炒制效率。而其他流程，则更多保留传统的手工炒制法。上品西湖龙井在室温干燥环境中保存一年仍能保持“色翠、香郁、味醇、形美”的品质。

“西湖龙井茶采摘制作技艺”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十、西湖绸伞

杭州西湖绸伞始创于民国21年（1932），由杭州都锦生丝织厂研制成功，因伞面以西湖风景为图案，采用刷花工艺装饰伞面，故称“西湖绸伞”。传承至今已有80余年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发展绸伞生产、提高绸伞质量，建立了杭州风景绸伞厂，之后杭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设立了绸伞研究室，大大促进了绸伞生产的发展。西湖绸伞因其利用杭州本地独有的淡竹资源、杭州丝绸及杭州西湖风景装饰图案3项具有杭州特色的材料和图案要素，同时具有精致的选材、繁复的手工工艺流程和丰富的品种规格而名扬天下。

西湖绸伞主体由伞骨和伞面组成。伞骨采用古老的套合技艺，不用任何黏



烘焙工序

合剂；伞面采用丝绸，加以刷花、绘花和绣花等装饰。刷花采用多种套色，以杭州西湖风景为题材；绘花采用中国传统国画的技巧，以仕女、花鸟为主；绣花则题材多样，工艺精细，鲜丽秀雅，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西湖绸伞原料选用要求极高，浙江竹源丰富，但适合制作伞骨的唯有淡竹，且竹龄要3年以上，粗细规格在4.5~5厘米之间，竹节间隔不小于38厘米，竹筒色泽均匀，不能有阴阳面和斑疤。每年六七月份就赴产地选好并做上标记，俗称“号竹”，待霜降后才能砍伐。伞面原料采用乔其纱、真丝电力纺、真丝斜纹绸等江南丝绸。伞顶和伞柄选用坚硬细密的优质木材，高档的则采用牛角、象牙。

西湖绸伞生产工序有劈竹、串骨、劈青、绷面、上架、穿花线、刷花、贴青等18道，这些工序细分可多达100余道小工序。劈竹是伞骨制作的关键，将一段圆润



绷面工序



上架工序



贴青工序

青竹，分劈成32根伞骨，每根伞骨4毫米宽，如果粗一点的竹段则劈成33根，还需要“抽骨”，即抽掉一根，以保持竹筒圆润。穿花线即在伞骨、短撑上穿线。长伞骨、短撑上都有32排细孔，每排36孔，每孔直径不到1毫米，每排细孔间隔仅1~2.5厘米。制作时，一手飞快地旋转伞身，一手捻着花线针，在细密的缝隙中穿针引线，来回交叉编织网纹，一把伞共要穿296针，工艺精细。又如贴青工艺，须做到“三齐一圆”，即顶齐、节齐、边齐、收拢圆稳，制作者将每支竹骨的青篾，一支不错地胶合到原配伞骨的绸面上，使伞收拢时浑然天成。



刷花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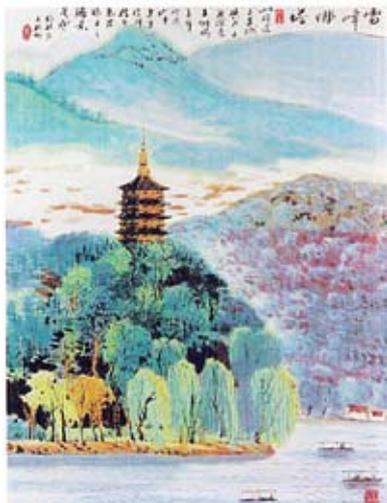


西湖绸伞（俞美娜 摄）

西湖绸伞种类可分日用伞、装饰伞、舞蹈伞、杂技伞、排须伞等。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绸伞伞面也有变化，用料除丝绸外，也用蓝印花布、手工万缕丝、电脑绣花布等。张开一把伞，收拢一根竹，西湖绸伞造型轻盈、设计奇巧、制作精细、外观高雅，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欣赏价值，具江南艺术神韵。

“西湖绸伞”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十一、杭州织锦技艺



《雷峰佛塔》(织锦)(来源于《西湖织锦》)

杭州织锦技艺以杭产桑蚕丝为原料，以吉祥图字案、名人书画、摄影作品为表现对象，在特制的提花织锦机上以手工织造而成。

杭州织锦历史可追溯至五代十国。根据《十国春秋》记载，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向中原王朝供奉的丝织品中就有“锦”的品种，并设置专门生产织锦的织室——官营织造工场。

南宋绍兴八年（1138）定都杭州后，为皇室服务并随之来杭的宫廷绫锦院、染院等工场的工匠带来了北方精湛的丝绸和织锦技艺，对杭州织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梦梁录》卷十八《物产·丝之品》记载：“锦，内司街坊以绒背为佳。”此时杭州地区生产的“织锦”融合南北织锦技艺，已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

元、明、清以后，织锦技艺更精。清厉鹗《东城杂记》记载：“十样西湖景，曾看上画衣。新图行殿好，试织九张机。”杭城大街里巷，“机杼之声，比户相闻”，被誉为“丝绸之府”。

清代前期，杭州开始用织锦来织制简单的山水图案。到了民国10年（1921），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织科毕业生都锦生经过反复的潜心研究，第一次用传统织锦技艺栩栩如生地织出了真实照片中的自然风光，将西湖风光织入织锦画中。他突破一般织物的提花方法，利用织物组织中的8枚缎子阴阳组织过渡（由经面8枚缎子组织过渡纬面8枚缎子组织）的方法，用来表达素描画中的阴阳暗面的过渡层次，织出第一幅丝织西湖风景织锦《九溪十八涧》，把杭州的织锦技



《归去来兮》(织锦)(来源于《西湖织锦》)

艺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民国15年，都锦生彩色古画织锦《宫妃夜游图》参加美国费城世博会并获得金奖，都锦生织锦由此成为中国杭州织锦的代表，名扬世界。

杭州织锦主要工艺流程有纹样设计、意匠纹制、装造、经线、纬线、织造、后期整理及包装成品检验等58道工序。其中独创的像景织锦意匠技艺五彩锦绣织锦的织纹穿吊装造法以及盘梭（纬）法、换道（纬）法、抛梭（纬）法、通经回纬挖花法等织锦工艺技法，均为杭州织锦特色，为中国织锦工艺的典范。

国务院原总理周恩来在1957年3月23日视察都锦生丝织厂时，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都锦生织锦是中国工艺品中的一朵奇葩，是国宝，要保留下去，要后继有人。”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都锦生织锦得到了保护和发展。

“杭州织锦技艺”于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宫妃夜游图》(织锦)(来源于《西湖织锦》)

杭州的方言是指杭州市行政辖区内的方言，是汉语的支派和地域变体，在现代汉语中跨3个大方言区，即吴语方言区，包括杭州老城区、余杭区、萧山区、富阳区、临安区和桐庐县；徽语方言区，包括建德市、淳安县；北方话方言区，指临安西北部与北方话方言区接壤，许多乡村说湖北、安庆话。杭州小片方言、湖州小片方言、临绍小片方言等，均属吴语方言区的北吴语太湖片方言。

一、方言

今杭州市域中的方言在汉语中跨3个大的方言区：一是吴语方言区，二是徽语方言区，三是北方话方言区。这3个语区的方言差别很大，特点明显不同。

杭州话属于北吴语杭州片。杭州有悠久的历史，古荡老和山一带有良渚文化遗址。五代时是吴越国的首府，南宋时为国都，元、明、清至今一直为浙江省省治，尤其是南宋时大批北方人迁来杭州，使杭州方言带上浓厚的北方官话色彩，在北吴语中独立成为一方言片。

余杭话属于北吴语湖州片。余杭境内话，总体上是较统一的，但口音也有不少差别。余杭北连湖州片的德清、安吉，东接嘉兴片的海宁、桐乡，西靠临安，南依杭州城边界地区，其方言或多或少受邻近方言的影响而使县内口音起变化。最具代表性的是余杭镇、塘栖镇、临平镇的话。余杭镇是旧县城，近临安，有临安话成分；塘栖镇近德清，有德清话成分；临平镇近海宁，有海宁话成分。现以临平话作为全区的代表方言。

萧山、临安、富阳、桐庐四旧县城的话属于北吴语临绍片方言。萧山旧县治属绍兴府，方言与旧绍兴府所辖各县（绍兴、上虞、余姚、嵊县、新昌、诸暨）的方言近，而与今市辖之临安、富阳、桐庐方言

远。萧山话解放后变化较大。尤其是从1959年1月改属杭州市后，杭州话大量渗入，语言逐渐融合。萧山话四乡口音略有不同，以城厢话为代表。临安话比较复杂，今临安已将旧於潜、昌化两地并入。现以临安话为临安代表方言。但於潜话、昌化话与临安话的差别是相当明显的，尤其是昌北话比较特殊。今富阳区已将旧新登并入。富阳方言以富阳话为代表，今新登话与富阳话差别比较小，不影响交际。今桐庐已将旧分水县并入。桐庐方言以桐庐话为代表，但桐庐话与分水话距离较大。相比而言，桐庐话与富阳话较近，分水话与杭州话较近。

建德话、淳安话属于徽语区中的严州片方言。今建德已将旧寿昌县并入。建德县旧治在梅城，今建德市治在白沙镇，方言以梅城话为代表。寿昌镇是旧寿昌县县城，方言有独立的系统，与梅城话有所区别。原淳安县和遂安县城治在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都已沉没于新安江水库库底，新淳安县城迁至排岭。排岭人口来自各地，口音较杂。建德话与淳安话相比，后者安徽歙县话成分更多。

杭州话使用的范围不大，大致东至下沙，南到钱塘江边，西自转塘至留下附近，北经拱宸桥至余杭三墩，东北经笕桥至余杭乔司之间。杭州是浙江省最大的城市之一，杭州话却是浙江吴语中最小的方言点之一。

杭州方言属吴语区太湖片方言。由于杭州话受外来方言的影响，与同片诸方言相比较，显得有许多特点。

外来影响最大的要数宋朝迁都临安。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从建炎元年（1127）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30年间，外籍居民已超过土著。当时南渡士民带来以汴梁为主的北方“官话”，对南方本地话施加影响。终于使杭州话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起了不小的变化，染上了浓厚的北方话色彩。

其次，清政府被推翻后，旗下营被迫解散，数量众多的旗人子弟和随军家属便混入杭州的普通百姓之中，他们浓重的北京“官话”，进一步使杭州话受到影响。

再次，对杭州话影响较多的是绍兴话。绍兴有句谚语：“经济人断勿得杭州路”，是说绍兴人来杭贩卖物品或经商定居的多。杭州也有一句谚语：“杭州萝卜绍兴种”，是说有很多杭州人的祖籍在绍兴。绍兴人多了，绍兴话对杭州就有了影响。

二、歇后语

西湖里放酱油——无济于事
吃得麦稀饭游西湖——穷开心
一根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
一脚跨过钱塘江——说大话
城隍山上看火烧——幸灾乐祸
西湖是没有盖儿的——要死自己去死
西湖边搭草棚——煞风景
做梦游西湖——想得美
西湖里挖月亮——枉费心机
白娘子遇许仙——两相情愿
白娘子哭断桥——怀念旧情
梁山伯遇祝英台——前世一劫
黄牛钻狗洞——大小不符
猢猻头上放鸭蛋——滑而又滑
痲子当作发背医——小题大做
屁股里吃人参——后（候）补
烧香望和尚——一带两便
王府里招亲——大来大去
叫花子吃死蟹——只只鲜
姜太公的坐骑——四不像
蜻蜓咬尾巴——自吃自
荷叶包刺菱——里戳出
半空里的灰尘——无着落
大蒜叶儿打气——混葱（充）
外婆的鞋样儿——老花头
床底下放鹞儿——一世不得高
拷儿鲞都是头——主意多

寿星老儿吃砒霜——活得不耐烦
老虎打雄——一回头
屁股画眉毛——大脸孔
吊死鬼搽粉——死要面子
老太婆坐花轿——浑沌沌
石板上甩乌龟——硬碰硬
和尚拜丈母——没遇着过
火筒里煨鳗——直死
泥水打墙——两面光
城墙上抬轿子——大荡转
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
三个指头捏田螺——十拿九稳
芥菜子掉在针眼里——碰巧
黄鼠狼跟了黄瓜宕——盲目追随

三、谚语

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旧指一些杭州人，只讲空话，不务实）
苏空头，杭铁头。（旧指一些苏州人不实在，杭州人刚直且强硬）
钱塘不管，仁和不收。（今杭州市区历史上曾分属钱塘和仁和两县管辖，此语谓某事或某地方现在谁都不管）

宠子不发。（指在溺爱中长大的孩子没有前途）

上赶江头，下赶湖墅。（江头即江干，说明做生意要信息灵，交易快）

急奔二龙头。（二龙头在之江一带，南宋时设西关于此。一说，当时西关甚热闹，人争趋之。另一说，西关每天下午规定关城门时间，外乡人来杭做生意要赶回去。今用此谚形容办事慌忙）

西湖日销寸金，西湖日产寸金。（西湖历史上为旅游胜地，消费大，而西湖历来又多产鱼虾莲藕，土特产丰富，收入好，故有此语）

城外楼外楼，城里天香楼。（指两个著名饭馆）

龙井茶叶虎跑水。(名茶、好水，被称为“双绝”)

初二、十六，店员吃肉。(旧杭州商界习俗)

西湖天下景，一世游不尽。(极言西湖景胜，景点极多，并随天时之变化而变化，无穷无尽)

西湖十样景。(指著名的西湖十景)

六桥三竺。(指苏堤六吊桥，上、中、下三天竺)

一湖二堤三岛。(一湖指西湖，二堤指苏堤、白堤，三岛指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

独自个上城隍山。(比喻人之无聊)

过了白堤有苏堤。(借指人做事要留有余地)

跳进西湖洗不清。(比喻人受冤枉)

打得船来，过了端午。(比喻丢失时机)

头伏火腿，二伏鸡，三伏吃个金银蹄。(指夏季三伏天饮食习俗)

年廿九，家家有；到除夕，家家急。(谓旧时除夕逼债)

双峰青，明日晴。(双峰指南高峰、北高峰)

九九落雪，西湖开裂。(气象谚语)

百年难遇岁朝春。(岁朝春指春节适逢立春)

踏雪迎春，大熟年成。(立春下雪年成好)

瘦人瘦马难过二月八。(谓二月初八，天气寒冷)

春东风，雨祖宗；夏东风，燥松松。(气象谚语)

晴冬至，烂年边。(气象谚语)

四、日常口语

早上、早半日——上午

日里——白天

日中——中午

晚快边儿——傍晚

夜里头、晚上头——夜晚、晚上

头毛——刚才
葛毛——现在
上毛——上次
旧年子——去年
辰光、时光——时候
豁闪——闪电
落雨——下雨
落雪——下雪
雪烱得来——雪化了
男人家——男人
女人家——女人
小伢儿——小孩子
男伢儿——男孩子
女伢儿——女孩子
阿爸——父亲
姆妈——母亲
爹爹——祖父
奶奶——祖母
阿哥——兄长
阿弟——弟弟
阿姐——姐姐
伯伯——伯父
大姆妈——伯母
小伯伯——叔父
婶娘——叔母
娘舅——舅父
舅姆——舅母
老公——丈夫
老婆——妻子

老头儿——泛指老年男人
丈人——岳父
丈姆娘——岳母
老信——用于指人
郎中——多指中医师
烧饭师父、厨房师父——厨师
贼骨头——贼
跷拐儿——瘸子
头颈——脖子
手膀——胳膊
大脚膀——大腿
脚踝头——膝盖骨及其周围
赤膊——光膀子
菜蔬——指下饭的菜
菜馒头——菜包子
肉馒头——肉包子
烧酒——白酒
老酒——黄酒
温吞水——温水
六谷——玉米
黄豆——大豆
番茄——西红柿
洋番薯——马铃薯、土豆
捧（音近“风”）——髌髌
薄（如：粥太薄）——稀
厚（如：粥太厚）——稠
壮（指动物）——肥
长（人长）——高
狭——窄

阔——宽
尽该、蛮蛮、木佬佬——很
蹩脚、起泡、推板——差
不乖——顽皮
吃力——累
发靛——可笑、好笑
难为情——害臊
濛濛湿——很湿
冰冰阴——很凉
墨墨黑——漆黑
慢慢交——慢慢地
好好交——好好地
糊达达、糊里达喇——黏黏糊糊
讨老婆——娶媳妇
嫁老公——出嫁
生病得来——病了
肚皮层（音同“查”）——拉肚子、腹泻
发寒热——发疟疾
看医生、看毛病——看病
捞痒——搔痒
做事体——干活儿
吃酒——喝酒
吃烟——抽烟
吃茶——喝茶
洗浴、汰浴——洗澡
倒霉——丢脸
寻事儿——找岔
闹架儿——吵架
起来——提起来

睡觉——睡觉
歇力——休息
耍子——玩儿
晓得——知道
有数——懂了
记牢——记住
粘牢——粘住
特为——故意
打呃得——打嗝
打一记——打一下
一滴滴——一点儿
一息息——一会儿
杀瘟猪——敲竹杠
毒头——指脾气古怪或行事乖张的人
瘟孙——指无用的人
吃相——谓态度，如“吃相难看”，即态度不好
滕头——喻人固执己见，不可说服
勒格——形容善于挑剔的人，难与相处
汪颡——用以称蛮不讲理、态度凶恶的人
寿头——称不合时宜的人
枣儿瓜——喻不知好歹的人
别苗头——与人竞争，比高低
上轧头——喻遇棘手事，两面受挤
牵煞煞——谓扭怩作态，取悦于人（多指女性）
大青娘——少女的一种旧称
起搁头——作梗，或寻衅
牵头皮——因某人或某事受牵连
门分账——原指应得之分，后引申为指应做之事
半吊子——指对某事一知半解、似懂非懂

接口令——指回答别人说话的本领
碰鼻头——指做事碰壁或寻人未遇
吃盾白儿——指受人驳诘
吃空心汤圆——比喻向别人许了愿而不能兑现
钉头碰铁头——比喻硬碰硬，互不相让
为好跌一跤——意谓出于好的愿望办了某事，不仅不被理解，反遭人怨
回汤豆腐干——指人被辞退而复入
吃隔夜螺蛳——喻人说话啰唆，纠缠不清
蚂蚁扛蚕头——比喻人多活少，许多人聚在一起做少量的工作
歪了头由自己说——意谓听不进意见，自以为是

一、生活习俗

(一) 送春牛图

旧时立春日，杭州民间，有春官送“春牛图”预兆丰收的风俗。此俗始于南宋，俗称“打春牛”。《武林旧事》载：“（立春）前一日，临安府造进大春牛，设之福宁殿庭。及驾临幸，内官皆用五色丝彩杖鞭牛。”《梦粱录》卷一载：“街市以花装栏，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胜，各相献遗于贵家宅舍，示丰稔之兆。”清末，杭州尚有此俗。立春前一日，杭州府知府暨总捕厅、总事厅、水利厅同知，及仁和、钱塘两知县，均着官服，坐无顶无帷显轿，全副执事，至庆春门



送春牛图

外先农坛迎请句芒神，供于神亭。句芒神彩画端正，长约2尺，头有双髻，立而不坐，手执牛鞭，似牧童之像。迎时，神亭前又有纸牛、活牛各一头，或抬或牵，随之而行，即所谓“春牛”。可任人鞭打，俗谓“鞭春牛”。并有彩亭若干，供瓷瓶于中，插富贵花，及“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等字。伴以大班鼓吹、台阁、地戏、秧歌，沿街唱舞，意为劝农。进城之后，夹道聚观，争掷五谷，称为“看迎春”。最后将句芒神及春牛供于杭州府衙门前，挂灯结彩。至立春之前一时，句芒神起身，上城隍山，称为“太岁上山”。迎春之日如遇下雪，杭人俗称“踏雪迎春，大熟年成”，主丰收。

（二）蚕猫辟鼠

所谓“蚕猫”，是一种象征物。养蚕农家最恨老鼠啃咬蚕种纸和蚕茧，世代传承着一种用蚕猫避鼠患的习俗。蚕妇们不仅将蚕猫作为避鼠物，而且也作为一种供观赏的传统工艺品。民间创作的蚕猫样式有彩绘、剪纸、泥塑等。剪纸蚕猫大都由蚕妇自己用红纸



半山泥猫

剪出各式各样蚕猫图像，贴在花窗、墙壁或蚕匾上。农村蚕户喜爱泥塑彩绘蚕猫。每逢清明前后，蚕妇们都要到杭州半山娘娘庙烧“蚕香”，在香市上购买泥塑彩绘蚕猫，回去放在蚕房里，或馈赠亲友。清人范祖述《杭俗遗风》记载：“半山出产泥猫，大小塑像如生，凡至半山者，无不购泥猫而归，亦一时之胜会也。”

（三）采茶

西湖茶乡有“女采茶、男炒茶”的习俗。开采日，全家要吃青团子。炒茶之夜，要吃红糖鸡蛋。采茶讲究时间，茶谚说：“前三日早，正三日宝，后三日草。”

（四）青龙吉利

除夕夜，商店都要在财神堂上吊串“纸元宝”，意为财神送宝。钱柜上则贴财神菩萨图像和“一本万利”等吉利红纸条。秤尾要扎上红线，秤钩要吊只“纸元宝”。招牌上还要挂上神马，称为“青龙吉利”。夜半封门，先放“封门炮”，祭门神，然后将门关上，以写有“封门大吉”字样长红纸两条，交叉斜贴门上，随后以红皮甘蔗两支倚门，称为“馊门甘蔗”，取甜福倚门的意思。此外，各商家店铺都有摆“分岁酒”的风俗，亦叫“吃岁饭”“吃年夜饭”，宴请店内掌柜、管账、跑街、店员等。管账必须随带当年账目清单，俗称“红单”，向老板汇报。

席间，老板亲自执壶，为辛苦一年的职工斟酒。酒毕，都要吃一碗“油菜汁水年糕汤”，寓意来年油水好，赚钱多。如果辞退职工，只要把席上的菜肴鱼尾巴朝向他，那位职工一见自明，当晚即卷铺盖，黯然离店。

大年初一，各商店虽不营业，但必晨起开门，燃放“开门炮”，并以红纸一条，书写“元旦书红，万事亨通”“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等语，贴于店堂上，以图一年吉利。

（五）喜接财神

年初一到年初四，只有茶坊、酒肆、杂货店等俗称“长生店”的商号照常开业。其他商店一般要到年初五接过财神，才开门营业。

年初五为“财神日”，亦叫“五谷财神日”。此日祭仪隆重，祭品习惯用猪、羊、鸡、鹅、鱼等。猪用猪头，称为“利市”，旁边摆一猪心和猪尾巴；羊摆羊头，中设一刀羊肉，表示用了“全猪全羊”。鸡鹅都要雄的，意思是鸡啼鹅叫，闹猛兴旺。鱼多用两条金红的活鲤鱼，用红纸遮眼，寓意鲤鱼跳龙门，吉庆如意，有的还把供毕后的鲤鱼放生于江河之中，以讨“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彩头。

各商店对新年第一个顾客登门，十分礼重，有敬奉“元宝茶”的风俗，即在茶水中放上两枚青果或金橘，认为开年头一桩生意顺利，全年生意都会顺顺利利。

二、礼仪习俗

（一）婚礼发奁

结婚日期确定前一天要发奁，俗称“发嫁妆”。旧时，富裕大户嫁妆甚厚。嫁妆先在家中布置陈列，何物在前，何物在后，都有一定的格式。到了男家必须照原样陈列。最前面的嫁妆，必为子孙桶，桶内盛有红蛋、喜果各一包。女家嫁妆无论如何丰富齐全，唯有眠床必须男家准备。女方嫁妆必须在棉被内放一些花生，以讨“生儿育女”的吉利。

（二）婚礼敬茶

茶在民间旧式婚礼中，自始至终都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茶树长成后必然开花结籽，所以订婚时，男方以馈赠茶叶为礼，加上其他饰物和糖果包等，称为“下茶”，预祝“生儿育女”。在新娘的嫁妆中，一般都陪嫁有八角式的锡制茶瓶，供贮藏茶叶之用。结婚行礼后，新郎新娘向长辈行拜见礼时，除三叩首外，还要献上香茗，作为一种尊敬的象征；长辈要摸出红纸包的拜见钱，放在茶盘上，仪式才算结束。



大运河湖墅婚典

结婚行礼后，新郎新娘向长辈行拜见礼时，除三叩首外，还要献上香茗，作为一种尊敬的象征；长辈要摸出红纸包的拜见钱，放在茶盘上，仪式才算结束。

（三）三朝回门

即新亲上门，就是女方亲属上男方去，旧时都要在结婚第三天举行。现在男方习惯第二天就邀请女方父母及兄弟姐妹上门。旧时还有吃三道茶等礼节，现在大都改为吃一餐新亲上门酒。婚后三天，新郎陪新娘回娘家，拜见岳父岳母。旧时，新娘回娘家，多则住一个月，少则七天，再由新郎接回家。

（四）催生礼

产妇怀孕足月，产期将届，娘家要行“催生礼”。催生礼物根据习俗和经济情况，有丰有俭。清末民国初，富庶之家以银盆或彩盆，盛麦秆一束，以锦或纸盖之，上簇花朵、通草、贴套，取三男二女之意，并有彩画鸭蛋120枚、枣子、栗子及孩儿绣蓬彩衣。男方，一般人家都送喜蛋、桂圆及婴儿襁褓，并携笙一具，吹之而进，以表催生之意。现在，大都送火腿、鸡蛋、桂圆、面条、红糖等产妇吃的滋补品和婴儿穿的衣衫、童毯等。

（五）生日庆寿

杭州习俗，50岁以下的诞生礼称为“过生日”，50岁以上的诞生礼称为“做寿”。

生日：民间有“逢十”举行纪念和庆祝的习惯。杭谚“有钱不做三十，无钱要做四十”。旧时，结婚较早，40岁已子孙满堂，即使无钱，也要过生日。也有的认为19岁、36岁、66岁是人一生中三大难关，到40岁已过36岁这难关，应做生日庆贺。但“四”与死是谐音，为避讳，特地提前到39岁时由家人、亲友为其过生日。

寿庆：50岁、60岁、70岁、80岁以上，通称“寿庆”，俗称“做寿”。杭俗“男不做十，女不做九”。因“十”与“贼”同音，为避讳提前一年做寿，俗称“做九头”。若父母同庚和而做寿，俗称“双庆”。

六十六寿辰：民间认为人活到66岁，是第三难关。杭谚“活到六十六，阎王要吃肉”。六十六寿辰前一日，必须由女儿（若无女儿，则由儿媳或侄女）烧68块肉，用精猪肉，切成丁块，用酱油红烧。寿辰之日，敬天1块，敬地1块，敬父或母66块，祝愿父母吃了能够长寿。

三、节日习俗

（一）春节

春节俗称“新年”，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由古时一年农事完毕，喜庆丰收，答谢神的恩赐的“腊祭”发展而来。

杭俗年初一早起放爆竹，称为“开门爆”。将除夕封门时倚于门板的甘蔗置于厅堂画桌两旁，取“渐入佳境”之意（甘蔗从梢到根，一节比一节甜）。再拿除夕预书的“开门大吉”红纸条，贴于大门之上。

早餐必取甜食，如糖莲子、糖年糕或甜汤团，寓意“一年甜到底”。除夕煮饭，必多于平日，取“吃剩有余”之意；饭盛于新箩中，把橘子、年糕放在上面，年初一蒸而食之，称为吃“隔年饭”。晚上，家家早睡，名为“赶鸡宿”（鸡眼夜盲，鸡于黄昏归宿）。



春节期间，南宋御街上的民俗活动。

是日不动刀（不杀生），不扫地（怕把财气扫走），不动针线（怕一年辛苦）。

年初一晚间，在祖宗神像前供酒和菜饭。有的人家日日如此，直至正月十八。有的人家在白天携肴馔、香烛祭扫祖先之墓，谓之“上年坟”。

年初三为“小年朝”，宅旁有井人家，早晨供香烛于井栏前，并将井上除夕所封的红纸条揭去，名曰“开井”。

年初五为“财神日”。此日，各家各户，尤其商家，要烧纸敬神，名为“烧五纸”。各店（除茶店、酒店、杂货店等新年不关门外）至初五开店门，称为“做好日”。家家又须购“寸金糖”供祖先，取“日进寸金”之意。

新岁之中，人人须拜年，至亲密友必亲躬。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正月初）士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有的不能亲到，则派人拿名片道贺，此名片称为“飞片”，大户人家还特置一门簿，以记客人的往来和飞片，于其首虚拟“亲到者”4人：一曰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坊巷；一曰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一曰贵无极大人，住大学士牌楼；一曰福照邻老爷，住五

福楼，以图吉利、讨口彩。出门拜年自正月初二始，至正月半止。以辈分大小为次序，拜年时随带礼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春节期间敬鬼神的气氛明显淡薄，而人情的内涵更加丰富。

（二）元宵节

杭俗元宵节有灯市，一般正月十二开始，正月十八落灯。正月十五过元宵，灯市最盛。

十二日这日，将新做成的龙灯（两眼暂不点睛），抬至城隍山龙神庙，拜供后，以墨汁点其睛，曰“开光”，俗称“龙灯上山”。

十三日为上灯夜，家家户户以糯米粉搓成小团，煮以供祖先，名为“上灯圆儿”。

十五日以糯米粉搓成大团，其中馅有切细的核桃、花生、芝麻、红枣、鸡油、豆沙之类，名曰“灯圆”（民国后，菜馆中以油炸之，称为“炸元宵”）。以灯圆馈送亲友，名为“灯节盒”。

元宵灯火，以龙灯为最闹。此外有船灯、马儿灯、兔儿灯、鱼儿灯、走马灯，亦有生肖灯等。各灯皆随龙灯喧闹于街巷，也有满街悬挂的。大户人家请舞龙灯者在家里盘舞一番，称之为“拦龙灯”。



“运河之春”元宵灯会

（三）寒食节

清明前一天（一说两天）为寒食节。古人从这一天起，三天不生火做饭，禁烟火，吃冷食。后人因寒食节与清明节时间相近，遂将寒食习俗并于清明习俗之中。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载：“人家上冢者，多用枣姜豉。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祭者尤多。”杭人多借出城祭扫祖墓为踏青之戏。杭州解放以后，机关、学校人员则多在清明日祭扫烈士墓。

（四）端午节

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重午节”“端阳节”。是日吃“五黄”，即雄黄、黄鱼、黄瓜、咸鸭蛋蛋黄和裹在粽子里的黄豆板。

端午有吃粽子习俗。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载：“人家包黍秫以为粽，束以五色彩丝。”

端午节处在梅雨期前后，潮湿蒸郁，百物生

霉，杭人有打蚊烟的卫生之习。以苍术、白芷及各种燥烈之物，杂而焚之，紧闭窗户，使其烟弥漫一室中。

据唐《语林》记载：“杭州端午日，竞渡于西湖，先期列舟舸于湖滨。”可见，西湖竞渡，唐时已行。清时，端午前后仍有龙舟竞赛之戏。道光年间（1821—1850），湖中竞渡，溺毙至数十人之多，官厅因而禁止，不准复行。端午日，城里东河中也有竞渡，坐船从艮山门水门来的游人敲锣打鼓，名曰“游短景儿”。留下、蒋村每年端午举行龙舟盛会，至今不衰。



西溪龙舟文化节（西湖区政府办公室 提供）

（五）七夕

七月初七为七夕，相传是牛郎织女渡银河鹊桥相会的日子。杭人有乞巧之俗，以面粉和糖制成各种小型的物状，油煎后名为“巧果”。是晚，将巧果、莲蓬、白藕、红菱等皆陈于庭院，妇人对月穿针，以祈织女赐以技巧。又捕蜘蛛一枚，置于盒中，第二天蜘蛛在盒中结网，则为“得巧”之验。又取雨水和井水各一半，盛在碗内，放在露天过一夜，第二天水上结薄衣，投一极小的针浮其上，视其水底的倒影，若像杵，则为拙；若像剪刀，则为巧。

（六）中元节

七月十五为中元节。俗传上元（正月十五）为人节，中元为鬼节，又称七月为鬼月。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四记载：“此日都城之人，有就家享祀者，或往坟所拜扫者。”

杭谚曰：“七月十二接祖宗，西瓜老藕瞎莲蓬。”杭人有中元接祖之俗。中元节前两日，凡新丧之家，灵前悬白灯，结白彩，供细点，拜忏念经，称为“拜中元节”。

七月十五祭祖，须有素馄饨一碗，以面粉皮裹以雪里蕻及豆腐干馅子。这天，寺院设盂兰盆会或盂兰盆节。“盂兰盆”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救倒悬”以报父母。佛经《盂兰盆经》载有佛陀（释迦牟尼）的弟子目连救母的故事。于是，佛徒们出自为现生父母增福延寿，为死去父母离苦得乐，便在这一日广设“盂兰盆供”以招待十方众僧，借此以报父母养育之恩。民间常集资搭台演出戏文《目连救母》。

（七）中秋节

八月十五为“中秋节”或“仲秋节”。中秋之夜，月亮最亮、最圆，故把它看作团圆的象征，又称为“团圆节”。

中秋食月饼，夜则设以祭月，取人月双圆之意。祀品有月饼、方柿、石榴、栗子之类。祀月时在天井中搭台，设案、点斗香。点斗香，即以纸糊作斛形，

内盛沙，插香于其中。据《杭俗遗风》载：“其式四方，上大下小，纱绢糊之。上缀月宫、楼台、殿阁、走马灯景，四角挑灯，大者四围各宽二尺许，出售处以琵琶街为最多。”

平湖秋月、三潭印月、月岩三处为杭州中秋赏月胜地。《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是夕，人家有赏月之宴，或携榼湖船，沿游彻晓。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日。”凤凰山的月岩，每到中秋，月光以岩孔穿出，幻化成一轮明月，天上地下，相映成双。

中秋佳节，杭人喜欢赴满觉陇赏桂。杭俗常以桂花栗子羹应市。

（八）观潮

八月十八是杭人观潮日。《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郡人观潮，自八月十一日为始，至十八日最盛，盖因宋时以是日教阅水军，故倾城往看，至今犹以十八日为名。”其时又有“弄潮”之戏：“伺潮上海门，则泅儿数十，执彩旗，



钱塘观潮节

树画伞，踏浪翻涛，腾跃百变，以夸材能。”《杭俗遗风》载：“候潮门内至闸口沿江十里，均可看潮。……起始之时，微见远处如白带一条迤邐而来，顷刻波涛汹涌，水势高有数丈，满江沸腾，真乃大观也。”清初江流改道，看潮者必去海宁。今萧山开辟有新的观潮点，赴海宁、萧山观潮者也逐年骤增。

（九）重阳节

九月初九为重阳节，亦称“重九”“九九重阳”。杭俗有登高之举，一般登城隍山或葛岭初阳台。《杭俗遗风》载：“是日城隍山登高，吃糖炒栗子、鸡豆，带游斗坛、文昌、关帝、火德等庙。”杭人俗传葛岭初阳台见“日月并升”之天

象，为葛洪炼丹成功，白日升天之时。

重阳家家皆食重阳糕。重阳糕以糜栗粉和糯米拌蜜蒸熟，切斜方形，上插彩旗。插旗之风，南宋已有。据《梦梁录》卷五载，杭城重阳节尚时兴“狮蛮栗糕”，“以五色米粉塑成狮蛮，以小彩旗簇之，下以熟栗子肉杵为细末，入麝香糖蜜和之，捏为饼糕小段，或如五色弹儿，皆入韵果糖霜，名之‘狮蛮栗糕’，供衬进酒，以应节序”。

杭俗于重阳节修灶，付给匠人工工资必加倍。

(十) 腊八日

十二月初八谓腊八日，亦称“腊八节”。

腊八节，又是佛祖的成道节。为了纪念，杭城各大寺院于每年腊月初八日熬制“腊八粥”供佛，并馈赠前来进香礼佛的信徒。后杭人于此日也以核桃、松子、莲子、红枣、花生、桂圆、荔枝等煮粥，送给亲友，名曰“七宝五味粥”。



胡庆余堂国药号派送腊八粥

（十一）除夕

除夕之前，腊月二十三日，家家送灶神。杭人送灶神时，用“善富竹灯”一盏，糊以红纸，以竹筷一双为轿杠，亦糊以红纸。送灶时祀之以三果（福橘、黄菱肉、荸荠）、三素（香菇、木耳、千张）与灶糖。

腊月二十四日俗称“小年夜”。在此之前，家家扫宅舍，杭俗谓之“掸尘”。

年三十即除夕，家家必祀年神，俗谓“烧年纸”。岁终祀神多用猪头，亦有五牲者，即鸡、鱼、肉、羊肉、腌猪头。送神之后合家团聚，名曰“散福”。

除夕挂祖宗遗像，晚间祭祖宗，祭品丰富，且多有取义，如猪大肠曰“常常顺利”，鱼圆肉圆曰“团团圆圆”。祭祖完毕，合家团聚，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这顿饭叫“合家欢”。这天也要给猫狗好食，称“猫狗分岁”。

午夜接回灶神，取新购的灶司神置于灶中。宅旁有井的，供净茶一杯，焚送小元宝一副，随以红纸长条纵横粘于井栏上，名为“封井”。还有封门之举，即用红皮甘蔗两支，其长相等，各以红绿纸束之，祭门神，祭毕，关门上闩，以长红纸两条，各书“封门大吉”四字，相交斜贴门上，并以甘蔗倚于门板。未至天明，切忌开门。

是夕，家中小孩须向尊长跪拜，谓“辞岁”。尊长须给小孩“压岁钱”，给儿媳银圆，用红纸包封。小孩将压岁钱与红橘、荔枝放在枕边，次日醒后，取而食之，谓“开口吉利”。有通宵不睡者，谓之“守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杭州精览 / 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 —杭州 :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213-08721-9

I. ①杭… II. ①杭… III. ①杭州-概况 IV. ①K92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6763 号

杭州精览

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王福群

责任校对 姚建国

封面设计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电脑制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419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8721-9

定 价 8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